

FBI 联邦调查局女特工

第一部 性单纯

(一)

我一直渴望着性的单纯。

今天是“逃避者”体育场的盛大节日。我只需呆在匹科街的加利福尼亚第一银行里查看几段监视镜头的胶片，之后便可以沐浴在来自切文斯峡谷的和风中。马丁内斯和德北克队之间的棒球战，一只道吉狗，或盛在大杯里的冰麦芽乳，就会让你感到生活慵懒、满足得像一只肥笨的汽球。

我必须和那位银行经理聊上一阵，前天这里刚被抢劫。我们当然已经来过这里，并进行了初步检查。但是经理看起来好像至今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劲来，需要人的安慰。他差不多有 50 岁，是一个长着浅色头发的马拉松爱好者，肩有些伛偻，穿一件马德拉斯产的蓝色夹克，里面衬着漂亮的浅紫色内衣，灰色的便裤。在他的办公桌斜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块凯文利斯国际公司的金属徽饰。

实际上他的管理无甚纰漏。这是一家新开的分支银行，闪亮的橡木地板，底色是大幅的彩画，镶有黄铜条嵌成的花形。女出纳员穿戴着可人的时装、珠饰，而男孩子们头发裁剪齐溜，身着一律的宽肩西服。仅靠他们那点微薄的薪金，负担这样的打扮有点不可想象。沿着各式储蓄计划、贷款图表走下去，在后门旁有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壶咖啡和一盘巧克力小饼。劫犯正是从这儿消失的，包括那 734 美元现金。

经理用他那骨棱、颤抖的手指拉着我的胳膊。这是他银行生涯里遇到的第六次打劫。每经历一次，他的周期性偏头痛症便剧烈地发作一次。只要看到抢，他对我说，就会变得面红耳赤。我得尽我所能的给他某种心理上的支持（那时我自己心里还在争论究竟应该由朱恩·萨米欧还是布莱特·布特勤担当第一击球手），提醒我们是居住在美国的银行劫匪之都，在联邦调查局的洛杉矶地区分局里，我们每天都得对付也许是十件劫案。特别是如果你的银行附近靠着两处干道口的话，倒霉事就非找上你不可——不过还好，没有人受伤，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低级冒险，几个坏家伙只是让工作流程稍微打断了一下而已。

我是在浪费时间，也并没有打消他的顾虑；他崭新的瑞士小挂钟在枪管粗暴的撞击下已不成形状，再也不能发出令人信赖的“踢嗒”声。FBI 在事件之后即到达这里。而现在，则是这位身高五呎四吋的女特工。她即使是在节日里也不会穿那种垂过膝盖的灰色套装，而总是那一件 T 恤衫和牛仔裤，还有，很抱歉我得说，还有一双粉红色的“凯德”高跟鞋。她一直跟在这位凯文利斯俱乐部的可靠伙计身边，以她玲珑的身姿和耐心的态度信誓旦旦地保证这样的倒霉事绝不会再重演了。

我不得不爬上梯子去取那些胶片。有一半时间里里面没有任何胶片，因为这些家伙们根本就忘了启动摄影机。不过今天算我的幸运日，因为通常我都免不了要受到我的拍档，麦克·唐纳多的骚扰，他喜欢叫我去爬那该死的梯子，这样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死盯我的屁股蛋。当然那不过是个玩笑，因为他早已经结婚。我们在一块儿快三年了，有一次我把我的黑头发染成红色让他足足痴迷了一周时间。今天我是单独行动，唐纳多正在休假。

我发觉，当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时候便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

我取出胶片，又把一卷新的塞进照相机。经理留在桌边，正满肚子不高兴地把杯子里倒着某种药茶，嘴里还在叫着我“长官”。我走出银行钻进泊在林荫里的车中。收音机 AM 波段正在转播“逃避者”体育场里进行的比赛。这时我看到一个男人走出一辆轿车，戴上太阳镜。棒球帽压得很低，几乎盖住了眼睛，行为诡秘。他正在扣一件短袖衬衫，但是里面他已经穿着一件了。衬衫下面有什么东西，鼓出一大块。

他看见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试图推想他可能是因为劫案派到这里来的暗探。我面无表情地呆着，没有笑容，我们的目光对视了一阵，直到他先避开。他摇了摇头，又回到他的车上。

我得到的全部信息是：那是个白种人，六呎高。我不知道他走回车子是否是因为他看出我是干这行的，或者是因为他恰好忘了带证件——他衬衫底下的要么是只随身听，要么就是一支勃朗宁手枪。我决定记下他的车牌号。

于是我把福特车开到他的车后。这时他正在倒车，我们差点就撞在一起。我记下了牌号，然后打开转向灯，缓缓滑出停车坪，一副打算离开的样子。头也没有歪一下，只是眼睛通过后视镜清楚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他一见到我转弯，立即又驶回停车位，关掉了引擎，窜出车，朝着银行走过去。这一刻我突然对唐纳多极其痛恨，我在这里孤军奋战之时，他却和妻子在遥远的卡塔尼娜。作了七年的外勤特工，我至少有 12 次不得不拔出枪来，但那时总有拍档在一起，要不身后也有强大的支援。我们不是地方警察，不能仅仅出于怀疑就随便抓人。除非是突发的恶性事件，否则在我们采取措施前都必须向地方检察官提供明证。我们的行动置于谨慎的管制之下。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一种飘忽的位置。但好像是得到了老爹老妈的忠告，在特工学校受训时记下的两条原则闪现在我的脑海中：保持清醒……照章办事。

如果我呼叫“211”寻求支援，LAPD 会立即收到并派出六辆尖叫的巡逻车，同时通过调查局的无线电同银行取得联系，提醒他们又一名劫犯要光顾他们了。如果我是对的，这确实是一桩劫案，随后发生的就可能是一场流血灾难；如果我错了，那人只不过是一个戴着棒球帽的饭桶，那么我就可能被骂得狗血淋头，剩下的时间也别想再到体育场去找清闲了。

我驶回停车坪，把车藏在一辆卸货车的后面，然后开始整理头绪：我现在的工作是保证银行里面的事情不变糟。我让他先进去抢劫，然后也让他出来，这种办法会使每个人感到高兴，除了银行经理，哪怕他是个低胆固醇，也可能发作心脏病。银行当然是保了险的、顾客只要不乱动会很安全。可要是我进去打扰他的话，倒不一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

我注意听着警用频道的讯息，准备随时听到 LAPD 的调度员说：“211 请听好，加利福尼亚第一，匹科 11712。”这就意味着那些训练有素的年轻通话员中的一位已经接到了警报。但是，我仍然只听到一些执行例行警务时的粗厉的嘈杂声，甚至盖过了附近两条干道上的喧嚣，而同时，我的紧张也达到极点。如果那个杂种出来了我该怎么办？他可能极其兴奋，比我跑得还快——这时我突然被一丝恐惧攫住了：防弹背心和霰弹枪可都还在车尾的行李箱里。

事实上，那家伙走进银行才不到九十秒钟的时间，但坦白地说我有些慌张，所以坚信银行里面已变得乌七八糟，漂亮的橡木地板上一定洒满了市民的鲜血——而就在我最终去拿无线电话的时候他跑出来了，满把的钞票，英

雄般地环顾四周，把他的棒球帽抛得远远的，又扯开了那第二件衬衫。

我仍然没有看到那支枪，也没有看到任何犯罪的迹象，但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会这样冲出银行，一面乱扔衣物的，在那一刹那间，一种罕见的稳健和充足的判断力使我有决心超越法定的规则。就在他关上车门的时候，我的车已飙到他的前边，堵住了出口，然后我扑向他，准备搞清楚他是不是想去见上帝。

我握着一支玛格勒姆·357，在车窗玻璃外几寸的地方对准了那家伙的耳朵。

“别动——否则我会敲碎你的脑袋，让它像只熟透的红瓢西瓜。”

他不再扭动钥匙，抬起头来用一双粘乎乎的眼睛望着我。

“现在我可真的有点神经质，所以你最好别逼着我用这玩艺儿，否则我即使不杀了你，也会叫你终生残废。”

如果你想叫别人清晰、迅速地明白他的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些陈词滥调通常还是有效的。

他似乎被枪管吓迷糊了。从他那边看过来，那无异于一门火炮，一个虽然形貌不清楚但无疑有充分自信的人就在它背后一臂远的地方。

“两只手放在挡风玻璃上，对的，对的，要慢。”

他举起了手，手掌张开贴在玻璃上，粘满灰尘的头发湿透了散落在头上。下腹部抵着驾驶盘，大概弄得他挺不舒服，看上去有点恼怒，又颓丧的样子。

“别乱动，否则我会把你的脸捶扁。”他没有动，“现在，打开车门退出来。”

门打开的时候，我的枪抵进了他的后脑勺，另一只手从他腰带上取下了那块鼓囊的东西。那是一支发号枪。

“趴在地上。手放在背上。”

他只好俯在混凝土地上。我给他上了铐。

“回到车里去。坐前排。脸冲下。”

他进去了，垂着头。肾上腺素在奔涌，一瞬间我变得敏锐起来，感受到了我以前从未感受到的东西，就像是在正午阳光的剧晒下，我几乎不能喘息了，汗水在我的臂弯和双乳间滴滴。

可我还没有把这该死的事情全部搞懂。

人们开始往停车坪里涌，他们仿佛看到了什么古怪的场面一样，脚步都僵了，一个脸色。

“我不敢相信你还在这里。”是银行经理，他也喘得厉害，“我们刚刚又被抢了……但是，”——似乎确实不敢相信一样——“你抓住他了！”

“所以他们才愿意付给我大价码。”我抓起无线电话。这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变得非常冷静：“我是 345，匹科街 11712 号加利福尼亚第一银行刚刚发生一起案件，已处理完毕，抓获一名男性目标。请求派人协助。”

那一端一阵沉默：“再说一遍？”

好吧。我尽量保持着冷静：“我抓住了那个从银行里出来的笨蛋。”

又沉默了一阵，然后那边说：“你是在吓唬我吧。”

我听到话筒里继续传来各种警号，这时已壮起胆来的银行经理，我的委托人和刚认识的最好的朋友，刚刚从七次被劫的绝望中挣扎过来，重新爆发了对文明的希望，正急急忙忙朝四周围拢过来的人群高喊：“站远点。”此时，远处飞过来一架直升机，人们又都往空中望去。一位 LAPD 的警官在我们

头顶上，手提着扩音筒喊到：“你怎么样？”

我给了他一个“OK”的手势——手指在头顶一挥——然后他就斜飞出去，那个疯狂的拉脱维亚机师是想把直升飞机就停在车坪的空场上，警报呼啸着，起码有一打来自威尔郡的孩子跟过去想看 he 怎样做。场面好看极了。

第二天早上很清闲，我那一组的人都有在清晨八点喝咖啡的习惯，他们都在等着我。而我前一天晚上一直呆在办公室里，直到深夜才算把书面报告弄完。

我得到了一圈掌声，他们送给我一只三尺长的手臂模型，绿色，泡沫胶制成，竖着食指，No.1。另一件有意义的礼物是从棒球场弄来的：一只用纸板剪成的道吉狗，全身用闪亮的铝箔包裹起来，还有双份的花生果，和我最喜欢的冰麦芽乳，融化在凉滋滋的美味果泥里。

“我们都认为你现在春风得意，”凯乐·维依说，“当然，如果没有我们大伙儿在就难说了！”

其他人都笑了。他们没有走是因为他们全在我的箝制之下。

“我们的长官正在华盛顿出尽风头，为什么我们却在这地狱底下做着美梦？”弗兰克，带狡黠的笑容说道。

“关他什么事？噢，他妈的狗屎。”

这时候麦克·唐纳多正躺在椅子上，双脚搁在桌子上，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一只手扯着他亚麻色的络腮胡须，好像这样就可以把它变成灰白色。大家都围着他是自然的，他比我大十岁，也是组里的长者和精神领袖。

“那么，唐纳多，”我假意问道，“卡塔尼娜岛怎么样？漂亮迷人？去海底潜泳了吗？”

他皱了皱鼻子，“你真走运。”

“你嫉妒！”

“你一直在等着这样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这里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而你和帕姆金却去看到了真正的美妙的海鱼。”

“如果你不是这样叽叽喳喳或许我会让你一道去的。”唐纳多懒懒的回头道。

“嘿，我自己也能去。”

“你以为抓个人就算搞到了去C-1的通行票？”

“我今天就可以写我的调职申请。”

“算了吧，孩子。丢勒·卡特尔才真的想借机调到总部去。”凯乐说。

丢勒·卡特尔是这个组的主管督察，并不怎么讨人喜欢。

“卡特尔已招到太多人的厌恶，”芭芭娜·苏立文是我们的协作者，外号“电脑”，她说道，“他们决不会把他安排到总部去。他们会让他留在这儿，直到腐烂为止。”

“你希望如此。”

“不，我才不这样想。”芭芭娜一面说，一面拨弄着她的金链上的珍珠粒儿，“如果他要腐烂的话，就让他到地狱里去腐烂吧。”

“不过，丢勒做事情不这么简单。”凯乐说，“他喜欢折磨你，把你弄成碎肉条。”

芭芭娜做了个怪脸。

“这是他的话，不是我说的。”凯乐耸耸肩。

“作为一名美国黑人，我认为你最好还是要懂得一点古老习俗。”

“原谅我，”凯乐捏着一副怪嗓，“我只是弄丢了我的心敏感指南，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

“这么说怎样：‘你！这头白种猪！’”弗兰克答道，我们全都笑了，大家早就习以为常，这里本来就是多元文化的大杂烩。

“卡特尔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了。”唐纳多把脚伸向地板，干巴巴地碾碎了一块饼干，“而你这一票的确干得棒极了。”

我有些飘飘然：“多谢。”

他的眼里充满了暖意：“你已经赢得了资本。”

罗莎琳，在地区分局办公室已干了二十年的行政助手，走了进来。

“安娜？我可以和你说句话吗？”

“来加入我们的派对吧。”

“你听说安娜的非凡业绩没有？”唐纳多嚷道，“如果还没有，她会告诉你的。”

“安娜，”她仍很平静地说，“我只是想和你说句话。”

凯乐冲着她笑，论年纪，罗莎琳简直可以做他的母亲，不过今天她并没想当这个角色。站在房间中央，我注意到她的神情有点特别。

“出什么事儿了？”

她领着我出门。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一个带给你的消息，是坏消息，安娜。”

一定是哪件案子出了毛病。哪件呢？我的大脑直到早晨还没有恢复运转。我仍然留在那停车坪上玩着“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我们拐到门口以便私下交谈，我们面面相觑，她比我矮小得多，所以必须仰起头来看我。

“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被杀了。”

我像一个木偶一样只管瞪着眼睛。

她递给我一张黄色的电话留言纸，上面写着：“你不在的时候……”底下是一个西班牙语的姓名，还有电话号码。我看了看但是我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

罗莎琳点点头，她的眼睛有点潮湿，含着些伤感，普通人的伤感。她的眉毛拧在一起，显出同情的样子，这种同情来自于一个已经懂得并珍惜生命价值的人。

她微微耸动着肩膀，似乎是懂得我的慌乱失措。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你听到类似的事情也一样。她拉起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里。

“他们说，她是你的堂妹。”

她看着我，耐心地，等着我作出理解。

(二)

在这间我们称之为“牛棚”的大房间里，有二十多张办公桌，成对地联在一起，我的桌子只是其中之一。顶灯发出柔和的黄色莹光。只有当朝向丢勒·卡特尔办公室的那扇门开青，并且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从他朝南的窗户望出去，你才可以看到韦斯特伍德外面的世界。

但是从我坐的这方看过去，除了一方灰色的墙壁，却是什么也得不到，

靠着墙壁有一个金属衣帽架，但此时，唯一挂在上面的是一件老式运动夹克，黑色标识牌上写着几个字：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衣服的前摆上点缀着大概好几代人传下来的什么奖章啊，建议啊，地图啊等等各式各样的东西，以及包括从绿墨水到真正的血渍一类的污迹，血渍来自于某次特别行动处的弗兰克，常和一个批发商之间龌龊的口角。

因为我成天都得对着它，所以一度我曾把这件“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看成是我的拍档，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手，是一个辛辣敏感的精灵，他知道我们的全部秘密和答案，但从不多言多语。究竟是谁从他的这种静默感受到更多的孤独？他还是我们？

我按照留言纸上的号码打了一个电话，听到话筒里传来拉丁语电视的嘈杂声，然后是一个老年妇女的声音：“Bueno？”

“古特瑞丝夫人？我是FBI特别行动处的安娜·格蕾。”

那边立刻传过来一串急促的西班牙语。

“对不起。我不会说西班牙语。”

“不会？”惊讶，“没问题，我可以讲英语。对你堂妹的事，我很难过。”

我的直觉一向正确，就像这次在银行这样。现在我却觉得是不是某人在对我搞什么恶作剧。

“等等，夫人，可我没有一个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堂妹。”

“但是，她谈起过你，你是在替美国政府做事的大堂姐。”

我脑袋里转着念头：什么叫作某人的“替美国政府做事的大堂姐。”

“我很抱歉。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奥尔瓦尔多小姐。”

“没错的。现在，你的家人需要你的帮助。”

她既武断，又荒唐，让我差点笑了起来：“那不是我的家人！你瞧，我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尼卡——”

“而你父亲的家族来自萨尔瓦多。”

我一下子感到不安了。多年来已没有人提到过我的父亲。他据说是来自中美洲，但我从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国家。自从很小的时候他抛弃我们以来，在我们家里他一直是个忌讳的话题。母亲和我与她的父亲住在一起，他是个警官。我是被新教徒和白人抚养长大的；你不可能和白种人有更深的关系，否则就会像我们的维京祖先那样满头卷发，可是碰巧我的头发又浓又密又黑，如同高加索人。那么拉丁美洲血统就可能是我的另一来源了。

更加冷淡：“你为什么找到我，古特瑞丝夫人？你想要什么？”

“不是为我，是为了维奥莱塔的孩子。他们在这个国家里没人照顾。”

我心里的某个部分仍在顽固地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我敷衍着他们的虚构看这场戏如何演下去：他们一定是先找一个死了的穷人，再找一个未曾谋面的亲戚（真正的或者虚拟的），接下去是敲一笔钱“照顾孩子们”。迟早会有人出于内疚寄上一笔款子的。我开始作一点笔录。说不定这会成为一条证据。

“是吗？”我一边写，“他们叫什么名字？”

“克里斯多巴和特瑞萨。”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住在一幢房子里，因为我们都是从萨尔瓦多来的，所以关系很好。她做工的时候，我就帮她照看孩子。只不过她一死这里就没有人了。”

“她怎么死的？”

“在街上被枪杀的，是在离这儿两个街区的圣莫尼卡大街。死得很惨连手掌都被打飞了，他们把她抬进棺材的时候只好套上了白手套。”

“警察说什么了？”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话筒里一阵喘息和啜泣声，女人的音调变得急促起来，充满了渴望：“谁将照顾这两个孩子呢？”

职业反应来得最容易：“我会安排你同慈善机构联系——”

她打断了我：“维奥莱塔受雇的最后那位女士还欠她一笔钱，如果你能拿回那笔钱，我可以来照顾孩子们，直到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家。”

她说“家”的时候，带有一种亲切的信服感，就像虔诚的人们谈到上帝一样，让我感到发窘。我的家是我外祖父的，生活中缺少上帝的关照，我自己仅仅在玛丽娜·德·瑞有一个带家具的卧房。还有我的1970年造普利茅斯巴罗库塔篷车。每周有六十、一百个小时呆在局里，中午一顿便餐，每天在泳池里游一个来回。工作如此紧张，你只能寄希望于升职。最直接的途径是作特别行动处的主管助理，甚至成为特别行动处的第一个女主管，拥有一间像戴文那样舒适的办公室。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所以要求至少在五年期间你得恪尽职守，把每一部分工作都熟透，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松；不许漫无头绪，不许出错，不许发胖。

我必须做到这些。“我还是希望你去找社会服务机构。”

“不，”这个陌生人顽固地坚持己见，“那样不对。这些孩子是你的血亲。”

“这恐怕有点荒谬。”

“维奥莱塔和你父亲来自同一个村庄。”

“什么村？”

“腊帕玛。”

“从未听说过。”

“她说这是个小地方。大概离圣萨尔瓦多有一百英里，有一个黑沙滩。”

在父亲遗留下来的零碎中，确实有一块瓷片一样的东西，就像是被海水洗磨过的玻璃那样闪亮：“当你父亲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是在那块黑沙滩上玩耍的。”

这让我有点震撼。

“古特瑞丝夫人——很抱歉，可我还得接另一个电话。祝你好运。”

我挂断电话，抬头凝视着“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袖子是空的。我心里有种轻飘的感觉。

之后我意识这个不速之客已骚扰我很久了。芭芭娜·苏立文还有事找我哩，关于银行劫案的。

(三)

在芭芭娜·苏立文的办公室里，有一整面墙都挂满了劫犯们的照片，这是摄影机拍下来的。对那些没受过太多的训练的眼睛而言，除了性别、人种、武器型号等显而易见的特征以外，他们的样子看起来都差不多，站在那儿令人作呕，你还得克服显影剂冲鼻的味儿，那些鬼影铺天盖地向你迫来。大多数相片颗粒太粗，焦距不准，你不得不借助放大镜来寻找细节。

但是对于“电脑”而言，这些东西便成了家常便饭，值得仔细地咀嚼、吞咽、消化，然后变成有用的信息存贮在大脑里面以便随时取用。“电脑”常忘记了其他一切事情，包括她的个人生活。在她嫁给另一位同事之前，芭芭娜和我经常结伴到警察酒吧去作乐，她至今还能说出我每一次幽会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还记得他们的警衔和姓名。

芭芭娜这次的协助任务是找出此次劫案和洛杉矶市每年发生的两千次以上的银行劫案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单独作案的劫犯会多次出手，十次或者十五次，仅仅为了不到一千美元的数目，然后消失在闹市中，或者劫犯们的乐园里，或者某个法制薄弱的地方。现在这些家伙们都难保没有卷进来，调查已经铺开，而且将进行得更加细致。我们的破案率并不高。而经常要靠“电脑”，通过对那些图片的周密分析，才找出一条破案的线索。

我走进办公室时，芭芭娜正在读一本《人民》杂志，封面上印着简娜·玛森的照片，一面吃着一块生日蛋糕，蛋糕好像是从谁放在午餐室里的那一大块上切下来的，涂着厚厚的巧克力、几颗山莓点缀其间。她向我推过来一只米老鼠纸盘，上面搁着选好的餐巾和一把红色的塑料餐叉。我带着我的大杯子，知道她这里总是有自己调制的新鲜的咖啡，带有桂皮香气的。

“我已经被简娜·玛森彻底弄栽了，”她说，眼都没抬一下，“整个世界就像坠入了一团迷雾。”

我看着那些乱七八糟的相片，就像对自己的家庭影集一样熟悉。在芭芭娜心里，五十或六十个或者所有她知道影星中，只有简娜·玛森是真正不朽的。

“她是个瘾君子。”芭芭娜摆了摆手，她是发出内心的伤感，好像被击溃的反倒是她自己。

我啜了一口咖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是一个戏子，当然是要吸毒的了。”

“噢，说什么！简娜·玛森？整个美国女孩的偶像？你应该承认她太高雅了。”

她挥舞着那本杂志，我看见那张著名的黑白肖像，这是简娜·玛森不到二十岁时拍的，她那动人的颊骨似乎是在述说：“如斯图加蒂瓦的曲线一般单纯，如莫扎特的音乐一般动人心魄。”

芭芭娜急切地说下去：“你不记得那些精采、感伤的老音乐片了吗？”

“我讨厌音乐片。”

“她像天使一样。她总是扮演好心肠的农家姑娘，父亲刚刚去世；或者是一个贫穷小街上精灵似的人物，刚刚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准备推出一部歌剧作品，却发现她自己得了肺结核。但是不用担心——一个年轻英俊的医生救了她的生命，她最后成了百老汇大牌明星。”

我说不出话来。芭芭娜瞪着我，有些沮丧：“你是不是觉得那些掉眼泪的故事太粘乎？”

“是啊，机器人死了她都要伤心”。

“她拒绝了在《姬姬》中出演主角——这是个错误——因为这个时候她和路易斯·约旦发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关系。”“电脑”不停地说下去：“她的第一个惹人注目角色是《坏男人》，著名的西部电影，和约翰·维勒演对手戏。”

“连我都记得，他们在亚利桑那州最高的一座小山垛上作爱。我猜他们

是真的干了那事。”

“看看这个！”芭芭娜举着杂志，手指用力像要掐住谁的脖子一样，“她成了瘾君子！就像大街上的每一个浑球。”

我把杂志接过来，查看了一张简娜·玛森上周拍的相片，她戴着墨镜，正要钻进一辆高级轿车，身上的亚麻套装是定做的，手里握着一大把黄玫瑰。看样子不像是在去贝蒂·福特中心的路上躲避记者，倒像是急着赶飞机去罗马。

芭芭娜指点着说道：“我过去常常在我的卡索尼克校服外边套上背带裙，因为简娜·玛森的这一身打扮看起来如此的性感和罗曼蒂克。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爱华滋高等学校，那时候我三岁，以后我每年都在那儿寻觅，希望她也在。她那时穿着所有舞裙中最美的舞裙，她是所有皇后的皇后。上帝，我也希望能有那么美！”

我像抓住了点什么东西：“三岁的时候，你什么都还记不得。”

“我记得。”

“我在五岁之前就什么也不知道。我和外祖父住在圣莫尼卡的整个时期都是一片空白。”

芭芭娜瞧着她的咖啡杯底露出了一丝苦笑：“你跟你的精神病医生谈过这些吗？”

“为什么？这很正常。”

但是芭芭娜的注意力又已若有所思地转到那本杂志上去了。

“简娜没有嫁给肯尼迪总统我真是很难过。他们可以成为这个世纪最为匹配的一对。结果错失良机。”没有停顿地，“丢勒什么时候回来？”

“后天吧。”

“那么我们可以给他准备一点特别的東西了。”

芭芭娜笑了。骨骼瘦小，桔红的头发滑落在肩头，冒失的鼻子，蓝眼睛，从生理上说处于高度进化状态，看起来就像个 FBI，跟我一样。印有米老鼠图案的餐巾卡在她黄色羊毛衫的脖颈处。

她把一张监视器上拍下的相片放到我面前。

“这就是你那家伙。”

照片上那家伙戴着棒球帽，穿着两件衬衫，在加利福尼亚第一银行里，正站在一个出纳员的窗口前。他没有拔枪，什么都没做，哪怕是极细小的危险动作。相片上贴着：UNSUB（不明目标）。

“这个也是。”

第二张相片上他穿着不同的衬衫，戴着另一顶棒球帽，但是同样是虚胖的脸，萎靡的眼睛。

“一样的 M.O.（汇票），”芭芭娜继续说，一面用她的餐叉指指点点，“枪，棒球帽，完全相同的要求：‘给我百元钞，不许染色。’”

第二张相片上贴着：“UNSUB，西部银行，库尔文城市分行，1984。”我非常吃惊。

“你怎么做到的？”

“维他命 A。”

“你怎么记得？你在玩什么花样？”

“当然有诀窍。”

她突然站起来，把我们盘子扫进垃圾篓，然后转向我，双手抱在胸前。

“那时我还是个新手，丢勒·卡特尔经常溜过来，把我推到卷宗柜这儿靠住，然后暗示我怎样消遣那个下午。我都一笑了之，自己觉得很机敏，还说‘不想伤害他的感情’——后来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他的大腿上，那硬邦邦的玩艺儿在后面顶着，他的手也滑到了我的裙子下面。”

“芭芭娜！”

“是，是这样。我可以一枪击中那个无耻骗徒两眼之间，但是相反……我没有能够很好处理。我哭了。告诉他我有男朋友。诸如此类的谎话废话。这是一次性骚扰。”

她把珍珠拨来拨去。

“他要带我去吃午饭，我们应该讨论一下这次的事情，或者谈论一下怎样在百威利坞饭店找一处顶层套间，谈论一下摩门教男子在床上那么的出色，他们有许多高超的性技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的妻子和孩子……但事实却是，他恨女人。”

我又看了看这位身着黄衫、戴着珍珠项链的、小巧的，来自芝加哥的卡索尼克校女学生，虽然充满愤怒却仍显得淑静。

“碰上这种事情我真替你感到难过。”

“我结婚之后才从丢勒·卡特尔的魔掌下解放出来。这些年来他一直以为还能在我身上占点小便宜。但是时过境迁，我一定会报复他的。”

“怎么做？现在才诉诸法律太晚了。”

“我一直在注意他，他也知道这点。你想我为什么会在银行劫案这件事上和你们合作这么久？在这个位置是最好盯住他，就像现在——你抓到的这家伙做过两起劫案，你一定会有机会升到C-1去。丢勒·卡特尔肯定会动些歪脑筋，因为你是女人你却做到了，而他却永远也升不了职。”

我搂住她的双肩。她是我的朋友。“不要把你的生命浪费在丢勒·卡特尔身上。”

“那让我得到快意。”她单薄的玫瑰色的嘴唇现出一丝僵硬的微笑。

“某天，”我对她说，“你来和我一起扳倒这堵墙。”

“上帝与你同在。”

三小时以后，我带着那家伙到了城市拘留中心的审讯室。他叫丹尼斯·希尔。我把他的权力告诉他，就开始问话。但他拒绝开口。他穿了件橙色外套，背后印着MDC字样，看起来还是跟昨天一样阴郁，我捉住他那时候——一张没有刮过的、长有双下巴的脸，蓬乱的灰色头发缠结在一起，混杂着颈背上长起来的卷毛。

“你是个不错的银行劫犯，丹尼斯。”

他的眼睛注视着我。我发觉里面闪动着一丝狡黠。

“这不是你的第一桩买卖。你以前从来没有被抓住过，对不对？”

他没有回答。

“所以说你很不错。不是了不起。是不错。”

我向他出示了两张监督照片，一张是最近这次的，另一张则会把他带回从前。

他用那双沉重的眼睛看了看相片，又回看我。

“很好，丹尼斯。你还是什么都没有说，我们已捉着你两回了。”

我把相片装回信封。

“你们只是从理论上捉住过我。”

他的第一句话。好精明。

“怎么讲？”

“你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另一半。”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

他把手撑在桌子上，同时把椅子向后挤了挤。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尽管门口就站着一个六呎四的大个儿警察。

丹尼斯把手指插进他油腻的头发里。

“你知道我从前住在哪里？”

“巴黎。”

“帕罗斯—维得斯。在一所房子里。房子那时已很值钱……也许值五十万美元。”

“你一定是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好的抢劫犯。”

他摇了摇头：“我是乌格斯·埃诺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年薪二十万美元。”

他很平静，似乎在等我把这些零碎拼接起来。我还记得在停车坪上，当我直接面对他时我的第一印象。他没有反抗。他似乎很狂躁……堕落……从高空坠落的边缘。

“是谁诱使你做那些事的呢？”我谨慎地问。

“除了我自己，没别人。一卷卷钞票，大堆的女人，漂亮的汽车，可爱的小马驹，全他妈的臭狗屎，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你的脑袋里全塞满了这些念头。开始是变卖资产以满足这些嗜好。当你失去一切以后你变得绝望你就去抢劫银行。这很容易。所以你又干了一次。”

他全身一阵颤抖：“我有个儿子。他今天早晨来看过我。他仍然爱我。”他咬着拇指指甲的一角。

“你是个聪明人，有教养，丹尼斯，为什么你不寻求一些帮助呢？”

“因为我爱上了柯卡因。”

我们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他爱上了柯卡因。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谁这样清楚、这样干脆、毫无愧疚地说出这一点。他爱柯卡因甚于爱他自己的儿子。

我相信我能嗅到他身上的汗水味，警察身上的汗水味，陈年积垢的砖墙上渗出的酸味等。墙后面装着数以千计的各种谋杀犯、鸡奸者、强奸犯、毒贩子、电影明星，以及小偷，他们全都会毫无自觉地告诉他们干过，无论他们干过什么，因为他们全都溺于爱中。爱使他们得到解脱，使他们感到清白。

我站起来：“找个速记员来，你做你的供述。”

“供述什么？”

当然，他还没有真正承认在“鸽城”做的那桩案子。但是我希望他说出来。

“我没有做另一桩劫案。”

我站在那里等了好一会儿，考虑着。也许我应该先把这家伙带到某个地方，我们达成某种妥协，再回来——

这时他说：“我做过六桩。”

第二天唐纳多请我到“波拉—波拉”吃午饭。这是大学生们经常聚会的热闹之地，女招待们穿着暴露的短裤和夏威夷衬衫。所有东西都装在塑料篮

里送上来。四周很吵闹，以至我们几乎听不见对方说话。

“这次专门为你送行，”他说道，“马上你就要高高在上了。”

“我会想念你的，唐纳多。”

他耸耸肩，叉起一块鸡肉送进嘴里。“你早该去了。我告诉你：七年。这段时间足以耗光所有人的激情。”

“你认为绑架和敲诈组是我该去的地方？”

我以前已经问过他这问题，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只是想拖延点时间罢了。

“我告诉你：更小的压力；更多的案件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处理；还有，上司是个不错的家伙。”

我伸过手去，替他把沾在胡子上的玉米饼碎屑掸掉。

“没有了你会做些什么呢？”

“带着淫欲疯狂追逐别的娘们。”

“你真的这么想？”

“安娜，我能像读一本书一样地读透你。”

“你完全能，”我对他说，“你是最适合于婚姻的男人，我知道。”

“尤其适合于你。”

我喝光了啤酒，当女招待走过来时，我另要了一杯冰茶。

“看看你，”我对着我的拍档嚷道，“你能不能把你的眼睛从她那该死的短裤上拿开。”

“它们是什么做的？我想那是鲸的表皮。”

咯咯地笑着：“只不过是我要离开你了吧。不要再装作‘你是我的全部’之类的样子。”

忽然间唐纳多好像对我们之间的小调情感到厌倦了。他总是这样。一会儿变得很严厉，或者抱怨他三十岁的身子，说那些工作原应该是青年人玩的游戏。事实上他有三个孩子，他的心总是系在他们身上的。在这条感情线上维系的是一个父亲的职责，常常超过了做特工的范围。他至今仍宣称在这两个都需要献身和全副精力的角色中，人们常常只可能选择一个。你可以看到，现在疲惫的阴影笼罩了他的全身。

“安娜，你是个出色的特工。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嗨……”我有点局促不安，话似乎要被噎住了，但还是说了出来，“一切都是你教我的。我想这次也要特别感谢你。”

我们都望着别处，感到尴尬，目光捉到了吧台上方 CNN 的电视节目，就都盯着看，直到帐单送过来。他付了帐，我们就离开了，回办公室的途中给罗莎琳挂了个电话，下午余下的时间就在考虑，为我何以会调升到 C-1，绑架和敲诈组去打一番有说服力的口饰。

就在我正打算离开，6 点半去游泳的时候，接到了 LAPD 罗思警探的电话。

“安娜？是约翰。”

他等着。我也一样。

谨慎地，“这几天你在哪儿，约翰？”

“维尔希尔分局，执行组。”

又是沉默，我听见他紧张的呼吸，不知说什么好。

“你一定是个忙人。”

“我认为你才是。”

“只是希望过得有点意思。”

我站在那里，游泳包的背后带挎在肩上，准备好走的。卷曲的电话绳已经被我拉直了，离开桌子远远的。在学校里他们教我：紧张和身体放松是同一种身体的反应。现在又听到了约翰·罗思的声音，其反应并不亚于，用他们的例子来说，一个带着滑雪面罩的人突然跳到了你眼前。

“我现在正在处理一桩两周前发生在圣莫卡尼大街的杀人案。一个名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拉丁血统女性。除了两个未成年者没有直系亲属，但是邻居说受害者跟一个叫安娜·格蕾的 FBI 特工有关系。”他用音乐腔补充道：“应该不是你。”

紧张：“也许是。”

“所以，很对不起，这是一个不幸的电话。”

“用不着说对不起，我甚至不认识那个死者。”

电话在把我往回拽，我坐了下来，话绳松弛，游泳包也顺势滑落到地板上。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恰恰是你接手这案子。”

“我知道。”

当约翰·罗思和我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我们对彼此间那瞬息的、充满魅力的默契大为惊奇，就好像经受着从环礁湖中流出的神秘水流的冲荡，令平日的乐趣大为失色，那种欲热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是如此的有创意如此的和谐如此的令人心旷神怡，以至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应该制作一盘完整的录相带，或者是给艺术家做性交造型的模特；我们常常对着镜子自我陶醉，或用爱称“约翰”和“约诃”彼此挑逗。

而现在，一年过去了，似乎一切也随之碎了焚了。也许我们还都认为——这使我怀有一种冷冷的恐慌——我们之间的联结在某种程度仍然存在，也许上苍会以一种奇怪的、不曾预料的方式重新把我们连到一起。

“在平常我们会遇到很多死人，”约翰说。

我神经质地大笑，他似乎受到了鼓励。

“我没有用警线打电话，因为我想你也许想把这件事查出来。”

“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位小姐曾坚持——”

我突然间感到一阵惊悸，脚好像有思想似的，自个儿“沓吧，沓吧”地颤动。

“听着，约翰，它很怪诞，它很滑稽，不管它是什么，但是它已经结束了，我甚至从来没听说过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我也确实不想招惹麻烦。所以，不要再打电话给我，我得走了，我得参加个会。”

我挂上电话，一把抓起熟悉的尼龙手把，包很重，里面放着橡皮脚掌、手浮板、折叠式头发干燥器，以及一个装着几瓶香波和保湿霜（瓶子很旧，字迹都磨掉了）的网袋。钻出“牛栅”，我试图集中精力去想象在那个五十码的池子里拍击水面、伸展身体的感觉该是多么的好啊，当疲劳消除时，恐惧也会驱散；1 外小时结束后，我就将彻底忘掉约翰·罗思。

（四）

星期五晚上，我制定了一个大方案：上一趟食品杂货店，冲一个热水浴。

芭芭娜借给我一本汤姆·克朗茨的新作《大厦将倾》，我盼望着能端上一杯山莓茶，躲在床上慢慢欣赏。这种类似修道院的禁欲生活可大有说道。

“大洋瞭望住宅区”是玛丽娜·德·瑞最古老的房产综合企业之一。1970年离奇古怪的致幻剂时代中一个短暂的时期就使它世界闻名，那时候我才十岁。他们中几个臭名昭著的人聚集在一起，占据了几个小区，有人把LSD（麦角酸乙基酰胺）撒在马铃薯片上，结果有三个人激狂致死。

这以后他们才把“南海别墅”改成了“大洋瞭望住宅区”，但是仍然有单身房客、过客和合租者，每到星期五晚上，就举行“社交野宴”，每个人此时都要钻出他们的小屋，围在油腻、破旧的烤架周围，想的大概是在我经过这个居民区时，怎样把我的公文包和四只塑料袋里的食物攫夺过去。而这个晚上我见到的却只有一大家子中东人在船上。戴着黑面纱的女人们正打开亮敞的黄色盆子取出鸡肉、玉米饼、米饭和来自波罗罗科的蚕豆。我的全新多元文化训练告诉我他们没有异状。

我住的地方在一条死巷子里，是一幢粉刷成棕色的两层楼建筑，却被荒谬地叫作“塔希提花园”。虽然离车库还有很长一段路，但这儿毕竟是家，三个房间，带家具，我在这儿已经住了七年。妙的是，连沙发我都从未买过一个。

邮箱里塞满各处寄来的商品目录，还有一个很大的棕色马尼拉纸信封，上面没有回信地址。如果不是笨手笨脚捧着食品袋，又忙着去厕所，原是可以早点打开信的。现在它还躺在厨柜上。

空气不流通，充斥着地毯洗液和具有腐蚀性的蚁酸的气味。我想是因为覆盖在墙板和煤渣砖上的乳胶墙纸太难以透气了。我把厚重的玻璃门拉开。迈步到阳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人造船坞的壮观景象。六千艘船井然有序地停靠在船坞里，白色的桅杆就像浮动的森林，我只能在这里饱饱眼福，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踏上过它们中的哪一只，我眼里似乎装满了那些帆桅、蓝色的航海包，以及沐浴在金色阳光里壮丽动人的白色船体。总有一天我会去学航行的。

四十多分钟后，食物已收放好，我一面把商品目录分类整理好，一面在心里决定和谁一起吃晚饭，埃蒂·保尔还是J·彼得曼。时间流逝，我从微波炉里取出一只烤鸡，放在厨柜上的一只搁盘里，这是我的一个小嗜好，从“男孩子市场”买来的，香味随着热汽的上升弥漫开来，还带着一股面包屑以及葛冈罗拉干酪的味道。

我打开一盏聚光灯。

那封信。

里面是一叠洛杉矶法院验尸官办公室寄来的尸体解剖照片。

照片表面光滑，我盯着它们，陷入了一种麻木、怀疑的状态，那是些8×10吋的照片，彩色，比我们见到过的或所想象到的任何色情描写中的肉体更加令人难以致信，每张照片的右下底角注明的小字“V·奥尔瓦尔多”表明了死者的身份。没有任何信函，还有一件事是不应该的：整个照片上都布满了发信人愤怒的痕迹，比如指纹。首先，在十字街口用彩色铅笔划出的箭头标明了假想的射击点和轿车可能的行驶路线。

其次，整个街道：酒吧、服装店、拐角、小巷。

犯罪场景的东方文化特征：尸体躺在人行道上，脸冲下。白色的三角路牌离一个被抛下的钱袋有五呎远，子弹击中了巴士站的长凳和一堵墙，那儿

还有更多的路牌。

尸体近照，她的裸足纤小，上帝才知道她的鞋上哪儿去了。紧身牛仔裤的口袋上绣着白花，踝的部分有拉链，衬衫打着精致的衣褶，可是整个背部已全被血污了，一缕缕的黑头发和摄影闪光形成的阴影揉在一块。

她的脸，照相机拍下的这一侧，是心形，上下颌张开，舌头下咽，是典型的窒息死亡的征状，眼睛半闭着，这些是你从图片上看得到的，而其他被掩盖着的但如同黑水晶的碎片一样隐隐发亮的东西则使人感觉到人生在苦闷与虚无之间的徜徉。

实际解剖的图片，精确地显示了尸体从盖着尸布运进来到解剖实施的每一步过程，如地狱般恐怖。

但最糟糕的——此时我坐在我的厨用小凳上几近僵硬——并不是手术时流的血或血块，而是仰面躺在解剖台的裸尸身上的原始枪孔，尸体只是除去衣服而已，看起来仍然是个人形。这样一览无余的观察是无耻的，特别是对方已无法保护自己，全身涂满了鲜血，却被粗暴地剥去了掩饰，没有任何秘密能保留下来。对人类尸体施暴力是最不可想象的。我在想，我的上帝，得有人照顾她，得给她盖上被单，得让她圣洁地保存下来。

剩下的照片证明：枪伤，伤口口径 45；Y 形切口从腹部一直到耻骨；摘除肋骨骨架，我曾被告知这得用剪切刀完成，以检查内部器官；直到最后剩下的只有谋杀、暴力和以暴力充当碎尸手段的科学检查。前者与后者毫无区别。封套上没有医学说明，只贴着一张字条：M.E.，悬案报告。

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这也许是约翰·罗思寄给我的，冲撞和伤害的感觉让我大为震惊。但是为什么我会如此惊讶呢？他总是喜欢寻求刺激——一夜半电话，从车库的柱子后边猛跳露面。六个月前，我听说他被停职三十天，因为他在一个公园里把枪塞进那个棒球投手的嘴里，而别人只是在和一群同事进行合法的聚会。我从凳子上跳起来，大步踏进卧室。那股葛冈罗拉干酪的味道让人难受极了。

想都没有想我就敲下了他的号码：“别再干这些肮脏勾当。”

“冷静点，安娜，你疯了吗？”

他的声音死硬，他是在瑞唐多海滩他的公寓里，我可以轻易想象他正坐在健身器的座位上——这是一套北欧田径运动员的训练设备——除了一条长运动裤外什么也没有穿，嘴里叼着一只大麻烟卷。年轻时为了成为一名警探，他花了大力气锻炼出一身世界级的运动体格，只不过一直保留着在七十年代就已过时的汤姆·芭内克那种小胡子，也许是为了分散人们的注意，以免看到他爬满双颊的痤疮斑。

“安娜，……什么东西让你如此害怕？”

他过去在床上也常常窃窃地说这些，要求我接受它，直到我们之间已越过一些原来十分模糊的界限。当我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他又用鲜花、电话、电传、各种装腔作势的小伎俩重新发动攻势，跟他的性侵扰一样。有一次他因此激怒了我，我一拳击碎了他的下颚。我越是逃避他就越是顽固，越发不依不饶无休止的蛮干，一直到我每时每刻随身带着武器。

“这又是什么把戏，约翰？”

“以为你会有兴趣看你的堂妹最后一眼。”

“我×你。”

“×我？”他笑了，“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小姐是一个他妈的毒品贩

子。”

古特瑞丝夫人说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小姐是一个长期受苦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你怎么能说她贩毒？”

“事实就是这样。”

我有点兴趣了：“证人在哪里？”

“一个叫‘耗子’的街头混混打电话给 911，但是——不用奇怪——后来却对调查人员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不要紧，这是一起汽车过路枪击案。凶器是 45 口径的 Mac-10，全自动，除了杀人没有别的好处。射出十五发子弹，七发击中被害者。”

“可能是无意的。”

“看第五号图片。”

我走进厨房找出第五号，电话仍贴在我耳边。这张相片上，尸体被洗过，以现出伤口。半吋子弹没有留下整齐的枪眼，它们完全击碎了骨头，射穿喉管，造成胸腔大出血。

“破坏很大。”

“你知道那种感觉有点像注射。想象一下，一支铅笔尺寸的东西忽地射穿你的身体。”

“怎么样？”

“血充满胸腔，直到你不能呼吸为止。”

“你认为淹死在你自己的血中要花多长的时间，约翰？”

“几分钟，”他的回答干巴巴的，“待会儿再考虑这个问题。看看手。”没有手，只有两根血桩子。

“他们轰掉了她的手，”他指导着，“作为对她拿走了不属于她的东西的惩罚。毒贩们总喜欢这样做。这是杀鸡给猴看。”

作为一个同事，两个专家，在安全的地方，跟他谈起话来就要容易得多，我也知道这往往是事情的一方面。

“有什么毒品的证据吗？”

“没有。但是，哪两个原因会导致一个妇女在大清晨五点钟外出到圣莫尼卡大街呢？交易毒品或者哄骗钱财。”

“典型的性别歧视的假定。”

“我是。”

“别废话。”

“那女人古特瑞丝和我们搭上了，发誓说受害者和在伟大的 FBI 的安娜·格蕾有亲戚关系，还说她还有证据。”

“什么样的证据？”

“Yonose，但在我这精密的大脑里已大致理出了一条思路：如果奥尔瓦尔多真的做了那些事，那帮坏小子就有足够的理由要她的命；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个雷子……他们准他妈的明白，这儿会有什么附带的后果。”

“我可要感谢他们的挂念。”

然后，我清楚地听见他吸了一口大麻烟，满嘴含糊道：“放松，安娜。你会高兴地知道我正全力为我们的女警官追查杀人凶手。”

我害怕的是什么？

那时约翰·罗思一直没有停止打电话给我，直到我用法令威胁他。几周

以后我发现一块浸满血的止血巾挂在我的起居室门口——甚至傻子都知道这是一个信号；约翰说他已找了另一个女人。我没有直接面对他，也没有证据说是他干的，只是换了门锁并且不再约会任何男人。

“我为你俩感到高兴。”

塞纳瑞塔·奥尔瓦尔多住在北好莱坞的一幢公寓里。在这里你甚至没有办法走上阳台。不过装修倒是很地道，只需加上一个劣质熟铁的火炉和几盏西班牙式样的吊灯就可以把这个橙色的灰粉房盆子变成中美洲庄园。这种房子是典型的西海岸建筑，设计成歪歪斜斜地四边形，底层是敞门车库，每个人的窗户一打开就对着别人的窗户，中间那块空块上也是充满了各种人声的嘈杂声和回音，有人把一辆自行车插放在他的窗户和窗底下的黑色金属装饰之间，不用说这是在三楼——否则，这辆自行车早就被清洗得只剩个骷髅架了。

星期一早晨周围没有人。我穿过几扇扭曲了的铁门匆匆走进门廊，那儿挂着一个像是人体气管一样构造的雕塑，在我头上。没有上电梯，谁知道里面潜伏什么东西，宁愿辛苦地爬那两段铁梯。

房子里弥漫着一股味儿，像是大麻烦烟卷的喷雾或者油煎鱼。铺在脚下的地毯是巧克力色的，又薄又贱的那种；如果你没踏稳地毯，你就可能跌倒在小孩身上——有五、六个，在两个小房间里乱跑。

“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住这里吗？”

“是的。但现在是我住这里。”古特瑞丝夫人披着一件纺织粗糙的豆绿色方格呢披衣，招呼我坐到沙发上去。你会发现你现在置身于“提园那”那种十二美元一小时的野店房里。

“你和维奥莱塔住在一起？”

“不，我在楼上有一个单元。只有一间房，我打电话给房东问过我是否可以住下来。”

古特瑞丝夫人点燃一支香烟。她很丰满，发型很奇怪——耳鬓的头发剪得很短，头发梳得高高的，然后散落在肩上，有点头披巾的效果。穿着一件黄色的无袖上装，对她略胖的身体毫不加以掩饰，扎着皮带的短裙下露出裸着的粗壮的大腿，脚上抹着指甲油。

“所以维奥莱塔死后，你就占有了她的房间。”我观察着她的反应。

她点点头：“我立刻打了电话。很多人都想得到它。”她对自己做了一个聪明的举措感到十分满意。她是胜利者。

“那些是维奥莱塔的孩子？”

“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在别的屋里。我得靠白天照顾小孩赚点钱。以前在圣萨尔瓦多，我在一家大饭店里主管厨活。我有一间漂亮的白房子，丈夫和两个男孩——全都在战争中被杀了。”

“我很抱歉。”

“在这里我没能找到那样的工作。所以只好给有工作的父母照看孩子。”

他们看起来很干净、健康，一个个正在忙于玩着一些早已磨破的玩偶和缺损的积木。我开始觉得有点心酸。这时古特瑞丝夫人站起来，用西班牙语念叨着什么，从角落里我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制婴儿床上抱起了一个婴儿。

她在一张牌桌上给婴儿换衣服的时候，我站在原处，观察墙头那幅日本印制的火山画，一面开始猜测分析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简简单单的东西：没

有吸毒者、没有嫖客、没有虐待婴儿、没有惊悸。

古特瑞丝夫人抱着孩子靠在肩上，轻轻地拍打着。“我很高兴见到你。”她说。

“我来只是要告诉你不要再说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是我的堂妹。”

那女人把孩子放回小床，打开一个木质大衣柜的抽屉，取出一本折叠了很多页的小开本黑色《圣经》。她把缠在上面的橡皮筋拿掉，小心地套到自己手腕上以防失落，然后从书里取出一张白色的工作名片，递给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那是事实。”

卡片上用烫金的黑体字慎微地写着：联邦调查局，安娜·格蕾，特别行动处。下面附有我们维尔希尔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她有一百种途径可以拿到我的名片。”

古特瑞丝夫人用涂成红铜色的指甲指着说：看看那一面。”

翻过来我看到几个字“移民和国籍管理局，北洛杉矶 300 大街，213—894—2119”，是我亲手写的。

“当维奥莱塔第一次到这个国家时你把这个给了她。”

“我确实不记得了。”

“是七年前。”

古特瑞丝夫人用于按住她的胃部，一面满意地点着头一面搓揉。

也许是这样的，那时候我还是局里值班的生丁，一个年青的拉丁女人闯进了 FBI 的摩天大楼。可能她还不会说英语（怀着天真热切的幻想的农村女孩，恭顺的，一头黑发），于是就把美国移民局的情况写给她，关心她，耐心地告诉她该到那儿去试试。那时在我面前横亘着刚到局里所遇到的那种真正的挑战，以至于我不太有心意去听去了解另一个充满困惑的移民唠唠叨叨的西班牙语，所以当她们回去的时候，她的心灵早已被那将我们与公众隔开的双层防弹玻璃墙深深挫伤了。

名片在我手里握着就好像我真的这么干过似的。我怀疑它是否就是这样发生的，是否因为我傲慢自大使一个年轻女子选择了这条路并最终导致了那场血光之灾。

名片滑落进我的夹克口袋里：“我们应该是什么关系呢？”

“她有一次告诉我从你父亲那边算她该是你的堂妹。”

“我根本不知道我父亲那边的情况。”

“我可以告诉你。”

古特瑞丝夫人舔湿了手指把书页一阵乱翻。那本《圣经》搁得有一臂远，她斜着头眯缝着眼。

“这是维奥莱塔的母亲，该是你的姨妈吧。”快照上是一位中年妇女，独个儿站在一处简陋的地方，看起来似乎已被四周过度生长的奢华榨蚀光了。她的黑头发未经任何修饰，两眼下方都有一点黑晕，但是她笑得很温和，身上穿着黑白相间的服装，上面撒着黄色的小花点，没穿鞋，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维奥莱塔在这所房子里长大。”

在我看起来，它倒更像是一座未完工的房屋框架，仅有些竹枝、衣服、叶子，没有屋顶和墙。另外的是些维奥莱塔兄弟们的照片——更多所谓的堂兄弟——正在剥玉米；还有一张灰暗模糊拍的是棕榈树上的一只鹦鹉，似乎被水浸过，颜色已经褪了。

我摇摇头。没有任何一张能让我产生点印象。

“警方认为维奥莱塔卷入毒品活动。”

“这不对。”古特瑞丝用她清澈的棕色眼睛直视我。

“他们认为这是她被杀的原因。”

“那些警察都疯了。我了解维奥莱塔，她害怕毒品。她不想让她的孩子们和毒品和黑社会一起长大。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攒钱回萨尔瓦多。她是个好人。”古特瑞丝夫人一再坚持，眼睛里已装满了泪水。“她爱她的孩子。在我们国家里发生着战争。她重重跋涉到了美国，却在大街上被人打死。”

她拿着烟头搁到水槽流淌着的水里，“嗤”的一声灭了，然后带着一丝怒气把它扔进金属垃圾罐里。

“她在哪儿工作？”

“她给住在圣莫尼卡的一位女士作管家，那位女士欠了她许多钱。”

“欠了许多钱？”

“大概……”古特瑞丝夫人往自己臂部上擂了一拳，抬头望望天花板，“四百美元。维奥莱塔很不高兴。那位女士很卑鄙，解雇了她。”

“为什么？”

“这不是她的错。”古特瑞丝夫人尖声说，“你可以去问那位女士。我有地址。因为维奥莱塔在那儿工作的时候我帮她看着孩子。瞧，这就是克里斯多巴和特瑞萨。”

两个孩子冲进房间。小女孩大约五岁，她弟弟三岁。她手牵着他往冰箱走去，试了几次终于打开，伸出手去想拿什么东西。

“我来拿，珂娜若，”古特瑞丝叫道，“你想要什么？”

“冰梅水。”

忽然间，从敞门车库里传来的沸腾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拉丁音乐一下子充斥了整幢住宅。我拉开灰尘满布的米色玻纤窗帘向外瞅去，两个青年正高声谈笑，有只手拿着一件少数民族的管乐器，一面解开花园的软皮水管一直往车库那边一辆七五年产的道吉车拖过去。他们为了洗那块污渍，看来是要用去中部严重干旱地区半个小时的城市水量。我的脖梗一阵紧张。

“克里斯多巴？特瑞萨？这是塞纳瑞塔·格蕾。你们妈妈和你们的亲戚。”

两个长着杏眼、皮肤金黄的孩子手里捧着塑料杯望着我。他们也许跟我毫无关系。那个女孩眨着眼睛，没有笑容，她穿着粉红的短裤和显得瘦小紧绷的T恤衫，看起来有点像六十年代那场战争的幸存者，男孩子的那条绿色的士兵杂役短裤对他来说显得太大了，折叠了无数次用安全别针扎在腰间，根本没有穿衬衫。

“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他问。

“你妈妈在天堂。”古特瑞丝夫人说，抚摩着他浓密的黑发，“我告诉过你的。”

但是男孩子重复着这个问题，直接面对我乞求道：“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古特瑞丝夫人的喉头因伤痛发出了一种咯咯声。她把他揽进怀里：“到这儿来，克里斯，想和我跳个舞么？”

她随着那震动的楼层的音乐晃动着臂部。孩子被贴着身体紧紧抱住，咧开嘴，越笑越欢了。

“特瑞萨，跳起来吧！让我们来做 merengue。”

女孩没有移动，就在我面前跳了起来，眼睛却不知盯在什么地方。为了近看她，我的膝盖跪了下来，直到我们的双眼对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用手抚摸了她的脸颊。但她匍匐下去，一直爬到婴儿床下，双臂紧紧抱在脸前，蜷缩着，脸紧贴着墙壁。

我觉得奇怪，一种模糊的惊疑的预感——这时它带着一种巨大的力量震荡着我的身体：混合着隆隆的音乐声，混合着穿透身体的热浪和一股不成熟、未经证实的恐惧感。慌乱，可是我仍然在拼命抗拒一种冲动：跟着特瑞萨躲到婴儿床底，那黑暗狭小的空间将变得更加狭小，找到那些也许根本不存在、不重要的蛛丝马迹，他们也许就躲在某个看起来并无危险的地方。人就是这样，如果你要减少痛苦，痛苦就会随之减少，减少到微不足道，最后，消失。

音乐声仍在变大，难以置信地，另一个音阶，古特瑞丝夫人把纸张相片全部收拢，重新夹回《圣经》里。为了抵消音乐声，她相当用力地说：“拿着这个。这是维奥莱塔的。”然后把书塞进我手里。

“即使我拿到那笔钱……也不会给你……”我嚷道。但是古特瑞丝夫人神情恍惚，似乎根本不在听，脚已踏上了楼梯，在她身边的男孩被她的动作和外边的音量吓着了，哭起来。“那钱归孩子们。他们会得到更好的抚养。”

我的手指摩着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圣经》，封皮破旧干皱。我简直无法再承受下去，就退了出来。留下小女孩无法形容的悲伤和古特瑞丝夫人关于 Nerengue 的梦。

（五）

我们有理由相信“JAP 匪帮”又出山了。这个匪称是督察官丢勒·卡特尔赠给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的。她打扮得珠光宝气，留着长指甲，保养极好，只不过碰巧喜欢上了在河谷地区干活。她的“汇票”和顾客们的混在一起，总是让出纳员大吃一惊。我们认为，大约有一打的劫匪是供她驱使的。华盛顿储蓄银行和希尔曼橡树贷款银行的是最近的两桩。

唐纳多和我接到 211 警报，和当地警察几乎同时到达那儿。我们刚刚开始讯问证人，我的无线传呼信号就响了。我打电话回办公室，罗莎琳说丢勒·卡特尔想马上见我。

我回话说，我们正在调查中没法中断。三个小时以后我们才完工，但我仍不想立刻回去。我闲话不断，唐纳多只好顾视莞尔。

“到 C-1 几年后我就会升任主管。我一直想到华盛顿，D.C. 去住。”

“华盛顿到夏天是个狗屎城市。”

我们沿着 405 干道一直往南开，有许许多多汽车，在干涸枯燥的丘陵之间形成两道回反的弯曲的车流。

“比这里更糟？”

唐纳多没有回答。我便不再问，他在“西密”河谷有套房子，是向姻亲借款买来的。天气好的话，到韦斯特伍德只要一个小时；今天晚上他还得掉头回来，再走一遍我们现在走的路，所以他到家已经将是八点或九点钟，他还要花上一个小时和他长子一起做家庭作业。儿子缺乏学习能力，这一直是一个苦恼源。

唐纳多十五年前娶了一个来自“恩锡罗”的女孩，并一直和她生活在一

起。在我们刚成为拍档的时候，他们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时期，分居了六个月，但唐纳多和我彼此不熟，他并没有向我谈到这点。唐纳多是我们认识的最有道德感的人之一（“我靠礼教生活。”他曾经这么说过，不是开玩笑），我认为，正因为如此，他才过得不快乐。他拒绝抛弃他的妻子。后来他们合好如初，并且坚信他们的婚姻会像直布罗陀的岩石一样坚固。之后不久，在我们每年的从巴克斯菲尔德到维加斯的竞速比赛上，麦克和罗谢尔双双获胜。每一次你去过他的办公桌，你总会看到他正专注于那张照片，上面两个人大汗淋漓，正亲吻着那座该死的奖杯。

“不要和丢勒·卡特尔上床。”他最终开口，不再怀有那种忧郁的沉默。

“我做过吗？”

“我听到你在电话上都成了‘嗨——我正在办案’小姐。别取笑。卡特尔就像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

“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得到提升？”

“他想得到高罗威的位子——想成为整个地区办公室的主管。从他的观点来看，——一个来自纽约的天主教徒，别说，得把他掐死。”

“高罗威似乎相当快就得到这样的描述。”

“高罗威自己也是如履薄冰。他已经来这儿八个月了，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出错。卡特尔弄得他紧张。”

“我对丢勒·卡特尔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自信地说，“加利福尼亚第一的案子自个儿就能说明一切。”

唐纳多只是咕哝着。我打开收音机，但是他对“体育网”不感兴趣，就又关上。我平静地观察着车窗外，车子在无穷无尽冗长的干线上奔跑，车车车车……一望无尽。

丢勒·卡特尔在办公室里做卷宗。我终于到了这儿，觉得似乎我应该说点调和性的话，事情才能容易解决些。

“很抱歉花了这么长时间，交通状况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不说我也知道。”

丢勒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带有那边人种喜欢争斗的特征。对于别人来说，一个长期懒散男孩的腔调可能是具有魅力的——像是揣着金条的牛仔们的回声——但是对于丢勒来说则意味着威胁和不友好，对人类生活毫无认识的枪手。如果他认为你移动缓慢，耍滑头等等，很可能他就会花点时间拿支，45 指着你的前额。我把他叫作反社会的人。他不喜欢别人。

也没有人喜欢他，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脸毛。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发育不完全的少年人：十五岁的年龄，棉花一样苍白的皮肤，双肩佝偻，支撑着大而软的身体，一张圆脸，黑色直立发亮的头发——额前总是垂着一缕，他的眼睛也是黑色的，深不可测。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获得了乔治敦的法律学位，但是在他身上仍然有一些东西是危险的，无法预言的，这种来自边远蛮荒地的兽性总是会 and 书本上的学识产生争执。

一位男同事告诉我丢勒曾经表示在他结婚之前要保持童身。他说他在他的官衔提升以后就再没做到，“摩门教”统治了洛杉矶地区办公室。那时候在半个拉美地区风行的反歧视社会运动打破了权力结构，现在这些地方已培育出兄弟关系。那时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好时机，这都是在我来之前的事。因为他收集了许多日本刀，所以一些家伙爱和他往来；但是对一个女人来讲，走进他的办公室就跟进了深冷室一样。我能够想象，前一位女同事的残骸是

怎样在精心锻制的熟铁弯钩上摆动。

“你昨天到哪儿去了？”

我在想。在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公寓。

“北好莱坞。”

“你到那儿去做什么工作？”

“私人事务。”

“在政府时间？”

我会找到办法搪塞过去的，但是使我不高兴的是老板回来两天了，却仍然没有对今年最为精彩的拘捕发表任何看法。

“如果你查看一下我的时间卡你将看到整个星期二晚上我都在岗写关于加利福利尼第一银行劫案的宣誓书。我也许在上面已经花费了一百个小时。”

丢勒只是坐在那儿，一面在他的办公桌上弹拨一只网球，一面用贼亮的眼睛盯着我看。

“我看过你的时间卡，我也看过你的宣誓书。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今天下午我要把你从河谷召回来？”

一阵惊栗：“为什么？”

“你闯祸了，小姐。”

“怎么？”

“你坐在那儿好好想想，我去撒尿，等我回来时我相信你已经找出答案了。因为你是个聪明的小东西。”

他留下我瘫软在椅子上，被一种原始的羞辱感蜇痛，像是他正把尿撒在我头上一样。

他回来的时候我的手掌已经变得潮湿，呼吸更加艰难。“我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并且遵循书本。”接着，像个小孩子一样脱口而出：“我干得很漂亮嘛。”

丢勒坐在办公桌后面，又开始玩网球。

“它可以是漂亮的，”他冷静地回答道，“如果你告诉别人后面的事情。”

“你想说什么？”

“在整个过程中你都没有呼叫 211。”

我笑了，解决起来如此富有趣味我感觉好像自己撒了一泡尿。

“那又怎样？”

“你不知道银行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途径去了解。”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呼叫。你把你自己和公众都置于无法控制的危险之中。”

我情不自禁地嘲弄道：“结果却一切顺利。”

“就差没有变成一堆狗屎。”

“是的，没有。我活得好好的。”

我的手臂抱在胸前，腿也舒展开向前伸出，这是挑战，如果你能，就来捉我吧。

“我很高兴，你能如此轻松地看待这件事，安娜。”

“对待我的工作我没有任何松懈，但是我考虑，出于尊重，丢勒，你应该置身事外。”

“我不能。你的判断力极差。这就是我的评价。”

他用的这些词“判断力”还有“评判”几乎使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判断力”是我们每半年一次的成绩评估项目之一。如果他在判断力上给我一个寒酸的成绩，我就将不得不在分局里再呆上几年。

如果他真的坚持要迫使我就范的话我也知道我该怎么做，尽管这样做又麻烦又让人恶心。

“意见收到。下一次我会呼叫的。”

“不，安娜。恐怕‘抱歉’是无济于事的。”

“我没有说过抱歉。我是说，下次我会呼叫的。”

丢勒给了我一个真正郑重的表情，郑重而且严肃，看来老爹对我很有兴趣。

“我知道你已经申请调到C—1组去。”

“正确。”

“安娜，你知道我毫无保留地相信……”

我等着告诉芭芭娜的并不是这个。

“……所以我想让你了解，在你的申请前面我会追加一个附录。”

“什么样的附录？”

“我将说明，作为你的直接上司我的看法是，你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判断力脆弱并不适合于调动。我们需要你同这里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

现在我的整个身体已被冰冷塞满了。我几乎已不能弯曲我的膝盖，我怀疑要是这样的缓慢动作，花老长时间才站立得起来，一定会让我难堪得要死。

“你用不着拿走申请。”

“我知道。它会直接送到特别行动处高罗威主管那里。”

“他的意见也一样。”

丢勒毫无表情地点着头：“跟现在一样。”

我到资料中心找到两条有关古特瑞丝夫人的资料，回到我的办公桌旁，“牛栅”里灯光昏暗，我的视野两旁全都是黑暗，所以我所能直接看到的空间里就只有那架电话。我试图反复用双手去扯动电话想把它从与地板的连接线上拽下来，但是它却牢牢地钉在那儿，我不得不沿着地板把电话线逐一扯开，最后才能抓起电话狠命地向墙上砸去。

两只手臂抱住了我，一股男人上浆衬衫的味道，这一刻我正站在楼井口脸贴着矿渣砖壁。一只手先轻轻搭在我背上。

我的鼻子剧烈地曲张着，似乎喘息不停。

我的手已松弛下来，我静静地站着。肩膀因为刚才的扭曲有些痛疼。

“好点儿了吗？”

我点点头，脸仍冲着墙，背后没有进一步的动静，我转过身来，滑落在铁梯阶上。唐纳多挨着我坐下。

“我希望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刚才的小闹剧。”

我用袖口揩了揩鼻子。好像被抓破了，流着血，但没有感觉到有破口。

“对不起，我们必须出去了。不知道你是否带着家伙。”

“带着。”我嗓门嘶哑地回答，似乎来一次伏击战就可以把刚才的阴云全部扫去。

“在银行他呼叫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要找你的碴子。他历来就是踩着别人的身体过他的职业生涯的。你不会什么麻烦都遇不到。别把他他妈的当回事。”

我向前歪着身子，头埋在手掌里。我真想彻底消失。在这黑暗之中，人是显得如此的孤独、渺小、没有价值。

“跟我说话。”他说，如此的轻柔以致我再也难以抑止泪水滑出眼眶。

我摇着头不说话。我弄不明白这些不可抗拒的，无名的内心感受，我似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声音。

有几个人经过。我把脸扭在一旁。唐纳多用欢快的声音叫道：“诸位好吗？”那些人继续走下楼梯。

“七年的辛苦。”等他们走远了他才说。

“那又怎么样？”

“除非你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直对我隐瞒了这点。”

不自然地笑容：“再试试吧。”

“这将是一个新的安娜·格蕾。从哪儿开始？”

我难以描述出来。“压力。”

“我能看到这点。请你喝一杯？”

我对刚才的事情深感羞愧，当然不想再坐在这里被它绊住。如果我不是过于注重因失去自制而产生的羞辱，我也许可以听出唐纳多声音中的温柔。

“谢谢，但是游泳对我来说也许更好。”

“你看起来很好。”

“嗨，我本来就是出类拔萃的。”

“至少试着在做。这就是你为什么把电话往墙上砸。”

我们从楼梯井的门口退回去，我的身体似乎又感到一处撞击。

“并不仅仅是卡特尔。”我犹豫着怎样找个恰当的说法，“有一些古怪的麻烦事正把我的家庭牵扯进去。”

“我希望你外祖父一切都好。”

“他？壮得像头牛，能一杆子把高尔夫球打到帕尔姆沙漠去。”外公的印象立即鲜活起来，我似乎清晰地看到他穿着黄色夏威夷短裤，在清晨七点钟和一大群老爹——如果你能描述出来的话，那是清一色的退休警察，就挡在大道正中诅咒和谈论着种族歧视的笑话——被沙漠里初升的太阳蒸烤着，享受着扰乱通行的顽童般的乐趣。

“外公早不管这些事儿了，”我告诉唐纳多，“不，是别的人。”

“亲戚。”唐纳多摇着头，“带他们到迪斯尼乐园去。”

这个可爱的单纯使我笑起来。

“现在好了吗？”

我点点头。

“你能处理好这事？”

“当然。”

唐纳多捏着我的胳膊。“好一块三头肌。”做了一个滑稽的却是充满深情的表情，“去游泳吧。明天见。”

我回去取游泳包时注意到“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落在地板上，恰好遮住了乱成一团麻似的电话线，而空空的座机仍然摔在上面。

(六)

几天以后，我带着一台打算拿去退换的加湿器钻进我的车里，我没怎

么学会换水，所以它去年冬天就停止工作了，整个春天它都烂在我的卧室里。在万圣节前夕我终于把上面的水槽取了出来，结果发现新的生命体已经在里面形成了。我买加湿器的那家商店许诺提供“终身保证”，因此你可以把这个发出死鱼气味的旧家伙拿去换一个崭新的回来，不会有疑问的，可供你的后半生用。我知道的，因为我去年就已经打算玩这种手段，所以才会听任它们彻底地干掉、坏死。

尽管先驱车到“世纪城”然后回来吃午饭的主意很不错，但我却一直坐在车里没有发动引擎。因为我在客座上发现了那本属维于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圣经，与一大堆废纸和法律书扔在一块儿。于是就翻开看，忽然间在联邦大楼停车坪的中央就有了一种晕头转向的感觉。

我就像古特瑞丝夫人那样小心、缓慢地取下橡皮筋。我的手指轻轻揭开那精致的薄纸页，上面用西班牙文细密地排着字型。又一次仔细地审视那些褪色的快照，最后目光停在抱着孩子的维奥莱塔的母亲身上。在她们身后的场景是灰绿色的，败落、无情。

我从未到过热带地区。难以了解那个女人和孩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从始至终都和外祖父在一起——他的加利福尼亚童年时代，他自己的母亲从堪萨斯到这个村庄的艰苦跋涉，在宝贵的五十年时间里他为警察工作的道义责任所付出的牺牲，形成了我自己对“精力旺盛、乐观勤奋”的美国人的印象，长大了，也从来没有对此产生过怀疑。

现在，我却不得不对它进行彻底的反省，我的手上拿着这张纸，从一个小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写着一个白人妇女的名字，据说她解雇了我那拉丁美洲的堂妹。这个名字是：克莱诺·依贝哈特；地址：第二十大街。离外公的老房子只有八个街区，在蒙塔娜之北，我在那儿度过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五年，就住在这座圣莫尼卡市——从前是一座海滨小镇，低矮恶臭的平房，迎面就是太平洋的盛景；而现在，却成了洛杉矶西部边缘上一块不断扩建增容的卫星城。

开出停车坪后我仍然在犹豫，最后还是决定先不去管那“世纪城”和新的加湿器，而是沿着维尔希尔往西，朝着圣维森特林荫大道方向开去。这几天我因局里的公事去过圣莫尼卡，也到第三街剧场看过电影，但是明确地说，在蒙塔娜之北已不是我的地盘。那儿是个新富区。到了月亮出来的时候，慢跑者喜欢跑到长在宽阔草坪上的叶端腥红色的珊瑚树下。福特车的样子看起来很笨重，旁边的默赛得斯、宝马和丰田车都是一尘不染。我手里把玩着餐叉走向蒙塔娜大街，拐过高尔夫球场。空气中飘荡着花和浇过水的草、松树、桉树的气味。

在蒙塔娜大街的尽头也许该是那种随处可见、小得难以形容的住宅街，但是当你经过一个学校开始沿着斜坡往下走的时候，一排搭着蓝色遮篷的商店就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我注意到，无论何时，你要有了遮篷的话，就会凭添许多情趣。

在蒙塔娜大街上有许多遮篷：带有白色扇形花样的酱紫色遮篷，用铁索挂起来的华而不实的现代派遮篷……那些没有遮篷的商店就用二楼的玻璃窗户加上莫名其妙的字母充当，让你知道在这儿买东西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付钱：大笔的。

男人和女人们提着购物袋，推着婴儿车，迈着悠缓的步调，自得其乐。我猜想他们大概整天都无事可做。道旁的桌子上摆满了刀叉，人们在绿伞底

下悠闲地吃着午餐，一面观看从蒙塔娜大街到海滨川流不息的人潮。到海边你就可以看到第十五街像条平展的蓝色带子，一直伸到远方。

我有点迷惑了，这里和城市的其余部分以及我陈旧的童年印象根本就不是一个步调。甚至可能我已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经过这么长的时期，埃诺剧院现在变成了一家奸滑的零售企业。我默想着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曾在这儿看过一场电影；然后，一阵冲动，我转向到第十二街去寻找我们的旧住址。

就在这里，刚过玛格瑞塔，在许多装着圆窗户的粉红高大现代建筑旁边：一座旧式加利福尼亚小型别墅，大概建于二十年代，斜屋顶，一块房地产公司的“待售”牌子挂在门口。我把车停下来，没有熄火。房子小得可怜，屋前一棵干枯的普通大小的山毛榉树就很容易地将它掩去了一半。树的侧身被漆成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棕黄色，而前门和整个屋的外表都是巧克力般的棕红。门的两边都有以狭窄的玻璃板条做成的嵌板。唯一显出夸饰特色的是由两根木柱支撑起来的入口上方的拱木，就像一顶拖着飘带的童帽。

什么东西撞上了我的挡风玻璃，是从附近路旁长着的橡胶树上掉下来的一颗多刺的圆籽。我等待着那些相关的记忆浮现在脑海里，但结果什么也没有，除了这幢废弃的老宅。邻屋的地产也是等待出售的。它由白色的隔板建成，秀气到只能算是一窝子田鼠的家。将两边废墟分隔开的藩篱大部分已经毁坏，就像是因为街坊倒错了车，从只有巴掌大的行车道冲过来把它给撞得七零八落似的。

真是有点难以理解。站在这个孤零零的地方很容易就产生了这样的图景：留着淡黄色头发、脸盘坚毅的外公还是个英俊的年轻人，他穿着蓝色的警察制服正大踏步地走出门来；母亲刚从厨房里出来，梳着二次大战留下来的头发式样，正呆在陌生狭小的门廊里剥豌豆……但是，这是幻想罢了，并不是记忆。

我真正的最早的记忆发生在十五英里以南的地方。1965年，那一天是位于长滩的彼得·H·布内特小学幼儿园开学的日子，妈妈站在人行道上，说完再见就转身走了，似乎毫无感情。在那一刻之前她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已经五年了，但周围除了黑暗就是沉默。可那以后，我就记得了一切事情：当我穿过操场孤单朝那幢沙色的建筑走过去的时候，我感到双腿孱弱无力。建筑的外国式样使它看起来像是用沙糖雕成的城堡。在里面，我记得的有一幅蛋白画，有新书的清新气息，还有我的第一个朋友劳诺·列纹，她扎着两条好看的辫子，下午我们一同分享酸奶。

外公、妈妈和我住在松树街，有一个中下阶层的邻居叫作瑞格雷。大多数的住房是三十年代修建的，属于工匠活或者平房。但我们的却是崭新的红砖房。有轨电车只能跑两个街区远近的路程，而乘坐“太平洋电动红车”到洛杉矶去逛一趟西勒罗马或者五月公司可就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件了，在长滩还根本没有一家这样令人目眩神迷的百货商店。

公共安全大厦里面就是长滩警察分局，外公在这里最终得到了上尉官衔，而这时，大厦修建还不到十年，海蓝色的玻璃和用马赛克镶嵌的门柱使它看起来富有朝气。在六十年代的南加利福尼亚，一切事物正欣欣向荣。

从这里我还可以继续下去，对于这个阳光明媚的海滨小镇上的普通童年，会有成千上万的记忆碎片滑落出来。一个农民也许因为厌倦了中西部的严冬来到这里；一个保守主义者，在那些开发者来到之前痴恋这里，又随着生命的每次抽动而离去。我的尊严的证明是在长滩高等工艺学校被选为女子

游泳队的队长。我最擅长的学科是科学和数学。学校入口处的箴言我至今还能背出：“进来学习——出去服务”。我猜想我一直把它郑重地记在心里。

那些都是很清楚的，而所不能描绘出来的却是圣莫尼卡这座潜意识里凋敝的小屋。我努力想把自己放进它撩人的历史里。我是怎样一个小女孩？哪里是我的秘密处所？我爬过那棵山毛榉树吗？谁住在我们的隔壁？记忆没有作出回答。我坐在那里，手里仍握住方向盘，人已麻木了。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驱车到那条有高高的松树和浓浓树荫的大街。明显地，我们住在这里时是住在街道不起眼的尽头，但现在街道的号码已变得更大了，旧时的踪迹已荡然无存。在第二十大街，场景十分繁荣，花团锦簇，桔红色的喷射涂料在白粉墙上鲜艳夺目。在每一个街区，花匠或者是建筑的工作都是由拉美人担当的。卖墨西哥午餐食品的小贩跟着私人安全巡逻队一起在整个街区里兜圈子。我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并避免生长出悲伤的感情来。我知道就快看到那座房子了，我现在才在祈求能够逃避开。我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侍女正遛着一条狗，脸上尽力幻想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却只留下些悲伤。也许我把我自己和维奥莱塔的孩子弄混淆了，那一定是特瑞萨，我描绘出来的，在裙子和上浆上装的包裹之中，站在凋零的金盏花丛中，站在外祖父的房子旁边，不是我，特瑞萨孤独地哭着，不是我。

依贝哈特一家住在一幢两层楼的现代地中海式建筑中，不加装饰，新近建成。红瓦屋顶，有两扇巨大的竖铰链窗，可以直接看到底楼的起居室内部，起居室和一扇超大门内的拱廊相对应。瓷砖铺地的走道弯弯曲曲穿过一块毫无价值的褐色草坪。一些植物贴着白色墙根生长起来——除了一丛茁壮的年轻的白桦树以外，这地方看起来十分干瘪，好像是主人支付了一百五十万美元之后再也没有精力来处理这些景致。我想对大多数人们来说一百五十万美元做任何事情都已足够了。

当然，在这种等级的房子里不会有门铃——代之的是一套更复杂的系统，按下一个白色按钮人就可以通话了。

“是谁？”

“你好。我叫安娜·格蕾。我来找克莱诺·依贝哈特。”因为这不是公事，所以我没有亮出联邦特工的身份。

“我就是。”

“我是……一个朋友……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仍然是对着麦克风在讲，“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犹豫。“维奥莱塔……不在这里工作。”

我抑制住愤怒没有说出口，当然不在，她死了。我很讨厌和墙谈话。

“我知道。就需要几分钟，夫人。”

“好吧。就来。”

静寂。她来了。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和研究这扇前门——四呎宽，通常高度的两倍高，顶端有一个月牙形的小窗户，黑色的木头，也许是桃花心木制成，就在我胡乱猜想究竟什么人会需要这样庞大的巨门时，它打开了。

她正抱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孩子，他的头安详地靠在她裸露的脖颈上。

“彼得刚刚小睡了一会儿。”她抱歉道。侧身来以便让我能看到彼得红润的脸颊和晶莹剔透的眼睛。他们都长着闪亮黑发，那种黑色几乎有茄子的紫色那样浓。小孩的头发微微有些松卷，而女人所有的头发全用一根粉色弹力带紧绷着，搭在前额，那些弹力带好似要绷断了一样的紧张着。

“我就是克莱诺。”她穿着一件灰色带有头兜的休闲衬衫，没有袖子，宽松的青绿色棉制长裤可以把多余的脂肪掩盖住。她的乳房显得松弛，但是疯狂的头发与丰满的臀部使她看起来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性感方式，非常有吸引力。只不过她的表情很恍惚，像是陷于某种思考当中，也许是因为她住在蒙培娜的北边，她就不得不为她来自何方感到隐忧。尽管看起来她是在和儿子一块小睡，但仍然抹着草莓红的唇膏。我对克莱诺·依贝哈特的第一印象是，她和这幢房子一样未入正轨。

你原本是希望她以主人的身份和态度把客人领进屋的，但她却相反，背向屋里，抱着孩子，张惶失措，似乎看着我不知该走进去呢还是别的怎么办。

“很抱歉打扰你，但这件事是和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有关的。”

“她怎么了？”

“奥尔瓦尔多夫人是在这儿工作吗？”

“是的，直到三个月以前，我们让她走了。”

“为什么呢？”

她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歪着头，眼睛似乎盯着门口擦鞋棕垫的边角：“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在你让她走之前奥尔瓦尔多夫人被雇用了多长时间？”

“大概一年，怎么办呢？”

她把孩子换到另一个肩头，以便能直接面冲我。现在我才算明白为什么总觉得有些古怪：她的左眼轻微地向外突出，但已足以形成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可能因为她认识到这点才表现出极端的不自然。

“我怕给你带来的是个坏消息。”

“坏消息？”

“维奥莱特·奥尔瓦尔多被杀了。”

突然之间对她来说孩子变得太沉重了，她颤动着尖叫着：“Carmen！Por favor！”用一种你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强烈的西班牙语重音。

一个瘦小的、棕色皮肤的老太太出现了，显然她来自安第斯山脉。她咧着嘴露着金牙，去接那个紧紧贴着母亲脖子的小孩。她们试图掰开小孩的手，把小孩弄得嚎陶大哭起来。老太太，依然微笑着，嘴里吐出一长串我听不懂的单词，把孩子抱走了。孩子却仍旧嘶声哭闹，小胳膊直向母亲探着。

克莱诺·依贝哈特对儿子的恸哭只能不予理睬。她转过身来，明显地颤抖着。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一辆小车驶过，里面射出了枪弹。大概两周前。”

“她受枪击致死？”

我点点头。

她把肘撑在门板上，扯下弹力带套在手腕上，另一只手则用力箝住头发似乎是要把它们也全部扯下来一样。当头发滑落下来我才确实看清楚，她的头发恰好齐肩长，而原先戴着的则是一条结婚钻石箍带。

“耶稣他妈的基督。”

除了她的钻石她的体态，这已完全不是淑女的风范了。

“请原谅我，不过——耶稣基督，她有孩子。”

“我知道。”

她站在门口，拽着头发，眼睛却向下盯着自己赤裸的脚踝。

“我是个护士，我的意思是，自从我们从波士顿搬过来以后就没继续工作，但是我曾经看见过……”她的声音变得低不可闻，“在 ER……当一个人被枪杀以后是什么样子。”

她是个护士，我在执法机构工作。她现在住在这样一幢房子里，她现在也有了佣人，但是也许我们之间隔得并不远。我们都为公众服务，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秩序和纠正。她抬起头凝视着我，在这一瞬间，我可以在她的脸上看到我自己的表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具有专业知识；我们都曾经见过一个被枪弹所杀害的年青女人躺在血泊中的尸体。

“你是她的朋友？这对你来说一定是个不小的打击。”

我觉得有些尴尬，因为我似乎没有像她所说的那样为维奥莱塔难过。“我是为了那些孩子来寻求帮助的，有人告诉我你欠维奥莱塔一些钱。”

“我不太清楚这事儿。”

“她走的时候。大约四百美元。”

“是我丈夫在支付她的工资。”

“那么，你愿意我和你丈夫谈谈吗？”

“我当然愿意，但……他刚刚出去。”

她露出一丝勉强的笑容，如果我通情达理的话，我应该理解她的窘慌和震惊。但是我没去理解，因为这里似乎另有一些东西躲在后面，一些更为隐密的东西。

“你好像不舒服，克莱诺。”

她的鼻子红红的，冒出了汗滴，眼里却滚动着泪花。她摇摇头，朝天空望去，像是要把它包容下来。“你曾经犯过真正的恶性的错误吗？”

“我从不犯错，”我说，“我是个出色的人。”

她很欣赏这话，这使她轻松了些：“我过去在高等学校里常喝酒，”她继续道：“我能一整夜地喝‘康伏特’，而第二天早晨醒来仍然像个正经姑娘。”

她身上仍然不断散发出新鲜的气息，也许是来自雪花膏一样苍白的皮肤和上面轻微的点点雀斑。而她看起来是这样的坦直，毫无警觉，就好像是一杯啤酒之后，她就恨不得把自己一生的故事都掏出来告诉你，你会很有兴趣，因为至少，这里面不会有谎话。“我们经常聚会，跟谁都没关系，也经常逃学，跑到内罗瑞海滩去——无论你做过些什么，你都可以侥幸逃脱。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家伙，你真的迷上了他，而他却是一个经常做错事的人。这样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过吗？”

她使我想起了约翰·罗思，我的脸顿时红了。

“有过一两次。”

“你对付过去了吗？”

我回答的时候脸就有些扭曲：“还得等着瞧。”

她的手指忽然间捏成了拳头，往桃花心木门上擂去。我在猜测那是否是她丈夫，那个为这所房子支付了上百万美元的不幸的傻瓜，犯下了这个错误以至让她永远也无法应付，无法摆脱。

“我的事儿没那么严重，”我开玩笑说，“他们不建房子，以前也不。”

她笑了：“嗨，我们可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呀。难道它们全应该土崩瓦解么？”

我也微笑着。“关于维奥莱塔，还有别的事吗？”

“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你认为她和毒品有关系吗？”

克莱诺·依贝哈特似乎很惊讶：“不，不会。绝不会。她很正直，没有人比她更正直了。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她试图做出一点笑容，“不像我。”

“那为什么你要解雇她？”

这是水落石出的时刻。如果她是这样率直的一个人，那么我看克莱诺·依贝哈特就能够坦然面对那个倔强的女佣对他们的阶级蔑视。我现在越过了重重的财富的界限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她没有退路，只有和我谈。

“我们不得不让她走。对不起，我马上就回来。”

她让门开着。我瞥见门厅里从地楼的最高处向下垂吊着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她会为了区区四百的小数目和我争执半天？

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捏着一张桃红色的公务名片和一条手绢。明显地她又已恢复了原先那种冷漠的表情。

“我丈夫会处理那笔钱的。”

我用挑剔的目光观察着她，试图把我所见到的和古特瑞丝夫人所描述的“卑鄙”的女士作一番比较。在克莱诺·依贝哈特内心，一定还隐藏着什么东西，但是，那也许并不是怨恨，那是罪。

在这次晤面彻底完结之前，她轻声说：“我实在抱歉。”然后有礼貌地关上门。名片上灰暗的字迹写着：阮德尔·依贝哈特，医学博士，达那矫形诊所。还有它在第十五街的地址，在维尔希尔以南，只需十分钟的车程；所以她是一个护士，而那个傻瓜现在看来是个大夫。

我总算明白克莱诺·依贝哈特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了。

达那矫形诊所在圣莫尼卡的医疗中心有一幢自己的改建过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候诊室，就像那张名片一样，是桃红和灰白的。接待员告诉我由于没有和依贝哈特大夫预约，我得等一会儿。有幸的是，那条弹簧长椅——桃红色和灰白的——确实“矫形”合体，可以完全放松地坐在上面读《魅力》杂志。

开始我变得有些烦躁。然后我变得冲气十足。因为在候诊室里再没有别的人。

“大夫在动手术吗？”

“没有。”

“大夫在房里吗？”

“在。”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

“他和一个病人在一起。也许时间将会有点长。”

这三个来回之后，又有四十五分钟过去了。我计划是威吓大夫写一张四百美元的支票，然后在这儿我的整个行动就算完成了。如果他敢狡辩，我就威胁说我要为了维奥莱塔的孩子们的利益而提出诉讼。大夫们都不会喜欢诉讼案件。这样就会结束争执。我再一次忍住没有拿出警徽去吓唬接待员，以免触犯那些警员规章。

一个小时以后大夫仍然和病人呆在一起，我突然感到有点担心，不知是否能在丢勒·卡特尔发现我偷跑了多长时间以前返回调查局。我重新预约了和依贝哈特大夫见面的时间，感谢接待员提供的巨大帮助，蹑着脚窜出门外，转了个圈回到我违章停放政府公车的小胡同。这时我才愤怒地发现，我

的车子被一辆黑色大轿车挡住了出路。

我原先是把蓝色福特倒退到一根电话线杆子和靠着砖墙的一只垃圾桶之间的空隙地里，现在大轿车就紧挨在它侧面，要把它弄出来是不可能的。大轿车的门锁着，里面看不到开车人。

我只有屏住呼吸，踮起脚尖，才勉强挤进两车之间，把车门打开了约八寸——仅仅足够探进去半边身子，然后打开了车上的警报和扬声器。

“一辆黑色大轿车，牌照号 JM，你阻塞了胡同，你将受到传讯，车将被拖曳走……”

我正重复第二遍的时候，警报器红光闪耀之处已经带出来了一个身着制服，大个儿红脸的司机，他手里拿着的锥形蛋卷上盛着一大块火炬形的冰淇淋，沿着胡同跑了过来。

“嗨，小姐，有什么麻烦吗？”

“只想把这车移开。”

他嘲弄似地盯着我，“急着参加 J·C·潘尼斯的展销会吗？”

我向他出示了警徽：“不。我是 FBI。现在，移开这车。”

他反而咧嘴笑了：“我还是州骑警呢。过去是，在我退役到好莱坞之前。相信吗？兄弟姊妹亲如一家。汤姆·保罗伊，很高兴见到你。”

他伸出一只粗钝的手。我们握了握。

“要冻乳酪吗？”

“不，谢谢。”

“给你。拿着这个吧。没动过的。绝没舔过。”

“你自个儿吃吧，汤姆，我大概要挨局里的训了。”我挤进车发动了引擎。

“我明白。你猜我是哪种怪人？但是你应该看看你的脸。我真应该让你拿走牌照。这就是我和警察们在一起做的事。然后：汤姆，我能为你做什么？汤姆，你能给我一张亲笔签名带给我妻子吗？”

“你说些什么呀？你是个名人？嗯？”我把变速杆挂到行驶档，希望他懂得这个暗示。

“为简娜·玛森工作的任何人自然就是。”

我同意，他似乎早就知道，因为这方面的经验，提到这个名字本来就足以使最趾高气扬的警察也咋舌不已。

“简娜·玛森在哪儿？——乳酪店里？”

“瞧大夫。这就是我把车停在这里的原因。很抱歉给你带来不方便。”

他朝着达那诊所的灰色大门扬了扬头。

“我以为她还在贝蒂·福特中心。”

“他们解放了她。”

“整形？”

“好像是，但她一直是背部有麻烦。你可不要把这个透露出去。”

“好的，汤姆。我真的很关心简娜·玛森的背部毛病。”然后，我好奇地问：“她的大夫是叫依贝哈特吗？”

他给了我一个微笑：“你知道我不能透露这个消息。”

我朝那扇门望去，这时，海风中挟着一股腐烂垃圾的强烈气味扑鼻而来。

“这就是为什么他让我等了两个小时。”

“够了，我说，老惦记这玩艺儿会把你的脑子榨干的。我过去就是，所

以说我才走开了自己找点东西填填肚子。”

灰色的门打开了，简娜·玛森冲了出来。她并没走多远，因为一只白色衣袖的手臂抓住她的肩膀，她试图摆脱但那只手臂抓得更紧了，迫使她转过身去面对一个高大结实，头发淡黄，带着宽幅眼镜，身穿白色大褂的男人。

“就是这个好大夫？”

汤姆点点头。

依贝哈特大夫——一个英俊的、下巴秀美的中年男子——仍然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使她无法逃脱。她穿着红色合体的外衣，旅行鞋，一条红色穆斯林头巾完全遮盖了她的头发。他更高、更年轻、更壮；但是她也是强壮的——一个舞蹈家，至今仍有很好的柔韧性。他保持了权威的态度，尽管她显得异常激动他仍然谈吐平和。

“警笛吹响了。”汤姆说，把还没有来得及吃的冰淇淋扔进了垃圾桶。

他把大轿车开出去停在胡同中间，然后，任它发动着，下车，打开门，等候着。她甚至没有朝他这个方向看上一眼以让他知道什么时候才应该开车。她最后带着固执的表情摆脱了大夫，大夫只好迁就地拉着她的手，领着她小心绕过残破的沥青路面。当他们走近了，我可以看到她漂亮衬衫上的装饰，那是一对小猫在逗弄一个线球，线球是真的，而小猫瞪着闪亮的眼睛，显得十分滑稽可爱。他们正好从我面前走过。女演员深红色的衣饰反衬着她皮肤的白皙，这些色彩又全部映射在锃亮的黑色车门上，交相辉映，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她就是她，即使在这个臭气熏天的小胡同里，她也能创造出惊人的活泼和生气，而这些，即算是一百个穿金戴银的行吟诗人也未必做得出来。

豪华大轿车开走了。依贝哈特大夫也不见了，灰色的铁门重新关上。我在想大夫的妻子是否知道她的丈夫和他著名的病人之间有多么亲密；他怎样把他的手一直放在她的肩上，尽管她很生气，却感受着他的触摸，没有避开。

我驱车驶出胡同，头脑里是另一幅情景：克莱诺·依贝哈特倚靠着他们家的桃花心木大门，对这里的一切一无所知，却在为可怜的萨尔瓦多女佣抛洒着她忏悔的热泪。

第二部 沙漠的清澈

(七)

在沙漠中，一切都是清澈的。

从洛杉矶出来两个小时，穿越过密如蛛网的商业小镇和蜿蜒伸展的圣贝纳迪诺山脉，它就迎面而来了。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交汇点，605干道在这儿和10干道相遇，从远处看，它们就宛如两条交错的混凝土缎带。虽然不知道沙漠的初端到底在哪里，但是在路的边缘已见得到白色的沙粒，远处的荒原上再也看不见天蓝色的城镇村落；空气，因为污染度很低，变得轻灵透明起来，你可以看到许多令人惊奇的细致景观，比如像数英里以外白雪皑皑的山脉上顺着斜坡淬下的细瀑。

顺着高速路继续缓慢下行，突然间变得很静，你甚至可以听见自己的喘息声盖过了沙粒滑落坡面时发出的鸣叫，落日绯红的余晖挑在仙人掌每一根细小的刺尖上。这时候，真正的沙漠出现了。沙漠的清澈。没有骚动、重压、车流和人群。生命点缀着这个神秘单纯的圣境。你的肉体向下沉寂，空气似乎都是神圣的——是的，你的灵魂显现出来，而这是你在通常的俗俚镇小镇中难以保存着的。沿着这个沙漠边的“霍特·斯普润”那条主要街道走下去，你会想要大声呼叫，你将听见自己的声音如何就像脱羁的草原野狼的嚎啸，而不是你平常与人的交谈，谨慎猥琐，老鼠般地吱唔着。

外公的公寓没有像它所费的价值那样有震撼力。公寓建在一处山脊上，朝西，在它的斜下方有一家空荡荡的保健药品销售中心，一家冯氏商场，以及一家KFC和影碟的出租店，全部是新建筑——外公的公寓则搭着干净的黑油毛毡，没有一点虚饰，在红木桶里栽着几株纺锤形的棕榈树。我一面往车上搬食品（如果我不自带给养，晚上我就只好喝西北风，而早上则必须“嘎嘎”地嚼他的全麸饼），一面享受着和风的吹拂，心里计算着什么时候这个小镇会发展到那样的规模，足以支持一个像汽球一样膨胀起来的高级市场，外公总会死的，那么那时我卖了他这块地头也许可以交换一个好点的场所。

我知道产生这类的想法实在是太蠢。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埋葬了我母亲，而外祖母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但几次到永久纪念园的行程之后，我那菲薄的记忆的思绪就被最终切断了，就像性格乖戾的命运女神姐妹中的哪一位挥舞着生锈的镰刀斩断金羊毛线一样。也许它不会这样轻易就被彻底切断的，根本不会；但是一个缓慢的努力过程反而使它充满了更多的折磨更多的痛楚。我能够看到我的手指是如何在最后一分钟张开、去抓住绳的末端以免跌进虚空，是的，如果没有外祖父在，我将不会知道我是谁。

事实上，当我真正审视我们家庭时，它变得如浸润在血色黄昏里的仙人掌刺一般清晰：三代女人各有自己的生活，可都不是独立的，从未脱离过与这位男子的关系。

外祖母伊丽莎白是五十年代一个海滨小镇上警察的妻子——她有什么选择呢？她死了以后，我的母亲辞去了给牙医作接待员的工作，承担起了照顾外公的全部责任，为他准备他最爱吃的小牛肉和猪肉团子（当他值夜班的时候，母亲就在清晨三点钟起床在灶头上为他把它们热好）。在后来的十年里，这一度成了我的活儿（包括在肉店里排长队）。我们一周要在电话里交谈好几次，我至少一个月内要驱车去看他一次。早晨第一个闯进意识里的通常是

外公，有时我会惊恐万分地以为他昨天晚上死了，尽管我知道他单独在外，壮得像头牛。当我有疑问的时候，他的声音告诉我该做些什么，当我把事情搞糟了的时候，他的声音就惩罚我。我也许算是一名炙手可热的联邦特工，带着一支枪，一副手铐（它们很轻，可以随便扔到哪只背包的袋底里），但是在我内心却一直遵循的是外祖父的原则。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是我的标准，我母亲的标准，我一直相信，我为美国国旗所做的一切和外公那时候执行权力一样的清白无私。

我现在来到这里，打算呆一个晚上，是为了向他表示迟到的七十岁的生日祝福，但是关于我所猜测的表妹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我父亲和家族中失散了拉丁族一支的问题深深镌刻在我脑中，所以当我拎着食品、生日蛋糕、行李袋接近那扇黄褐色的大门，听到里面传来的狗叫声时，我的心情毫无喜悦。

我知道那一定是莫比·狄克在，他是跟随外公出来闯荡沙漠的老友，还有他那些凶猛的阿基塔狗，他把它们养在野外的木屋里，非法地和纯种德国的牧羊犬交配，结果生下一群体格强健的巨兽，就像他一样。骑手们和带有家眷的警官都愿意出五百美元一只购买它们。

“不许动！FBI！”莫比·狄克大笑着，打开了门。他的大腹现在被一件T恤盖住了，T恤上居然写着“见鬼的胃口”。我冲着他无奈地笑了。

电视开着，啤酒罐放在咖啡桌上。

“那些狗。”

“没问题。”他拎着颈圈把它们全部赶上了阳台，然后拉上厚重的玻璃门，喊道：“长官！你的小妮子来了！”

我把手上的东西扔进厨房。外公的地方总保持着整洁。餐盘里是空的。一盒克巴勤薄饼放在厨柜上。冰箱里的所有食物都是低盐、低胆固醇的——除了番茄汁和伏特加酒兑成的“流血玛丽”和两块纽约牛排。至少，莫比·狄克不会呆在这儿吃晚餐。

“安妮！”外公站在门口，腰间围了条白毛巾，其余什么都没穿，跟从前一样的傲慢自负，露出非凡的桶一般的腰身和举重运动员的粗壮胳膊。

尽管已经七十岁了，但是他赤裸的胸肌仍然如从前一样极富男子的气概。这副情景把我带回了在长滩林荫大道YMCA（基督教青年会）的那个星期天下午，为了奖赏我在五十码自由泳上的精采表演，他捧着我的脸颊把我带进深水区——结实的胸肌，散发着漂白粉味的皮肤带给我的冰凉感觉，黑色的头发在水中轻柔漂散时扫过的手臂，颞下令人惊异的火鸡一样的皱折，托着我纤小的赤足将我举出水面的坚实双肩，还有水下湿漉漉反射出微光的头。我没有一个父亲来教我游泳；我有的是外公。

“生日快乐！你看上去很棒。”

“在这个地球上呆了七个十年总算是不错的。你喝点什么？”

“我自己带了。”我从包里拖出一个瓶子。

“白酒？”他摇着头，“那是洛杉矶人的习惯。”抓起一大把冰块，拉开一罐“7UP”。

“对不起，我没有想到要给莫比·狄克们带吃的。”

“你还是害怕它们？”——对于一个FBI特工来说多么幼稚可笑的字眼——“我一直认为它们全都是有教养的私生子。”

我笑了。我们一起走过去。“我们正在努力变得坚韧起来。几乎已像你

那样坚强。”

外公坐在靠近阳台的椅子上，除了毛巾还是什么都没穿，腿悠闲地交叉着，一罐接一罐地喝着七喜。不久以后天黑下来，四周的死寂使我一阵寒战。狗们还呆在外面，不时把鼻子贴在玻璃上想往外公的脚上凑去，似乎它们身上犬的精灵已被土著的阿古阿加利恩特印第安人所唤醒。

我承认我把车开到这沙漠里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在私下里将我在加利福尼亚第一银行所干的那件事的全部细节告诉给外公。我是怎样的孤单，我怎样监视那家伙，正确地行动，没有任何帮助将他铐住；我的审讯是怎样的聪明，技巧性地引导疑犯供认了其余六桩劫案，它是如何的完美如何的简单。

我总是为外公提供这类的东西。成就，礼物。他的反应通常是不明朗的，言下之意是这件事总非做得极佳。他出席我的毕业典礼（特工学校）时，穿着全套的警官制服，他哭了。现在我回来了，希望我已经做过的会做得更好，希望事情最终会让外公感到喜悦。

莫比·狄克是更值得称赞的听众，我发现自己很愿意和他玩笑。他模仿着卡通片《警察学校》（他每个星期六早晨都在木屋里虔诚地观看这部片子）里的动作，扯着他的大嗓门，叫着：“立正！”外公唯一的反应就是告诉他关于他那个时代，他还是一个在长官面前列队的新兵，有一次在圣莫尼卡码头附近，他单独困住了一个谋杀嫌疑犯，沿着足迹追赶，一直把他逼到了海滩上。那是七月份的一个星期六，到处都像地狱般拥挤。那个疑犯最终是跳进了海里，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哇，长官，那只是个故事吧。”莫比·狄克敬畏地对外公说。

“当你是个新丁的时候还发生过什么事？当我们住在蒙塔娜之北的时候？”

“好，我们就讲讲著名的饥饿的窃贼的故事。”外公咧着嘴先笑了。放下他的饮料：“他闯进一家超级商场，偷走一千元，留下两个吃了一半的香肠三明治。”

莫比·狄克笑了，从鼻孔里发出低沉的哼哼声。

“我去过第十二街的旧房子，”我不经意地插口说，“试图去回忆它从前是什么样子的，你和妈妈和我曾经与我父亲一起住在那儿吗？”

“我会告诉你那时发生过什么事。”外公突然说，他的眼睛亮起来，根本不理睬我的问题。“有一次我带着你在局里，突然间我们听到了极其可怕的飞行器的声响，我们都跑出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妈的，一架武装直升机正降落在停车坪上。”

莫比·狄克问：“为什么？”

“为了约翰·F·肯尼迪。”

外公对我们的洗耳恭听感到很满意：“总统实际上并不在飞机上，但那段时间，他频繁飞来洛市——他们说他是来看他在海滨的内弟彼得·罗福得，但实际上，他是借机幽会玛丽莲·莫罗伊，所以秘密保安人员就得找一个地方降落总统专用直升机，我猜他们一定以为到圣莫尼卡警察局最为保险，这些蠢货，要在达拉斯的话，连小孩都可以使他们一败涂地。”

莫比·狄克说：“令人吃惊。”

外公暗自笑着：“他们找了几个家伙在停车坪上划线，他们全是用粉笔划，然后那个该死的庞然大物落下来，立刻把粉笔印儿全部刮跑了。”

“我看见直升机了吗？”

“你？”外公看着我，非常吃惊地记起原来我也是这个故事里的一角儿，“你还是个小姑娘，你很害怕那些噪声和吵闹，紧紧抓住我的手就好像再也看不到明天一样。”

这些我全不记得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你听到关于你自己的叙述可你却根本不记得它们，就像做爱一样，什么都感觉不到。

“肯尼迪总统和简娜·玛森的绯闻是真的吗？”

“好漂亮的大腿。”外公低声说，又没有理睬我的问题。“他们过去叫她小阳光小姐，当然，那时候她只能算个孩子。她长成了美女。那些家伙弄了一幅她的相片挂在警察局里。我看见简娜·玛森也许是十年前，在韦加斯。漂亮的嗓音，丰富的内涵，她唱歌的那种方式能让你哭。”他一根指头拍打着眼睛，生怕我不相信他。“那些都是我的歌。”

莫比·狄克用急促的宣告打断了我外公的白日梦：“我之所以拼命恭维你是因为我希望我这位 FBI 能问你些事情，但是现在我警告你那些废话说完后马上开始。我走了，我消失，行了吧？”

原来，他听到混杂在棕榈树的婆婆声中似乎从弗兰克·西冷翠家那边传来的婴孩幽灵般的夜哭声。

这时我已喝光了一瓶酒，我们都忘了，却把手伸向两块多米诺比萨饼和那块生日蛋糕。

“我们到‘恶作剧’去吧。”莫比·狄克建议。

在我现在的意识中那地方似乎就意味着一连串滑稽的事情。“你是说那个有两个演奏萨克斯风的双胞胎小姐妹的地方？”

“她们现在至少有六十岁了。”外公纠正我说。

“我所记得的只有喂索啼狗喝水，还有和退休的锁匠一块跳舞。”

“可惜，他已经死了。明天打高尔夫球怎么样，上午七点。”

“生活真是充实，长官。”

外公披上了马球衫，套上卡其便服，我们走下山去也让狗儿们活动活动。现在已是子夜，可空气中温度仍然很高。月亮高挂着，皱着脸，就像老朽腐败的牙齿那样昏黄。莫比·狄克领着动物钻进他的篷车里。篷车用灰漆漆得灰一块黑一块，只有上帝的仁慈才让它重新发动起来。

我们选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径，只是想多呼吸一点夜的空气。我突然间感到现在也许太晚了，我怎样来开口提出寻找家庭这棵大树的根呢？我一直觉得外公在回避关于我父亲的任何问题，现在他也不想再让它提出来。此外，我累了，他也累了。明早五点钟，我就得起床赶回洛杉矶，八点钟有早班。另约一个时间吧。也许可以通过电话。但是，我的声音却似乎再也不能谈别的任何事情：

“我是不是有个堂妹名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

“据我所知没有。没有像这样的名字。”

“是爸爸那边家族的。”

“谁是爸爸？”真地迷惑。

“我的父亲。米桂·桑切斯，或者桑多瓦。没有人告诉过我到底是哪一个。”

耶稣，这是怎么了？只不过大声说出这个名字，我看见外公的紧张，一阵寒颤竟穿透我的整个身体。酒精的热力暖洋洋地笼罩着我，我突然间警觉起来，心里有些恐慌。

“我们对一个婊子养的总不会知道太多，是不是？”

“我们必须了解一些事情。他来自萨尔瓦多？”

“大概。”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普通的劳工。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我只是好奇。”

“忘了他吧。”

我已经快三十岁了，仍然怕惹外公发怒。

“有些人自称是亲戚。”

“他们想做什么？”我回答：“钱。”

“你知道我会怎样跟他们说，不管他们是谁——休想。”

“你不喜欢他是不是因为他是拉美人？”

“我对拉美人没有成见。我厌恶他是因为他让我女儿怀了孕，”他毫不费力地说出来，不容我怀疑。他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后来这个婊子养的走掉了，抛弃了她——和你。为什么你会关心那走掉的家伙？是我把你抚养大的，只有我。”

“我知道，外公。”我握住他的手，“你愿意他留在这里吗？”

“不。我不想她和他有任何关系。”

“她怎么想？”

外公轻轻抽了抽鼻子。一个警告：“别管她想什么。她才十八岁。”

“为什么她不再结婚呢？”

“她忙着照料你。”

“但是她这么漂亮，她继续跟人约会吗？”

“我不鼓励约会。”

“为什么不？”

“她太年轻。”

我冷笑：“年轻？她和你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她三十八岁的死去。”

出乎意料地，他张开臂抱住了我：“你从洛杉矶人那儿知道的这些？”

“知道什么？”

“这些多元文化的废话。”

我尽力找点轻松的话题：“外公……我认为也许我就是个多元化的缩影。”

就像阿亚多哈·霍梅尼所说的：他不懂反话。

“你是鬼！你是个美国人，如果你不为此感到自豪，那我们还有什么信仰可言。”

他躲到一棵棕榈树后面撒了泡尿。

我冲着他那边嚷道：“第十二街的那所房子正在出售。”

“我很惊讶它还立在那儿。”

“谁住在隔壁的白房子里？”

“一个瑞典家庭。我们的邻居全都是德国人或瑞典人。我记得有阵子我上夜班，他们养了条狗，整天叫个不停，我根本无法睡觉。”

我独自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双手抱着膝盖。比萨饼太劣，蛋糕太腻，又喝了太多的酒，所以头有点痛。我不喜欢在停车场买的这些东西。天空中点缀着几颗忽隐忽现的星星，走到这里四周已经显得太黑太黑。远处停

靠下来的汽车的灯光非常微弱。一直不断的干燥的风吹拂着棕榈树的树叶，发出像捻动玻璃纸那样干硬的哗哗声，我穿着无袖的上衣和斜纹蓝布裤，感到很虚浮。我的枪在楼上背包里。这个角落四周的建筑都面朝沙漠，此时寂静无声。漆黑的空间。

我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可以听见狗叫声。不，现在我还能把它们同野狼区别开来，它们从黑暗中冲出来像群疯子一样笑着，停车场看上去有点奇怪。是不是那个胖胖的售货员在我的酒里加了点 LSD？我和朱丽塔·弗洛累斯一块回家。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纯棉无袖上衣，镶着红色 Z 形花边；她年龄比我大，也许是八岁。她从学校里偷了一薄白纸用来写小说，她的小说是写一对住在鬼宅里的姐妹的故事，她让我从母亲写字台的抽屉里偷一些邮票给她，以便把小说寄出去发表。她似乎很孤独，而且从不惊乍，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我们是在露茜维尔特小学的操场相遇的，她把我带进了她的梦幻世界，她经常亲自跑到第十二街来找我，然后继续我们的游戏。

我正看着那边的停车场，记忆像黑白影片一样浮现。我们正在街道中央，一只叫维尔森的杂种狗从隔壁砖房前的空场上跑出来，立在我们面前，龇牙裂嘴。我们被吓着了，游戏再也进行不下去。朱丽塔开始呜咽，我知道我必须救她，我把她拉回我们家。

“维尔森在外面！朱丽塔不能回家！”

我的警察外公会管这件事儿的。他从盥洗间里出来，拿着一卷报纸，大个儿，就像一座小型灯塔一样挡在通往厨房的狭长的过道上。

“她不能呆在这儿。”

“但是维尔森——”

“我不想有个拉丁小女孩呆在我家里。”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他把我的朋友从前门推搡出去。我掀开遮住门边一块狭小窗户的镶着白色蕾丝的窗帘，我看到朱丽塔·弗洛累斯一个人站在外边，因为羞辱和恐惧而神情恍惚。狂吠的狗在前面，背后是关着的门。慢慢地，一股黄色的细流从淡紫色的衣服下面滴滴出来，在门阶上留下一摊。

但是我是安全的。我没有被赶出去。即使当我听到那个是我父亲的男孩被归属于“墨西哥人”的一类我也丝毫没有留心，它离我太远了，我不是一个拉丁小女孩就像朱丽塔·弗洛累斯那样的。在冰凉的黑暗里我看着我的外祖父，感激他的爱。从那时起，我就想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八)

这是凯乐·维依的主意，我们每个人每个月要为大家提供一样家常午餐。作为法式大菜的专业学生和白酒鉴赏家，凯乐有一次带我们三个从办公室出来到好莱坞·希尔斯附近一家由法国厨师料理的私人比萨饼店去喝一盞。我坐在竹凳上，一面喝着不兑水的“香槟”酒，一面发表一些似是而非、针贬时弊的评价。凯乐听得入迷，迟迟不愿让这次兴奋结束。我看到几个布朗特坞的家庭主妇带着在石头上烤出的特制比萨饼回家，而我回家的时候却对我是否会将钱花在我生活中的哪个男子身上不抱幻想。

这个月凯乐带来两三个法国苹果派，苹果切得非常薄，我们都认为他一定是用刀片做的。切片按照同心圆的方式，完美地排放在一层牛奶蛋糊上，切片上则浇上一层桔子冻，他把这桔子冻雅称为杏黄釉。

“哎呀，凯乐，”我说，“为什么你不马上去面包烤房？你可以挽救许多的艺术品。”

“安娜，就是有许多像你这样的人才把这‘派姐’糟蹋了。”

“‘派姐’”我故作沉思只不过是取笑他，“那不是一种中东人的三明治吗？”

芭芭娜烤了玉米饼。罗莎琳带来的是蒸锅金枪鱼。丢勒·卡特尔的贡献，不用说，是得克萨斯干辣椒，又辛又热足以让你泪流满面。弗兰克·常的母亲做了中国小笼包。我则去买了足够一家人吃的麦卡鲁格斯炖鸡。

凯乐看上去有点伤心：“我不敢相信我们居然会允许那种半成品摆上这美丽的桌子。”

“嗨，我可没有一个妻子替我上商店。”

“谁在说妻子了？我自己到蓝奇商场，放进每一个酥饼，每一片水果都是亲手挑选。”

“那是因为你是一个有强迫症的疯子。”

“那么芭芭娜呢？那么罗莎琳呢？”凯乐不依不饶，“她们有妻子吗？但是她们是不是把她最佳的努力成果带给了她们的同事？”

“他有妻子。”我戏剧性地把战火燃向了唐纳多，他正把目光从一个揭开盖子的蓝色大塑料碗上移过来。碗里装满了莴苣，切成薄片的胡萝卜与小萝卜在莴苣四周围成一圈，上面撒着红色洋葱头旋成的小环还有绿色的胡椒粉，简直就是一个蔬菜万花筒。

“承认吧，唐纳多，是你妻子做的这份色拉。”

“证据确凿。我从来就不知道哪个男子会用厨具。”芭芭娜用她特有的干巴巴的方式评论说，“饮食总是超越他们。”

唐纳多旋开一个乳酪瓶的盖子，将里面的一堆新鲜蓝色乳酪全部倒进碗里：“罪如所诉。铐上我，拷打我。”

“真是诱人。”我低声说，越过他把手伸向中国小笼包子，凭经验，我知道那才是所有食物中最好的一样。

起初他看起来没什么反应。他的眼睛正盯着他用来拌色拉的那个黑色塑料钳子；钳子是从“西密”河谷家中厨房里的杂用抽屉里拿来的，那儿有与第一流的主妇匹配的第一等锅碗，连金属罐上也用字母标明：糖、调味品，排列整齐，一切都井然有序。

最后，在对它沉思半天之后，唐纳多诱使我摊牌：“如果你掉进这堆事情里，我知道，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女人。”

“可是我敢打赌，你在家不过是个常客罢了。”

唐纳多仍然是面无表情：“我们已经做了三年的拍档，但是你又真正了解我多少，安娜？”

我大笑：“我从许多事情上都能了解你，唐纳多，但是也许女人不在其列。”

“什么事这么有趣？”芭芭娜想知道。

“唐纳多被黑皮腰带捆住了。”

唐纳多滑稽地咧开大嘴，胡子下面藏着个微笑的暗示。

“我能看见你，”他说，“安妮·奥克雷戴着黑色‘花边’。”

芭芭娜有意地一个倒肘敲压我的肋部，然后又冲着他喊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他的眼睛盯了我好一阵——安妮·奥克雷戴着黑色花边？——然

后转向别处，我发现我自己像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人一样不自觉中脸红到了脖梗。

在“牛栅”中，电话一直在响。

“我来接。”罗莎琳下意识地放下了她的盘子。

“不——是我的。”穿过屋子，我能看见在我办公桌上指示灯正在闪烁。

这时我听到古特瑞丝夫人足以引起人性欲的声音蒸发过来，我的胃里突然间一阵痉挛。

“每个人都病了，”她正告诉我，“所有的孩子都在流鼻涕，克里斯多巴在发烧。”

“他需要看大夫吗？”

“我想不用。我觉得他过一天就会好起来的，我刚给他喝了点硝化甘油。”

我一直注意看着在玻璃隔墙后面午餐室里的那群人。唐纳多也跟其他人一起在听丢勒·卡特尔滔滔不绝的演讲。尽管肩有些萎缩，可丢勒在那些人中还是最高。他讲着什么使每个人都发笑。

“你从克莱诺夫人那儿拿到钱了吗？我一直等着你的消息。”

“不，我没拿到。我跟她讲过，但是……总之我没有拿到。”

“没有钱叫我怎么照顾这些孩子？”

“我不知道，古特瑞丝夫人。”

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亨利·卡拉维蒂，得了肌肉营养不良症的收发室职员，摇着他的电动轮椅过来，把一摞信放到了我的文件格里。我向他翘了翘拇指表示感谢。他苍白的嘴唇泛起一个颤巍巍的笑容，他把一只僵硬的手从控制器上移开，用力向上一举，以回答我的手势，然后就滑开了。

“这些孩子是你的家人。”古特瑞丝夫人带着愤怒唾弃道，“可是你却无动于衷，小姐，我真为你感到难过。”

她挂了电话，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从内到外部感到遭到一种打击。突然间那一切又都归于愤怒，我在办公桌抽屉、手提包、夹克的口袋里一阵乱翻，最后发现那张“达那矫正诊所”的桃红和灰白的名片被弄得皱皱巴巴的，正和几颗咽喉糖一起躺在我的蓝色帆布公文包的兜底。我又一次抑制住了冲动，没有亮出我作为 FBI 特工的身份以便阻吓那些标准的接待员的废话，但是我动用了那些词语“非常紧急”、“法律事务”等等，最终得以接通了依贝哈特大夫的电话。

“很对不起——请再说一遍你是谁？”

我告诉他我是他们原先的女佣，维奥莱塔的堂姐。这虽然听起来有些古怪但我得坚持用它。

“我们都知道，当她被你们解雇时，你还欠她一些佣金。”

医生冷淡地说：“我全都付过了。”

“她告诉一位朋友你还欠她大约四百美元。”

“简直是胡扯。我怎么会偷窃一个女佣的钱。”

“我们直话直说”。我有种犯罪感，很矛盾，但是他是个医生，住在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房子里，还有水晶吊灯。“她的孩子们现在没人照顾，明白吗？也许我的建议不符合普通的原则，但是我希望作为她的最后一名雇主，能为孩子们的福利做一点贡献，行吗？”

“听着，格蕾夫人”，他说，对“夫人”二字他特别强调，“我解雇了

维奥莱塔。你想知道是为什么吗？她本来是来照看我的孩子们的，为此，她得到极好的报酬，可是她并没有很好履行她的职责，相反却跑到屋里同别的佣人聊天，由于她的疏忽，我四岁的女儿掉进了水池里，差点儿淹死。”

我被压制住了：“我不知道这件事。”

“是的，你不知道，但是你却到过这里来对我进行无礼的非难。”

“然而，”我勉强挣扎着，“她的孩子们仍需要帮助。”

“去求助于政府机构怎么样？我的收入的五十分之一要上缴给政府，那就应该用来照顾像维奥莱塔这样的人民。人民，顺便说一句，他们甚至根本不是美国公民。”

从午餐室里又传来一阵哄笑声。

似乎他在考虑什么事情，出现了一阵停顿，然后话筒里传来依贝哈特大夫气恼的喘息声：“如果她断言我欠了她的钱，我可以开张支票，只不过是了了结这件事情。”

我谢了他并告诉他直接把支票寄给古特瑞丝夫人。

“维奥莱塔的行为疏忽大意。但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是愚蠢和残暴的。我只是为孩子着想。以后请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我倒进椅子上，朝着“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得意洋洋的点点头，好像它在祝贺我成功解决了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这道难题一样。不会再有波折了。它的袖子已经挂在了胜利的钩子上。但是，一道黑暗的阴影这时钻进了我的意识中，大夫对维奥莱塔的疏忽的描述似乎和他妻子对我的问题的反应不大一致。克莱诺·依贝哈特关上门，只是说：“我们不得不让她走，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一女佣让我的孩子差点淹死在水池里我的反应一定会更加强烈。她在门前的颤抖给我的印象最后变得越来越清晰：克莱诺·依贝哈特的行为有确实的疑点，一定有什么事情被她隐藏起来了。

似乎是为了把思路理清楚，我心不在焉地开始翻看我的邮件。有一封公文信是从特别行动处主管（SAC）罗伯特·高罗威那里送来的，正是他在复审我关于调往绑架和敲诈组的申请。他否决了我的申请，并引用了一份“反对附录”，正是由我的上司，丢勒·卡特尔所写。

我回到午餐室，两手空空站在那儿。他们正在分享凯乐的法式苹果馅饼，丢勒·卡特尔现在的故事是关于十五世纪一柄价值几十万美元的“卡达娜”宝剑的。它比我们今天所能制造出的钢铁还要坚硬，剑身却又不可思议的柔软，你的手指轻轻挨上它表皮就会被划破，如果你对着它呼吸，则在三十分钟内，它就会生锈，丢勒说。

男人们“哇”地狂呼起来，房间里的女人则开始清洗、打扫。

我对芭芭娜说：“丢勒耍了我。”

“怎么回事？”

“调职申请被否决了。”

“该死。”她抱着双臂喃喃地说着这个词儿：“该死。”

我们的声音很低，我用力咬紧了牙关以避免音量过大使这幢稳固的大楼震塌了。

芭芭娜弯下了腰去从桌子上拾起一张盘子：“这是歧视。”

越过她我的目光从那扇模糊不清的玻璃窗钻出去，窗上张贴着几份垒球比赛和带水下呼吸器的潜泳活动的广告：外面各式各样衣着的人们川流不息地进出大厅。有时我真是渴望能有一个母亲在此刻安慰我。

“如果那是歧视，那么现在将停止了。”

我没有管她告诫的表情。丢勒·卡特尔为了这顿家常午餐正好在这里。我朝他走过去，摆好一副战斗的架势。

“嗨。丢勒。”

“安娜？”

“SAC 否决了我的调职申请。”我平静地说，“你的反对附录对他的决定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很抱歉事情不得不这样。”

“你真的很抱歉，丢勒？”

“当然他很抱歉，”唐纳多不知从哪里走出来，“到现在他和你共事已经七年多了。”他给我们的上司戴了顶高帽子似乎是同情他在今天这个世界管理任何一个层次的妇女时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我恨唐纳多，他竟为丢勒充当调解人，尽管我知道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我。

“我猜想我完全能够和她一起共事。”丢勒打着圆腔。

“如果你强迫我继续在你的组里工作，丢勒，我向你保证：我们中将有一个人能继续站在这儿。”

唐纳多的笑容一下子变得僵硬可憎，似乎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当他或者其他聪明的老手都宁愿先呆在一边保护好自己时，我怎么会像一个新来的业余选手一样一下子跳进对方火力的中心。现在我再也无法为你做什么了，他震颤地对我说。剩下的唯一问题，他是否会留下来观看我发动攻击。

但是似乎再没有人想让这件事缓和下来，丢勒非常惊诧，每个人都拉了一张椅子远远地叉腿坐下，换着观望的态度。所以，他和我就是真正的以眼还眼。我可以观察他白瓷皮肤上的最细微的纹路，下嘴唇下冒出几根黑色的短毛，我怀疑他是否刮过。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

这意味着他想避免冲突，而且当然，在公共场合结衣捋袖，剑拔弩张，丢勒的意图是让我看起来像个混球，我的冒犯似乎成了对他的真正的伤害而变成他脸上的无奈。但是我知道，芭芭娜不会买他的账，唐纳多也不会。现在他们都若无其事地离开房间，和别人一样，一瞬间都走得干干净净。

“我正想问你同样的问题。”

“那么好。我不是不喜欢你，安娜，我对你要求严厉是因为你能够承受它。或者也许，坦白地说，你需要它。你的确显得过于顺便。”

“所以你为了我好才否决了我的调职。”

丢勒对我挖苦不感兴趣。他满心要表现出他的诚挚来，这是个艰难的努力。

“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你会像飞去地狱的蝙蝠一样，没有谁能阻止你。但是，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基督，你还不到三十岁，是吧？”

我已经后退，屁股靠在了棕色午餐桌的边缘上，半坐半立。我穿着黑色短裙，黑色紧身裤袜，使我看起来很性感，又漫不经意，懒洋洋的样子。我的双臂交叉在胸前，手指抚摩着我特意为这次午餐穿上的白色毛线衫的衣袖，就是缀着花边几乎可以透视身体的那件。但丢勒·卡特尔看着我时带着一种被阉割过似的漠视，就好像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停止了骚动却像他六岁时一样跪在地上玩玩具小车，显得那样的不自然、不相称。

“问题仍然存在，我在加利福尼亚第一银行那件案子上干得极为出色，

理应得到奖赏，而不是惩罚。”

“我正在试图说明现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惩罚——”

“那当然是，你惩罚我，因为我是个女人。”

他眨着眼睛然后高声笑了出来：“我希望你真的不要这样以为。”

“不，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将提出一份 EEOC 起诉书，控告你的性别歧视，局里会证明这一点的。”

丢勒抬起脚踢在椅子边上，他的手插在裤兜里，似乎正在设法弄清楚他的对手的实力和那种具有破坏性的心理力量的来源。漠视已经消失了，一种黑色的怒火再次在他眼中燃起，一瞬而过。

自从拉丁美洲移民局那边闹过一阵阶级纠纷以来，FBI 一直被置于监控之下，其他一些如涉及黑人的诉讼案也受到广泛的注意。我清楚地知道局里的当权者将难以容忍对洛杉矶分局实行性别歧视所提出的指控。

在征求了几个辩护律师的意见之后，我确信，在这场官司中我将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结果，在申请备案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特别行动处主管高罗威把丢勒和我都叫到他的办公室作了一次特殊的会面。

我从来没有进过高罗威的私人办公室，这里除了可以鸟瞰洛杉矶市热闹的壮美景色之外，地毯也更好，家具是崭新的，花格纹，像黄油硬糖一样锃亮。

“我不得不回到这件事情的开头，以便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高罗威用他的布鲁克林口音说道，“以便我能看出你们每一个人的观点有何特殊之处。”

高威罗在我们的纽约办公室工作了十八年，专门对付有组织犯罪。但结果却是他自己一筹莫展，灰白头发也悄悄爬上了他的浓密、波浪形的爱尔兰黑发上。他总是穿一件高领衫——这是他的标志——不穿衬衫，不打领带，无论什么场合什么天气，说是为了掩藏气管切开的手术刀口、枪伤、伤疤……但是他仍然在抽雪茄，所以，要么他是自己想死，要么，就像我们中的某些人一样，他坚持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现在是十点半，在我们身下可以看到低处洛杉矶的市容，笼罩其中的令人眩目的牛奶质的白色雾霾正在被中午的热度驱散，露出晴朗的天空。凑巧丢勒和我都穿着海军蓝西服和白色的衬衣，这使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对飞机上的服务生。在咖啡桌上放着一些高罗威在纽约任职期间的纪念礼物，其中包括一座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和一枚 NYPD 侦探处的四寸椭圆形铜质徽章。

高威罗抬起徽章在手上把弄。我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一个皮带扣，他们不可能给我提供一整条皮带。”

他指了指放在腿上的档案。他绕过办公室桌坐在前面，以管理者的姿态，把自己的位置坐得离我们很近，以显示出我们完全平等。而他两只腿却交叉放着，坐得很舒适，嘴里一直咬着一支雪茄。

“先回到银行这件案子……看起来安娜似乎做了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她查明了有一桩严重犯罪正在进行中，就单枪匹马地阻隔和治服了目标，并且在没有 LAPD 在场的情况下将其拘捕……然后”——他摇了摇头笑了——“案犯供认了其余六桩劫案！”

他笑了又笑，一直笑到咳嗽起来，满脸涨得通红。

丢勒·卡特尔一点笑意也没有。他把一种胆怯不安又近似仇恨的目光对准高罗威。我记得唐纳多告诉过我他们之间的争斗，就感到一阵寒战，心想

不知高罗威是否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特别行动处的安娜没有呼叫以求得到后备支援，所以给她自己和公众都造成了威胁。”丢勒说。

高罗威睁大了眼睛：“你是对的。在进行过程中呼叫 211 是被认可的程序。”

他的手臂垂放在椅子的两边，两手里依然握着那枚沉重的“皮带扣”，带着一种无可更改的冷淡的目光揣摩着它。现在，他们俩勾结到一块儿去了。

“从技术上说他是对的。”我不耐烦地摆着腿，“但他否决我的调职就不对，因为——”

“我说过在开始你们俩各有道理，”高罗威粗暴地打断我，“不要撅着嘴，安娜，这会给你添上许多皱纹的，你多年轻多漂亮啊。”

他扬起眉，激我回应他的话。但我并没有理会他的暗示给他一个笑容，反而更加连鼻子也皱了一皱。不过最终，我没有再撅嘴了。

“我将赞成丢勒的附录成立。”

这意味着它将永远成为我个人档案的一部分。别的人将只会读到它，不知道事件的真相，并猜想我一定是把事情搞砸了。这样颠倒黑白是不公平的。

“那是一个起码的错误。”

“没有人说你必须同意。”

“我不同意。我绝对不会同意，我肯定 EEOC 会支持我。”

我停下来，几乎无法呼吸，勇气突然之间不知道转移到哪儿去了。现在，他们俩个都盯着我，坐在他们的椅子上一点不安都没有，而我不知不觉中脚步已经迈到房间的中央去了。

最糟糕的是丢勒·卡特尔看着我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可怜。

“好，如果你已经冷静下来了，”高罗威继续道，“我将告诉你我的决定的剩余部分。”

我往椅背上靠去。

“我将使那份附录成立……但是，我也将赞同安娜的调职申请。”

“对不起，”丢勒说，“但是就是十岁的孩子也能找出它们之间的矛盾，你怎能同时把两者都兼顾到呢？”

“我同意安娜调职是基于一个偶然因素。如果在一段试用期后她看起来能够胜任，那么我们将回到前面来把她升到绑架和敲诈组任职。”

“这彻底是一堆废话。”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高明的妥协办法。

“什么是偶然因素？”我急切地问。

高罗威站起来，回到他办公桌的后面，把半截雪茄扔到了烟灰缸里，在里面，已经有两个显然是被唾沫濡湿未干的烟蒂。

“我将让你着手一件毒品的案件。看看你到底怎样做。”

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为之欢呼，没有比这更棒的事情了。

“这是从局长办公室直接传送到我这里的。这就是他们称之为‘高度个人能力测验’的东西。”

我难以说清楚，高罗威一直微笑着，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件礼物呢，还是因为他找到了这个特别的字眼：“高度个人能力测验”，值得琢磨一番。与此同时，丢勒的脸一下变得如此阴暗，差点儿和他的海洋蓝西服成了一个色儿。

“简娜·玛森宣称，她的医生使她使用药用麻醉剂成瘾。”

我们估计是哥伦比亚人、墨西哥人、或是什么纨绔子弟所做的。

“你得立即进行调查，现在还不知道简娜·玛森是不是在贝蒂·福特中心，”高罗威继续道，“不过，她已承认她是一名吸毒者，因为那名奸诈的医学博士。名叫依贝哈特。”

丢勒：“局里的权限是什么？”

“她宣称他给她的毒品来自墨西哥。”高罗威扔给我一份档案。

“非常薄。”丢勒在一旁观察。

“看那份‘标题 18’，联邦编码，防止毒品滥用，或许是 21，配给失误。”

我没有吱声。

我完全清楚我有责任立即告诉特别行动处主管关于这件案子对我个人的矛盾冲突。我所谓的堂妹，死在神秘的环境下，正是被这位依贝哈特大夫所雇用的。

“听起来这像是一桩药品欺骗案，对我来说，”丢勒坚持道，“那么，它是在白领犯罪组的权限内，我错了吗？”

“正如前面所言，”高罗威严厉重复说，“这是从局长办公室传送来的。”

他已向我们俩清楚地指出了其政治意义。

“我会谨慎处理这件案子。”

“见鬼的谨慎，”高罗威咕哝着，“赶快给我滚回他妈的楼下去，以便我能显得他妈的聪明点。”

我们鱼贯而出。丢勒已经走出门口的时候，高罗威轻轻碰了一下我的肩。我转过身。雪茄已经在他嘴里了。

“现在已经没有理由再提那件诉讼案了，对不对？”

“我认为你相当公平。”

“十分动听。”

丢勒在走廊上等着我。

“显赫的案件。”我说，拢了一下头发。

“狗屁案件。”他满面笑容的回答说，接着便溜开了。

管他丢勒·卡特尔怎么想，这是我的机会，对于这次成果，可以产生无数的话题，甚至，闲话会满天飞——简娜·玛森，这个题目可太大了——还有，事实，如果要查证事实的话，我对于案件涉及人员已经有了先期的信息。从兴趣的冲突，到未可置信的优势，现在都在我的脑袋里打转儿。

我在回想那一天，从诊所出来的小巷子里，我看见简娜·玛森和这个被控告的医生在一起，她穿着红色衣服，挣脱他的拉扯，大步迈向轿车。现在，我还想起别的事情，奇异的细节。大夫一直拿着一朵玫瑰。黄色的玫瑰，有很长的茎。大轿车消失以后，他把玫瑰扔进了垃圾堆，沉重的大门在身后“啪”地关上。

(九)

第一步是要收集关于阮德尔·依贝哈特医学博士的全部信息，这通常从全球硬盘和磁带档案上就可以查到。

我们在机构内部计算机上敲出了他的名字，计算机会提供他在全球任何地方的犯罪前科，但是，我什么也没发现，我到“加利福尼亚机动车管理

局”核对，试图找到些鲁莽行驶被干扰驾车或超速行驶等等的传票，仍然是一无所获。我传要了电话记录，结果从电话公司得到一份收费长途电话的记载打印件，这些电话都是从诊所办公室和在第二十街的居所打出去的，我希望从中找到一个图样，能显示出与毒品的关联网。但是，我所了解到的全部资料只是依贝哈特一家曾给在波士顿的朋友和亲戚打过许多电话。

在楼下我们巨大的旋转“死亡档案”记录的是我们收到的市民通过电话或气窗投递等各种方式传送过来的申诉，通常我们会派出一两个聪明的职员去查检当然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加利福尼亚医药许可榜告诉我对于依贝哈特大夫没有任何病人投诉在档。他们强调，他是从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在新英格兰长会老女执事医院完成了整形医学的高级训练和实习。他出生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毕业于伯金汉的一所贵族预备学校：勃朗宁和尼克斯（B&N）。

我联系了我们的波士顿地方办公室，要求进行一次深层背景调查，并特别强调这是一起紧急的、由局长分派的“高度个人能力测验”的案子。波士顿的回应似乎是满口允诺了的。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依贝哈特的出轨，在他移居加利福尼亚之前，都一定会留下证据。也许这里存在着一种程式。我提出了一个去东海岸公差的应用，以防万一。

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我让自己回到了那个老问题：依贝哈特大夫的女佣和我对她个人的了解。我一直保存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贫乏的档案。信封放在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时常我会把它取出来看看：一本圣经；一些快照，它们讲着到美国的一个旅行；解剖照片，证明了一次暴力死亡。我听见她的叙述，作为一个艰辛的工人和慈爱的母亲，也看见她的孩子们，似乎就在眼前。也许最终证明她确是我的堂妹，但是我的工作必须扫除一切情感因素而只注重事实。我越是细密地看就越是倾向于肯定 LAPD 警探约翰·罗思的理论，但是需要作点修正：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与毒品有关——也许是为了她的前雇主，阮德尔·依贝哈特。

我的工作经常要求我成为社会结构的典型，一个人类行为的模范，就像是挂在特别行动处米切尔·尼西莫娜办公桌台灯的灯绳上的那串中国香囊一样。我曾经观察过她用纸做出这最不可思议的手工，怎样按步骤实施复杂的折叠。这个设计的单纯逻辑就是要使最为脆弱的材料变成为坚固的机构。

我的头脑里有一个小球开始跳：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与简娜·玛森案件联系的可能性。小球在脑力的墙壁上弹跳了千百次仍然没有停下来，它只触动了一根神经——再给约翰·罗思打个电话。

花了几天时间才找到他，因为他的工作是需秘密进行的。他的态度却如此的令人恼火：

“为什么我他妈的要帮你一个忙？”

“是帮你自己的忙，找一个杀人犯，就这一次。”

“我为何要自寻烦恼呢？”

“你是不是已经得到尸体解剖的报告结论？”

“没有。”

“那么那件案子现在是个什么情形呢？”

“它在‘谁在乎？’档案里，也就是在‘谁在乎一个墨西哥死人？’里。”

什么东西正从远方吹过来，地平线上仍然什么也见不到，只是可以从空气的细微变化里可以觉察到，从干到湿，还有，白杨树叶的颤动也透出一丝

征兆……与通常的城市喧闹相反，四周显露着奇特的宁静，以至一个人的声音会在空间中反复飘荡，变得狂暴而急迫。

我压低了嗓音告诫说：“她来自萨尔瓦多，她有孩子。”

“跟其余一百万个死去的墨西哥人一样。”

“你真是残忍冷酷。”

他狂笑起来。

“这是你自己的精妙推断，约翰。她在凌晨五点钟走到圣莫尼卡大街上去，她被枪杀而且看起来完全是蓄意的，她的手被打掉了，这意味着某种报复和警戒。”

“非常好。”

“她一直为一位大夫工作，而这位大夫现在被简娜·玛森指控非法使用药物。她一定为他提供了一个联系渠道。我请求你重新调查这件案子。”

“我还需要其他一些情况。”

“这些是最主要的。”

“那么我就接手了。”

我咬着嘴唇，我太需要这句话了。

“约翰，别松懈，好吗？”

我在想，软弱在他那里是如此的明显，正如在我这里是被拼命克制住的一样。

“一个医生非法使用麻醉剂，就好像一个枪手要动他们的枪一样，”芭芭娜宣称，“全是社会的蛀虫。”

“现在还未必，一切都还是推测。”

“你的意思是敲诈勒索？”

我们在复印机旁遇上了，就一起沿着走廊回来。

“或者是他想从药店或保险公司得到一笔赔款，但是我查过他的银行账号和信用卡，经济上一点问题没有。”

“那么就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权力。”芭芭娜得到这个假想，眼睛一下亮起来，“你想想，能有什么东西让这个讨厌的医生得以把简娜·玛森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医生掌握隐私和怪癖。”我同意她的意见，一个想法已呼之欲出了。

“你怎样对一个女人实行这样一种，‘检查’？”

“我会让你知道的。今天下午，我就去马里布。”

芭芭娜用拳头擂着自己的胸，出于羡慕，她的拳头捏得更紧了。

“别担心，”她继续气喘得说不出话时我向她许诺，“我保证会从微型胶片上得到简娜·玛森的贴身内衣。”

我窜出海洋大街的隧道，把车开上了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太阳烤得我直冒水汽，走廊地带的空气突然变得流畅，没有阻拦。棕榈树都还很细小，沿着公路边的岩壁生长开来，公路很狭窄，双向对开，中间没有隔物，我以六十码的时速在向前喷射。这个速度让我觉得有些晕眩，海浪溅起的银色飞沫又分散了我一些注意力。岔路口挤着几辆停靠的小车，一排低矮的破旧的房子胡乱堆在远处山上，背向着公路，看来用不多久，它们全都会变成一堆危险的垃圾，左侧海水洗刷着海岸，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蟹钳在从右边的山壁上刨取泥土。我记得在去年冬天那场该死的风暴中，有许多砾石被抛到了路面上。当我朝北开去时，这个恒定世界的秩序就逐一在眼前展开，自然界中

清晰健稳与诡变动荡之间微妙的平衡全部体现在这大洋与大陆交界间。

经过倍伯戴恩大学后，我把所有那些无用的东西全抛在了身后——西班牙式样的林荫路和海岸交通。道路变窄，成了乡村景色，牧场队这里一直伸到圣莫尼卡山脉脚下，太平洋向西延展的远景，近处岩石峭壁下海的拍击翻卷，共同构成了一幅奇特壮美的景象。

阿诺约路很快就到了，一块经受了风吹雨打已显得模糊不清的路牌指示着。在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左拐横过高速公路之后，我发现自己置于一条肮脏的狭路上，整段路被巨大的、枝条横兀的显然已栽种了许多年月的按树像凉篷一样的覆盖了。我非常惊奇，在高速公路和大海之间居然会有这样一块土地躲藏在这里。一道由树枝编成的管状防护栏看起来似乎显得单薄，围在里面的茂盛的金草场上，两匹阿巴路萨马正在吃草。我担心安全。道路在这里划了一个弧。弯过牧场钻进了一片红杉木林。

出现了一间门房，里面并没有看守人，但是白色的防护栏却是升起来的。我谨慎地穿过去，直奔狐尾农场。这是一块数英亩的沿岸林地，包括一处私人海滩，是简娜·玛森在七十年代花两百万美元买下来的，现在价值早翻了十几倍。

五六辆机动车停在一块碎石地上，工人开的轻型卡车，那辆 JM 豪华大轿车，崭新的米色凯迪拉克带有部分金色构件，那一定是属于玛森的私人经纪人玛格达·斯脱克曼的，她（我已被告知）今天将同她的委托人一起在场。

树叶遮掩了房子的大部分。入口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在并不显眼的白色墙壁上开了一扇门，旁边是一间车库房。

一个年轻的男子前来应门，他留着一头富有光泽的棕色披肩长发。有一些留长发的男人看起来就像羊脂球；有一些则像性感的偶相——就像这个：肌肉虬结，警觉的野性的眼睛，褪色的游泳裤，品红色的马球衫，以及一双赤裸的足。

“我叫简。路上交通如何？”

“比韦斯特伍德好。”

“通常会先有一点混乱发生，但是一旦当你到这儿，大多数人们都会满意这次旅行。”

我跟着简穿过院子，眼睛一直盯着他充满魅力的脚踝看（忘记小腿了，我甚至没顾得上看看小腿），上面拴着一对危地马拉脚镯。他的脚趾修长，富有抓力，被太阳晒成很健康的黑色。你可以很容易地想像这样一双脚将怎样灵巧地驾驶住冲浪板，或者，驾驭住一架黄铜大床。

“你喜欢到外边海滩上去是吗，简？”

“噢，是的，我是帆板教练。”

“不要告诉我简娜·玛森正在帆板上。”

“不，她不在。”他回答得很严肃。

“你为玛森夫人做什么？”我尽量保持坦率的语气。

“我是她的助手。”

这是对秘书的好莱坞叫法。一天早晨简娜·玛森到海滩去散步，拾回来一个年轻的冲浪者为房间增色，并为她拆寄邮件。他的想象力的绝对缺乏使我相信他只是她的秘书而再不是别的。他说的每一件事都费了他极大的能量才传送出来，这看上去像是很有个性，而实际上只不过是机械罢了，就像一家上好旅馆里的服务生。他对我毫无兴趣。他根本不在乎是否碰上了我的眼

神，他感兴趣的是他的身体，以及他今晚上在麦克金堤的吧台旁摆好姿势时会是什么样子。我把这些事情都记下来，因为我曾经注意到，人们通常雇用的助手，在很多方面其实都和他們自己相似。

我们继续往前绕过一个拐角，在这里，我突然被一个旧水池给我的感觉冲撞了一下——水池四周飘着一股很浓的氯气和湿水泥的味道——我确信，在我左边的是一个大约四十尺长的游泳池，椭圆形，池底铺着青绿色的瓷砖。旁边是两张红木躺椅，上面放着黄绿相间的绣花背垫，在它们边上，则插着一把遮阳伞。那水看起来似乎已腐败发出了恶臭，难说吸引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水老鼠。我猜想使用这池子的人大概只有简娜·玛森孙子辈的小孩们。芭芭娜告诉过我，简娜的三次婚姻共产生了三次的结果。

我们走进一间修建有假梁的大厅，地上铺的地毯颜色是明亮的，酢浆草那样的嫩绿。我突然间发现站在我面前，几乎脸碰脸的就是简娜·玛森，她穿着一件晚间长袍，怀里抱着一束花，满面笑容。

在经过不知所措的一瞬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幅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剪影而已，会面还没有开始。

“喝点儿什么吗？咖啡？果酒？”

“咖啡就行了。”

“除去咖啡因的还是一般的？”

“加糖和奶。”

“马上就送来。”简毫无表情地说，然后就离开了。

房间里放着两只很大的棕色转椅，看上去就像是桶一样；几张咖啡桌都是用彩玻璃嵌饰而成，图案设计或是少女，或是鸽子，或是太阳和月亮。向外凸出的酒吧里贮存着几乎所有东西，从格朗菲底希的苏格兰威士忌到法国的肉桂香草甜酒，甚至还有一叠叠“大事记”粘贴在吧台上。

欢迎你来到咖啡简娜。“大事记”里有关于她的喜剧连环画、讽刺画和相片，涉及了你所能想象得到的著名人士，包括最近的五位美国总统。还有则是一些思考、推测她的辉煌成就，私人生活的带有那种令人吃惊的大字标题的文字报道和摄影画面。在吧台正中，是放在水晶花瓶里的一大蓬鲜活的黄玫瑰。

奇怪的是，在报纸上能见到的日期全都截止于1974年。

现在我开始懂得这间屋子了。为什么棕色的百叶窗是关着的。为什么家具，尽管它有华丽的鳞纹，接受最精心的保养，看上去却是破旧的。空气感觉起来闭塞而湿闷。这是一幢七十年代的房子，二十年来从没有被改变过。这间屋子是为了抽鸦片、喝酒精、调情、做爱和躲避加利福尼亚阳光而设计的。这是一个舞台，是为享乐主义者的享乐而设置，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采取一种特定的方式；它现在被原样保存下来，以便简娜·玛森无论什么时候迈进门厅，都能重新唤起对那光彩夺目、精力充沛的往昔的回忆。

我在房间里踱步，力图去感受，去想象它最近被怎样地使用过和为了什么而使用。没有烟灰缸，没有废物篓。壁炉清扫得干干净净。但是就在它的正上方。挂得如此拙劣以致于从墙上向外倾斜似乎是要跌落下来的，是一幅绝对令人震惊的油画。这是一幅海景，无数只帆船在海风的鼓动下，穿过半透明蓝绿色的海水，竞航向前。它是如此的生动，似乎能让人看到画面发射出奇异的光芒。而对于它沉重的镀金画框，对于这间过时的屋子，对于电影明星枯燥无味的家来讲，它的生动又显得太不相宜了。

在真正的生活中能看到这样一件作品是会令人震动的。我凝视着那些风帆，长时间地陷入为情感所支配的感觉世界，不知不觉竟掉下泪来。这幅油画的生命力使每一件事物，包括我自己感伤的心灵，都变得似乎沉静下来。

“这是依多德·马奈的作品。”

我猛地转过身去。我没有想到在这间屋子中，除了简娜·玛森的巨幅肖像外，还有别的人。

“她在马略尔卡岛拍片子时看到这幅画。我一直鼓励她收集艺术品，但这并不适合于她。她只对表演感兴趣，当然这对她来说就很幸运。我是玛格达·斯脱克曼，她的私人经纪。”

她是个高大的女人，穿的一件黑色西服，以上好的式样和上好的羊毛线镶着白色的滚边，使她的形象看起来整洁、漂亮。她移动步子时衣服发出瑟瑟的声音——那衣服一定是用丝线缀成的。当我们握手的时候，她的手腕上几件沉重的金镯和金链相互撞击，发出圣诞铃一样的叮当声，我完全被她身上散发过来的甜腻、浓郁的香水味所包围。她穿着黑色长筒袜和一双黑色高跟无带皮鞋，脚上同样戴了两只金镯，像我这样生活在低层的人都把这看成是上流社会的商业标志。

“像这样的绘画整幢房子都有吗？”

“只有几幅毕加索的。这已足够了。简娜不是那种把坐在火炉旁欣赏绘画当作享受的人，她总是让自己处于运动中。”

玛格达·斯脱克曼的两只手像个轱辘一样，老是转个不停，手镯发出悦耳的丁丁声、她的口音圆润、清亮，可能是来自中欧。所以我得到这个印象，她一定在那里呆过很长的时间，培养了这种口音以至成为她个人特征的一部分，她有宽阔的斯拉夫颧骨，黑色的头发扫过脸面 and 一副眼睛框，与湿润而极端白皙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东西富于艺术性地组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只能想象她的年龄大约经常被猜想在五十至七十岁之间。

“我很抱歉不得不说简娜和我今天将不能和你在一起，我们同从圣路易斯来的一些人有个约会，而且不能被打断。请向 FBI 致以歉意。”

我的背挺直起来。

“这件事是局长直接分派下来的，我们被告知它非常紧急。”

“它的确是最高紧急。但是在今天也不行。”

她宽和地微笑着，嘴唇红润发亮。

“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放松一下。我们当然欢迎你去海滩散步。如果有什么所需就找简好了。”

她已经给了美国政府三十秒她自己的时间了。玛格达·斯脱克曼匆忙出门。在某间屋子里响着的电话铃声正催促着她。

简端着一个银盘出现了。盘里是一套绘着草莓图样的瓷咖啡具——壶，杯子和碟，以及乳脂和方糖，所有这些东西，还包括搁在蓝色布餐巾上的一只银茶匙，只为一个人服务，而你就好像此时正躺在一张床上悠闲翻阅那些用昂贵纸张制成的邮购商品的目录。

他小心地放下盘子，然后用他那双粗壮的手整理了一下花哨的头发：“我们将打电话到你的办公室做重新的安排。”

“简娜喜欢黄玫瑰。”揣摸着这里的每个人都叫她简娜，所以我也试试。

“是的，她喜欢。”

就这么多。他留下我和咖啡和马奈的纪念在一起。我还从来没有受到过

如此有礼貌的接待。

我走到海滩上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小径从迷人的斜草地中穿过，路边填满了黄、红、蓝还有紫色的三色堇，在风中微微摇动，使我想起母亲晾在后院晾衣绳上的棉手帕。站在悬崖顶端，强劲的海风把头发全都吹得向后飘散，就像是一个炼金术士围在你耳边许下令你心神激荡的诺言。夏威夷就在那边，还有中国。毕竟——到现在，这里已经没有选择，潮湿的空气弄糟了这件我特地穿来会见电影明星的米色亚麻西服又怎么样呢。我紧紧拽住悬崖梯道两边的保护铁链，几乎在岩岬上垂直下行了一百多码。

这里就是简娜·玛森的私人海滩了。下午三点钟的太阳照在沙滩上，沙滩就像是一面镜子，只不过反射的全是阳光的热量罢了。空气中有股咸味，没有噪音，除了风也没有什么能留在脑子里，视野里没有人，没有他们存在过的迹象，彻底的一个人。为了能够拥有这里的一切，我也会乐意犯下死罪的。这时，一个男人在岩石上正摇摇晃晃地向这边毗邻的一处凹槽爬越过来。眼前的阳光太明亮，看到他时只是一个黑色的轮廓。我想这一定是简娜·玛森的狂慕者，或者是一个小报摄影记者，试图从海路接近她的住地。我从我歇脚的一个经历着日晒雨淋的木箱上站起身来，手有意无意地就停在了衣服下别着枪的位置附近。

当他笨拙地移近了我才认出是那是汤姆·保罗伊，那辆大轿车的司机。他彻底全身赤裸着。

“汤姆，”我冲他大声叫嚷以引起他的注意，“我是安娜·格蕾，FBI，我们在巷子里遇见的，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他一直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这边移动，直到跳上沙滩走到我身边来，“好一个明朗的天气。”旁若无人地，他打开了这个木箱。在里面是一副旧的、纠缠在一起的渔网，有一些衣服、叠着的毛巾，还有一个红色的冷却器。冷却器里边有新鲜的冰块，棕色瓶子装的墨西哥啤酒，水果苏打饮料和半个水分已蒸发掉不少的西瓜。

“啊哎，汤姆。我们可不能像这样进行一次约会。”

他咧嘴笑了。他的嘴唇已经干裂，肩上已长出了赘肉，苍白的小腹向外膨出。那东西挂在那里摇晃晃的，很一般。一双弓形的腿，接近于油煎圣芭芭拉河虾的颜色。

“喝点啤酒。”

“我要黑葡萄汁。”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被邀请来的。”

“被谁？”

“你的老板。”

“有人被调查？”

“也许是。”

“我们中的某些人？”

“是的，汤姆。”

他笑了，眉毛生动地扬了扬。

“拉我一把。”

“你可以走开但不能藏起来。”

我们站在这里向大海眺望，而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因为我穿衣服。不要

问我为什么。

海浪现在来得更快了。汤姆爬过来的那块巨砾已彻底地被粘满泡沫的拍岸浪花淹没了，这使得第二个爬过来的人影，一个女人，移动起来更为困难。她找了一条路绕过突出的峭壁，越过岩石，穿过沙滩，加入到我们中来。

“米特·莫瑞恩。”

也赤裸着。

莫瑞恩看起来脑袋很小，太小了，似乎是饮食不正常引起的。她的手臂瘦骨嶙峋，大腿肌肉松弛，胸前只有很小的坟起，乳头扁平。但是头发很漂亮，红得耀眼，在微风吹拂下如一团火焰在半空中燃起。

莫瑞恩拉着汤姆的手，什么也没说。我猜想她有些害羞。她从箱子取出一件斜纹粗布衬衫，但是并没有穿在身上——我希望她这么做——而是在地上铺开躺了下去。

汤姆抓了一块毛巾，双腿交叉挨着她坐着。他的中年体态像一大堆粉白的面团，在她纤弱、毫无性欲的身体旁边。一只多肉的手拎起一瓶啤酒往嘴里猛灌了几口。其余的则洒在莫瑞恩年轻的布满雀斑的前额上。

“你们俩看起来是想私下呆一会儿？”

“不，不。我们只是在休息。”

“这就是他们在马里布的咖啡休闲？”

“有时候可能是这样。”汤姆不由得又咧开了嘴。

“你们都为简娜·玛森工作吗？”

“莫瑞恩为她做衣服。”

“我有一个朋友叫芭芭娜，她由于悲剧性的童年的剥夺，一直被简娜·玛森和她在哪里得的她的衣服困扰不休。”

莫瑞恩耸了耸她裸露的肩膀说：“她拿的。”

“拿的？这是什么意思？从商店里？”

“从电影制片厂。”莫瑞恩的脸一直向着太阳，没睁开过眼睛。她会告诉管道具的工作人员或别的人，给她葛丽泰·嘉宝的复制品，然后我就返回汽车，到更衣室里给她抱几大盒子劣货出来。

“哪种劣货？”

“就是她在电影里时穿的那些。我想这和她自己的随随便便相类似。”

“这种行为和她的吸毒问题有关吗？”

“那已经结束了。她放弃了毒品。”莫瑞恩用严肃的声音告诉我说，“很长时间。”

汤姆斜躺了下去，用肘支撑着脑袋。

“他们都从制片厂偷东西，安娜。标准的行为程序。”

“有人会去。你从哪里得到那衣服的？然后她也会去。欧，这是我私人设计师设计的，路克·弗朗斯，而它实际上确实是从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拿的。我爱简娜。”莫瑞恩在红外线照射中笑着。

我意识到这个女孩不可能超过二十岁，而她脑细胞的年龄也大约如此。

“你为简娜工作几年了？”

“我不知道，也许一年。”

“现在就要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是不是太快了点？他们难道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什么的？”

“莫瑞恩是助手。”汤姆解释说，“有别的人——或者实际上是一些人

——在掌管，你知道的——”

“设计、采购、裁剪，”莫瑞恩像个小孩子在她课堂上一边唱着说，“概念化。”她停了下来，汤姆皱起了眉头。“我真的不想做衣服。”

“不想？”我把饮料一干到底。

“我对演艺有个伟大的想法。”

“小莫瑞恩的大梦想。”汤姆充满深情的捋着她的头发。

“玛玛玛格达认为那是个好主意。”莫瑞恩睁开了眼睛而且张得大大的转过头去瞪着汤姆。

汤姆讨好地笑了。我把饮料瓶扔回了冷却器。

“为什么你不留下加入我们？”他接着。

“加入你们什么？”

“无论何事。”

我又一次地眺望大海。浪头现在有六尺高，沉重，令人生畏。

“进入另一种生活。很高兴见到你，莫瑞恩。”

我走回悬崖，抓住铁链，沿着木头搭起的阶梯自个儿一步步地爬上去。

我到达崖顶，刚刚喘出一口气，就被突然出现在面前的简弄得大吃一惊。他站在岬角的顶头，上半截的衣服已经湿透了，因为崖上有风，他的头发全从肩上飘扬起来，他正通过一只高倍双筒望远镜看着这海洋。

“海豚。”我经过的时候他解释说，眼睛没有离开镜片。

很明显，他是在窥视那对赤裸的情侣。

(十)

简把那叫作“重新安排”——然后中断然后再重新安排——或许要十几次，我继续忙着其他的案子，而每一次简说他的老板准备好了见我最终却都未能成行。有一次我如约去了位于“百威利·格朗”顶层的最高档的意大利餐厅，但是餐厅的侍者总管告诉我玛森小姐无法见我，但我可以作为她的客人到前面要一顿午餐。我要了一份价值二十一美元的海味色拉，当它送过来的时候，令我极端惊怖的是，一只角币大小的剥了皮的章鱼竟从那一堆混合的绿色色拉中缓慢的爬了出来，爬在盘子边缘，然后瘫成一团掉在桌布上。

“为了保证海味的绝对新鲜，厨师把它们放进色拉时是活的。”侍者解释道，“然后用橄榄油将它们杀死。”

第二天，我发现我的办公桌上空一条绳索末端中吊着一条橡皮章鱼。这个叫我讨厌的玩艺儿是他们中的哪一个——最可能是凯乐——跑到玩笑商店买来的。这些快乐的恶作剧者还复印了许多简娜·玛森的图片贴在我的墙上，“在马球场见我！”“在浴室里见我！”“路亚，孩子！”“给安娜——我最亲爱的朋友。”

按照简的说法，这次是“铁板钉钉”，从星期一起的一周内，我将在简娜·玛森在百威利·希尔斯的律师办公室中同她见面。这件事安排好以后，我得以投入全部的注意力与列斯进行深层的交流，他是玛丽娜制造公司新来的机械师。我确实很喜欢在那辆巴罗库塔上工作，要保证它的运转需要在面对唐吉诃德式的挑战。尽管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前灯线路要削短，但他告诉我的那件奇妙发明却将替代整个配线和灯泡装配线。它的成本大约三百美元、而我们将不得不等到有零钱给我们的时候。

我渐渐知道有些事情是在“牛棚”以外进行的。一件只需表示适度惊异的事情有可能演变成一次小的骚乱，比如有人在抽彩中赢了五十块钱。但是我一直在观注列斯，努力控制我的恼怒，忍受着他在早晨七点钟穿一件污秽的法兰绒衫衬，马尾辫子吊在背后，白色的纸咖啡杯套在他修长的变黑的手指上转圈，清香的水蒸气和他的口臭一同混合在空气中。

也许老列斯被汽车的毛病扰烦了，或者也许只不过是偶尔一次的宿醉，但是如果他有一把螺丝起子而不是份繁琐的工作，他也许就能够看到所有的道吉货车的前灯灯泡都会换成他的发明。你只需在自动收零的商店递出十美元就可以得到它。但是，正当我准备教育他时，在办公室那一端骚乱已经发生了，并且开始向我身上转移。就像在棒球场里的人浪一样，那边人们刚站起来，十五秒钟以内每个人都涌到我身边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们遭到攻击了。那些疯子们要设法通过安全门。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拿他们的武器，飞虎队也没有赶到。“继续。”我示意列斯。自己却绕过办公桌伸长了脖子去看，只看到一幅穿着白衬衫的人潮像海水一样拥向简娜·玛森的情景，而她本人正在朝我走来。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她到这里来做什么。我激动得发狂似的只来得及把她的图片的复印件全部从墙上撕下来。大片大片的墙灰落下来飞进我的眼里，我把它们揉成一团扔进垃圾堆里，试图强迫自己马上变成一个尽心尽职的FBI特工。简娜·玛森正赶来看我。然后我意识到那条橡皮章鱼还挂在我办公桌的上空。

我瞟了一眼走廊的情景。我能看见玛格达·斯脱克曼光亮黝黑的头高高冒在众人之上，金耳环闪闪发亮。她自己像一块岩石一样立定身形，并巧妙地分散了她的当事人周围人流的力量，使玛森在她的庇护下跟随她一起移动，保证不受侵扰。同时，她保持了一种宽厚的表情，熟练地环顾房间四周以预期下一步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对她们发生。将近六呎的身高赋予了她这种能力，可以凌驾于许多人之上。

我计算出在他们接近我之前，我有十秒钟时间，所以抓起一把剪刀又跳上一张椅子，但是随行的人流却突然向左拐了。我空着手跳下椅子，盯着他们的背影发呆。

稍停，芭芭娜·苏立文像个伊斯兰教托钵僧一样出现在我背后，一只手指使劲戳进我臂上的三角肌里。

“我得到她的亲笔签名了！”

她把一张公务用的便笺几乎伸到我的鼻子底下。一个仔细而清晰的签名写满了一整张纸。

简娜·玛森能把一张废纸变成一顶帐篷，她能仅仅是走进一个房间就改变这一天。这个女人有种魔力，甚至连我，一个无神论者，也感觉到遗弃、伤害和不适当，因为我没有在门的那一边。“简娜·玛森有何贵干？”我有些伤感地抱怨道。

“要么你知道要么你不知道。”芭芭娜叹着气，一面赶紧跑开。“我要给我芝加哥的姐姐打电话——他们肯定都不会相信的。”

她刚下了两个台阶，就停下，然后转身跑回来瞪着我，似乎突然间觉得很惊诧。

“你在这里干什么？”

“想把我的前灯修好。”我已经又把注意力放到了列斯身上。

芭芭娜的眼睛已经瞪圆了，露出极度惊奇的表情：“为什么你现在不在高罗威的办公室里？”

“她是来找他的，不是我。”我露出的是一个生硬的笑容。

“你疯了吗？”她把我的手从桌上抓开，“到那边去。”

“芭芭娜，我不会介入别人的会晤——”

“你就坐在这儿等皇室的邀请？”嬉戏消失了，但她的眼睛因为同样的狂热依然明亮，这种情形在以往任何时候有人提到丢勒·卡特尔时都不会出现。

“很明显这件事已经被更高层接管了。”

芭芭娜很不愉快地拽着我的上臂：“走吧，你这个狗屎蠢蛋。”

她故反应似乎过分了。但是我说：“我去。”

她放开了我。手臂已经被她扭伤了。

“耶稣基督。”

我抬起档案和一听喝了一半的可乐，故作矜持地缓慢向高罗威紧闭的房门走去。一面举起那只没有弄伤的手把头发弄得蓬松些，偶而回头看看，发现芭芭娜·苏立文仍然在背后盯着我。她长我七岁，她的喜怒经常会突如其来，她也能变得严肃。我如果有这么一位大姐，不知道我今天会在哪儿，但是，一定不是这儿。

我期望艾艾钻进屋的时候，高罗威亲切地说他正要传我来。

他应该告诉我自己要带椅子来的，因为这地方已经挤满了人。

简娜·玛森独自坐在花格纹的“黄油硬糖”沙发上。我的眼睛一旦放到她脸上就再也拿不开；自然、完美的脸型，放射出奇异的光芒就像她的马奈。她穿着一件桃红色的雪丝绸外衣，袖子很长，镶着花边的袖口已完全把手掩住了，荷叶边则铺到了膝盖处，一双行动不便的高跟沙滩凉鞋。

玛格达·斯脱克曼坐在她右边的扶手椅上，两位男律师，我得知，他们来自百威利·希尔斯律师行，只好蜷在两张不知是从哪里飞来的打字凳上歇脚，高罗威拖出来一张样式蠢笨的黑皮办公椅示意我坐下。这是属于富有男子气概的“执行官”级别的椅子，它的靠背比我的头还高。轴承已经松动，所以旋转难以控制。坐在上面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些稀奇古怪、皱缩了的君主，将要被离心力赶下台。

这会儿简娜和玛格达一直在私下里交谈。

“这真是令人震惊地滑稽。它决不会停下来，”玛格达说，“我不能相信它会不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我听说结局会是谁也讨不了好。”

“不。它完美极了。”

“我总是在哭。”简娜道，“为什么我要去演一出总是在哭的戏？”

“他在这幅照片里可爱极了。他是一个宠儿。他们是真正地在一起。”

“我们会乘同一架飞机回纽约。”简娜对她说：“难道这不漂亮吗？”

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礼貌地听着，但没有人搞得懂她们任何一句话。最后简娜·玛森才算对着旁的人问了句：

“能给一点‘埃万’水吗？”

“冰箱里有苏打水。”高罗威朝着我点点头。我举起了我的可乐罐。

“糖会使我的腰变粗的。”

“我们要普通水。”

“我的营养师会大发雷霆。”

高罗威看起来大费踌躇，两个律师开始摸电话。但斯脱克曼毫不退缩。

“水马上就来，杰伊。”

那低沉的喉音真让我感到一种压力，它似乎是像和她自己庞大坚实的身体的权威来一次竞赛。她今天穿了一件棕橄榄色的上衣，黄铜扣，袖口上镶着金边。在这件典雅的外衣下，套着一件办公室的制服（芭芭娜将会知道谁是设计者）。她的腿矮壮——农民的腿——她使膝盖露在外边，两个膝盖头紧紧挤在一起，棕色的长筒袜，配一双浅口无带皮鞋，皮鞋上带有一个 Cs 的标记。橄榄色的镶皮挎包上的金链上同样有一个标记 Cs。

玛森有一点神经质的紧张，同时对斯脱克曼则若无其事地发号施令。她的行动果断而不慌乱。黑头发被压发收拢，些微的几根拂在她的面颊和蒙古人种的眼睛上。

“真的，我们马上就能找到水。”高罗威继续说道，声音从嗓音里格格地逼出。

“让水见鬼去吧，拿苏格兰威士忌来！”玛森爽快地叫起来，我们全笑了。

“你向我们的女 FBI 特工安娜·格蕾说哈罗了吗？”斯脱克曼提醒道。

电影明星双眼向我瞅过来，伸出了她的手，直接，富于技巧，使我来不及移动自己的位置，不要犯错误：我们聚集到这里来是为她个人的需要服务的。我从高罗威的椅子上站起来有点犹豫。我的手变得潮湿，有些发抖。

“关于你，我们曾听到许多有趣的传闻。”她带着微笑喃喃地说。

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我不能想象那到底是什么有趣的事，这些事又是谁告诉了她们中的哪些人。

“我们非常乐意让一位女人来处理这件案子。”斯脱克曼补充道。

“安娜在这里是因为她的优秀，而不是因为她是女人。”高罗威插口道。他把一支雪茄放进嘴里。“别担心。我不会在你们面前点燃它。”

“噢，男人和他们的傲慢。”玛森宣布说，“我曾对克拉克·戈培尔说，当你像猿猴一样被吊起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抽一支雪茄呢？”

“杰伊，不要说谎话。”

“女人用不着抽一支大雪茄或者拿一把枪来证明她们也能。”

两个律师偷着咯咯笑起来，好像他们以前从没听过这类的笑话一样。显然，高罗威也被逗乐了。

“不是我们不需要保护我们自己，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玛森小姐继续道，“告诉我，安娜，你用过枪吗？”

“是的，夫人。”

“好。”她低声说，“你能保护我们不受这些律师的伤害！”

屋子一片不满之声。这时候门打开了，莫瑞恩，就是先前在私人沙滩上那个裸体莫瑞恩，拿着一大瓶“埃万”水走进办公室。

“坐在我旁边，甜心。”

简娜·玛森敛了敛衣服的折边，腾出一点空隙让莫瑞恩挤在她身边坐下去。莫瑞恩被介绍作“为我制作全套服装的天才少女，和亲爱的朋友”。

“我们见过。”我回应道，尽管从她漫不经心地表情上我怀疑莫瑞恩是否能想得起来是在何时何地。她很明显地，如他们所说，“在她自己的空间里”。今天她看起来更像是来自另一个空间的化身，带着用玳瑁梳子和扣紧

的与众不同的桔红色头发，与那件古典式样的人造丝服装搭配的是一条琥珀项圈，一双跑鞋、一双短袜。

“我抱歉，从七楼到十一楼他们能找到的就这么多。”莫瑞恩从一个大的帆布肩包里取出一包整整五十个套在一块儿的塑料杯，拔下一个来，为简娜倒了一杯水。

玛格达·斯脱克曼现在开始打趣高罗威：“在我与局长的交谈中，他向我保证我们将受到你最庄重认真的关注。”

“你已经得到了。”高罗威说，“你是否介意我们把这些录在磁带上？”

“我希望如此，这样我们也许能留下一个记录。”

高罗威将一个松下微型录音机放在了咖啡桌上，然后按下了“ON”键。

玛格达用时轻轻敲了一下：“简娜？”

简娜·玛森站了起来，她的眼睛微微闪光，她的手十指交叉紧紧握在一起，就好像她正准备开始一场音乐会一样。

“这个男人，这个依贝哈特大夫，使我对止痛药上了瘾。”

她现在动了，偶而转向我们，展示一下裙子的摆幅，调整一下她在这间屋子的空间里的位置。

“当然，我信任他，我是他的病人。最先那药丸帮了忙，但是他坚持给我更多的直到我后来离开它就再也不能活下去。我成了一个瘾君子，我现在可以承认这点而不必因为羞耻隐瞒它。”

她抬起她的下巴，逐渐从这个角色中放松下来。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药丸？”

“狄劳狄德。”她瞥了一眼斯脱克曼，寻求鼓励，然后继续道，“他们说它们从墨西哥进来的普通的狄劳狄德，只是通过那条途径来的更便宜一些，尽管他实际上向我索要了一大笔钱。”

我跟着问：“你在什么地方得到这些墨西哥药丸的？”

她侧过身去看斯脱克曼，很迷惑。经纪人平静地替她答道：“他是在办公室里把药丸给她的。”

“他没有开药方？”

“药方很容易写出来。那家伙很聪明。”律师中的一人说。

“并不那么聪明。”另一人说，“从他自己的工作室里配置一种受控制的物质？”

内部通联系统鸣叫起来。玛森小姐的电话。她消失在毗邻的办公室里，律师们有了机会可以打他们私人电话。高罗威关掉了录音机。我们低声交谈了一会儿。我去了盥洗室。十五分钟以后，我们重新开始。简娜·玛森现在如演戏般地靠在窗户边。

“依贝哈特大夫把狄劳狄德保存在哪里？”我想知道得更详尽，这样，当我们去搜查他的办公室时他就不可能跳起来把药丸毁掉。

“在检查室一个上锁的橱柜里。他有一只鞋盒，里面放着装满各种药丸的瓶子和盒子。依贝哈特大夫听起来就像一个粗心大意的傻瓜。我在他办公室后面的小巷子里的那一刻看到的可正好相反：一个对他面前的一切事物都有优先权的男人，极佳的控制。是她，那天跑出了他的控制之外。

还有更多的中断——玛森小姐需要一些酸乳酪来帮助她度过这段时间直到午餐，但是乳酪要不含脂肪的，还需要有能咬得嘎嘎响的蜂蜜坚果。直到最后我觉得受够了。

“玛森夫人，出于尊重，我们能不能停止这些紧张而忙乱的活动？”

高罗威瞪圆了他的眼睛，两个律师在他们的凳子上僵住了，好像是一个闪电一下子击中了他们的屁股。但是玛森小姐和斯脱克曼只是交换了一下眼神，似乎反而轻笑起来。

“我告诉过你她很可怕。”那经纪人向女演员保证道。然后对高罗威说：“请告诉你的秘书，玛森小姐将不会再接电话了。”接着向她的当事人点点头示意开始。

“我正在福克斯公司拍一部片子，间谍战栗片那一类的。一次鸡尾酒会后的场面，有人扔了一颗炸弹进大使馆窗户……我正和舍恩在跳舞——伟大的爱！——他演我的丈夫，那个被杀的大使……我们正对着摄影机排演，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大理石壁炉前跳舞。这时，我应该听到远处一声枪响，他的胳膊被打伤——然而，我踏出一个舞步时突然间膝盖扭了一下，舍恩想抓住我，但我已经跌下去，连大腿也跌伤了。地板跟地狱一样硬。那是哪种地板，莫瑞恩？”

“柚木。”

“正好跌在柚木地板上。”

“然后你就去瞧依贝哈特大夫？”

“他们在我的腿上搁上冰，把我扶进轿车里，然后莫瑞恩和我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赶到匹克，对吧，甜心？”

“整个时间里我都觉得胃不舒服。”莫瑞恩在沙发里说，嗓音甜腻腻的。“为了你。因为你那时是这样的痛苦。”

“谢谢你，亲爱的。”简娜抚摸着她的头。

“那时候你就已经是依贝哈特大夫的病人了？”我问。

“这是命运的安排。实际上我也许应该永远不遇上依贝哈特大夫的。她们想送我去西达斯，但我坚持一定要到圣莫尼卡去看达那大夫，一个亲密的，非常亲密的老朋友，我认识他已经好几年了。我的司机用车载电话和他们联系，他们告诉他达那大夫最近退休已去了毛依，这个年轻的依贝哈特大夫来自波士顿，现在代替了他的位置。这时候我们已经行到半路上了，我又陷于极度痛苦之中，而且对达那大夫在这时候离开了我感到很难过，所以已经不能再想别的事了。”

“依贝哈特大夫的检查结果怎样？”高罗威想知道。“你不是说检查十分彻底和专业吗？”

“作为一个医生，他的确很出色。非常聪明。非常有教养，以及可爱。他按摩着我的髌部，那里伤得就像地狱一样糟。我说：‘我真的像只大鸡仔。我再也不能忍住痛了。’依贝哈特大夫说：‘别骗我了。我看见你把那个杀手踢到烟囱里去的。’这样，他把我给逗笑了，我也知道，我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下。”

“诊断结果是什么？”

“髌关节的骨囊炎。另外还撕裂了一些膝盖软骨组织。”

“他怎么处理的？”

她转向莫瑞恩：“你在那间屋里。他怎么说？”

“休息，冰和理疗。”

我等了一会。出现了一阵沉默，除了录音机转动时单调的沙沙声。

“没有药丸？”

“什么？”

“那时候依贝哈特大夫没有为你的髋关节骨囊炎开任何药丸？”

简娜·玛森放弃了她在这间屋子里的反客为主的地位，坐在了咖啡桌的边上，身子躬下来，脸凑到离我大约只有十寸的地方对着我，呼出来的气息中有一股柠檬和香草味。

“我会很诚实地对你说。”她说，“如果我没有问他要那些药丸他也不会给我。”

“你要了那些药丸？”

“是的。”她的皮肤，因为靠得更近，看起来完美无暇。一双海蓝色的眼睛边上涂着绿色的眼影。黑色的瞳孔扩张得很大，不自然地闪着微光。“他给我药丸是因为我告诉他下午我必须回到摄影机面前。”她说得很慢很审慎。她想让我买她的帐——她的裸脸，居高临下的亲近，对任何事情毫不羞愧的诚实。

“你的意思是尽管你伤得这么厉害，可你仍然可以继续拍电影？”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遇到了许多麻烦，安娜。”她现在说得很亲昵，就好像我们实际是在“百威利·格朗”上面的高级餐馆里相遇的一样，两个有钱的小姐正在分享午餐，这时候一条章鱼从盘子里跳出来闹自杀。”我已经和两个代理商解了约，我被一个所谓的制片人控告——我不能告诉你那时候是多么的艰难。在一项转手抵押中，我欠了银行一大笔款项——”

“杰伊，我们谈正事。”斯脱克曼提醒道。

“这是正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给我那些药丸。我欠了银行五十万美元，如果我不偿还它，我将失去我在马里布的房子。所以我必须完成那部片子——请相信我”——她不安地站起来——“它是一次赌博。”

她蹙着眉，考虑着她的赌博，一面倒了一杯“埃万”水。每个人都等着。

“所以我就和依贝哈特大夫做了这笔生意。如果他真的给我药丸，那么我就能完成工作，我可以作冰敷、作理疗，或者任何他认为需要的东西。”

“他答应了？”

“这可以猜想得到。我很虚弱而他也正是利用了我的虚弱。”

“怎么？”

“如果我有点头痛，他就给我开点药丸。然而我有反应，他就给我一些别的东西，直到最后我成了一个完全依附于他的躯壳。他从来没有说，简娜，要做个强壮的女孩，去吃冻火鸡肉。他是个医生。我把自己交到了他手上。最后，我沉溺于狄劳狄德之中，它成了超乎我控制力之上的化学毒瘾。在最糟糕的时候，我需要依贝哈特大夫和他的药丸来度过每一天。”

“你和依贝哈特大夫睡过觉吗，玛森小姐？”

“绝对没有。”

“他送过你玫瑰？”

“我也送过他玫瑰。”她笑了，“我送给每个人黄玫瑰，这是我说谢谢你的方式。是他修理好我的屁股。”

“你必须明白这个男人毁了她的演艺生涯。”斯脱克曼拖长了声调。“谁会雇一个瘾君子去演一部电影？反面的名声使她难以投保，而没有保险她就不能受雇参演。她没有收入的来源，又被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够格的金融机构催讨债务，简娜·玛森陷于严重的财务危机中。”

斯脱克曼那双无所不知的眼睛盯在我身上——狼的眼睛，如果你仔细看

的话，里面有相同的残酷和镇静。

“但是她决定不再做一个牺牲者。作为女人，你懂得这需要怎样的勇气。”

想想我是怎么样对付丢勒·卡特尔的。这种感觉很亲切。“我已经进行过我的战役。”

“我们都是。”

呀，我有点感觉到，包括这个屋子里的男人们，似乎也被做过一回目标。

“安娜，我知道你将会面对一些困难——但这并不仅仅是为了简娜，也是为了其他女人，她们一直都缺乏勇气站起来进行反抗。”

斯脱克曼和她的当事人一样，都是熟练的演员。我羞于承认我迷恋了这番话，觉得它专为我而说。奉承——对于我，对于每一个别的人——如同黄玫瑰令人陶醉的芳香一样使人头晕目眩，稍微镇静了一下，我就向自己发誓，一定要倾尽全力。

高罗威伴同大家一块儿出去。我向玛森小姐赞美她的桃红色雪纺绸外衣。

“难道你不爱它？它出自路克·弗朗斯之手，我的私人设计师。”

“我听说过他。”我冲着莫瑞恩微笑道。她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拉着玛森的手。我的玩笑在她脸上没有激起任何反应。也许，那件事情根本就无足轻重。

两天以后，从波士顿地方分局传来佳音。作为他们深层背景调查的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以前的病人，克劳迪娅·凡·何文，她宣称依贝哈特大夫在药方上给她开毒品，使她使用成瘾。情况和简娜·玛森一模一样。

我坐在唐纳多办公桌的挂角上，这样我就看不到他和他妻子的那张照片。

“你知道这趟旅行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抵达目的地啊——但是高罗威嘱咐我明天就乘飞机去波士顿，然后带着凡·何文指控医生的证供回来。他和简娜·玛森在一起的那个小时，他就像一条小狗仰面躺在地上，爪子在空中乱搔。得到了她的一切，干了所有的事。”

唐纳多正在浏览最近发生在奥伦济县的一桩银行抢劫的档案。它们堆放在桌上。

“想要点建议吗，关于波士顿？”

我总是急于得到他的鉴定：“告诉我。”

“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炸肉团。”

我缓缓地摇着头：“高罗威现在对我另眼相看，我是在为好莱坞工作了。”

“这跟好莱坞可没什么关系。”唐纳多注视着我。

“听着——如果乔·西摩打电话给 FBI 说有医生给了他许许多多麻醉剂，你是否认为我应当飞往波士顿去作背景调查呢？”

“是政治。”他耐心地解释说，“玛格达·斯脱克曼是共和党的主要捐助人。她住在爱伦堡，里根时代，‘平民会’为白宫的整个翻新出资，她就是其中的一员。你不记得了吗？噢，对了，那时你才十二岁。”

“但是，当一个像简娜·玛森这样——”

唐纳多打断我的话：“简娜·玛森是又一个疯颠的女演员，还有，相信我，高罗威从来就没有放过一张漂亮的脸蛋，”他举起手阻止了我的反对，“玛格达是一个更富有魅力的演员。”

唐纳多悲观地摇着头，回到他的劫案档案前：“你应当读读《新共和》，代替你那本《机械润滑油世界》。”

“我喜欢机械润滑油。你应该找点儿来试试。”

他装作没有听见。

我大笑着滑下桌子：“我为你感到难过，唐纳多，我走了以后看你还能欺负谁？”

“我自己。”

这很刺激。我可以早点回家打点行装，搭乘明天上午八点的飞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办理我自己的案子，除了 SAC 自己再没有谁来督察我。脑袋里忙忙碌碌地想，一旦我到了那里，什么需要带回来，下一着棋该怎么走。

在这时段里，联邦大楼的门厅里挤满了下午昏黄的光线照拂下的人群，今天上午我到达这里时蜂拥的人群移动得还没有这么慢。同样缺乏耐心的人丛在等待着通过金属探测器的检测，那两个被痛苦折磨着的警卫表情彻底的肃穆。在外侧等着拿通行证的人排的线路更长，或许动作也更慢。

这个门厅是这样一个通道，从全世界各个角落聚集到这里来的数千人，他们每一个人的步调都不能被阻滞，可是现在，连他们自己都对此习以为常：美国政府的官僚主义所带来的不断挫折和深深的绝望。一种易于激动的忧虑使我在迈过这些大理石地板时总是保持着警觉。

也许正是这种警觉，或者也许对于约翰·罗思我的确有一种第六感，它告诫我说：他来了。这时约翰叫了起来：“安娜。”

是的，我一眼捕捉到那个靠在墙边的形象，并且知道那就是约翰，尽管现在他肮脏的头发垂在肩上，乱蓬蓬的胡子，还有被撕裂了的灰白色牛仔裤。这副姿态，那饥渴的目光，使我的警报系统一下子尖啸起来。

“你看起来很好。”他作出一个笑容，说道。

“你看起来像个‘贻皮客’。”

“吸毒间谍。我喜欢和害人虫混在一起。”

他的衬衫，缺了一粒扣子，露着肚脐。腹部是凹进去的，牛仔裤系得很低。

“那也叫黄鼠狼给鸡拜年吧？”

“你正面对着的是史垂德先生。”

我点点头。他像个鬼。

“你在监视我？”

“只是等你，沉迷于一些幻想之中。”

他朝我靠了一步。我往后挪了一步。

“我有东西带给你。”

“拿出来，我会让你的阴谋很快破产——”

“不。”他打断我，“是奥尔瓦尔多的杀人案。”

我没有再向后退，但是在我们之间仍保持了足有八呎的距离。

“我回到那条街跟踪那小子，‘耗子’，那次汽车过路枪杀事件的目击证人。证明了他的确能够辨认出那辆轿车。”

“什么东西唤起了他的记忆？”

“他是个男妓。我威胁说要轰掉他的屁股，这样他就听话了。证明这是一次团伙行动，但奥尔瓦尔多并不是预期的目标。一桩毒品交易正要在离公共汽车站几步远的地方进行。对方中的一个身上有血。他们误会了。奥尔瓦

尔多夫人碰巧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走进了一个错误的地方。”

“你能确定？”

“那小子人不错。”

“那么手怎么解释？或者他们把它们打飞只是为了刺激？”

“解释报告说手被打断是因为受害人对着枪弹本能地试图举起手来保护自己。”

他抬起胳膊，手掌向外挡着脸。

我现在明白了，一切非常清楚。一辆小轿车从拐角转过来，嘭—嘭—嘭，街上的人都有经验寻找掩蔽。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夜未央时一个人外出到了那里，谁知道是为什么——她是清白的——被击中了一枪又一枪。她试图挡开子弹，但是它们带着令人震惊的力量和难以置信的速度……

“奥尔瓦尔多的被杀和她为医生工作之间没有联系。她只是碰巧赶上了交火。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我无话可说。

“我干这件事是因为我想它可能对你有点意义。”

那些解剖照片像钉在墙上的恐怖日历一样在我的脑子里——滑动。

“它对你的案子将不会有帮助，但是至少现在你知道你的堂妹是无辜的。”

我正在回想她的小女孩怎样恐惧地藏藏在婴儿床底下。还有那个男孩，和他失去神情的眼睛。

“她是你的堂妹，对吗？”

我好长时间没有回答他的问话。然后，我一步踏过一个大理石方块，不慌不忙地朝他走过去，直到我们面面对。

“是的，约翰。她是我的堂妹。”

认识到这点以后我发觉我还获得了些别的东西。信心。解脱。我能站在这里，用一种直率的、新的方式端详这个很长以来我一直畏惧的男人。我能看见新事物，就像在约翰·罗思心中的害怕。

“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碰到了他的肩，“还有谢谢。”

“嗨，”他说，有些摇晃，有些失魂落魄，“我不是一个彻底的混蛋。”

那一刻我们对视了一下。然后我转身走出了大楼，快步走进停车库。下午经历的这两件事一直让我牙关咬得紧紧的。长筒袜让我不舒服，我再也不能忍受它们在腿上多缠一分钟，一进车里，我就把它们扯了下来。好多了。我发动引擎把车倒出来，开上了惩戒阮德尔·依贝哈特大夫之路。

(十一)

波士顿跟洛杉矶一样，交通非常拥挤，只不过，这儿的汽车相互间还压得更紧密一些，有的甚至只好在一些狭小、缠绕、不可思议的从前的牛道上行进。

或者也许我抵达的时候恰好是高峰期，又碰上了一场春季冻雨。

我停在罗甘机场外的一段斜坡上，观察着租来的“金牛座”车窗上的刮水器除去堆积下来的冻雨。在短暂的视野清楚的时间中，我不耐烦地努力判断自己的位置，寻找去波士顿的道路，去发掘阮德尔·依贝哈特大夫的过往的劣迹，对于这点，我始终感到将会大有希望。但是，在这个漆黑的晚上，

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只是被车灯照亮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张贴广告，诸如新英格兰水族馆、王子实心面调味汁之类。

我得顶住加热器的蒸烤，以用它来阻止雨水在窗玻璃上凝结。等了四十多分钟才进入夏日隧道，可以看到大块的冰片被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刮起，缓缓地送出，融化后滴滴成细流。如果我和唐纳多一起对付这件案子的话，我们现在一定在对这反常的天气大开玩笑，像一对情侣一样舒服地躺在暖和的车里，偷偷摸摸地去度周末。这个想法使我感觉到有点羞耻，烧红了脸，这时候车流突然向前松动了。

隧道除了是一条狭窄、幽闭、恐怖的气腔，自身并没有性欲的经验，隧道过后是一个复杂的立交桥，结果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惑，骗我走了不少盲目的弯路。后来我跟着—辆大油罐车走，它却把我带到了附近—幢饱经风雨的三层楼房面前。我只好返回立交桥。当我发现—块“科德角”的路标时我又感到—阵慌乱，只好下车，却发现自己是在中国城。最后，我只好驶进—家加油站打电话给波士顿地方分局特别仔动处的“野嘴”列斯特·沃克尔，他让我呆在原处。二十分钟后他赶了过来，爬出—辆绿色政府的公车。他是一个高大的男人，裹着雨衣，戴着一顶编织羊毛帽。他穿过雨雪朝我走来，在我的车前灯照明下，凝成冰片的雪雨就像纷纷坠落的银针，而他则像个粗鲁的爱斯基摩人。我降下车窗，他伸过来—只戴着手套的手，这是我曾握过的最热情的手，这个姿势——我的赤裸的手掌在他的皮爪子里——并且说明了，我对于这次差务是多么的缺乏准备。

“你准备住哪儿？”

“希拉顿。”

“跟我来。”

他钻回他的车子，我们驶出加油站。几分钟后，我们就来到某个商业区的内部。这里是商业闹市里—块孤立的小块地盘，每一幢建筑都不是摩天大厦或精心修整的商场，而是旧的红砖厂房和花岗石贴面的办公建筑。你可以很容易想象出，一百年前，葡萄牙渔民推着手推车卖黑线鳕，放债人在破晓之前就得赶到这儿计算出他们银行的巨大收益，而在那些巨大的直棣窗户后面，爱尔兰姑娘们正忙着把鹅毛填进床垫里去。商业就沿着这条弯曲的小巷繁荣起来当第二天早晨来临的时候，一百年后也同样如此。但是，今天晚上这里彻底的空荡荡，彻底的黑暗，除了钠蒸汽街灯雾蒙蒙的玫瑰色的灯光穿透这场冻雨。

“这里不是‘希拉顿’，野嘴。”

我们隔了一个街区把车停下来，然后在街拐角处碰头。我的一只手一直放在我的手提包里，在里面是那支玛格勒姆.357。

“我想我们该弄点吃的。”他说。

这条街显得空旷和黑暗，没有—家开着门的酒店，也没有—家亮着灯的咖啡馆。

在长时间的飞行和精神错乱的驾驶之后，终于到了波士顿，但我已经彻底地晕头转向了，除了在心底还明白—件事情：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揭穿阮德尔·依贝哈特。

“我没有时间来观光。”

但是列斯特已经走在前边了。他敲开—扇门。现在我才注意到—扇烟雾腾腾的沿街铺面的窗户，在窗户后面人影憧憧。我们走进屋子，—下子跌入

了暖和，烟雾与噪音之中，这些东西在这里，就如日用商品交换一样正常。

这是个很大的、空阔的房间，一张又旧又大的桃花心木的吧台、一台落满尘垢的黄铜色的通风扇，还有一面映射出所有这些城市人群的镜墙。公文包全都放在挂满了衣服的衣帽架下。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都穿着套装。我脱雨衣挂在衣钩上。在我的海军蓝下面，裙子几乎恰好掩过膝盖头，使我看上去很像那些女性业务代理和证券经纪人，我喜欢这种感觉。交际语言、威士忌美妙的味道，使我产生一种现实感，几乎有点讽刺意味地，这比我在洛杉矶通常的生活都更要现实。在那里，它榨干了你的全部能量，而你却会发现，你只不过是站在一个烤炉篦子上。但是这里却有所不同：当你在洛杉矶等候永恒的审判时，在这里却不会有人观注你，这种解脱的心情真是太复杂了，我只在这些友好的陌生人中呆了五分钟，我的脖梗就自然而然地松弛下来了，就像一个新婴儿一样不可思议地感到轻松和放纵。

列斯特为我们买来了“流血玛丽”，我们碰了一杯，这时，一个脸上肉脂横堆、黄头发梳理整齐的超胖女人走了过来，她抓住他的胳膊，顺势就在他的嘴上亲了一口，然后把我们领到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放着普通的盐和胡椒粉瓶子，一个烟灰缸和一瓶“塔巴斯科”烈酒。但是我们俩都换成了伏特加马丁尼，很快一大盘去了壳的新鲜蛤肉也端了上来。我决定忘掉前面的艰苦旅程。

列斯特是一个年长的老练特工，从有真空吸尘器时起他就在干这行了，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安排他来协助调查这件案子，他对黑帮路数了如指掌，上次关于哈佛医生的背景调查正是他的杰作。不过作这样的安排另一个用意通常也是告诉你整个下午都可以沉醉在酒乡中。我认识到这点是在我看到他准备对付第二杯伏特加马丁尼时，这时候我们还未看到我们的菜肴。他喜欢这地方不是因为它有真正的铁皮顶篷，而是因为它离政府中心足够的远，所以同事们都不太可能到这里来，这样，他就可以在平和安详的环境中寻求自我堕落。

列斯特的脸已胀得通红，看起来他是费了很大的努力，才把手探进他肌肉发达的怀中，从一件苔藓绿的纯羊毛夹克的内口袋中掏出了两张折叠着的纸页。

“知道吗，我已经拿到了你需要的……”他用颤抖的手把纸抚平，“这就是凡·何文这个小女孩。”

他停下来舔了舔嘴唇，又给了他的伏特加一个吻：是呀，它们才是最亲密的朋友。

“关于依贝哈特，每个人都说着同样的看法——漂亮的家伙，聪明，身强力壮，好医生，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但是，只有这位凡·何文的小姑娘对他有刻骨之恨，说他毁了她的一生。”

“她很出色？”

“她是一个搞音乐的学生，拉小提琴。”

他向我坦白地一笑：“听着，安娜。如果我不是认为她很出色的话，我也就不会促成你这次的波士顿之行了。”

“我受的欺诈已经不少，这算不了什么。”

“我几年里总要这么做上一回。安娜，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你丢脸的。”我想，在这个冻人的夜晚，正是他这双大手掌把我救了出来。

“关于依贝哈特的事情，在你的电脑上还有什么？”

“否认有犯罪记录。没有治疗失当。合格的童子军。事实上，在 1985 年，这家伙还随一个慈善代表团出访过非洲，救助了一些妇女。”

“噢，他妈的。”

“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卷进毒品活动中。”沃克尔鼓励性地示意说。

“他妻子是什么背景？她会牵连到这件事里吗？推销毒品，花他的钱？”

“对他的妻子，我了解的是，她是个护士。他们是在新英格兰长老会女执事医院碰到一块儿的。两个都是当地人，在那儿长大，除了他出身于坎布里奇上层社会 WASP（祖先是英国新教法的美国人）家庭，而她是个爱尔兰棚户居民，没有罪行。”

“那是什么罪过？”

“我有时候也到棚户区去。想想，你也许也是个爱尔兰人呢。”

“不是……不过有些人这么认为。”

“亚美尼亚人？”

“西班牙，千真万确。”我觉得自己有些羞愧，“一半一半。”

“一个西班牙塞纳瑞塔。也许，”他殷勤地继续说道，“我可以叫你塞纳瑞塔吗？”

“塞纳瑞塔。”

他点点头。根本不为任何理由，我们干了一杯。

服务生出现的时候，“野嘴”告诉他：“这位塞纳瑞塔需要点鱼和土豆片。”这句话给我添了几分醉意，我把整条手臂搁在桌子上，头不胜娇柔地靠了上去，一面大笑起来。

我们喝得很痛快，天空已经晴开了，但是人行道上积了一层薄冰。我们彼此挽着胳膊，一步一滑地朝我们的汽车走过去。我对“野嘴”，他染黑的头发以及他的一切都产生了一种慈爱之情。从餐馆到停车处花了我们一段时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路面像铺了一层玻璃一样，实在是太滑溜了。绿色的轿车在沉寂的街道拐角处等着我，尾灯经过了风雪的洗礼，在白蒙蒙的雾气中只能发出微弱的光，我呼地撞上了它。

“野嘴”爬了出来：“嘿，这是政府的车”。他挥舞着手臂但很快就垂了下来，他摇着头钻回车子里，拉上了门。于是我们开始在波士顿城中穿越。给我的印象则似在乡间小路上行走，每个路口都看得到交通事故的残骸。调幅电台正在播放罗德·斯特沃特的一首老歌“玛吉美”。车窗外，加热器开始冒出水汽了。我漫不在意。除了它超乎想象的复杂，我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城市里有千百张床，就像蝴蝶聚集地的蛹一样，除了我，每一张床上都有一个单独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历史，生或复制自己或死。而我并没有一张床。我自顾自怜，猛然间一踏刹车，车歪歪斜斜地停在了一处拐角的路灯底下，在背后，是一排黑乎乎的红砖居民房。在那个拉长了的羊皮纸一般薄削的阴影后面一定有盏温暖的灯。也许那里，在一个我决看不见的房间里，在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城市里，一个母亲醒着，看护着一个孩子，孩子睡在平和安详中。

那绝不是我的母亲，也不是我。她在那里，在房子里，但是模糊不清。“在地狱里她在做什么？”我在康芒威尔大街的中间，要求知道。问题出来了，正当的，像水晶般的透澈。“为什么我不记得母亲抱过我、抚摸过我？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呆在我的屋子里，听见她在哭？”因为她没有想要我，

这对她自己来说，一样是正当的要求。她才十几岁怀孕了她下流胚的男朋友溜走了，她是脆弱的，她没有能力对付我这个杂种小鬼，只有外公，才能坚强得爱我。

我们到达希拉顿的咨询大厅后，沃克尔戴着手套的拳头伸出车窗向我挥舞着算是道别，然后掉转头走了。那辆车现在已经遍体鳞伤。我像别的美国人一样，先驶进巨大的地下停车场，然后拖着衣箱坐电梯升到门厅里，然后升得更高到我的房间里，这里可以看到这座城市令人目眩的市景，某处闪着耀眼的电光，而另一处则挑衅地回应几道红光。我坐在一张桌子上，有些呆滞，手却本能地伸向了电话，没有原因，自私，为了逃脱那说不出的孤独感受而去寻找那个唯一爱我的人，我先拨了长途代码 8，然后是外祖父的号码，他现在一定在加利福尼亚沙漠的斯普润小镇他冰冷的卧室里睡熟了，我渴望把他从熟睡的安静中唤醒，把他带回给我。但是电话铃空荡荡地回响着，而他在哪里。

我强迫自己喝下去三杯水，脱下衬裤就倒进了厚实软和的床垫里，那里我已经铺好了被单，羊毛毯和沉重的床罩盖到我的肩头。我做了一个关于那架直升飞机的梦。

我站在圣莫尼卡警察局外，握着外祖父宽厚温暖的手，一切事物都被落日的阳光染成了红色，就像透过红色的玻璃糖纸看出去的一样。总统的直升飞机正在一场桔红色的粉尘风暴中降落，它巨大的肚腹朝我们压下来——我害怕极了，生怕我们会被它压个粉碎。直升机着陆了，JFK 爬了出来，顺着踏梯飘着，没有挥手，非常清醒，什么事情不对头。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他的脸死白。头上有枪伤，弄得血肉模糊。那是一具行尸走肉。

在厚重的被盖下我却冻醒过来，因为恐惧卷缩成一团。这个梦不是关于肯尼迪的。那是我父亲。血和死亡。

“野嘴”沃克尔和我一起坐在坎布里奇公园最北端一角的一个游乐场的长凳上。大醉了一宿之后在清晨九点钟还很难判断清楚到底哪个方向是最北端。我在公园里转了好几个圈，才看到一个大块头独自坐在那儿，披着雨衣戴着帽子看起来像个叫化子，然后我认识到那一定是他。当我们坐在铅灰色阴云满布的天空下等候时，我开始妒忌那顶帽子和打着厚厚的橡胶鞋底的那双笨重的黑鞋。

克劳迪娅·凡·何文坚持要在这里会面，而不在她的住所或别的任何场所。她告诉过“野嘴”她有一套小型的寓所，她的丈夫，一个研究生，在晚上工作，白天睡觉。还有孩子，她告诉他。这已经够难的了。

游乐场上光秃秃的，到处溅着半冻状态中的泥浆。我把脸转过来，迎向湿润的微风。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这期间，我了解到了五年前“野嘴”得前列腺癌接受放射性治疗时的每一个细节。

最后我烦躁地站了起来：“我们被耍了。”

“她会出现的。”

“我们去她家。”

我们已经走出了公园的铁木门，这时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穿着黑色长外衣披着红色披巾的苗条女人推着一辆轻便婴儿车越过大大小小的水洼走进游乐场。

“就是那位小姐。”沃克尔松了口气说道，“告诉过你她人不错。”

我们走过去，彼此握了握手。克劳迪娅·凡·何文轻巧地微笑着。她比

我年轻，二十岁多一点，眼圈周围还根本没有皱纹。

“让你们久等了？”

我望了望“野嘴”，我知道他什么也说不出。

“我们九点钟到的。”我告诉她。

克劳迪娅看上去有些不安：“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她看了看表，痛苦地皱起了眉头，似乎只是意识到她失去了一些东西。“我很抱歉，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

“我女儿有四个小孩，全是男孩。”“野嘴”老派地递了个眼色，“有时候她一次就会丢掉好几天的时间。”他拉住她的肘，让她在长凳上坐下，继续讲他的孙子并逗引她谈自己的孩子。我开始钦佩他的方式。

“依贝哈特大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克劳迪娅想知道。

“他可能会丢掉他的行医执照。”沃克尔神情严肃地对她说，“他可能会坐牢。”

她闭上了她的眼睛，好一会儿，才透过她的金边眼镜向远处望，镜框很小，椭圆式样式也过时了，似乎戴着它只是为了标志一种学位身份。她光着头，风吹拂着她粗直闪亮的棕色头发。当她侧着头演奏小提琴时，那头发看起来肯定漂亮极了。

“你希望看到他进监狱吗？”我问。

“我内心那个愤怒的女人是这样希望的。”她给了我们一个微笑以让我们放心，“别担心——我不会放她出来打扰我们的。”

她说话的方式很典雅，但是似乎是诚挚的。

“告诉我们你是怎样成为依贝哈特大夫的病人的。”

她没有阻止我使用录音机，她叙说了三年前的三月末，她怎样穿过街道去参加在加登勒博物馆举行的音乐会，一个开着“达特商Z型”的轿车的小子怎样风驰电掣地从街角拐过来，挡风玻璃足足把她弹出二十尺远，她怎样浑身缠满石膏在医院里呆了六个礼拜，依贝哈特大夫那时已是资深矫形外科医生。

“他和我谈了许多话。那时我正苦于陷在石膏的包裹之中烦闷无比，他来和我聊天，因此我是很感激的。”

一滴泪在她的眼中转着圈儿，她擦了擦眼睛。我也很动情，但证人就在旁边，我强忍住自己的感动。

“我担心，我也许再也不能演奏了。他和我坐在一起……他向我保证我将……”

沃克尔掏出了一包“克里内克斯”湿巾纸，递给她一张。

“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医院呆了多长时间接受药物治疗，但是他一直给我吃那药丸是几个月后的事。”

“是哪种药丸，克劳迪娅？”

“狄劳狄德，凡里尔苜，海尔辛那，在我不能入睡的时候，后来我是如此的迷醉于它，甚至根本连听音乐也听不进去了。”

“后来你是怎么回到小提琴上的？”

克劳迪娅摇摇她的头，“她死了。”

“谁死了？”

“我内心的那个音乐家。”她来回推动着婴儿车，“我一直在对依贝哈特大夫说，她死了。”

“他说什么？”

“他告诉我要耐心，恢复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就给我更多的药丸。”

她的头顶和棕色纯羊毛外套肩头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最初落下的雨滴。婴儿推车的遮篷放了下来；把孩子完全盖住，我猜想孩子一定是睡觉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也没有看过她，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手指和脚趾的存在。沃克尔一直在一个小本子上写着什么。

“依贝哈特这样做持续了多久？”他问。

“我出院以后还有一年的时间。然后阿伦就来了，告诉我应该离他远点，他对我不好，他没有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阿伦是你的丈夫？”

“我的拯救者，”一个恍惚的微笑暂时代替眼泪，“我亲爱的朋友。”

“依贝哈特大夫写过药方吗？”

“是的，他写过。”

“你是在哪里拿到药方的？”

“马斯大街的柏药店。”

“好极了。”

沃克尔说：“我会把它找出来。”接着划了一个着重号。

“你上瘾了吗？”我问，“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只是想你还是不可能停止服药的？”

“是的。”

我盯住她的眼睛：“那么你是如何停下来的？”

“阿伦帮助我，他一直呆在我的身边。”

“克劳迪娅，你认为既然依贝哈特大夫知道它们是危险的，可他还要给你开这些毒品，那是为什么？”

“我很沮丧，我受的伤害是无法愈合的。也许他以为我给他制造了许多麻烦。”她站了起来，“我还是带孩子回家的好。”

“天变冷了。”沃克尔附和道。

“几周以后我们会再来取你的作证书，”我对她说，一面向大门走去，脚已经麻木湿冷，就像两段木桩子。“然后我们还可能请你飞往加利福尼亚去指证依贝哈特大夫，当然是由政府出资，你同意那样做吗？”

“我内心里那个愤怒的女人等不及要上那趟飞机了。”她微笑着说。

我关掉了录音机，也冲她笑了：“带着她一块儿去。”

沃克尔和我跑向哈佛广场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因为他们修建这个广场要求只能徒步穿行，车辆禁止通过，所以我们的车都停在三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学生群和无家可归者看起来都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我的回程飞机几小时以后就要起飞，而我仍然需要见一下依贝哈特从前在医院的上司。

“太冒险了。”沃克尔喘着气，“为什么我要排除考虑在第一个地点呢。他应该就守在话筒旁，等着你告诉他你马上见他。”

“我会抓住这个机会。”

“真是很傻，我们把凡·何文小姑娘弄得太累了。”

“直到我们证实她的故事之前，她不算太累。”

“我们出去后到机场吧，去找点吃的。”沃克尔很坦白准备退出了。毕竟，现在已经过了中午，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喝我们今天的第一杯“流血玛

丽”。

一个中年妇女在收费电话前放着一个帆布背包，上面写着：救救树木。在那女人移开她的手套之前我就抢上前去，从挂钩上抓起话筒，那女人却猛然转向沃克尔道：“我带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回家，否则他们会活活剥了我的皮，你明白吗？”

阿尔弗雷德·拉诺严大夫，矫形外科全体职员的头儿，很乐意同我们谈，但是四十五钟后他就有手术安排。没问题。我们调回我们的轿车，“野嘴”能干地论证着他是如何得到他的姓名、一面领着我风驰电掣般地穿越波士顿大学桥，到朗坞大街。我注意到在波士顿的人行道上的许多地点，都有马蹄印迹嵌入其中，这一定是保罗·瑞威尔和他著名的坐骑经过的地点；好的，现在他们也应该留下些疲惫的车迹来纪念我们了。

拉诺严大夫在心脏病看护区的护士站等我们：高个头，鹰钩鼻，修剪过的黑色卷发，热情的棕色眼睛，略有些偏白的棕色皮肤，在浆过的白色工作大褂下面他打着一一条红色的丝质领带，并没有印第安人口音，而是一口很有修养的牛津英语。他身上有一股湿润的英国春季期间那种紫丁香的香味。

“一定是严重的事件才惊动了联邦特工。”话音从他的肩头传过来，他领着我们穿过病房区和 IV 室一直往走廊的尽头走去。

没有时间讲客套话。

“依贝哈特大夫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给病人开了许多麻醉性的药品？”

“只有在需要的时候。”

“他不曾越权处理？”

“当然没有。”

沃克尔：“在他的被雇用的时间里你是否注意有麻醉药失踪？”

“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

医生来来回回盯着我们看，似乎这一串提问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沃克尔故作悲哀地朝我耸耸肩就转向窗户了。外边正有一辆有轨电车穿越浓密树荫下的空间。

“你是否还记得一个名叫克劳迪娅·凡·何文的病人？”拉诺严大夫摇着他讲究的头。“三年前。”我有些焦急地提醒道，“她被一辆轿车给撞了。依贝哈特大夫负责看顾她。”

“我可以找出记录。”

“那太妙了。”

“你看起来很着急。”他友好地说，“为什么不问我你真正希望知道的事？”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是否拉诺严大夫愿意离开他的妻子和十四个孩子跟我住到南肯色顿去，但我问道：“在阮德尔·依贝哈特的行为中有没有什么东西令你相信他可能在剥削病人？”

“剥削他们？”

“越权开出麻醉剂，使她们上瘾。特别是妇女。使她们不得不依靠一个像他这样的医生。”

“太荒唐了。”

“为什么？健康保护的诡计可是一门一本万利的产业。”

“阮德尔·依贝哈特是一个有才能，有献身精神的医生，受欢迎，受尊

敬。他的工作无可挑剔。这点将以我的人格担保。如果你不相信我，你们可以找一个自己的专家来评估他的职历表。”

“他有过什么财务上的问题吗？”

“我的上帝，这个人出身老坎布里奇豪门，我不能想象。不。”

沃克尔，看着我一无所获，却只是着急着去机场酒吧：“谢谢，大夫。我们还要去赶飞机。”

这是最后一击了：“他的婚姻状况怎么样？”

“他的妻子，克莱诺，曾是这个病室的心脏护士，他们俩比翼双飞当然在那时是这一带人们的主要话题，但除此之外我就所知甚浅，瞧——该我当差了。”他朝护士站里一个正在电脑前忙碌着的、衣穿绿色消毒医服的注册护士叫道：“凯茜·多诺万！出来和这几个人谈谈。”

凯茜·多诺万把铅笔塞在耳背上夹住，从凳子上站起来。她是那种你可以很有礼貌地叫她“胖嫂”的人，大奶，虎背，走起路来就像个空酒瓶。

“凯茜对阮德尔和克莱诺的情况知道很清楚。如果还有什么事情我能做的话，请不要客气。”拉诺严和我们轻快握了握就离开了。

“你怎么认识依贝哈特家的？”

“克莱诺和我在同一个街区长大，就隔两幢房子，”凯茜·多诺万用沙哑的嗓音说道。波士顿口音很生硬，不婉转——“在她的婚礼上我是伴娘。你们是谁？”

“FBI。”

她不自然地笑了：“他们做什么了？没有缴税？”

“常规检查。”沃克尔回答说，露出他的黄牙齿伪造出一个笑容，他实在是不耐烦地等着我的撤退了。

“我们只是想和你谈谈。”

“我要值班到四点，这以后我才能见你们。”

这意味着我将错过我的飞机，不得不搭乘下一班或者再在波士顿度过另一个晚上，没有授权这两者我都不能自行决定。但是，将在外，我自己就是主宰。

“好的。我们在你收工后来见你。”

“在哪儿？”

“在一个能找到炸肉团的地方。”

我们一走出医院，沃克尔就离开了，宣称他将回办公室着手调查克劳迪娅·凡·何文在柏药店拿到的处方笺的记录复本，但是我确信他一定是迫不及待地冲进了最近的酒吧间并且一直呆在那儿。

我还有一些时间，所以就在这一带闲逛。在医院的周围，你可以看到许多相关的从业人员生意兴隆。我顺着亨廷顿大街向下开，两旁都是些过时的旧式公寓——这个像都铎王朝的官邸，有一个街区那么长，那个带着文艺复兴时期古怪而俗丽的屋顶——人们穿着灯芯绒的衣服，女人的裙子足足垂到了小腿，显得如此保守；街道很干净，那些爱卖弄的人对于一双略嫌笨拙的加利福尼亚眼睛来说都是有趣的，舒适的、自以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生活实则陈腐透顶。他们整天都做些什么，去瞧波士顿交响乐团？然而，当我将车拐到马萨诸塞大街，按预约的凯茜的方位开去时，景象就变化很快。我放慢车速加大注意。这里的人们收入水平显然突降，就像一架飞机破空而出一样，我在十秒内去过的地方，已从繁华降到赤贫线以下。

稍大一点的商场都被厚实的门掩着或挡往，只有几家夫妻老婆店还开着做生意。男人们吆五喝六地坐在地上，背靠着建筑物，或者在红砖排楼的路口扎成一堆，往墙上乱画乱涂。我的眼睛直直地盯在前方。因为我不想成为一桩毒品交易的见证人。

突然两个人影闯入我的视线。车速现在是每小时三十英里，所以我不得不猛地踩住刹车。两个十来岁的黑人女孩抓住这个空隙闯过人行红灯像跳华尔兹一样走向街对面，不慌不忙，能走多慢就有多慢。她们靠着我的车已那么近，以至于她们走过时还来得及若无其事用她们又长又弯的紫色指甲在我的发动机罩上划出一道弧线，用她们忽闪的眼睛穿过挡风玻璃向我发出一次挑战。我保持着脸上不带任何表情，两只手放在方向盘上不动，尽管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武器就在我右边的皮带上以及我花多长时间就可以把它拔出来。

我等着她们走过去，知道各种示警的尖叫声是由那些街坊们发出的。最后，女孩子们似乎意识我并没有吃她们那套，剩下的那一段距离总算是跑了起来，躲闪着其他高速汽车。我继续沿着哥伦比亚路行驶，但是我现在知道了需要警惕，并一直将保持始终。这一路可以看见一些照明建筑、空场，偶尔有几处雅致的私人住宅，某段历史的遗迹，但一切事物都因为灰暗的雾霾笼罩而失去了光泽。天空是黄白色的，就像是透过一层平纹棉麻窗帘布被照亮的一样。在这里不大见得到春天的落日景象，相反，在这个阴冷的下午天光早就接近于晚上了，似乎这世界上所有的色彩已被吮干榨尽了，只有那一幅幅街景就像是印在金属灰墙上的照片。萨文希尔属于劳动阶层的飞地曾经占据过多切斯特·柏上面那块高岗现在已被挤压成屈指可数的几间木瓦房子，窗户后面黑漆漆一片死寂。交错的树枝显出焦枯的颜色。只有邻近的酒吧间打出的招牌被樱桃红的灯光吹起了那一层陈年累积的灰尘。

我越过“三艘希腊潜艇商店”，把车停在圣保罗教堂前。一阵凉风带着一股潮湿的水汽拂面而去。离教堂十个街区远的地方有几家沿街的店铺，招牌全是用手书的西班牙字母写成；这边的教堂是哥特式的，只不过它的尖顶已经被弄歪了，显得摇摇欲坠。我能看见老小姐们穿着不成形状的外衣，戴着方头巾，推着空空的购物小车，这些起码有十年历史的美国推车早已是锈迹斑斑。这是一块勤勉的但是被马萨诸塞无止头的衰退弄得疲惫不堪的地方，周围是充满敌意的邻居，背靠着海湾无路可去。它坚持下来只是因为它的根基深厚。而自己制造暴力事件则一定会彻底地毁坏这份根基。

凯茜护士正在“希腊潜艇”里等着我。叼了一支烟，读着一本罗伯特·弗雷斯特的平装本诗歌集。她没有再穿绿色的医院制服，却换成了一身斜纹粗布牛仔服，看起来就像一个卡车女司机。

“我不得不先去看望我的母亲和父亲。”她告诉我的第一件事，“直到确信他们已吃完了晚饭。”

“你和父母住在一块儿？”

“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自己过活。坦白地说，他们太老了，快走不动了。”

她在金色烟灰缸里捻熄了香烟看着我。这地方很热，有股子发酵粉味。我的雨衣顺着肩头滑了下去。

“那么，凯茜，”我用愉快的声音说，心想我最好是能够在我们之间确立某种和睦的关系，“是什么东西使你喜欢上做心脏病护士这一行的呢？”

“是紧张。你的行色匆匆。你必须快速作出决断，比如有人心室心动过速，你就必须决定是否要给它们一个心前区的捶击。”

她在炫耀。罗伯特·弗雷斯特的书是这炫耀的一部分。她是在试图说明她是个聪明的有感情的人，是替人们修饰内心的人。现在她又给了我一个夸张的表情。狡诈的。毫不退避的。敌意的。

“克莱诺·依贝哈特是一个好的心脏病护士吗？”

“非常优秀。”她缓缓地点头，“她能够承受压力。她喜欢肾上腺素的高速分泌。对病人很好，能够提供最好的照顾。她爱和医生们争论。”

“关于什么？”

“药物处理。或别的任何方面。如果她认为病人拿到的是他不需要的药。我们比医生对病了解得更多。”

“她同依贝哈特大夫争论过吗？”

“为什么她要同他争论？他带她到加利福尼亚去了。”

“这是她结婚的原因？”

“我不知道。”凯茜护士笑了起来，“这似乎对于我倒会是个很好的效果。想吃点什么吗？”

唐纳多是对的。在爱尔兰人居住区吃希腊人做的波士顿意大利炸肉团是一次独一无二的经历。这里有一些特别的方法，比如要把果子面包浸泡在红色调味汁里使之松软成海绵状；有些事情则令人兴奋。当炸肉团掉在纸盘子里的时候你怎么捉也捉不起来，迫得你只好带着下巴上流淌着的桔红色油脂，跑到柜台上取叉子，会有二十张餐巾纸胶粘在你的手指上。我发誓一定要带一个团子上飞机，在下次组里会餐时强迫唐纳多吃下去。

“我父母的房子就在那边的街角上。”凯茜坐回来的时候带了一纸杯的黑咖啡和另一份薄姜饼。“克莱诺的家人仍住在离此两栋房子远的地方。”

“你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我不能说是最好的，她天生就和啦啦队长、和那些雀斑还有逗人喜爱的身段连在一起，而我天生就是个肥婆。很明显。不过我们在一起呆的时间很多。我们都生长在爱尔兰环境中。受压迫的爱尔兰人。我甚至上过一门饮酒社会学课程——我可以和你深入探讨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她说话的时候怀有一股强烈的冷讽意味。

“好的。”

但她自己已左顾而言他了。“克莱诺和我都是家里第一个上专科学校的。护士学校。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可以去读医学院。”

“但是她摆脱了。”

凯茜深深地吸了口烟：“她摆脱了。”

“于是你恨她的见鬼的勇气。”

“我不恨他妈的勇气。”她说：“我希望她在西海岸得到好运。”

“我是否告诉过你阮德尔·依贝哈特被指控越权给病人开麻醉剂？”

凯茜回答得很干脆，想都未想：“我不会相信！”

“不？”

“不。阮德尔是好家伙。”

“你不认为在加利福尼亚他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生活在快节奏当中？”

“阮德尔是这种类型的人，他对自己非常地满意。为什么他要改变？除非是金钱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某些不可预见的因素。或者有人陷害他。”

“也许发生变化的是克莱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也许她想要快节奏的生活。”

“在生活之外，克莱诺·依贝哈特想要的是一个好的地位。”在她自己觉察到而停下来之前，这句话已经溜出了口，“在高等学校里她是第一个失去童贞的。”

我点点头，总算回敬了一个讥笑：“总会有那么一个。”

“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荡妇。她有一个男朋友，沃伦·思佩卡。他现在也移居到西海岸去了。”

“在洛杉矶？”

“离那儿很近。邻居的女孩子们带她去参加告别聚会时，我们给了她沃伦·思佩卡的电话号码是在——温尼斯，加利福尼亚？”

“对。”

“我把它写在一张处方笺上，‘解决相思病的处方——打电话给沃伦·思佩卡’，她兴奋得要命，连脸都胀得通红。”

“她仍对沃伦有性欲？”

“噢，这我可不知道。高等学校之后他们就没再保持联系。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沃伦在哪里。他好像是遇到些麻烦，”——这时她好像从叙述中醒悟过来找到了自己——“我不应该告诉你这些，不管怎样，是我母亲和他母亲聊天才证实他成了电器承包商，是在一个叫温尼斯的地方，加利福尼亚。我把这些看作一个玩笑——克莱诺在加利福尼亚认识的唯一一个人竟是她的高等学校的男朋友。当然这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我强迫自己做出一个笑容，然后确认自己搞清楚了沃伦·思佩卡名字的正确拼写。我们把纸盘和餐巾纸都捏成团，连同吃光了的食品罐头听一块扔进了垃圾堆。我把唐纳多的炸肉团子用包装蜡纸袋和铝箔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我感谢了护士凯茜提供的帮助后就朝门口走去。如果我现在就走，也许来得及赶上最后一班飞机。

“加利福尼亚的天气怎么样？”当我们迎面夜空时她问我。

“棒极了，在十二月份你都可以只穿一件T恤衫。你想去那边吗？”

我递给她一张我的名片。她拿过去仔细审视一会儿，似乎很有兴趣。

“谁知道。”她收起了名片，看着我，第一次以不设防的方式。“我对自己许诺，明年我将搬到我自己喜欢的地方去，在昆西。”

我注意到，暴力事件总是发生得很快，比他们在电影里所演的要快得多，比在你的想象里你所认为的也要快得多。

离开护士凯茜以后，在古兴大街我遇上个红灯。我的头低下去了一秒钟，在地图上想找出一条去机场最快的路。这时，从背后传来一股巨大的震动力，如果没有安全带把我缚住，我几乎就要整个儿摔到方向盘上。同时，旁边的乘客座位的车窗“哗”地一声碎了，一块砖头重重地敲在我的肩上，我的手臂顿时麻木了。

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从碎玻璃中飞快地伸进来，一把从乘客座位上抓起了我的手提包。

“住手！”一声女人的尖叫声。而他和手提包早已一起缩了回去。

我手里握着武器下了车，而撞击我的新型奥德车已在黑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能记下它的车牌。像其他所有受害者一样，我站在十字路口一阵晕眩，伸屈着我刺痛的手。我脱下雨衣，抖落了玻璃碎片，又从头发找出

一些来。有两辆车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又开走了。他们对此漠不关心。我的联邦 ID 和飞机票都放在车尾行礼箱那个蓝色帆布公文包里,还要感谢上帝的是他们没有拿走唐纳多的炸肉团子。

我回到车子里,把砖头扔到后座上,我像一条狗一样颤抖个不停。剧痛拉紧了我肩上的肌肉甚至有点儿痉挛,背部也感觉到不舒服。我挂上了车档,一面郑重地发着誓言。

当冷风从破窗子倒灌进来时,它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稳定前冲,任何红灯或行人都不能让我停下来,精神只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让我离开这个他妈的令人压抑的鬼地方,赶快搭上一班前往洛杉矶的飞机。我知道,克莱诺·依贝哈特离开萨文希尔时,一定也想同样的事情。

四十分钟以后,当我跛着脚迈向飞机舱门时,我又想起了克莱诺·依贝哈特,在她匆匆离去时,踏上的也许正是同一架航梯,稚子伏在她的肩头,小女孩牵着她的手。

她坚信她将逃脱的是那些垂死的街道,而代之却是带着邻居孩子们送给她的临别礼物,高等学校从前男友的电话号码,就像是带着一张治病的良方,抵达加利福尼亚。我开始设想,如果和她在家门口窃窃私语的沃伦·思佩卡是一个“坏家伙”,如果是这样,她已经犯了多少次“致命”的错误。

如果为了救她自己而想毁掉她,并且开始另一个生活,他们的确找不到一个更好的途径,那张纸原本无害的疏忽就像一颗安放在飞机上的定时炸弹,我的家伙当然可以像国际反恐怖主义特别小组的人所做的那样,用来对付那些强硬的毫无道德可言的杀手。

但是他们,相对于那些技艺高超,掌握着致命的精确度的恐怖分子而言,却只能算是业余选手,他们就在我的朋友当中,也许,当我很快把他们找出来时,他们竟然就在我的家人当中。

第三部 旅行城

(十二)

在洛杉矶，一眼可以看到百万英里以上的高空，就好像已回到了家里坐在扶手椅上一样，可以感觉到空气的滑润。那架扶手椅已是三十年代留下来的古董，铺着厚实的绿缎子，流苏垂到地上，这全都是从水晶城漂洋过海运过来的。

那位俄籍的出租汽车司机告诉我，“他们预报说一场风暴来袭，”这一定是某些英格兰人愚蠢的误报，因为在这个季节里不可能这么迟还会下雨，尤其是在一个如此晴朗的夜晚。我们沿着林肯大街行驶，所有的车窗全开着。现在午夜时分，我原应该躺着做个好梦的，但是我的心智已在准备要应付新的一天的开始，需要编制一个紧要工作的纵览表，从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到与“野嘴”进行核对。

出租车停在“大洋瞭望住宅区”的主入口，我从夜间守卫那里借了二十块钱给车费。守卫多米尼哥在这里呆的时间和我一样长。带着过夜的用具，蓝色公文包挎在那一侧好肩膀上，我踏过熟悉的小路朝“塔希提花园”走去。

程序总是相同：我乐意回到家里，但是立即需要新鲜空气。我打开了玻璃门以迎接潮湿的微风，众多的航船安详地停泊在白色的聚光灯的强光下的景象令人心境平稳。

仅仅经过这样短暂的一次离别，我的卧室看上去已显得陌生，就像是一家被几件惯常的家具拘束地充塞着的旅馆，我只是一个新来的占用者。除了怀特·莱龙香水的香痕和铺在双人床上的古式手工制被子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特色，无法辨明。

如果这里着火了，只允许我救出一样东西的话，那一定是那床被子，它属于我的曾外祖母，外公的母亲，格蕾丝，她1890年出生在堪萨斯，开了一辆“雏型T”跋涉千山万水来到加利福尼亚。被子图案是由细小的六角形白色小花印制成，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白色绵线的经纬。这种布料同样可以做成女人的家居服饰或者挂在农场小屋的厨房里的，被微暗的煤油灯光照亮的门帘。

我脱下我的衣服，上面还有一股飞机舱内的气味，赤裸地躺在这被子上，想象着女人们制作它的过程，想象她们的手指抚摩过的每一条线，生满老茧的手指，瘦瘠坚硬的手指，它们把昏黄的灯光也都织进去了。她们在一起制作多久，她们就能用双手把属于女人的那份相互间的联系保持多久。“我的联系又在哪里？”

我渴了，想喝新鲜的桔子汁。我已经回到了洛杉矶，回到了这个被监督的环境里，也许在那边天花板的阴影里就藏着一架摄影机，正俯看着我躺在床上呢。“我应该给外公打电话。”窗外，风轻轻吹动了挂在阳台上的铜吊铃，发出的铃声就像是从远处的小船上敲响了警铃。摄影机移得更近了。它是我的瞳孔螺旋上升的终点。

“为什么我的某个部分总是觉得害怕？”

我漂浮在六角形小花的花心里。是波士顿时间还是加利福尼亚时间？这是我的空虚的身体还是克莱诺·依贝哈特饥渴的身体还是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烧成了灰？

那些关于她的生命是神秘的，被水浸褪了色的快照从来没远离过的意识：兄弟们郑重地排成半个圈，老妇人康斯坦萨抱着一个孩子，那只鹦鹉。在一座没有墙的风房子里长大该是什么样？干季的灰土和湿季的雨——生活在这幢房子里，它完全把自己向上天敞开，这该是什么样呢？

设想一下，也许我可以到萨尔瓦多旅行一趟，去寻找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旧居？当我走过那片土地时，也许堂兄弟们正在用他们的手指剥落干瘪的玉米粒，而堂姐妹们则正把它们倒进“磨力诺”里碾碎，把玉米糊打在又圆又扁的模子里，放在石头上烤；我最终也走到康斯坦萨面前，叫出她的名字，她会眼睛从炊烟中抬起来，惊慌地看着我这个古怪的外国亲戚……或许，她还是继续做她的玉米饼，对看到我根本不感到惊奇，或许，对那个自从她女儿动身前往美国她就害怕听到的消息也丝毫没有惊奇？

雨点敲在窗户上的声音把我弄醒了，我在床上转了个身，用手摸到电视遥控器，我的肩感觉好点儿了，但是背的下部还有点僵硬和疼痛。第九频道的电视信号逐渐出现在屏幕上，一股强烈的太平洋寒潮的前锋挟带的冻雨和冰雹已经席卷了整个美国西海岸。圣弗兰西斯科的温度只有三十华氏度，整夜有雹暴。明天还会有两尺厚的降雪，更多的风暴系统将像飞机在LAX一样在沿海一带登陆。当我听到在帕尔姆·斯普润会有突发的洪水时，我抓起了电话敲下两个数字，这是我特地留给外公的存储号码。

“外公？你在做什么？是不是呆在干燥的地方？”

“我刚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晚上。”

“发生了什么事了？”

我的外祖父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住医院的经历。他一定是被他那些老式的双面刮胡刀割破了手指，他总把它们配着他的薄荷醇刮胡泡沫一块用。

“在打第十一个洞时我觉得肚子痛。他们惊慌失措，还叫来一辆救护车。”

“耶稣基督，外公。”

“那只是十足的浪费时间，他们让我过了一夜，没能发现任何问题。”

“那一定是我给你打电话的那个晚上。”我感到一阵歉意，继续说道，“我到外地去搞一个调查，家里一直没有人接电话，我觉得很害怕，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但是他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头：“那么在清晨四点钟又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我很孤独。”我用大笑挫退了他的语锋，但是他没有回答，我感觉我必须打破这个沉默：“我喝酒了。”

又是一个停顿，然后他说：“你是个笨蛋。”

“谢谢，外公。”

他的底气很足，我反而显得萎缩和虚弱。

“你有酒瘾了？”

“没有，我没有酒瘾。”

“那么不要做笨蛋，尤其是在工作上。”

他固有的好战性激起了我一阵恼怒：“根本没有人把我看成是笨蛋。他们交给我一件案子，牵涉简娜·玛森。”

“什么样的案子？”

“她指控一个医生用他从墨西哥搞到的止痛药使她上了瘾。”

“你见过简娜·玛森了？”

“和她详细地交谈过。”

“她是什么样的人？”

“你梦中的那种女人，外公。”

“我们能够相处融洽。”

他们也许会的。“这是一件显赫的案子。是局长直接指派给我们的。这也是我去波士顿的原因。”

“你得全力以赴。”

“你觉得我该怎么去做？”

“不要做个笨蛋。”

没有用。你赢不了。和外公谈话的末尾我已经无话可说了。我光着身子坐在床沿上，哆嗦着，既然对外公生着气又为此感到内疚，我责备自己为什么在外公进医院的时候不在他的身边，担心到底在他的身上潜伏着怎样的病痛……一种无法说明的新的畏惧又在我心中生长起来，就像这场冷雨一样冰凉。

早晨只吃了点燕麦粥，然后就穿上牛仔裤和齐膝高的橡胶防雨靴，扣上风雪大衣，拉紧了兜帽，踏着泥浆穿过雨水四溢的小路朝更加阴冷的车库走去，我的巴罗库塔此时正泡在六呎深的水里，它拒绝启动。

“呆在家里，”罗莎琳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要求政府雇员都呆在家里，除非他们的部门必须。”

“这就是说不让我呆在家里。”

她让我别挂断，过一会声音回来了：“是的，除了你，亲爱的安娜。”她继续往下说，压低了声音，“SAC 高罗威刚刚来过，他让你过来。”

一个小时以后唐纳多开着他的小车沿着狭窄的辅助路缓慢移到了我的阳台外，按着喇叭。他一定是使劲纠缠守卫才得以进到住宅区内部来。倾盆大雨来得如此猛烈以至我刚从门廊出去就被它浇了个透湿。

我跳进车里，“砰”地拉上了车门。

“这么说，巴罗库塔已经彻底完蛋了。”

“她没有完蛋，她只不过是把自己弄得那么湿。”

“你怎么喜欢开这种破烂？”

“因为她罗曼蒂克。”

“花同样多的钱你足以弄到一辆称心的旧马自达车了。”

“每个人都开马自达。但没有人开巴罗库塔，他们那份浓墨重彩的工作就像那些老婊子一样。”

“这正是我担心你的地方。”他递给我一纸杯热咖啡。忽然间我感觉自己又已完全饿了。——“怎么闻到一股面包房的味道？”

“我给你带了点‘赞恩’松糕。”

“真的吗？”

“赞恩”松糕是紫浆果和植物纤维混合做成的大面团，经常是我午餐时的唯一食物。费了很大的劲我才找到它们并且拿在手里。咖啡诱人的香味，模糊的车窗外的瓢泼大雨，我们湿漉漉的外衣——他不会真正地看我一眼——同样使我心神激荡还有那个相同的不正当的欲念，我在波士顿坐在车里等着进隧洞时产生的那个非分之想，唐纳多和我是真正的情侣，每个时刻都能在我们自己特殊的虚构世界中一起度过。

但是在下一刻，以另一个方式震荡的却是自己的醒悟：不可能。这只能叫作“蠢笨”，就像外公说的那样。

“我可能会更经常性地离开这里。”我带着一种苦涩的滋味观察着他。

“好的，我会想念你的屁股的，它现在正坐在一个极具魅力的任务上。”

“我们得面对这点：我确实富有魅力。”

他的眼睛并没有看我：“尤其是戴着那顶兜帽。”

我故意把它扯开：“我从波士顿给你带回来一个炸肉团子，但是留在橱柜里了。”

“很有意思。”他现在被分散了注意力，小心地倒着车，压过被雨水冲洗得发亮的冬青树皮质的黑叶子，“我来是想警告你，高罗威正伸着鼻子到处嗅血腥味。”

“谁的？我的？”

“某人的。”我们已经到了住宅区的出入口，面对着一盏红色交通信号灯，一闪一闪地，失去了控制。五六辆车犹豫着停在那里，雨水冲刷着它们的顶篷。“关于那医生，我希望你在波士顿拿到了充足的资料。”

“没问题。”我自信地回答，脑子里出现了克劳迪娅·凡·何文在公园里擦拭眼泪的情景。

“最好是比充足更充足。最好是大丰收。”

“已经是极致了。”我厉声说、有点儿惹恼了，“这是他妈的最好的证据，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 FBI 特工做到这点。为什么高罗威要揪人小辫子，随随便便毫无道理？”

“他被古巴人事件搞得心烦意乱——那个小女孩在哪儿死的？”

我盯着雨看。古巴人事件是我们地区分局的人搞得最砸锅的一次；与公众关系的全面倒退，其影响至今尚未消除。

“相反我深受鼓舞。”

唐纳多破水前进，抢过了十字路口。

罗伯特·高罗威在其职业生涯中比硬汉还要坚韧。他曾经向唐·玛菲——黑手党先生挑战，他曾经在肯尼迪机场和卡车司机面面对，也曾在曼哈顿码头的海洛因交易中充当内线。在他作为对付有组织犯罪的专家的最后一年中，因为接连不断的死亡恐吓威胁着他们，迫使他不得不把家庭从布鲁克林搬迁至西法尼亚。最后，由于和十几岁的孩子分离过多，他不得不勉强接受了升职，到洛杉矶，尽管他仍旧保持了作一个纯粹的纽约人。他，我猜想，仍然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会得到丰硕的果实。

高罗威是个记忆不够的人，不适于躺下安心养神，这点没能使他在面对压力时做出最好的选择。相反却使他在应付古巴人事件这类事情时犹豫不决，就像其他官僚一样没有作第二手准备。高罗威觉得自己好像不得不如实地回答如下的问题：

为什么 FBI 没能把一位来自依阿华的二十四岁前选美王后从她的古巴毒贩子男友手中拯救出来却让他用一把八时长的厨房用餐刀将她连刺三十刀致死而同时他们在好莱坞的公寓却能二十四小时置于我们的监控之下并且整个犯罪过程竟得以一次喘息接一次喘息一次呼叫接一次惨烈的呼叫地记录在我们的磁带录音机上？

“高罗威昨天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进行得不顺利。”

我们乘坐电梯往上升，大约到了五楼，我的胃里因为有了咖啡和松糕已

经感觉暖和多了。

“他告诉他们实情了吗？没有人听到过那份监视录音？”

“是的。”

“难以置信。”

“在那次他为‘吧协会’所作的关于‘对毒品的战斗在洛杉矶将会胜利还是失败’的大演讲之后，对高罗威而言这就已经只是个人的荣辱问题了。”

“我猜我们会知道结果。”

“你还能赌世界上的丢勒·卡特们仍会像德国的短毛狗一样死死咬住高罗威的脚后跟，”唐纳多耸耸肩，“我今天早晨淋浴时还对帕姆金说，没有人能希望我们在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里都有效地对每件案子进行监视。”

当我们走过甬道时两人都沉默了。

“结婚十五年了你们仍然在一起淋浴？”

唐纳多给了我一个可爱的苦笑。

“她正在盥洗台旁漱口，行了吧？”

我们刷过卡，走进“特工专用，非请莫入”的那扇门。

“呀，我真有几分喜欢你穿着拖鞋，满身肥皂泡的样子。”

“可不要玩什么花招。”唐纳多对我说。

丢勒·卡特们的门开着。他和别的两个家伙正在把尼夫球扔进篮筐里。

“波士顿怎么样？”丢勒叫我。

我当然不会说在停车灯前被几个顽童抢劫的事。“棒呆了。”我对着他狠劲咧了咧嘴，又做了一个翘拇指的手势。他也还了我一笑，好像我们倒成了最好的伙伴一般。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几乎还没有在位子上坐正。是简娜·玛森。

“他们搞到了我的奶头的照片。”

“我的上帝。谁做的？”

“‘国民调查者’，‘妇女家庭旅游’，我怎么知道到底是谁？”

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爽快亲密地传进我耳朵里，就像看见她突然出现在“牛棚”里一样——浑身震颤着，没有人像她这样的震怒过。

“他们是怎样搞到照片的，玛森小姐？”

“昨天，如果你记得，在开始下那鬼雨之前，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我裸着身子在池边晒日光浴，一架直升机从头顶上飞过来。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随后干了些什么？”

“直升飞机上有什么标记吗？”

“上面写着：KTLA！”

“是一家电视台。”

“当然是。”

“所以你认为 KTLA 将在六点钟的新闻节目中播出这些裸体照片。”

“请尊重我的智慧。”我听到杯子里冰块摇动的声音，“所有的摄影师在这方面都是自由行动的人，他们去拍那次交通堵塞时顺便飞过一些完全无辜的女演员的屋顶，然后拍下几张偷偷摸摸的小镜头，想象一下，他们轻而易举便可拿到一万美元。”

我“嘘”了一声，带着嘲笑地口吻低声问：“真的？他们真这么做？”

“驾就轻熟。”

我只得承认。现在她的意思大约是让我帮她解决胸部的问题。她是因为

它们衰老了干枯了而感到尴尬呢，还是因为它们依然生龙活虎、漂亮坚挺却只值一万美元而感到震怒？

“我想让 FBI 插手这件事。”

“我们是一个政府机构，我们只调查联邦犯罪。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权限之外，我建议你与当地警方联系一下。”

“但是你是我的 FBI 特工。”

“事实上，我受雇于美国政府，夫人。”

“噢，见你妈的鬼？”她大发脾气，挂断了电话。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是，高罗威，穿着腥红色的高领衫，几份卷宗纸从手里飞出来，雪茄咬在牙齿间，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椅子上拖出来，然后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里。

“玛森那件案子你到底找到些什么该死的东西？”

噢，孩子。

“我找到了依贝哈特大夫的前病人，克劳迪娅·凡·何文，她宣称医生曾给她开过过量的止痛药，让她上了瘾，跟简娜·玛森一模一样。”

“她会来作证吗？”

“是的。”

“现在我们去要搜查令。”

他去拿电话准备打给美国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我认为我们还该等等。”

“为什么？”这个时刻有些沉闷。高罗威不耐烦地大嚼着烟头。那样做是很容易的：让他打电话，召集人马，然后案情成立，我只需要处理我那一部分，完成在波士顿的使命……但是这将是不负责的。也许他只是一时冲动而误入歧途，那么我必须是要保持清醒头脑的那个人。我们都不可能避免有仓促行事的时候，也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就像我那位可怜的银行劫犯，丹尼斯·希尔，他迟早会悔悟那天在停车坪拿着满把钞票和上膛的手枪，红着眼全身因吸毒而虚弱，内心被魔鬼支配时犯下的过失。

“我们什么时候才需要搜查。”

“我正在等波士顿地方分局的一个电话。”

高罗威放下了电话。在他身后雾气蒙蒙的窗玻璃上，雨水像小瀑布一样从顶楣上挂下来。

“我知道你的确需要这件案子。”

“简娜·玛森不是一件案子。简娜·玛森就像古巴人事件一样，是一个快要撑破的该死的复杂政治形势。”

他靠在咖啡桌上，是一副大受挫折的姿势。

“你的幸运皮带扣在哪儿？”

“飞了。”

他没有拿起遥控器，而是走过去直接按下了开关，然后粗鲁地按着一个个频道按钮。

与他的情绪相吻合，本地新闻正在播放救援直升飞机的现场新闻报道：一辆五十呎长的野营车辆被泛滥的洪水扫出了已是一片洪荒野地的公园并随着洪水的狂奔而卷腾翻滚，；铁路桥已被冲毁，七零八落的残片甚至被冲进了海里。我们带着极大的兴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个缓慢的但是无可逃避的毁灭。

高罗威烦躁地向椅子走去：“局长在踢我的屁股，新闻界在踢我的屁股，地方检察官在家等我的电话——”

“简娜·玛森刚才打电话来。”

“什么事？”

“有架直升机从她的屋顶上飞过去，她想让我们帮忙做点事。”

这几乎把高罗威的鼻子都气歪了。

“在它失去控制之前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件事。”他抓起一把黄色的电话留言纸，“今天早上我一个人就已经接到三个电话，玛森的私人经纪人打来的。”

“我听说她动用了许多私人影响。”

高罗威作了一个苦相，嘴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嘘”声。

“看来你不知道事情的这一半而我却不知道你的那一半。”

“你知道的那一半是什么？”

“我有一份关于玛格达·斯脱克曼简历摘要。我可以跟你说，在我们接手这件案子的时候由总局办公局提供的原始资料。她是一个强悍精明的又铁石心肠的女人。1957年匈牙利事件之后逃到这个国家来，在马克西先驱广场找到了一份卖唇膏的工作，结果发现些窍门，不久便自立门户了，在马笛逊开了一家独霸一方的漂亮商店，跟一些著名的百老汇女影星们往来密切，直到后来成为她的经纪人。”

“那么政治影响在哪点上呢？”

高罗威在嘴里含着雪茄：“她在华盛顿的有趣的亲戚们。”

“这么说她还没有脱离——”

高罗威点点头：“她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又不止这些，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所以她到美国来——”

“新来的淘金者。”

于是我们一起点头。

“了不起吧？”他咧着嘴就像一头食肉动物，“我有这个共和党的宠儿做后盾就可以驾驭其他所有的关于古巴人事件的废话。”

“局里的日子看来不好过呀。”

突然间他不再听我说话，注意力全部被电视屏幕上那个穿着蓝色外衣里面惊心动魄地露出一截花边小背心的女新闻播音员吸引住了。

“有一堂课必须要上，”他若有所思，我知趣地等着他说，“好莱坞。”我适度地点点头。

高罗威从电视机那个方向转过脸来，表情镇静自若。

“也许在玛森这件案子上我该再投入些人力。”

一阵冰凉的感觉掠过身体：“为什么？我能够应付。”

他说得很含糊：“我希望你他妈的没有让我想起我十四岁的女儿。”

“我不是你十四岁的女儿。不用担心——我不会怀孕。”

高罗威笑了，或者至少他紧张的肩松弛了下来。他将和我达成共识。为了这一刻。

“那么你怎样置办那位医生？还有什么别的资料能够拿出来探讨或是要继续保密？不能容忍这家伙的邻居，不满的佣人，园林工人，邮差，桃色事件，还有什么？”

“只要有，我就会把它找出来。”

画面上又回到了风暴报道现场。一个掉队的消防队员正被大水围困在一间房屋的平台上，一只手抓住一根桩子，一个步话机在另一手里。

“到下周末为止，我要有最有力的证据，如果他有罪，我们就把他抓进来。”高罗威简直咆哮了。

“行！”

他的眼睛回到电视上那个水已淹到胸口的男人。

“可怜的家伙。”

“不用担心，直升飞机会把他拉起来的。”

但是高罗威的表情看起来并不那么肯定。

(十三)

我回到我的办公桌，和“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讨论的结果是，当务之急首先要完成对克劳迪娅·凡·何文的背景调查以确认她成为有效证人。为此，我必须先和波士顿地区分局的“野嘴”联系上。

顺着高罗威的思路还要去找几个医生身边的人，他们要有动机愿意交谈。我重新翻阅了档案，并又向电话公司索要了几份复印资料。在最近几个月期间从依贝哈特家打出的大量电话都打给了一个当地号码 454，这个电话属于西奥多·费茵。从记录来看，事情非常明显，费茵女士和依贝哈特一家人通过各种方式存在着联系：有时仅仅是一周内就有二十次热线。

“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和我用相同的波长工作，我们一致同意，因为这些电话是在白天从住处打出的，所以最有可能打电话是那位妻子，也许是给一位女朋友，也许是她在加利福尼亚唯一的朋友，愿意倾听这位从波士顿来的无事可干的护士抱怨她在第二十街是多么的孤独如同置身于当代的地中海中被彻底隔绝一样。

西奥多·费茵无疑就是高罗威所要的那一类信息源。但是如果我立即打电话找她，她可以很轻易地回过头就告诉她的闺中密友，FBI 正在调查她的丈夫，从而可能使整个操作告吹，并且把我撵回值班室。

为了保险，我应该找一个熟知西奥多·费茵和依贝哈特家关系的人聊聊。谁知道呢？

在街上转个圈就会明白，蒙塔娜以北的社会是个双重结构，上中层的白人和劳动阶层的拉丁人共存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当白种女人不在场的时候，你就可看到女佣们聚拢在繁华的住区街道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有成堆的手推车和婴儿，用西班牙语传播着各种流言蜚语好像这里不再有明天一样。这一注赌会是安全的，我向“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解释说，这些流言大多是对付白人妇女的，她们付多少工酬呀，她们怎样支使佣人呀以及谁的婚姻不幸，谁和谁两个相好一类的。

如果西奥多·费茵和克莱诺·依贝哈特关系密切，那么对她们的女佣，维奥莱塔·奥尔瓦多来说，是完全有机会知道其中的一切的，维奥莱塔会和她的好朋友谈起这件事，古特瑞丝夫人是住在这幢房子里的年长女人，并且也是从萨尔瓦多来的，还帮她照看孩子；这是一个不仅了解而且关心她的人。

我拨通了古特瑞丝夫人的电话，说有些关于我堂妹的问题。哪种问题？她想知道。哦，关于她的生活，她怎样到美国来的。对我显示出这样的对我

自己家族的兴趣感到满意，古特瑞丝夫人同意我们在星期天再见面。

当然关于维奥莱塔的那一套是撒谎，我真正想得到的是她的雇主的情况。我沾沾自喜地向吊在那里的“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瞥去，但是感觉它在责难我：它知道我只不过是在对自己撒谎。

星期天下午雨停了一会儿。尽管还是阴云密布，气温只有华氏五十度，我仍然抓住这个机会把巴罗库塔开了出来，扎着胶底鞋，穿着飞行皮夹克，戴上飞行员的太阳镜，一顶道吉棒球帽帽舌向后反戴着。当我把车停到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公寓楼前时，古特瑞丝夫人已经带着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在外边等着我了。

我跟他们说哈罗时孩子们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我以为在他们坐上来以后至少会对我的篷车发生一点兴趣，而他们仍然什么也没说。风吹着他们蓬乱的黑色头发，但他们的脸仍是苍白的。

古特瑞丝夫人和我在前座简单地交换了几句话，关于明天是不是会继续下雨。当我沿着落日大街加速行驶时，她从胸口里掏出了一个很大的白色女式手袋，撑开成尖屋顶状反扣在头上，似乎是为了防止弄乱她光亮的头发样式。

现在做什么？是不是试着说几个西班牙问题使谈话继续下去？用拉丁美洲人的身份？他们会喜欢这样呢还是可能觉得受到了侮辱？这种拘束的沉默已经不是我所能解决的了，所以我只好推给某种古老的方式，退回到我自己的空间里——我的车，我的星期天，我的音乐——只花了二十多分钟，开上高速公路又开了下来，开进格里非斯公园的“旅行城”里。

在好莱坞·希尔的这一侧，潮湿，雾气弥漫的空气中有雪茄烟和铁锈的味道，尽管天气阴晴莫测，但停车坪上还是半满着，我们从一些显得脆弱的桉树底下走过，穿过大门，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微型火车站里，那里有列微型蒸汽火车正在行驶。

“他们想去坐一坐吗？”我问古特瑞丝夫人。

特瑞萨摇着她的头，不。她的弟弟只是拉着她的手，他穿着一件新的“菱佳海龟”毛线衣。

我注意到几张露天的餐桌：“他们饿了吗？”

“他们吃过午饭了，但也许他们还想吃点。”

我们组成了一支奇怪的小分队，我裹在我的皮衣里，戴着棒球帽；古特瑞丝夫人套着青绿色的花布护腿，穿了一件尺码大得像圆桶的红色毛线衣；还有两个孤儿。

我买了微波炉烤的热狗和饮料。我们四周的人全是在参加生日派对，大部分是拉美人。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吃得很慢很仔细，似乎他们已经学会珍惜每一粒粮食，眼睛却盯着那些包装礼盒，一个彩饰陶罐藏进树枝里，一个便携式烤架上挂满着冒着烟的腌肉和长长的整根的大葱，散发出炙烤的大蒜和欧椴的风味。每一伙似乎都包括了十至二十个家庭成员，幽默、轻松。生日蛋糕都是从商店买来的精心制作。特瑞萨看着他们却并没有妒忌。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眼睛看得出来的感情变化。

“妈妈！”克里斯多巴突然叫了起来，兴奋地，用手指着。

“他认为那位小姐看上去像他母亲。”古特瑞丝夫人抚摸着他的头，“Pobrecito。”

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她可能的确很像是从我看过的那些解剖照片中复

活的死尸，正坐在那边抱着一个婴儿，一面剥着盘子里包裹水果的锡箔纸。她微笑着用她的鼻尖蹭着孩子，而孩子则抓住垂落在她腰间的波浪型黑长发。

“克里斯多巴懂不懂得……”我不知道如何说下去。

“他知道她的妈妈不会回来。”

克里斯多巴使劲拉着他姐姐的胳膊，但她仍旧无动于衷就像他指着的不过是一辆路过的公共汽车而已。

“你记不记得维奥莱塔是否曾经跟你谈起依贝哈特先生家的一个朋友，名字叫作西奥多·费茵的？”

“你是指特迪小姐？”

“可能是。”

“哦是的，克莱诺小姐和特迪小姐关系非常密切，而特迪家的女佣，雷娜，也和维奥莱塔十分亲密。”

“所以她们四个经常在一起？”

“那倒不会。”

“不？”

“特迪小姐和克莱诺小姐在一起时非常疯狂。”

“那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但是维奥莱塔后来很不高兴，因为她再也见不到雷娜了。还有那两个小姑娘也喜欢在一起玩。”

“发生什么事了？特迪和克莱诺打了一架？”

“哦是的。她们相互间不再说话。”

这倒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接近西奥多·费茵。我们交谈的时间很长，这个下午已经快结束了。我站起来伸了伸腰，发现玫瑰园里的花朵上已星星点点地洒上了好些在不知不觉中落下来的小雨点。我懒散地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很有礼貌地问古特瑞丝夫人：

“依贝哈特大夫把支票寄给你了吗？”

“是的，他寄了。我给孩子们买了些新衣服。”她有几分自豪地向着克里斯多巴鲜绿色的毛线衣点点头，“然后我写信给老祖母问她想怎么办。也许是她来这儿，也许是孩子们回萨尔瓦多和她以及他们的兄长生活在一起。”

“维奥莱塔有别的孩子？”

“当然，你在照片里见过他的。老祖母抱着的那个，是维奥莱塔的长子。她扔下他才来到了这个国家。”

“她怎么能扔下这么小一个孩子呢？”

“为了创造好一点的生活。”古特瑞丝夫人解释道，在她的眉间明显表现出挖苦的神情。“她工作，然后把钱寄回家照顾儿子和老祖母。在内心，”——她拍了拍她的心脏——“她想念她的妈妈。”

她打开她的随身手袋，取出一卷薄擦面纸。手袋里则散发出浓郁的香粉的气息。

“现在那孩子一定已经有八岁或者九岁了。他甚至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妈妈。”

除了温和地溅落的几点雨滴外——落在我的头发上，长椅上，落在上百朵含苞的玫瑰上——我们之间再无话可说。

古特瑞丝夫人垂着头，用两张擦面纸在眼角压了压。像是格里夫插到了

我们中间，站在冰冷水泥地上，两只长满青苔一样的胳膊圈在我们肩上。我几乎觉察不到他的重量。我的心因为同样感到亲人的丧失而抽紧了，时时听到噗噗的响声，似乎在一瞬间就要将你推倒一样。在我内心，它依旧保持着神秘性，这是一种毫无根源的隐密的躁动。

“使家庭团圆是维奥莱塔的梦想。”

“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是在这个国家出生的吗？”

“是的，”古特瑞丝夫人说：“父亲走了。”

她对那父亲嗤之以鼻，“啪”地把手袋关上。

“如果他们出生在这里，他们就是美国公民，受美国政府的监护。这即是说政府将会照顾他们。”

古特瑞丝夫人像混凝土浇筑的桌子一样一动不动：“那不对。”

“这不是只针对我们。这是法律。”

“法律是错的。”

我呷了一口酸甜的柠檬汁。我不想陷于情绪化的争论当中。我是一个联邦政府的特工——理所当然我相似的社会有义务、有同情心去关心我们中像特瑞萨那样失去了亲人，受到了伤害的人，她幼稚的脸现在就像石头雕刻的一样呆滞。蒙蒙小雨已经飘过了，一缕阳光刺穿一块厚厚的乌云洒在远方。我能看出，对特瑞萨来说，虽然仅仅是离开了那所公寓里她的秘密场所一小会儿，但是坐在这里仍然是痛苦的，她怀着孤独，毫无戒备地瞪视着这个世界。

“哪天是你的生日，特瑞萨？”

她看了看古特瑞丝夫人，什么也没说。

“跟我说吧，你一定知道你的生日。”

她低声说了一个日期。

“你想要什么作你的生日礼物？”

“我想要一张床。”特瑞萨毫不犹豫地说。

“你没有床？你在哪儿睡觉？”

“厨房的桌子下面。”

我抬起头来，目光投向了那条遥远的光线，心里想尽管太阳眼镜能够最好地遮蔽紫外线的照射，但是透镜本身却不是黑的——根本不够黑。

特瑞丝的眼睛还盯在她的空盘子上。

“想再要一只热狗吗？”

她点点头。这个物品丰富的快餐小酒吧所有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买了两份：爆米花、冰淇淋三明治、玉米饼片，看着孩子们将它们一扫而光。

“告诉他们到处走一走、玩一玩。”

古特瑞丝夫人用西班牙语重复了一遍，但是孩子们全都没动。如果你并不是一个前来野餐的大家庭中的一员的话，在这个“旅行城”中是没有什么鬼事好做的。我希望在我从电话簿的前几页把它找出来时早知道这点就好了。你可以去修在又黑又旧的大车库里的运输工具博物馆，看看1902年的救火车，或者爬上像陷在泥潭里的钢铁怪兽一样僵立的火车头。但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什么都不想做。他们都是一只手拉着古特瑞丝夫人的手，蹲下来，把另一只手臂缠绕在她壮硕的小腿上。

“让他们去玩。”我尖声地重复道。

她说的时候嗓音更加尖厉，他们很不情愿地拖着脚步朝小车走过去。

“如果他们自己的家庭不能确定下来，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就只好让人领养。”我告诉她，说得很缓慢，带着绝对的确信的权威，尽可能的清楚和刨除感情因素，正是你像一个罪犯宣布他的权力的那种方式。“由我去与有关的机构接洽好了。”

古特瑞丝夫人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的双手都已经掩在了嘴上。她方形的宽厚指甲上涂着土红色的指甲油，有三个或者四个从廉价商店里买来的戒指套在粗壮的手指上。

“我爱这些孩子！”她叫道，“而且你会帮我们的。”

“我们应该想想怎样做更正确。”

“什么是正确？”古特瑞丝夫人问，“维奥莱塔想要创造一个好点儿的生活。在美国赚了钱寄回给她的孩子。她只有十八岁。她坐公共汽车从墨西哥城来到提园那，在车上她被男人们强暴了，令人发指的轮奸，就压在车底板上。这正确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法律。”

“她刚刚离开一个婴儿，乳房里还胀满了奶水，法律可不管这些。”

克里斯多巴和特瑞萨在长椅后画躲躲闪闪的，最后古特瑞丝夫人再也忍受不住了。她站起来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拽着克里斯多巴的胳膊把他拖过来。

“这位小姐是警察，”她富于技巧地说，把他推到我面前，“让她看看你做了什么。”

克里斯多巴拒绝抬起头来。古特瑞丝夫人把他的手从他的口袋里拉出来。他攥着一个价值约六十九美元的塑料玩具小汽车。

“从别人的生日聚会上偷过来的。”她粗鲁地摇晃着他，“你这个小贼。”

她盯着我。因为我知道什么东西对于孩子来说是最好的，所以当然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我领着他穿过广场：“我们不能拿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轻声地向他解释说。

我们走过那个敲碎了的彩饰陶罐，有一些糖果，和一些小玩具散落在潮湿的草丛里。

我推着他来到那场生日派对中的父亲面前，“克里斯多巴拿了那个，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他想把它还回来。”

但是男孩丝毫没有屈从的意思，玩具车仍然紧紧地攥在手里。

“没关系，让他拿着吧。”那男人说。

克里斯多巴挣脱了我的手，带着眼泪奔到他姐姐那边。

“谢谢你。”我唯一能说的，“非常感谢。”

我并未完全说出我的意思。我有些紧张，尽管天气阴冷，但汗水已将我浸湿了。我并不想拿走他的小汽车，我根本就不想到这儿来，但是我曾经为我的堂妹的孩子们，这些无父无母，心灵受到创伤，生活在不快乐中的孩子们许下过诺言，要带他们到这个“旅行城”来度过一个下午。而旋转小木马还在前头。

(十四)

晚上另一场风暴又入侵了。星期一早晨天空白扑扑的，光线则显出棕褐

色。我穿过紧密的不间断的雨瀑直接开向特迪·费茵的房子。我没有选择绕到第二十街的依贝哈特的家宅或者第十二街的外公的老房子的弯路，而直接去走了主干道，圣维森特大街，虽然这里行进缓慢，交通拥挤，到处是被阻塞的车辆，许多棕榈树叶被吹到了大道中来，几棵脆弱的珊瑚树被风暴连根拔起，须根抓向天空，生命已彻底结束了。

在第七街我打了右转灯朝圣莫尼卡峡谷方向开去。下山的时候后置发动的福特几次打滑，失去牵引力好几秒钟，后来两只轮子都陷入了泥淖之中，只好搁下了一块“停车”的交通标志。我竭尽全力想把车子推回路上，但是我的手臂力量不够，撑着方向盘的手也酸痛不已。我站在那里，喘着气。如果我打电话叫一辆拖曳车可能会太麻烦，而且会费大量的时间。正在这时，我的脖梗后面一阵刺痛感，有什么东西从后边迅速地接近过来。但是，这辆兰奇罗威并没有减速停下来，相反，在它飞速经过的时候，故意转弯碾过一个小水坑，向我的车窗溅去一大片胆汁色的泥水，还伴有一声鹅卵石的脆响，那个司机，戴了顶棒球帽，没有回头看一眼。

一块碎石击中了刮水器，并且在玻璃上留下了一个令人寒心的弧形的刮痕，就像是有人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下的那样。我咬牙切齿地用鸡毛掸把蓝色挡风玻璃拾掇干净，回到车里轧住了调速档。

第一档和第二档之间进退都很容易，我增加了马力试图使汽车有所松动，全副精神都放在了飞速旋转的轮胎上，小心地操纵着，最后发觉轮胎重新咬住并拉回了路面。我快速穿过了峡谷弯道，一路咒骂着那辆该死的兰奇罗威。似乎当一个人驾驶一辆价值四万五千美元的机车时，他们就有这种癖好，要溅你一脸的泥。

圣莫尼卡峡谷是介于蒙塔娜之北一块升高的平台和太平洋岩壁的南段陡岸之间的一个小型峡谷，离依贝哈特的住屋两英里。峡谷口和海平面持平，但被沙滩所阻割。一年四季往谷口里灌着的海风，只是苦于被两侧的峡壁所束缚。于是在这里营造了自己的小气候，出现了难得的晴日、峡谷中深深的阴影和新鲜的带着盐味的空气。对律师们和那些经常在电视中抛头露面的人来说，这里就成了一处高级的住宅区，不过，这里最奢华的建筑却是特迪和安德鲁·费茵在圣罗伦佐街的尽头靠着山边修建的房屋。

它是一幢巨大的都铎时代的官邸，棕色方石饰面的木混结构，汽车入口是一个常春藤覆盖的拱顶，房屋是双坡屋顶，有三个中世纪风格的烟囱，高大的凸窗全部镶着钻石形状的窗格玻璃，会使你不由自主地想到白雪公主会不会从里面飘行出来。实际上，如果你没有看到在这个雨天横在道口的几株瓜德罗普棕榈树，这幢房子完全会给你一种置身于英国来斯特郡的良好印象。

打开那扇熟铁大门，我沿着一条碎石路往里走，这条路现在似乎已经成了一条急流通道。特迪·费茵出现在短柱廊里，一个很有魅力的苗条的女人，穿着黄色的高跟鞋，拿着一个拖把。当我解释说是从联邦调查局来的，想问她几个关于她的熟人，依贝哈特先生和夫人的问题时，她的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示意我进屋谈。就像那位兰奇罗威的司机一样，她似乎更不介意溅起泥浆，也许能把泥水溅向别人的机会确实是不多见的。

我跟着她走进厨房。

“你相信这个吗，你能不受它影响吗？”

我们涉水而过，在橡木地板上，竟然积起了半吋深的雨水。这场令人吃

惊的小洪灾的源泉是一间堆杂物的小房间，雨水或是从灯闸处灌入，或是从墙头像瀑布一样的流进来。一个穿着白色紧身短衬裤的年轻女孩正在有条不紊地把这个小房间里的所有东西搬到别的房间去。扫帚、真空吸尘器，一堆湿的破旧衣服、清洁剂、花盆、网球拍，以及一个当女孩把东西一件件转移时堆在柜子上的幻灯片放映机。

有别于女孩细致缓慢的移动步伐，她的主人则以每分钟上千转的高速率奋力搏击。

“我看过这样的电影，谢天谢地，我不需要再看一遍。”

她脚踢着水，手上徒劳无功地把桶朝墙上掼去。

“去年的风暴中我们遇上了一场泥石流，凌晨三点钟整座山全塌了，我想我们都得完蛋了呢。”

透过宽大的窗户，穿过一块砖头铺砌的空场和许多胡乱塞在那边的植物丛，我能够看到一座小山被用混凝土在外层牢牢地包裹住。

“它像一台推土机一样势不可挡，一下把房屋的整个后部撕了过去，我们一个月以前才重新修好这个厨房。现在我简直要彻底地疯了。迪尔克到哪儿去了？”

她用拖把在水中搅着，抬到一个无线话筒，但她急着要求迪尔克立即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到门这边来。

我无法想象一个糟糕的厨房是什么样子，如果真要想象，那么现在这个就是。特迪·费茵，仍然精力旺盛地扯着些无聊的话题。她示意我先坐到厨房里的一把有靠背的舒服的小椅子上。厨房有两个不锈钢的洗涤槽安放在打磨光亮的大理石台面上，房间很大，你甚至可以听到空气在一排白色的平滑的橱柜间流动的空响声。新鲜的油漆味、新色的壁灯，都很容易让人辨认出这是一间崭新的厨房——那些灯泡上，甚至连油烟都没来得及沾上一点。

她似乎也无事可干了，靠在大理石台面的边上，抓住这间隙，她却开始修剪起她原本就整齐漂亮的指甲来。（如果你要利用这个间隙，干吗非得剪指甲呢？）

“咖啡，”她突然醒悟道，“现在。你要么？”

“好极了。对于依贝哈特家你知道些什么？”

“我是他们理解西海岸神秘主义的精神向导。”

她摆动着手指，作了一个嘲弄的脸色。

“他们刚搬到这儿来的时候，谁也不认识。是我介绍给他们认识。我请他们吃晚饭。我公开邀请他们到我的网球场上玩。我甚至说过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我的房间——”

这个女人说起话来就像一枝 AK—47 一样，每秒钟嘴里能进出更多的单词。

“我推荐病人给阮德尔，让他们的孩子在我的游泳池里游泳，尽管那时候游泳池还没有完全发挥功用——”

“我听说出了一次事故。”

她的说法十分简洁：“劳拉掉进去了。我不在家。她没事儿。”

她躊躇了一阵，没有把最后余下的一点和气也剥掉。

“我很厌倦但是并没有说要把他们赶出去。”

“所以你是相当了解他们的。”

“从内心深处了解，在他们和我断绝关系之前。但是那又是另一个故事

了。”

她打开橱柜门，用敏捷地动作摆弄着杯子、咖啡和茶匙。

“我理解在你和依贝哈特夫人之间存在着一些冲突。”

“你怎么知道的？”

“这并不难找出。”

她好奇地看着我，似乎看不清楚，于是又把眼镜挂上了鼻子，虽然那副笨重的黑镜框看起来像是五十年代的破旧货，但是配在她秀美的脸上竟然是另一种风情。尽管她像快接近四十岁了，但扎在脑后的头发却像一丛淡黄色的针刺。她穿了一件黑色开士米汗衫，下身是一条紧绵绵黑色天鹅绒护腿衬裤。唯一打破整个这种阴沉肃穆的黑色基调的是那一双光彩夺目的钻石耳环，每粒钻石都差不多有葡萄干大小。

“你是否认为依贝哈特家正陷于财务压力之下？”

“意外损失？你开玩笑？阮德尔的家底殷厚。”

“也许他开销也很大？”

她不屑一顾：“他开的可是一辆阿库拉。”

“你看见过他吸毒吗？”

“从来没有。”

“他曾经向你提供过毒品吗？”

“我不碰那东西。”

“也许他只是为了帮你们的忙，当作催眠药给你或你的丈夫开过某种药丸？”

“从来没有发生过。”

“给我讲讲他的个性特征。你是否能说他是那种追求个人成就的医生？”

“阮德尔？”

她笑了起来。她像饭店里那样，娴熟地调制着咖啡。

“我第一次遇见阮德尔·依贝哈特时，他只穿了一条长运动裤，沿着大街跑过来，手里晃着一块猪排。”

蒸汽从咖啡器里冒出来，她连忙把手缩回去，咕哝着：“差点儿烫死我。”然后，又继续去摆弄她的机器：“我正过去想带克莱诺出去吃午饭，刚刚下车，就看见一个英俊的男人举着一块很好的猪排沿着大街跑过来，跟在一条狗后面。那条狗曾在他们的后院出现过，是只可怜兮兮的小侏儒，阮德尔叫它‘无家可归的狗’，因为它眼睛里面那种空荡荡的神情就像你在无家可归者眼里看到的一样，他一直无法靠近，把排骨喂给它，到最后它还是跑掉了。旁边就是一位他不认识的女士，穿着一件阿玛尼礼服，从阿达姆来刚刚走出一辆麦西达斯，而他却赤着身子追赶一条流浪狗，一点都不感到难为情，所以我那时就想，这是一个可爱的家伙。”

咖啡器发出咯咯的响声，随着黑咖啡倾倒入两个很大的白色咖啡杯里，一股浓郁热烈的芳香飘散开来。

“事实上，我无法想象阮德尔怎么会和你们 FBI 扯上瓜葛。”

“你说呢？”

“呀，那也许是因为他在六几年吸过毒吧。”

我给她一个伪善的微笑。

“你说过，在他妻子和你断绝关系之前你们俩非常亲密。到底发生了什

么事呢？”

特迪·费茵皱着眉，她没有从我这儿得到她想得到的东西，自己却重陷往事。看来她想把戏再演得久点。

“我第一次和克莱诺见面就是在那个堆放杂物的小房间里，就像现在一样那时候它就在漏水。”她用沾满了牛奶泡的茶匙很不满意地指指那边。

“泥石流经过以后天还在继续下雨，我们只得找了些塑料篷准备把那小山盖住，以免它继续坍塌下把房子给埋了。我们需要人手，那时是早晨六点钟，我让雷娜打电话找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甚至包括我女儿在学前班的同学。”

特迪·费茵穿着胶底鞋，走过溜滑的橡木地板，把冒着热气的咖啡杯放在了橱柜上。

“克莱诺·依贝哈特是唯一一个到这儿来的那个班的同学家长。”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丈夫的亲戚们都帮我们，还有一些是我丈夫从五金店前边那家酒吧里临时雇来的人。我回来给人们做饭时发现了一个陌生女人，长长的黑头发，扎着丝绒的束发带，穿着‘费尔埃尔’绒线衫，正在试图把那小房间里三英吋的积水舀出去。我问她我们是否见过，她告诉我她是学前班同学的母亲。我们几乎打电话叫过笛德尔班上每个同学的父母，这些人我们在生日聚会呀、游艺日呀、电影呀、晚餐呀什么的都见过面……”带着显而易见的某种痛惜，她继续说道，“我那时甚至不认识克莱诺·依贝哈特，但是却只有她一个人放下了自己手中的事情跑到这儿来帮助别人。我完全被她感动了，迷迷糊糊地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开始哭了。她是个护士，她能很好的安慰人。于是我们就坐在这儿，吃着热的五香熏牛肉三明治，成了朋友。”

我啜了一口咖啡，太淡了，又太甜。

“我真的是想帮助克莱诺，她到这里来以后有点不知所措。她的丈夫赚了许多钱，而她不知道怎样处理它们。我告诉她去找个佣人，对小孩子不要太操心。但事实是，她是被阮德尔拴住了。彻底地依靠他。护士和医生，彻头彻尾。”

“她顺从了你的建议？”

“噢，一切都结束了。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她每天要给我打十次电话！连我们的佣人都是朋友，我们的孩子也在一起玩——但是现在我却对她如此恼火。”

“为什么？”

她只是不再给我打电话了。就像蓦然打的冷枪，恰好就在笛笛的四岁生日之后。突然她开始制造借口，又四次跟我吵闹。你最好的朋友毫无理由就中断了与你的来往，那会是什么感觉？是伤害。”

“你问过她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说她很忙。”特迪·费茵摇着头说，“我也忙呀。我放弃我的星期六去和她一起逛商店。她在‘勒雪’买了大批的东西，几乎每一样都要买回家。现在抱怨什么？”

特迪·费茵像个小女孩一样用手托住下巴，仍然被抛弃所刺痛。

“克莱诺被阻止不能回马萨诸塞。阮德尔在加利福尼亚已经是事业兴旺。”

“那又是为什么呢？”

“他的父母都是医生。”她扬起了眉。我弄明白了什么？“我们谈话的时候少有顾忌。阮德尔离开时一直调子很低，但他是被逼迫的。我是指，你瞧：他们搬到这边来不到两年，他已经是这个城市的顶尖红人之一了。”

门转开了。特迪·费茵似乎紧张起来。她在自己的厨房里也被惊吓住了？一个小女孩闯了进来。

“这是笛德尔。看着水，小心。”

笛德尔穿了一件宽大的罩衫和一双米老鼠鞋，有一头漂亮的齐肩短发，带着一点小小的派头。

“很高兴见到你。”她活泼地说，下巴微微朝上扬着，我在想，当她长到十五岁的时候，特迪·费茵在这个家里就不大会有发言权了。

笛德尔后面还跟着一个年岁稍大的女人。

“雷娜说我们可以到水坑里面玩。”小姑娘宣称道。

“嗨，那只是开玩笑。”特迪·费茵嚷了起来，轻轻摇晃着她的女儿把她弄笑了。她把我介绍给雷娜，雷娜握了握我的手。丰满，也许有六十岁，雷娜明显有比其他佣人更高的身份。她说话不带口音，穿着一件用腰带扎住的棕褐色外衣，低开领，头发染成棕色，戴着一副镀金镜框的时髦眼镜。

“雨都快停了，笛笛在屋里已经玩腻了。”

“好借口。”

我喜欢雷娜稳重的支配能力。我喜欢她抚摩笛笛的头发的方式。

“去拿一双我的鞋，”特迪·费茵建议说，“雷娜和我穿同一个码子。”她说话的时候嘴角轻轻往上挂，似乎在她们之前有一种不可显现的联接桥梁足可以消除她们间的所有隔阂和差距。

在雷娜看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谢谢你。来吧，笛笛，我们去找一双雷娜能穿上的妈妈的鞋。”

她牵起孩子的手，帮她从母亲的膝上滑落下来，离开时对我们有礼貌的一笑。

我很高兴我的堂妹在美国曾有一个像雷娜这样的朋友。

雨已经变小了，轻得就像一层薄雾一样，只要有勇气的人，都可以钻去闹一通。空气的湿度已经达到了饱和，绿叶全都一动不动，只是因为承接雨水重量而低垂着。

顺着墙根流进杂物室的水流已经减退了，那个少女还有更多的湿盘子、碟子和餐用碗需要擦干净。

“依贝哈特和简娜·玛森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

“当简娜成为他的病人以后这就已经是个大新闻了。她很喜欢阮德尔，每件小事都听他的。这甚至使他没能来参加笛笛的派对——因为简娜得了流感他不得不赶到马里布去。”

“克莱诺嫉妒吗？”

“她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样的事。每次简娜一来电话她就浑身僵硬。我告诉她要运用关系，但她不知道怎样做。她本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家。”

电话铃响了。

“嘿，宝贝儿，我呆会儿给你回话，”特迪·费茵如唱诗一般，充满了趾高气扬的神情，“我正跟 FBI 说话呢。”

出于调查局全部的庄严权威，我严厉地告诉她不要把我们的谈话传给全世界都知道。

“对不起，”她立即感到有些窘迫，她脆弱的自负很快破裂，“我保证我不会。”

怀着尴尬，她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了一个折迭着的信封。

“现在我得找个电工回来，把小房间里的电灯重新安好。”她抽出一张名片，“这就是：沃伦·思佩卡。”

“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名字？”

“这是克莱诺给我的。他们一起在高等学校读的书，又都回到波士顿。他和迪尔克一起干过改建的活儿。”特迪·费茵忽然又对那个无人接的电话表示起愤慨来，“迪尔克在哪儿？”

现在我才回想起凯茜·多诺万给我讲过克莱诺的旧男友的故事，他们如何当作一个玩笑一样给了她一个他搬到温尼斯后的电话号码。所以这是沃伦·恩佩卡的名字第二次和克莱诺·依贝哈特联系起来了。在学校里，你所学到的技能之一就是怎样迅速地从一张卡片上记下下一个地址，然后把卡片扔到一边。

屋外，我们能够看到笛德尔正把湿沙子堆在一个红木玩具建筑中的滑板池塘里，雷娜撑着一把伞注视着她，脚上穿了一双齐膝高的马靴。

“我叫她穿我的鞋的时候可并不是指那双价值四百美元的‘拉尔夫·劳伦斯’，耶稣基督啊。”

特迪·费茵叹息道。然后，又开始对被水损害了的墙和新崭新的地板感到惋惜绝望：“我应该做什么？”

“等着迪尔克。”

从圣维森特大街回去的路全都被刮倒的树堵住了。一个紧急救助队正把车辆从住区街道疏散，我跟在长长地交通队伍后面，缓慢地经过了第十二街外公的旧房子。

那块“待售”的牌子仍然挂在门前，只是经过了这场风雨这块地方显得更加破烂不堪。这次我没有停下来，但是记忆仍追随着我。

我的双膝跪在起居室的硬木地板上。这是个黑暗的星期六的早晨，我透过门边狭小窗户上镶着白色花边的窗帘，可以看到外边正在下雨。昨天我从家里到学校去迟到了五分钟，我的外祖父惩罚我跪在电视机前，但电视却关着，这样我就看不到自己最喜欢的节目。我的母亲从门口经过了许多次，但是一句话都不说。我瞪着空空的电视屏幕。我的膝盖很痛。它们已经在这块硬木地板上压了很长时间。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驶入了在韦斯特伍德的总部的车库。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如何到达这里的，也不知道为何，我呆在干燥安全的汽车里，而我的面颊却如此湿润。

(十五)

在洛杉矶，一年中总有七天很特别的日子让你感到活着真是幸运……而对于拥有篷车的人来说，就意味着它又要开跑了。

这些日子在那场雨和强风暴以后立即就来临了，这时，圣安娜风暴已经将所有的垃圾秽物全部清除出了水坞。到了这些天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八十年前他们就选择了这里拍电影——因为每天早晨当他们醒来时所面对的都是一个被清澈的沙漠所照亮了的世界。自然光线如此的充裕和单纯，几乎能够展

露出远处园林里的每一棵桔子树，或者一个演员脸上的每一处特写镜头的细微差别。

今天就是这七天中的一天。我扔下了政府的公车而开着自己的“巴罗库塔”，以便让它能在高速路上尽情地撒个欢儿。往内地瞧你可以看到大雪封顶的巅峰在六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往西方则可以看到圣莫尼卡山脉的每一处褶皱，而“世纪城”的塔顶的每一个窗户都在闪亮。天空中还布满了白色或炭黑色的云团，非常厚实，足以使投射下来的浮动的阴影能够覆盖一整座新生的、充满生气的大城市。

刚刚从“野嘴”沃克那儿传来的消息也令我振奋不已。他说他最终“承受住繁杂、拖拉的公事程序的纠缠”，成功地获得了阮德尔·依贝哈特写给那次事件的受害者克劳迪娅·凡·何文的处方。他不得不用传票索取这些记录，但是他说药店正在查找他们的电脑档案，并且许诺立即向我电传副本过来。我洋洋自得的幻想已急速的膨胀开了，也许在高罗威周末的 deadline 到来之前，我就可以把最有力的证据放在他的桌子上。安娜·格蕾的又一次杰作。

我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盯着传真机，或者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所以我决定还是亲自去找沃伦·思佩卡，他一直没有回我的电话留言。我得去看看他对他高等学校的旧女友和她的丈夫到底有什么更深的了解。如果找不到他，那么到温尼斯海滩散散步，瞧瞧大海也是好的。

思佩卡电器店设在运河街的一间平房里。凯茜护士在马萨诸塞一定会很惊讶地看到加利福尼亚的温尼斯竟果真有許多运河。这儿过去也有许多桥和平底船，还有一座歌剧院，这些都意味把文明带给了野蛮的美国太平洋海岸。它是阿伯特·金尼那些可爱但是缺乏想象力的思想的一部分，他觉得如果你建起了一座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城镇，那么文艺复兴就将在这里产生。

上天知道，在边疆，梦想每天都在顽固地生存下来，但是温尼斯却是我们最悲痛的失败；尽管在长滩“派克娱乐公园”衰落下来被海岸开发者所占据后，温尼斯就成了一个更为辉煌的象征，但是运河的建造却实在是很差劲，无论是因其无知还是贪婪（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历史》中可不会讲这些，这是我从《玻利》中看到的），而且几乎立即海水就开始向它们侵蚀过来。阿伯特·金尼的水路文明逐渐被淤泥充填，直到它们变成了一个呆滞的废水潭子。到了二十年代，它们被宣布成为疫病的源藪，因而大都用沥青封埋起来。

沃伦·思佩克的黄色小平房建在少数保留下来的运河的河沿上。今天河水表面有一层五彩的油膜覆盖着，河岸上挤满了鸭子，绿草在拼命躲开鸭嘴的啄食戏弄。路的那边是大量的高档公寓套房，但是在运河的这边却是一排平房，它们一定是阿伯特·金尼那个年代修建的，一直在顽强抵抗着发展神话的掠占。从朽败的木质和剥落的表面涂层以及古怪的装饰，还有后院荒芜的园地来判断，它们一定是属于哪个执拗、疯狂的地主。像思佩卡的小屋，窗户和门都安装上了防护栅，这种安全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它的古典型的魅力。

我循着震耳的广播电台的声音把车开到了停车道上，这里停有一辆丰田4X4，发动机在轰鸣着，一个穿着破旧的工作裤和牛仔鞋的男人正背着他的工具箱，拉上房门。

“思佩卡先生？我能和你谈两分钟吗？我是安娜·格蕾，FBI。”我向他

出示了我的证件。

他去把引擎关掉，当他钻出司机室的时候，目光却掠过我肩头朝后面望去，好像那边有什么东西突然抓住了他的注意力。我连忙转过身子，以为可以看到什么新奇的事物。

“那是一辆 1971 年的普利茅斯·巴罗库塔吧？”

他一边说，一边朝我走过来。

“确切地说是 1970 年。”他打量这辆车的时候我们站在街道上。

“漂亮的油漆活儿。这是你的车？”

“是的，是我的。”

他并不显得吃惊或与此相关的任何表情：“你到这里来需要什么？一个 440 四缸？”

“我只是不能使空气调节达到良好状态。”

沃伦·思佩克走到他的运货车旁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最近一期的《电机新闻》杂志。我情不自禁地接过来，心跳加快了。

“我的爱好中包括阅读。”他已把它翻烂了，所以我看到的每一页几乎都是翻卷折角的。

“我也是。”

“这么说我们上床的时候也可以谈这些东西了。”他的目光在我的胸部一溜而过，然后带着一丝挑逗和坦白的好色的神情盯住我的眼睛。“一加仑汽油所行的平均里程是多少？”

“十三英里。但这并不是你愿意拥有这种车的原因。”

“我理解。”他完全理解，他灰色的头发被剃成军人式的短平头，柔和丰厚的嘴唇带有一道性感的曲线，面颊沾满了风霜之色，眼睛眯成缝躲避着阳光。他的唇印倒很像在《青春的小鸟》中的保罗·纽曼，也许就是这一点常使他侥幸做成他在高等学校中曾侥幸做成的事儿。这嘴唇发出顽固的邀请，邀请别人去亲近它，并进而打破一切的禁忌。

“保养精心吗？”

“总算不是太坏。交流发电机在前两天的雨中曾经出了点毛病。电池也失效了。诸如此类的事情。”

“但是我敢打赌它能够每小时开上六十五英里。”

“在晚上开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曾经达到过一百英里。”

沃伦·思佩卡用手指摸了摸放在驾驶座上的红色皮衣：“顽劣的女孩。”

“那是一次高速追捕，穿越了五个县，最后以武力解决而告终。你该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吧。”

他笑了：“就像电视里演的警察——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开着一辆这样的车？”

“曼尼克斯。”

“跟你这辆一模一样？”

沃伦·思佩卡看看我，又看看车，缓缓地点了点头：“我印象深刻。”

“是啊，我印象深刻。”我喋喋不休地说，相信我正领着他走向花园小径，“你是我遇上的人中唯一知道曼尼克斯开着巴罗库塔的。”

“六十年代我曾看过大量的电视片。也经常做其他一些事情。”

“你和克莱诺·依贝哈特？”

他的眼睛保持着平静：“克莱诺怎么了？”

“你们一起去高等学校的时候，我能看见你们俩喝啤酒、吸食无论何种东西、溜出去看电视……”

他的手插进了衣服的前口袋里：“是啊，后来，他妈的怎么样呢？”

我知道他迟早会像这个样子，所以我只是平静地呆在那儿。

“我们对你们以前做过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想知道的是你现在是否还和她有联系。”

“为什么？”

“对依贝哈特家的例行背景调查。”

他等了一会儿，在我脸上力图寻找到点什么东西。明显地我流露出来了因为他开口道：“我不这么认为。”然后就走回停车道上他的运货车里。

“有什么问题吗？”我发觉我自己跟着他在走。

“没问题。这么好的一天，我还不想和你谈。”

他把丰田车倒了出来。

“顺便说一句，”——他上身探出车窗外——“曼尼克斯开的是一辆赫米，库塔。”

“我知道的。”我说，脸颊却红了。

他竖起一根手指，责备式的摇了摇，沿着大街开远了。

我知道我会捉到沃伦·思佩卡的。他不可能来非难我，也不可能远远跑开。

我回去的时候一直在想凯茜护士在潜水艇商店里跟我讲的话。她说过，沃伦曾经“遇到些麻烦”，但她并没有告诉我是些什么麻烦。我打开了电脑，准备搜寻一下犯罪记录。结果，在我喝完第二杯安息咖啡之前，我们需要的所有信息已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屏幕上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等到九点钟准备在他回家时捉住他。他拾起话筒沉闷、轻率地嘟囔了一声：“哈罗。”

“哈罗，沃伦，我是安娜·格蕾，FBI。”

“我知道你会打电话。”

“你知道？”

“你想找个日子约我出去。”

在这一瞬间我放弃了其他可能的反应：“实际上我打电话是要谈关于你非法拥有大麻和可卡因，意图散布而被加利福尼亚州定罪的事。”

“陈年旧账……那又怎么啦？”

“我可以打赌你在申请你的州承包商执照的时候隐瞒了这个事实，你是个重罪犯。”

是停顿，然后：“我没有那样做。安娜，为什么你要威胁我呢？”

“我想要你告诉我关于克来诺·依贝哈特的事。”

“如果有律师在场我就跟你说。”

“你当然可以要求律师在场——”我随口说，而我脑子里想到的是许多律师都和依贝哈特的律师臭味相投，“但是这不是针对你的，沃伦，这是针对克来诺和她丈夫的。”

“我并没有什么事情是针对阮德尔的。”他怀有戒心地说。

“大多数人都认为阮德尔·依贝哈特是个慎重沉稳的市民，但是我有这种感觉，你了解到的绝对不同。”

沃伦·思佩卡同意，第二天下午我们在圣莫尼卡的亨特饭店的顶层酒吧

中见面。

去拓普斯酒吧的唯一路径是乘坐那部安置在旅店侧面的外部电梯，上上下下时它就像一个爬动的玻璃鼻涕虫。两个二十来岁的秘书在一旁窃窃私语，在他们的眼中笼罩着一种机械的动摇和哀怨的神情。我们在棕榈树的上空缓慢上升，如置梦境般地悬浮于海上二十层楼的高处。我相当不喜欢这样的境遇。

门打开，我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墨西哥小酒吧中，墙壁粉白，边缘却是靛蓝色的。在两扇拱门入口的上方，分别用褪晦的桃红颜色写着“阿卡布科”和“圣布鲁兹”——一个把你领到一个铺着粉红色桌布的餐厅，另一个则导向一间盖着竹屋顶的酒吧。沃伦·思佩卡正坐在酒吧里独酌，戴着一顶镶有许多小圆镜子的墨西哥宽边帽。

一个长着黑胡子、留着水滑的拖背长发的酒吧招待员好像对他的头发已无法约束，只好让它随意披散着。

“Está Loco。”他冲着沃伦点点头。沃伦孩子气地咧着嘴，帽带儿在他的下巴底下晃荡着。

“喝的什么？”我问。

“没什么。苏打水。我只是想控制一下情绪。”

“为什么？斗牛比赛？”

沃伦把帽子扔给招待员。招待员把它挂回帽钩，嘴角仍然挂着一丝轻笑。

我们选了张靠窗的桌子，这里可以悠闲地看到蒙塔娜之北的景色：白色或米色的建筑，红色、橙色的屋顶，顺着林荫道四处延展。

女招待给我端上一杯酸橙味的非酒精饮料，饮料装在一个汤碗大小的有柄玻璃杯里，表面浮满了碎冰块。

“我搬到加利福尼亚以后就专心于我的生意，直到有一天我接到特迪·费茵女士打来的电话，她家快被泥石流埋了。”

“她还有更多的活儿给你。她会打电话给你的。”

“那很妙啊。后来她说克莱诺·依贝哈特曾提起过我，一个高等学校里的老朋友。我确实不曾想到克莱诺会搬到西海岸来，我猜想这一定是我们的母亲无聊闲话的结果。如果你认为犹太人的母亲很讨厌的话，那你一定是不了解爱尔兰和意大利人的母亲。你不是犹太人吧，是吗？”

这句话突然使我陷入一阵忧伤的情感浪潮之中，但是我很快把它推到一旁：“我父亲来自萨尔瓦多，我母亲是美国人。”

那是这张桌子以外的事情，而且也并不见得有那么糟糕。

“那很快被证明是件重要的活儿，费茵夫人迫着我赶快完成，所以我在周末就开始工作。那天她正为她的孩子举行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来了一百多号亲戚朋友，我拿着断路器站在人群的外边。这时候，那两扇法国式样的门“哗”地撞开了，克莱诺·依贝哈特却飞了出去。我是说飞。那是两扇摆摆样子的门而已，从来就没打算要用的，但是克莱诺怎么知道呢。所以她就飞进了一道明沟里。我扶她站起来，才认出她就是萨文希尔的克莱诺·麦卡锡。她增加了一点体重但我的判断仍是毫无疑问的。她很尴尬，感到这件事确实也搞得很糟糕，所以没有认出我来——毕竟，已经十五年了——我就让她离开了。

“后来，我走进厨房，她也正在那儿，面向朝着派对那边的窗户，像一朵墙上长出来的那种黄色草花——克莱诺以前从来就不是一朵草花——眼泪

顺着她的面颊往下淌。她看见了我就试图把眼泪擦掉掩饰过去。

“‘克莱诺·麦卡锡’，我说，‘你在擦什么？告诉我你没有认出我。’”

“最终她还是认出来了。‘我不能想象你怎么会在这里呢，’她说，‘现在我记起来了我给过特迪你的电话号码。刚才在外边大出洋相的时候你怎么什么也没说呢？’”

“‘不想让你太难堪。’”

“‘我看起来一定像个疯子。’”

“我走过去：‘不，你只是受了点惊吓。’”

“于是我问起她老是饮酒过度的父母的情况，我们俩就聊了起来。我告诉她我现在有工作要做，我不饮酒，这牵动了她的心事。为了逗她开心，我指着外面的一个胖家伙，他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汗衫，他的身价是六千万美元，说：

“‘设计一个电视节目吧，现在他可有六千万家产，过去逗弄逗弄他，也许不愉快就过去了。’”

“‘你去逗他吧。’”她说。

“‘我试过了，但是他不感兴趣。嗨，为了六千万我可愿意做任何事情。’”

“‘不，你不会的。’”

“‘你是对的，我不会。我还能关心什么？只有钱。’”

“但是克莱诺盯着所有那些人看，又开始变得眼泪汪汪的了，她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她的女儿已经成了人群中的一分子，而克莱诺却知道自己永远不会适应。

“‘那是我的女儿，劳拉，她是今天过生日的那个女孩最好的朋友。她爱加利福尼亚。’”

“橱柜上放着一个大得不可思议的生日蛋糕，所以我就用我的手指，”——他在桌子边缘做了一个示意动作——“在它周围抹上一圈，然后把刮起来的巧克力糖霜送进嘴里，我对克莱诺说：‘你不能对这些人太认真。’”

“她看着我，然后从蛋糕上摘下其中的一朵糖花，扔进了她的嘴里，我知道是时候了，我们又将会在一起睡觉。”

“你和克莱诺·依贝哈特一起睡过觉了吗？”

“一周两三次。通常是在我的地方，尽管有一次我们是在她丈夫的床上干的。我想有那么三十秒钟吧，她是真的想离开她丈夫到我这边来。”

他露出一丝苦笑。

“她爱你吗？”

沃伦·思佩克捋起胳膊，他翘起了椅子，两个光光的膝盖头也露在外面，眯着眼向海面上升起的薄雾望去。他是刚丢下工作跑来的，依然是一副褴褛的短打扮，一双笨重的鞋，和水手袜。

“对于我，她最爱的事情——很不幸——是我们做完爱以后谈起我们的老邻居。她喜欢去寻找那些记忆，确实我也记得当她十二岁的时候她就是这样，那都是些渣滓。当然，那时我们的性交也是相当成功的。”

我禁不住去想那会是怎样的。

“她很恨移居到这里来。像特迪·费茵那样的人总是把很多垃圾教给她，但是她觉得要做到像他们那样有很大的压力。她很高兴找到了一个借口可以不再跟特迪一起闲荡。她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我在一起。”他接着说道，露出了一个逗人的微笑。

“那么那些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阮德尔大夫，还会有别的地方吗？我一直认为那家伙是个势利虚伪的人。他把妻子晾在家里，自己在外跑到明星面前扮医生。”

“和简娜·玛森？”

“你看看吧：他有安全门的通行卡，有前门的钥匙，简娜·玛森经常用她的豪华大轿车去他办公室接他，带他去参加慈善晚宴和电影放映式。”

“他们是私通吗？”

“不，简直就像在地狱里一样明目张胆。她给了他一把紧急会面时的房间钥匙。”

“为什么选择了阮德尔？”

“谁知道呢。因为她喜欢这样而他又是个星迷，就像所有的吸毒者沉浸于他们虚幻的快乐中一样。作为一个医生，我可以告诉你，他一点儿也不聪明。我曾经为电影明星们干过许多活儿，根本不用费脑筋就可以明白他们所想做的就是利用你。”

“所以你认为简娜·玛森是在利用阮德尔·依贝哈特。”

“利用他做什么？”

“得到麻醉剂。”

“不，在我看来事情正好相反。他一直在试图使她戒掉毒瘾。我会告诉你那些事的。”

他把糖扔进第二杯冰茶中搅着。

“克莱诺单独来参加这个生日聚会，对，然后遇上了我，我们重续旧情，阮德尔不在这里和他不能来的原因是，他到马里布去照看简娜·玛森去了，她据说是得了感冒。”

他的身子向前倾斜，手指在桌面上的镶嵌小花瓷片上敲出“达达”的声音。

“克莱诺后来告诉我，当阮德尔赶到那里去的时候，发现简娜·玛森正躺在床上，全身彻底赤裸着，覆盖着的只有她自己的脸皮和呕吐物。”

每个词他都重重地敲击一下，加以强调：她自己的脸皮和呕吐物。

“好在他有房门钥匙，要不然，她真会死在过量的毒品上。这也是他阻止进入贝蒂·福特中心的原因。”

这件事很费思量。

“那么她又是从什么地方得到毒品的呢？”

他耸耸肩：“她一定跟外边街头的某个地方有联系。”

我点点头，这是一个不错的猜测，一个你可能说出来的有头脑的猜测。但是如果依贝哈特医生并没有供给简娜·玛森麻醉剂，那么为什么她现在这样地追剿医生，好像她的整个生命都寄托在上面一样。

西面一层灰蒙蒙的雾霭把海天混在一起，就像制造了一副雾的帘子。拍岸的浪涛来势凶猛，在黄昏的阳光照射下颜色绿莹莹的，显得有些顽皮。自行车的车轮子辗过自行车道，从这里看去很小，就像是钟表里的齿轮一样，转动起来抛射出星星点点的微弱金属光泽。

“你仍在和克莱诺见面吗？”

“几个月前就结束了，那时她决定了，仍然愿意和阮德尔在一起。不要吃惊。她不能够离开，她依靠着他就像依靠一只救生筏一样。”

“你们俩之间是怎样结束的呢？”

他用指尖轻轻捋过他的短发。

“相当糟糕。她那天在我那边，很晚才准备回家。她打电话给特迪·费茵，因为劳拉在那儿和他们的小女孩一起玩……”他叹息着，“结果她得知劳拉掉进了游泳池差点淹死。”

我丢下了笔。停止做笔录。我的心脏跳得更快，因为我听出来他颤抖的声音中的恐惧——也因为在這裡我虽然不能代替克莱诺·依贝哈特的位置，但这沃伦·思佩卡坐在一起，我同样可以感受到她一定也曾感受过的心情——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进入了一个危险的轨道。

“我们跳进我的运货车，往特迪的房子奔过去。克莱诺一路上都念着‘我们的父啊’。特迪那时候不在家。佣人已经打了911电话，街道上挤满了医护人员和警车。你根本不会想你回到家时家里会变成那个样子。克莱诺钻出运货车，几乎立刻就昏厥在一个黑人女警察手臂上。我没有走进屋子——我在这里能做什么呢，对吧？——但是克莱诺又跑出来了，告诉我劳拉没事儿，她甚至没有失去意识。事实证明那是佣人的错误。”

“哪个佣人？”

“我忘了她的名字。”

“是维奥莱塔吗？”

“是。是维奥莱塔。”

我感到胸部遭到一记闷击，你正要喜欢上某个人时，却突然听到了关于他的坏消息。

“你认识维奥莱塔吗？”

“嗯，我想我碰见过她一次，我到克莱诺家去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

“那次是为了结束一切。劳拉那件事以后有一个月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然后克莱诺告诉我们之间完了。”

“为什么？犯罪感？”

“是的，她认为一切都是她的错，但她也知道阮德尔一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灾难是他们一起制造的。”他不易觉察地皱皱眉，“我能告诉你什么？恐慌已过了。”

他用拇指和食指把空玻璃杯往前弹。

“这是我带她来的第一个地方，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等电梯的时候，站在一整块嵌在木框子里的大镜子前，木柜上绘着玫瑰。沃伦·思佩卡戴上了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沃伦兄弟工作室”字样。我看着镜子里的两个人。酒吧招待正在把一锅辣椒倒到蒸气腾腾的盘里，准备开饭的时候了。电梯到了，空的。我们迈了进去。

“我们第一次接吻正是在这里。”

玻璃电梯震颤起来，当它开始往下降时，我们站在那里谁也没说话，跟他们站在这里时一样，靠得很近，笨拙地，充满渴望地。

如果他像第一次吻克莱诺·依贝哈特那样的吻来吓我一跳，我知道那将只是一次小遭遇，一次逗弄，没有什么可感到震怒的。她那时也一样吧：一个来自老朋友的纪念，对在高等学校那些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害怕的日子的记忆，那时一切事情都在那么仓促轻率中完成了。一个夏天的晚上，在一辆滑动的车里，所有车窗都放下来了，南康伏特美妙的夜幕令人陶醉，逐渐伸展进黑暗中的乡村道路上混杂着野草的气息。车灯熄了。不需要光亮。加

速。

(十六)

第二天我从波士顿得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柏药店查看了他们自 1985 年以来的记录，给克劳迪娅·凡·何文配药的方子只是给一次眼科传染病和一些妇科病的。”“野嘴”在电话里漫不经心地说，“而且这些药方都不是阮德尔·依贝哈特开的。”

“也许她去的是另一家药房，她没有把名字记正确。”

“我现在就去查，小塞纳瑞塔。”

这一时刻我对“野嘴”的幽默丝毫也不感兴趣。他尽力屏住呼吸的声音暴露了他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立即传染给我，使我的肾上腺素陡然加快了分泌。

“我们有麻烦了，不是吗？”

“并非没有机会。”

“是的，我们还有。”但恐慌在急剧增加。“在公园里她一定对我们撒了谎。”

“那么，现在她的那一套说法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越是再多作些假定，我就越感到船沉得更快。”她为什么要制造出这样的事端来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得替她找到指控依贝哈特越权开药的其他根据，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了确证证人。”

“我听听你能有些什么意见。”

“你得到她的医院记录没有？”

“还没有时间——”

“我去做。”我粗鲁地打断道，一下子掐断了电话。

几分钟以后我接通拉诺严大夫，阮德尔·依贝哈特在新英格兰长老会女执事医院的前老板，他满口承诺说下午去查凡·何文的档案表，他的英国口音富有节奏，显得很动听。在我的经验中，即使最有修养的人如果有机会和 FBI 共事一番也会兴奋不已的。

局里要求每六个月对我们进行一次体能测验，所以每周在你的时间表上就可以开列三个小时时间用以进行锻炼，所以对我来说，每天穿过停车场到位于色普维达的“韦斯特伍德公共娱乐中心”的游泳池里游个二十二分钟每哩就决不只是为了消遣混日子。我如此急切地渴望到那里去没有别的意图，只是想一头扎进水道里游个痛快。把精神的焦点对准对面壁上的大十字纹，尽情享受运动中充分的技巧性的乐趣，干净利落的转身，挥臂入水的节奏，池水在皮肤上的滑动，胸腔所承受的压力，每个晚上都从疲劳中重新振作；今天我的体力应付有余，甚至战胜了一位穿橙色泳衣的小姐的挑战，她游的是水池中央的快水道，这起码给她增加了十分之一的作用力。

我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回到办公室。一次酣畅淋漓的运动之后我感到彻底放松下来，又有精力可以应付任何事情。回来就遇上幸运的事，罗莎琳给我留了条子让我打电话给波士顿的拉诺严大夫。

“克劳迪娅·凡·何文是因为在一次汽车事故中的骨折和外伤而接受治疗的。”医生热情地告诉我，“在此以前，她因为有各种病症，从压抑到精神分裂症，所以接受了长时间的精神病医治，直到后来被送入佐治亚瑞文纽

学院接受治疗，实际上诊断为分裂性个性失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重性格失调。”

“明白了。你是说她属于那种具有不同的声音和性格的人？”

“对。”

“那不是很不寻常吗？”

“分裂性个性失调可能比你们认识的要普遍得多。它是一种精神机制，是为了避免确实地变成另外一个人造成的创伤。在凡·何文小姐的病例中，病情似乎是从早期青春期就开始了，导因于一个邻居的性虐待。从这份记录中看得出来，”他继续说，“有二十三个人对此提供了证明，包括一个名叫阿伦的放肆的男人。”

“她说阿伦是她的拯救者。”

“是的，一些病人把某种改变者当作‘拯救者’——其实就是，拯救她的性格，当你和她谈话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有什么转换？”

“转换？”

“你是否看见她通过改变发音方式或者体态变成别的人——”

“耶稣，不。”一阵战栗传遍我的全身。

“很有趣。”

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跟得上医生的意思：“那么我们能相信她告诉我们的关于依贝哈特大夫的事吗？”

“那可能是靠不住的。”

“但是她看起来非常的有理性。她有头脑，还害羞——她说她能演奏小提琴。”

“那可能是她的叫作贝基的那一重人格。”

“贝基！那是什么——‘边缘地带’？瞧啊，她有丈夫和孩子，她正推着一辆婴儿车呢。”

“你确实看到那孩子了吗？”

“没有。但是那时正开始下雨。”这似乎解释不了任何问题。

拉诺严大夫的音调十分克制：“我很抱歉不得不告诉你，我非常怀疑在推车里是否真有一个婴儿。”

这个想法，她出来站在冷风中只是装作在照看一个婴儿——我认为的那儿有个婴儿——让我产生了畏惧感。最后我问：

“从你的专业观点来看，考虑到她的处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克劳迪娅·凡·何文在法庭上，做一个可靠的证人吗？”

“最终地？没有机会。”

我挂上了电话，把头埋在我的手掌里，希望从这堆乱麻中理出一条线索，挂在衣帽架上的“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的袖子和胸口被风吹动，挺了起来，就像有一团热空气在里面膨胀起来一样。

我没有了确证证人。

而高罗威等着明天就要结果。

我可以向我的老板哀诉，我曾经保证凡·何文是个好姑娘，但是波士顿的那个老酒鬼没能查明她的资格，结果把事情搞糟了，尽管我现在非常愤怒，但是我不能为了我自己而出卖“野嘴”。一封指责信将只会对他的退休不利，而即便是这样做，也根本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能出示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阮德尔·依贝哈特有罪呢？

我坐在那儿好长时间，心里像有只老鼠在爬，用它尖利的爪子挖着我的心房。我做着笔记，画着图表，但我看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制造”一个案子来对付医生。我们能掌握的只是一个戏子不可信的故事。这时电话铃响了，而且就是简娜·玛森自己。

她是我想找来谈话的最后一个人。我对直升飞机飞过她的房顶不感兴趣，或许这次她是有一个新型垃圾桶想要我修。

令人吃惊的是，她似乎完全悔悟了。她需要和我谈但是却不想在电话机里进行和深入下去，我们可以见一面吗？

上一次，安排一次会面竟然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她又提早一周到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点，所以我有一点怨气和对是否值得冒险的怀疑。但是她保证，她的车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会来联邦大楼前接我。它确实也来了。

我拨开人群走向那辆专门等候我的黑色闪亮的豪华大轿车时，心跳都有些加速了。车掉过头。我觉得有点头晕，车体反射的光芒一下掠过我的脸。

汤姆·保罗伊打开了车门，点了点头算是招呼。这简直不像是爬进一辆轿车，而像是走进一间房子，房间里还有唇膏的气味，到处铺满了上好的皮革，车顶的嵌板是珍珠白的，四周边缘上都安有熠熠闪亮的顶灯。一个镀铬的搁架上摆满水晶制的细颈瓶，瓶颈上都套着银色箍带加以固定——威士忌，黑麦酒、杜松子酒。我可以尽量伸展我的腿，但是距离那个搁着电视机，影碟机和 CD 唱机的落地式支架仍像有几英里远，在它上面，是一排黑色玻璃板把我们和司机隔开。这里有两部电话，一部传真机，有一个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长试管的花瓶里插着一朵黄玫瑰。我们离开路边时，一束镜面反射的光线照射在一排玻璃器皿上，相互间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几卷剧本稿张开像扇形一样堆在缤纷的地毯上。

“谢谢你来，安娜，亲爱的。”

简娜·玛森，涂着巴黎式的红嘴唇，黑色眼影，头发别成两个髻子，把手伸给我握了握，又迅速抽了回去，扭身转向窗户，眼神显得很忧郁。她穿着一条夺目的粉红色丝质长裤，裤脚镶着白边，上身在夺目的粉红色丝质体恤衫外面还套了一件白色的运动上衣，袖子被拉到小臂上。每只手腕上都套着一只金手镯，脖颈上绕着的珍珠短链上还吊着一件闪闪发光的东西（在淡柔的灯光下不容易看得清）。她这副打扮看起来是要去谈什么生意似的，以帕尔姆·斯普润地区人特有的方式。我们坐得很近，我几乎能闻到她的体香——就像一件用丁香香囊熏过的内衣。

很容易想象阮德尔·依贝哈特是怎样地掉入这个脂粉团里难以自拔，要伴同玛森小姐参加时髦的募捐晚餐，绕着城兜一圈风。当我看到一大批白领工作者在维尔希尔大街街口等着红绿灯的转换时，我意识到，别人看不到你而你却可以窥探到别人，这通常是我们执行法律的一种方式；而令人不安的是，作为医生，他们也能分享这一特权。

这时候简娜·玛森开始唱起歌来，她的头依然背向我，声音低沉而忧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

“在清晨的片刻光阴中/整个世界就要醒来……”

这就是所有的注意力和抱怨所关切的东西，为什么人们要容忍愚蠢和暴行，为什么玛格达·斯脱克曼要置身于简娜·玛森和剩余的世界之间，为什么有些人甚至像我外祖父也会真正被功绩所打动：人的天性。

当大轿车转过街角时，我平衡住身体，听着简娜·玛森的歌声，道地的，毫无瑕疵；这一时刻，她的确是个雍容华贵的人。

我们通过一个VIP（要人）出入口驶进世纪城购物中心，我从来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出入口存在。车停在另一辆豪华大轿车背后，那是辆白色的加长车。简娜·玛森戴了一副宽大的墨镜，又把一顶浅黄色浅顶软帽扣在她的法式发髻上。

“对不起，我得先办一件事情。”保罗绕过来替我们开门时玛森说。

我走出车门跟在她后面。在电梯上我说：“如果我早知道我们是到这儿来，我一定要把我的加湿器带来。”这句话对她来说当然是莫名其妙。而她对此也丝毫不感兴趣，眼神只是注视着我们头顶上宽敞明亮的空间。

电梯刚刚着地停稳，她就窜了出去，就像是一枚灵敏的导弹迂回绕过障碍物，直扑预定的目标。我只好加快我的步伐以跟上她的动作。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女人穿着高跟鞋行动还如此敏捷。她只顾埋头向前，根本不去注意一路上的情形，就像一枚上升的火箭头拨开雨滴一样，披靡前进。中心城最妙的事情就是它是一座开放式的商业城，在城里就像在林荫道上的一样，你可以直接得到日照和向上通风。有露天的食品摊，许多人的货物都是放在一架木制手推车上卖——当然，整个一座城其实是在一个邮区之中，即布洛克斯。

她握住玻璃门上的镀铬米把手，把门拉开，走进了底楼的化妆品部。

我猜测她一定是来寻找某个品牌的香水。因为我们在这里绕行了三十秒钟，走过黄铜装饰的柜台，打扮漂亮的售货小姐，顾客，光彩夺目的展示品，异彩纷呈、令人难以置信的化妆瓶的摆置，在光亮可鉴的厅柱上反射出来的我们俩的影子——她身上鲜亮的白色和粉红色，我的晦暗的卡其布制服——然后就离开了。她又一次碰着那扇玻璃门，一股异常的热气向我们扑面而来，又立即四处弥散了。我们重新回到路边。

“我想你还没有得到它。”

“没有。”

“如果在布洛克斯都没有的话，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有。”她说，很沮丧地。

我们经过了一个巧克力商店和一个卖快餐的地方，仍然保持着高速度。

“你想和我谈什么？”

“我的确想谈，但是现在我没有情绪。你呢？”她亲昵地问，好像我们刚过了一次购物狂欢，也许应该喝一杯茶，歇歇脚了。

“实际上，是的，我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你谈。这是我的任务。”

我们经过一家电影院。

“你看过《霹雳情天》吗？”她问。

“还没有。但是我喜欢汤姆·克鲁斯。”

一队人正默默地排着队买电影票，准备看早场。没有再说话。简娜·玛森直接走到人群前面，递给售票员某种会员卡一类的东西，不用付钱就拿了两张票回来，然后我们就换乘另一部电梯到了一个门厅里。

再往前显然是要左转弯。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噢管他呢，”她说，“我们去看汤姆·克鲁斯。”

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真的去了。我们坐在那里吃着爆米花，简娜·玛

森和我。这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电影，充满了虚张声势，我入迷了，兴奋得发抖。

“‘生命瞬息而过，死在风华正茂之时，留下一具美丽的尸体’。”我们走出电影院时简娜·玛森注视着我，说：“那是我和斯图尔特·格兰吉尔演的一部戏里面的台词。现在他已经成为他理想中的人了。”

天已经黑了。树上缠绕着一串串发出白光的小灯泡，飘扬在食品商场四周的彩旗制造出一种嘉年华会的气氛。人们坐在杏黄伞下的露天桌子旁，吃着烤肉串和乳酪饼，在这个凉爽的初夏的晚上，夹克衫都扣得紧紧的，店家穿着宽大飘动的白色长褂，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跟她的第一次约会，我感到一股兴奋激动的感情在心中涌动：我喜欢这个人。我想更多地了解她。

“我们去吃点东西。有个地方很不错。”简娜·玛森决定道，我欣然默许，享受这非凡的经历，旁边走着的是世界闻名的电影明星，心里怀揣着一种秘密的喜悦，知道我们是要走向 VIP 出入口，在那里再坐上我们的私家豪华轿车，穿过城市到一处美妙的地方去。

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门前停下来，它的霓虹灯广告牌很朴素，毫不张扬，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绿色桃棚。我们把汤姆·保罗伊留在车里的時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滑稽的敬礼。这就是他的工作。别以为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躺在沙滩上。餐馆里面是个舒适的小酒吧，到处挂满了一簇簇的香提花束，还有一幅巨幅的 JFK 的挂像。墙上则贴满了电影招贴，和名人、影星们的头部特写，像卢希勒·鲍尔，唐·理克厄斯，艾森豪威尔总统，均在其中，在这群人中，我未能看到简娜·玛森。

一个穿着陈旧的夜小礼服，双肩萎靡的男士迎上来说：“很高兴又见到你，玛森小姐。”然后把我们领进主间，这里面完全被桔红色的灯光所淹没。弧形的窗口竟是桔红色的，一组拖着长长的影子的组合灯所有的灯泡也全是桔红色的。大多数桌子都空着，白色的餐巾叠成花样垂直放在空桌上，看上去就像这个餐馆收集了许多兔子耳朵似的。

我们走过一个展览柜，里面陈列着各种载重汽车的模型，还有一个同样双肩萎靡的绅士，三十多岁，同教区牧师合影的照片。我们走过两个老家伙身边，他们正在抱怨在圣安妮他的损失，他们是在和一个金发碧眼、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谈论房地产生意。这些招待员似乎太老，精神太低靡，谁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著名的主顾，但是接着我便认出了一个演警匪片的男演员，随即意识到这一定是一个好莱坞影星们的聚集地，全是真家伙。

“我从来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找到一个男人，所以我一直不得不靠自己养活自己。”简娜突然说。

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份开胃的油煎果，实话说，在礼拜五，他们要做得比平日好得多。简娜喝的苦艾酒，我照例喝我的“7UP”，一面欣赏着墙上的小丑画。

“我的第三个丈夫，是过去的汽车大王，那是我不堪忍受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就像是他脚下的一块泥，我过去一直在想，为什么指甲修剪师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时总是擦着她的嘴唇。”

她从一个陶瓷小罐里给我们每人加了些水。水罐的外表就像是一个鸡头，这大概是这家餐馆的标志物吧。

“他是花光我所有钱的人之一，我们 1959 年离婚。一个从俄克拉荷马来的小姑娘还能做些什么？还有两个小孩需要抚养，除了唱歌、跳舞外，一切

都在使她弱小的心灵破碎。所以后来我搞过晚餐剧场、地区剧场，开过旅馆酒吧，所有我能得到的活儿，从维加斯到帕尔姆海滩到蒲非德，衣阿华，然后又回来。那样做了许多年，然后我遇上了玛格达·斯脱克曼。”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

“她没有生活。”简娜说，“她的当事人就是她的生活。”玛森向我指了指面包棍，示意末端有破裂，“她是上天派下来的天使，请原谅。”

她去洗手间的路上碰到一对穿夜礼服的夫妇。我看着他们看见了玛森，试图说：“那是简娜·玛森啊。”但是却没有张开嘴。这副情景非常有趣。

她回来时重新上了妆，玛格达·斯脱克曼仍然挂在嘴边。

“玛吉告诉我，我应该去演戏剧，她说服乔·帕派冒险上演《玩偶之家》，正是它改变了我的命运，不仅因为它获得了广泛的成功，而且它还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你非常了解自己。”

“我只知道自己是女演员。我离开了第九十街，在好莱坞·希尔租了一间房子，在三年之内我就为自己赢得了第一个奥斯卡大奖。你瞧，这就是我对自己的全部看法。我们不能让任何人从我们这儿把它带走。”

一个萎靡的招待员端上来两盘名目叫作“多尼·帕顿”的菜肴。我盯着这道菜不知如何下手，我完全把它同“米基虾”和“科勒曼炸鸡”混淆在一块，最后还是决定她动哪块我就跟着动哪块。

“我相信你一定听到过一些关于我的可怕的传闻——说我年老色衰，说我酗酒、傲慢、粗鲁，但是让我告诉你，人们都爱我。”她把酒一口干完，又继续说，“人们都爱我。”她过于强调了，所以我暗地里猜想是不是那一杯鸡尾酒已经使她醺醺欲醉了。

“今天晚上真是棒极了。”当我们开始享用我们的乳脂面条时我说，“但是这与我们的办理阮德尔·依贝哈特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她合起双掌搁在桌布上，手镯露在外边，金光耀眼。“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震怒地要把这个男人带上法庭。尽管我已经学到了许多东西，可仍然对这头雄性野兽着了迷，阮德尔·依贝哈特又完全地凌驾于我之上。我挣扎得十分辛苦。”

她重新要了一杯苦艾酒：“我相信你很聪明，不会掉进这类的陷阱里。”

“未必如此。”

“你是怎样对付男人的？”

“我根本就不和他们打交道。”

简娜把头向后一仰，笑了起来，“噢我亲爱的，我们没有想要那样做啊。”

“这十分有效。”

她好奇地盯着我看，然后唇把白色的纯棉夹克披在肩头上，继续把话题转到了维尔·约翰尼·卡森的身上。

“我的第三个丈夫，从前的汽车大王，有一次秘密地拍摄下了我们做爱的镜头。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你明不明白呢，要找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人是多难啊？”

“是的，我明白。”

“这些年来，只有玛格达在始终支持我。为了她还有我的孩子们还有我的孙子们我要感谢上帝。我曾经有过很艰难的日子，但我仍然相信罗曼司。”

她从我的笑容里找到了我的入迷的神情。

“我可以打赌你一定在想，穿着一身戏装多傻啊。我并不是穿给男人们看的。我穿上它是为了我自己。我早晨醒来看看镜子，就把它穿上，一直穿到我看见某些东西过于陈旧为止。”

她笑了起来，我也跟着她笑，尽管我得努力理解她的话语中越来越忽略我的婉转的成分。

“在文森特尔·明内尼的导演下，我主演了一部音乐喜剧，它是一部用彩色印片法制作的色彩艳丽的狂剧，有一幕里我穿了一件狐皮斗篷，是啊，明内尼先生后来把它送到了纽约，专门配合我的眼睛进行着色。为什么？因为这才是罗曼蒂克。”

“我想我看过那片子。”

“路易斯·B·迈斯尔总是告诉我他的哲学是为漂亮的人们留下漂亮的形象。”她带着一股扫荡一切的决心继续说道：“我们都需要罗曼司，甚至你，安娜，亲爱的。你是严肃的年轻女人——我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你的某个部分要更加活跃起来。”

她几乎撑在了桌子上，用一双朦胧不清的蓝绿色眼睛注视着我。瞳孔却是黝黑的，张得很大，也许是落日般的桔红色灯光照射下的结果。

“给你自己一点魅力吧，安娜。”

就好像她能看透我的灵魂一样，她知道我丢失了什么，就为我提供了什么。我感到我自己被触动了，被软化了。我点着头。我想说，谢谢你。

当我们走出餐馆时，汤姆·保罗伊已经在那里为我们打开了车门等候着。

“晚餐如意吗？”

“令人愉快，汤姆。”简娜微醉着说。

在大轿车里她又继续解释说：“我谈到罗曼蒂克的时候，不是说这种事情一定要发生在六十岁的老司机和二十一岁的女服装保管员之间，当然我也不认为这里边就有什么天生的错误，天知道，那时候约翰·巴里莫尔已老得可能做我的祖父了，但是我确实感到需要保护我的人民，我担心这两个想法都会导致灾祸。”

“所以汤姆和莫瑞森就是一个例子。”这证实了我在海滩上所见到的。

“是的，但是在那个城堡里一切难如人意，”简娜叹道，“一切难如人意。”

保罗伊已经把轿车开进了交通潮之中。

“拿着这个。”她递给我一个鸡头水罐，这显然是她从餐馆里顺手牵羊带出来的，而且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为了记住这个晚上。”

我接过来。它的形状逗人喜爱。在电影之后，在“多尼·帕顿”和小牛肉和乳酪饼和咖啡之后，我感到心满意足得像一只贪睡的小猫，伸伸腰打个呵欠，希望简娜·玛森又开始唱歌。

像阮德尔·依贝哈特一样，我已经彻底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芭芭娜看着我走进她的办公室，抱着一个又大又沉的玻璃容器，里面足足装有两打黄玫瑰。

“给我的？我们订婚了吗？”

我把花瓶放下。

“简娜·玛森送来的。今天早晨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为什么？”

“因为我太善解人意了。”

“你么？”

“她的便条里就这么说的：‘谢谢你的理解。’我们一起去看了电影，然后吃了晚饭。她对我讲了许多她的人生哲学。”

芭芭娜白皙的脸上泛起了兴奋的红光：“你和简娜·玛森共进晚餐？”

“就我们俩。她喜欢我。”我坐下来，把脚翘到了她的桌子上。

“一生一次的经历。”芭芭娜妒嫉地嘟囔着。

“相当令人惊异。”我承认，仍然回味着豪华大轿车里的温暖舒适。“‘生命瞬息而过，死在风华正茂之时，留下一具美丽的尸体。’她在她的一部戏里这么说。我告诉她，嗨，亲爱的简娜，你正是在说我呢！”

“关于她的人生哲学，她还说了些什么？”

芭芭娜不再用手指抚弄那些黄色花瓣，她的笑容很不明确。

“噢，她讲了许多伟大的好莱坞的老故事，你一定会喜欢听的。像那时候那家伙为了配合她眼睛的颜色专门把一件狐皮斗篷送去重新染色——”

“谁干的？”

“利萨·明内尼的父亲。”

“文森特·明内尼？那位导演？”她表示怀疑地问。

“是啊，她演了一部他的片子，他把狐毛送到纽约去染色……有什么问题吗？”

芭芭娜的嘴紧闭着，她的兴奋变成了忧虑。

“那是诺玛·希尔若在《玛丽·安托万内特》中的事儿。”

“不可能。”

“那是有史以来最过分的影片之一。他们花了一大笔钱制作古式的家具和难以置信的服装，那个服装设计师，吉尔伯特·艾德里安，甚至定制了一件狐皮斗篷以配合诺玛·希尔若的眼睛。而奇妙的在于，为了省钱，他们甚至是用黑白胶片来拍的片子。这是一个很出名的故事。”

“但是简娜·玛森说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

“不是。”

“也许是她喝醉了。”

“还有那句台词‘生命瞬息而过，死在风华正茂之时’？那是约翰·德雷克在汉弗莱·伯加特导演的《鬼敲门》中的台词。”

“你能确定吗？”

“我确信。”

我知道对“电脑”的任何记忆和其准确性表示怀疑都是徒劳的。我想起那个鸡头水罐和她亲密的举动，这都是特意为我的。我的脚从办公桌上滑落掉在了地板上。

“怎么啦？”

“她耍了些花招。”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如此沮丧和手足无措。

“也许她是在做戏。”

“嗯。”

“也许她有点疯了。”

“她没有。”

芭芭娜也非常的沮丧。甚至连“电脑”也不能猜透其中的秘密。

“我不明白。这都是事实。她公开撒谎。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冒充。”

但是很快我就完全清楚整个过程的真相了。

“在这件该死的事情上她一直在说谎。”

“医生？”

我点点头。我想我快要哭出来了。

“把他查出来。”芭芭娜轻声地建议道，“你必须这样做。还有高罗威。多去几次。”

(十七)

我在底楼的自助餐厅里找到唐纳多。他坐在一根柱子后面所以人们很难发现他，他刚刚消灭了一块“浆果派”，正在读一本《瓦街的旅行》。

“我现在是进退维谷。”我告诉他我的麻烦，一面毫不客气地把他剩在盘子里的一块面包皮吞进了肚子。“我需要拿点成绩给高罗威，可我不能回去说，到波士顿的那趟是英雄白跑路，而且从那以来我一直只是在捉自己的尾巴。我自己都已经弄不明白，医生是否真的有罪。”

一个穿着黄色丝质束腰长袍的印第安女人缓缓走过来坐在我们旁边。有些倦怠地放下一个托盘。另一个文职人员正在为他的周末度假作准备。

“现在是我找出事情的根源的时候。我认为我应当暗中进行。安装上一个窃听器，然后装作病人到医生那儿去，问他要止痛药看他是否会给我。”

“为什么你以前不用窃听器？”

“我没有理由要让高罗威批准一套秘密行动方案。”

“你仍然没有。”

“对，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这样做了。”

“不经批准？”

我点点头，把像酸性呕吐物一样沿着我的喉管升起来的忧虑咽了下去。

“我知道这是有一点越界。”

“界限以外的方法。”

“你会配合我吗？监听窃听器？”

“自行其是的行动？如果搞砸了怎么办？”

“不可能搞砸，这太简单了。你跟我每个人都这样干过上千次。”

唐纳多把胡子拨拉得根根直立，这和他平时耐心的性格格格不入，每当他想要对付什么恼人的事情时就会有这番举动。

“这是冒险。”

“有节制的冒险。”

唐纳多摇着头：“不关我的事。”

“我明白了。”我觉得一阵燥热，自己好像很愚蠢，而且突然像是失去了什么。“算了，我用微型录音机，放在我的手提包里。”

唐纳多喝完了他剩下的柠檬水。

“帕姆金开始上法律学校了，我告诉过你吗？”

“她真好运。”

“我本来希望她等到杰里米读进高等学校再说的，但是那需要两年多的时间。”

“他学得很艰难吗？”

“现在跟一个家庭教师学，但是注意力总是严重分散，他们说这是他新

添的毛病。事物总有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吧。但罗谢尔不想再等了。”

他站起来扔掉了他留下来的垃圾。自助餐厅的味道就是一只满身油腻、热烘烘的野狗。我们经过一张政府合作人员的餐桌：一个日本职员正在用一双筷子吃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装在塑料饭盒里的食物；两个白种男人光着膀子只穿了件衬衫，一个菲律宾女孩旁边放了一只仿皮挎包。可他们在一起，究竟用什么语言进行交谈呢？

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抢步上去替我把门打开。

“我跟你合作。”他说。

我满怀感激地抬头看他，但他的目光却已射向了楼前的广场。那儿有一群拍片子的人，有的在架设折叠帆布椅，把电缆线队护道灌木丛中拉过来，有的在把笨重的摄影机安装在三角架上，或者正打开装满了照明设备的黑色箱子。从联邦大楼出去的一大帮工作人员伸长了脖子呆呆地看那个电视女演员，她浓密的淡黄色头发看起来相当熟悉。我知道如果那是简娜·玛森的话，肯定又将引起一场骚乱。我们一直向前走，直到一个拿着步话机的小子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让我们绕道从侧门走。我不喜欢被这些平民百姓呼来喝去，我也真他妈地讨厌别人叫我“女士”。

在洛杉矶，你应当习惯于看到摄影组随处地拍摄外景，这对当地的经济有好处，许多人也认为这相当刺激。但是对我来说，除了让我心里隐隐发痛之外，它什么狗屁都不是。这些自高自大的家伙侵占了我们的广场，当成他们自己的领地，只不过是让我们正视这点吧——电影人似乎是特殊的，他们凌驾于我们的生活之上。

然而，当下到这个自助餐厅里时，我们就完全一样了。

试用窃听器械的小房间在库房最南端的角落里，门上没有任何标记。

我讨厌到那儿去，那管理员的半边脸上爬着一个可怕的紫色胎记，而他却以人们同样难以承受的热情来做补偿，每一次办理事务都点着头鞠着躬。他有一个微型电视机，总是在播放些肥皂剧，墙上贴着三张明信片，是别人休假时寄给他的，他成天呆在他自己这个狭小阴暗的王国里，摆弄这些整齐有序地收藏在金属搁板上的录音和摄影器材。填完那些复写表格，你就会知道，是否这里是一间通向地狱的接待室，还有是否这里有一位保管员，这个可怜的家伙带着与生俱来的胎记在这里忍受着永久的痛苦，或者也许你的不自在反而会对你将要采取的行动，对你将要越过的界限有所帮助：对公民进行窃听，记录他们最为隐密的行为。

我巧妙地安排了一次与依贝哈特大夫的晤面。我和那位接待员交涉时借口说我在一次车尾被撞的事故中落下了背部麻木、痛疼的毛病。显然，在波士顿的那次遭遇虽然已经过去那么久，仍然让我心有余悸。但她突然问我是谁推荐我来的，我犹豫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说法。然后只好说：

“在体育馆里我偶然听到两个女人谈起依贝哈特大夫。她们说他是最棒的。”

“我们也这么认为。”小姑娘热情地说。

我告诉她的名字是阿曼达·格里芬，她把我约定在第二天的九点四十五分。

从我的衣橱的底层木板上的那一堆衣服里，我翻出来一条灰色的百褶裙和一件丝绸罩衫，从作为特工的经验来讲，我知道女人只要穿着得体就能占一步先机。但是执行秘密行动任务，有时你不得不坐在汽车里，在监视地

区不间断地呆上十个小时，有了几次经验之后，我就扔下了套装和高跟鞋，开始穿上轻便服装以便随时随地都像可以投入工作的样子。我发觉做男孩子中的一员要比做一个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孩子有趣得多。我在我的首饰盒里找到一串假珍珠项链，在杂乱的浴室抽屉里则找一管旧的紫红色唇膏。这是一种策略，就像穿上盛装去演戏，也同样有点紧张不安。我瞧着镜子里，它反射回来的信息是“身姿挺直”。我对这番改头换面很是满意。这一身很适合于阿曼达·格里芬，她，我已经决定，将是一名法律秘书。

我刚刚把一只仿蜥蜴皮挎包甩到肩头上，钥匙拿在手里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外公。

“我不能谈。我正要去办案子，简娜·玛森的事。”

“我只占用你五分钟时间。”

“稍后我回打给你好吗？”

通常我的坚持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想要你到维尔希尔的银行去一趟，它叫作什么——”

“‘国民保障’？”

我想把我的钥匙放到橱柜上，但是它们仍然握在我捏紧的拳头里。

“然后从我的保险箱盒子里找几张纸出来。”

我强迫自己把因为受挫积累起来的怨气排出胸腔。

“我想要把我的出生证明书，我的遗嘱，所有在那儿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好的。”

“我们即将遇到一场挑战，安妮。”

我的耐心现在已经正到极限了，我能够想象到外公一定是陷入了一场和邻居的法律纠纷，他们肯定不喜欢他把他的“比尔克”随意摆放，超出了两个停车区的界限。

“我们能不能以后再谈这件事？”

“医生说我得了癌症，活不长了，但我告诉他他知道个狗屁。”

我像被扔进了冰窖里，从里到外一下子凉了个透。

“是什么意思，‘癌症’？”

“噢我在刮胡子的时候发现颈部有一些肿块。”

我的拳头松开了。钥匙在我的手掌心里已经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似乎很严重呵。”

“嗯，不用担心。这点小事还不能把我击倒。”

我突然感觉有必要去洗手间。我还要在十分钟以内赶到圣莫尼卡。

“我马上开车出来看你，用最快速度。”

“不必了，我很好。只需把那几份文件给我寄来。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快去把我的简娜姑娘从那坏家伙手中救出来。”

唐纳多把车停在达那矫正诊所门前几米远的地方。

他打开公文包。在里面有一架“纳格拉”磁带录音机，联接在一个无线电接收器上。无线电发射装置则被我放在了挎包里。

“你的掩护身份是什么？”

“阿曼达·格里芬。她是个法律秘书，和她的两只猫住在马·维斯他。”我的声音听起来出奇的平静。

“尽量简单些。”唐纳多告诫说，把一副耳机塞进耳朵里，“无论你做

什么——不要露出马脚。说话时对着你的手提包。”

我启动了无线电接收器和“纳格拉”，它们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再没有说别的话，我钻出轿车，穿过人行道迈步向依贝哈特大夫的诊所走过去。

我几乎还没有机会在那张桃红和灰白色的长椅旁停留片刻，一个穿着白色医褂的年轻女人就打开了门，柔声叫道：“阿曼达·格里芬？”

她把我带进了一间检查室。一件棉长袍叠好了放在桌子上。

“除了你的紧身衫裤，把其余衣服都脱下来。穿上这件背部有开口的棉袍。依贝哈特大夫几分钟后就来。”

她离开了。我把装有无无线电发射器的挎包放在离检查桌很近的一张椅子上。

我开始脱我的衣服，然后意识到，在我精心挑选出来的衣服下面，除了一双日间穿的极薄的弹力长统袜以外，我根本就没有穿衬裤。那么，我必须面对这个医生，这次调查的犯罪嫌疑对象，而且是完全赤裸着的。

我心神不安地用长袍裹住我的身体，我的赤足踩在干净的亚麻地毡上，开始检查橱柜和抽屉。我发现有几个搁架上装满了一种叫作“拿帕鲁辛”的药物——“对关节炎有很好的疗效”。纸盒子上这么写着——还有纱布、手巾、儿童尺寸的罩衣，上面印着恐龙图案。所有的橱柜都开着，除了最低层靠近窗房的那一个，它被锁着，也正是简娜·玛森描述过的那个。我的心跳加快了，极有可能在里面就是装满了墨西哥麻醉剂的鞋盒子。

有人敲门。我迅速地坐到一张椅子上，然后医生进来了。

“阿曼达·格里芬？我是依贝哈特大夫。”一个微笑，客套地握手，眼睛盯在了阿曼达·格里芬空白的表格上：“你遇上一次车祸，然后背部就一直让你觉得痛。”

只有一次，在巷子里我曾看到过我的目标。他比我记忆中的人显得更高大，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更温和，他穿的不是浆硬的白色医褂，而是一件医用的宽松的绿色短袖消毒服，露出了他发达的二头肌。沙色的头发式样显得时髦华贵。一副金属框的读写眼镜低低地挂在鼻梁上。在棉袍里面既舒服又不自在，在阮德尔·依贝哈特身上显露出来的优势意识使我有些畏缩，他确确实实的狂妄和对自己医学权威的坚定信念也许完全就凝结在那枚小小的哈佛纪念指环上。他不拘礼节地跳上检查桌坐着，在交叉的双脚上套着一双臃肿的蓝色纸板鞋。透过眼镜他和蔼可亲地瞥着我，问道：“你被撞击的时候速度有多快？”

“我动都没动，那时我正在等红灯，几个小流氓从我车后撞过来。在古兴大街。我碰巧正在波士顿。”

“我就来自波士顿。”他说，“我很清楚马萨诸塞司机们的古怪。”

他填写着表格，我注视着他光滑黝黑的小臂上的肌肉。

“你的体形真好。”阿曼达·格里芬说，她开始行动了。“波士顿的人那么冷酷无情吗？”

“不像这里。我迁到这里来工作有两个原因：发展我的矫形医术和跟我的孩子在一起。”

“是他们让你到处跑的，不是吗？”

“我的小姑娘是个最淘气的家伙，我敢发誓她一定是猴子变来的。你回家去的时候她肯定正站在钢琴上。虽然才七岁，但你已经可以看到她在平衡木上的表演，那真是让我心惊肉跳。而且很快她的小弟弟也要跟上她的步子

了。当你被撞的时候你看后视镜了吗？”

“没有，我正低着头，往下看一张地图。”

“可能正因为这样才救了你的脖子。”

“我没有孩子。我甚至还没有结婚。”阿曼达自告奋勇地说。

“孩子们让你认识到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最重要的，医生？”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只有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

“赚许多的钱也许也会有所帮助。”

“我喜欢赚钱。”阮德尔·依贝哈特坦率地承认。用手蹭了蹭他的鼻子，“但是我不是很在意‘物质财富’，虽然这个城市里的人从前常常以此来判断你的生活形式。”

“我知道。所以你经常和在这一带风头正健的电影明星们来往。”

“我确实很喜欢娱乐圈里的人。我基本上是一个令人厌烦的缺乏创造力的家伙，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相当的不可思议。”

我能明白为什么简娜·玛森会那么愿意把阮德尔·依贝哈特带到她的豪华大轿车里去。尽管离洛杉矶的烟雾那么近。可他依然像干脆利落的新英格兰瀑布一样，保持着与众不同的激情。而且逗人喜爱。

他继续问一些问题，一边用夹在粗壮有力的手指间的“蒙大拿·布兰卡”钢笔写下阿曼达·格里芬的回答。他的头发里还没有一点灰白的杂色；他尽量保持着自己的年纪，虽然在眼睛底下已经鼓出两团棕色的眼囊。现在，我的任务是要发现在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阴暗的东西。

“我需要一点止痛药，依贝哈特大夫，我的背都痛死了，我几乎不能入睡。”

他涂完了表格跳下桌来。

“我们先来做一些检查。”

我站了起来，走到房间的中央。

我们的声音正传送到唐纳多的耳朵里，同时记录到了录音磁带上，处理后的对话作为技术事实，以后将加以仔细的研究。

但是磁带上不能记录的有他温暖、坚实的指尖触到我的赤裸的身体上时不自然的颤抖。我照他的要求转过身去，这样他就可以分开那件棉袍，而我易受攻击的裸背便暴露出来，他富于理解力的手在脊椎骨上一块一块地，缓慢而娴熟地探寻着，难道一个医治者仅仅通过这样的触摸便能确定伤者痛疼的部位？也许依贝哈特大夫会找到我的病症吧，不是阿曼达·格里芬的，而是安娜·格蕾的。它一定就在那些骨头里，只要去读就可以找到。

我盯着被浸渍过而剥落的墙纸，外公一定也在这样的诊察间里被检查过，专业设计的环境是暗淡的，据说这样可以稳定那些颌部长有恶性肿瘤的病人的情绪，而这时，也许沙漠里的太阳正像从地狱里升起来的火球，掷在被染得火红的窗户上。

阮德尔·依贝哈特的大拇指沿着骨盆隆起的顶端挤搥着兴奋点。他对女人的身体非常了解，他的手指顺着我的臀部曲线熟练的游走时，把我的精神推入一阵恍惚之中。“摁住这里时痛不痛？”痛。不痛。现在握住了后颈的肌腱，我的下颌不得不向下低垂，当这个治病的男人触动我赤裸的身体时，唐纳多正在车里听着，就像在同一时刻和两个情人做爱，一个男人正在抚摸你，而另一个男人注视着。

他的手又握住了我的腰，吩咐我弯腰下去触到脚踵。长袍随之滑落开来，我的光屁股正好抬起来冲着他，毫无遮蔽。他从容地捏住髋部的两侧，用力往里挤压。汗水从我的腋窝大颗大颗地摔到地板上。

现在到桌子上去，躺平。他一边对我发出指令，一边已经握住了我的脚胚，用他的手掌用力下压。我的手指捏碎了我身下的薄纸面，告诉他这里伤得有多厉害，每个地方都痛，我简直不能呼吸啦。

正当我处在这样毫不设防、易受攻击的状态中时，一个过去的回忆突然闪现了出来。我在第十二街外公房子的后院里。那是晚上，我不大看得清楚东西，只有当汽车经过胡同的时候才偶有灯光从木栅栏的间隙刺透进来。我仍然挤压在两个男人之间，两个人都爱我，都想拥有我。一个是我年轻的移民父亲，另一个是外公。

他们高声地争吵着。他们都拉着我的胳膊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拖拽。我父亲赢了，他用我曾经经历过的，留在记忆感觉里的最大的力气把我揽在胸前。我的手臂挂在他的脖子上，我的腿圈在他瘦小的腰上，我的全部存在都粘连在他的身上。这时候我想要我的父亲，现在，我作为一个病人躺在这里的时候。思念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它甚至替代了我现有的，为外公的诊断结果深深悲切的感情。当这种悲切分解以后，除了一块掩盖了我对于外公的真实情感的窗帘布，我就什么也看不到。攫取了我的灵魂的感觉现在就像是地狱里升起的彗星在穿过玻璃窗的瞬间一下碎裂：我希望外公死。

这个想法推动我从桌上跳下来，又送我过去拿我的衣服。

“怎么了，阿曼达？”

“我感觉好多了。无论你在我的背上做过什么，总之它十分有效。”

“我倒不认为我有这样的魔力。”

我的手在棉袍底下，用最快的速度系好了我的乳罩。依贝哈特大夫的一只手握在门上的球形把手上。他不自在地看着我穿衣服。

“在我的诊察室里应该听我的。”

“我认为我不需要了，谢谢。”

他皱着眉，担心的样子。

“这儿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吧。我们去谈谈。”

我的第一个清晰的念头：他发现了。那好吧，噢，上帝，反正一切都会在磁带上。

“车祸之后我一直很震惊，但是也许找个人谈谈也会有帮助的。”

阮德尔·依贝哈特站在面前，近到足以表示出他的关心，同时又足够远足以在我们之间留下空间。他棕色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它学究气的傲慢和偏见，传达出诚挚和平静的神情。

“你的背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你的肌肉弹性也极为出色。你不需要照 X 光或者做理疗，或其他此类的手段。我打赌你怕是有点杞人忧天了。”

“但是一到晚上痛疼就又发作了。”我勉强继续我的使命，就像是一个摔成碎片的机器人仍在发出毫无意义的声音。

“可以试着用点阿斯匹林，多洗热水浴。”

我已经穿好了所有的衣服，除了开始就塞进挎包里的弹力袜。我穿着一条羊毛裙但是里面没有衬裤，光着脚伸进高跟鞋里。

“那就是你能给我的一切吗？”

“阿曼达，如果你有什么药物方面的问题的话，我想我可以给你推荐别

的诊所。”

我钻回汽车。

“我们走。”

唐纳多在往回倒磁带。

“这是我目睹的成绩最糟糕的一次秘密行动。”

“所以我才不会赢得学院奖。我们走吧。”

“我想让你听听自己的声音。”

“不。”——我封上了公文包——“谢了。”

唐纳多仍然没有启动汽车。

“最后是他操纵着你。”

“别想。”

“他知道你不是一个病人，因为你一直在找那些麻醉药。那不是个好计划。”唐纳多的声音起伏不定。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最近我几次看到你做出些相当鲁莽的行动。我曾经看过你使劲砸你的电话——”

“唐纳多——”

“我看到过你和丢勒·卡特尔之间无意义的争斗，然后又威胁要提出诉讼，几乎使你彻底毁掉你的职业生涯，而现在，你把我拖进来之后，你却使一次秘密任务夭折了。”

“一次‘未经批准的’秘密任务。”

“甚至更糟。”

“这就是你不满的原因吧。我把你拖到这里来，现在你感到……紧张了吧。”

“我没有紧张，安娜。我只是担心你心里的稳定性。”

我很平静。我做了两个深呼吸：“就在我来之前我得知我外祖父得了癌症。我知道我不应该让它对这件案子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它还是影响了，我很抱歉。”

“他会没事的吧？”

“你知道外公的。他会战胜它。”

“好的。”

但是唐纳多仍不发动汽车。

“在你处于情绪危机的边缘时，我真的很担心你。如果过分的警惕，成天寝食不安或者没生活的乐趣的话，危机都会来。如果危机太严重，它也会让你成熟起来并出去寻找帮助。那就是哈维·麦克金斯到这里来的原因。”他说，他指的是局里为特工们所配置的神经科医生，但他已非正式地调离了。

“哈维·麦克金斯穿着一条裙子。”我回击道。他的确如此，碰到圣诞节或者葬礼他被邀请去演奏风笛的时候，他就会穿上一条苏格兰花格裙。

“我只是关心你，你都快成了个聪明的傻瓜。”他显然有些发怒，脸色都变了。“如果你再冲动下去，我将不得不通知丢勒·卡特尔对你是否有资格携带武器进行重新评定。”

“真是荒谬。”

“我不这么认为。”

“我会找出我需要知道的东西，所以，放轻松些吧。”最后他启动了引

挚，车开了出去。在回韦斯特伍德的一路上，我们俩都没有再说什么。

我感到高兴的是他并不知道那只上锁的橱柜的事。现在打开它的唯一途径是取得法庭的搜查令。

但我不需要什么法庭搜查令。我不需要往橱柜里看。我甚至不需要用磁带里面的记录来支持我的调查结论。

因为我知道，从他把他那双医生治病的手放在我的身上时我就知道，阮德尔·依贝哈特是清白的。

(十八)

我穿上海军蓝西服去见高罗威。

“我已经无法证明简娜·玛森对阮德尔·依贝哈特大夫的指控有根据。”

为了抵御下午阳光的暴晒，高罗威把百叶窗全部关着。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只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两根手指头撑着头的一侧，紧绷着脸，像是得了该死的头痛病一样。

“说下去。”

“对医生的深层背景调查结果是否定的，一次当前的调查结果证明也是否定的。”

“说下去。”

他闷闷不乐的消极状态令我有些胆怯。

“没有关于非法使用麻醉药，与墨西哥人有勾结，违法前科，或者其他病人的相同指控等方面的证据。我们现在所有的只是简娜·玛森的一个故事，而且仍然没有证实。她已经被发现在有关她自己的生活事实上有撒谎行为，这引起我们对她人格的怀疑。还有，”——我停顿了一下——“我有理由相信是她偷了你的皮带扣。”

“现在你触动了我的心事。”

“对不起。”

高罗威似乎很艰难地移动了他沉重的大脑袋，用另外两只手指撑着头的另一侧。“波士顿的那位小姐又是怎么回事？”

“她……不能证明是可靠的。”

我嘴里好像突然被注射了“罗佛卡因”一样，说话变得含糊不清。所以高罗威让我重复一遍刚才说的话，我不得不第二次说道：

“自从简娜·玛森对她的医生的指控被调查以来，”我继续道，“没有任何犯罪的证据被找到，我提议我们终止这件案子。我很抱歉，这是你不愿听到的结果。”

“没有必要如此抱歉。”

“在这件事上我已竭尽所能。”

然后是沉默。

“我来问你一些事情。”他的眼皮低垂着，就像一只正在打瞌睡的鳄鱼，“如果医生是清白的，那么玛森为什么要找他的麻烦？”

“我不知道。”

“他强暴过她？”

“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她只是……”

“疯子。”

“不。是一个女演员和一个著名的瘾君子。”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知道一个瘾君子就是一个瘾君子，这跟她是否花了五百万美元买一幅画无关；就像丹尼斯·希尔为了柯卡因，“野嘴”沃克尔为了痛醉，还有约翰·罗思在床上一样，她的存在仅仅是为了那只贪得无厌的胃。

“她需要的是支配力。”

高罗威只是自己嘟囔着。

“我正在写一份报告，但我认为你应当想知道 ASAP 的结果，因为这个……政治形势。”

过了一会儿高罗威站了起来，两只手梳理着头发，然后就不断地前后摆弄他的便裤上的腰带，就像一个老头子，因为坐久了，要把他的短衬裤放松一下。

“我会妥善处理它的。”

他似乎重新振作，摆脱了忧虑，坚定起来。

他甚至说我的工作做得不错。

我向芭芭娜详尽地叙述这次会面的始末时，她给了我一个最高分五分。她确信到这个月末，我就会得到提升，到绑架与敲诈组去。

但是一个小时后，我就接到玛格达·斯脱克曼打来的电话。

“我刚刚跟高罗威先生通过话，我感到非常地意外。为什么你要结束这件案子？”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对医生提出起诉。”

“证据不足？我们给了你时间、日期、剂量——”

“我相信你知道，要在法庭上使一件案子成立，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起诉而已。”

“一定有什么东西没搞对。”

“我是主要调查人，这件案子应当结案，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我不满意。”

“那是你的权力。”

斯脱克曼抑制住自己，没有提高音量，仍然用亨利·基辛格的私人代理的权威语气低沉地说：“我们对你相当失望，安娜。”

“我们？”

“我们相信，作为一个女人你本应当懂得更详尽的问题焦点。”

“作为一个女人，”——我变得愤怒起来，要保护我自己不受诽谤——“我认为你和你的当事人对详尽的问题焦点一无所知。”

但是她只是用那种平淡、老套的腔调来反击：

“我们一定会阻止依贝哈特大夫再这么干。简娜原想使事情保持平静和谨慎，但是情况已不允许我们再谨小慎微了。我将建议我的当事人今天就对依贝哈特大夫起诉，我向你保证，明天全世界都将知道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不会受到交叉火力的袭击，安娜。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像你这样聪明、守信的人身上。”

当我挂断电话的时候，“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正在触着玛格达·斯脱克曼的霉头。嘿，那不是我。

第二天清晨五点钟心脏的跳动声吵醒了我。我扭转身子侧躺着，脸埋在枕头里，整个身体被一种低沉的敲打声所震动，就像是通过一副立体声耳机

听到铜鼓的闷响一样。

随着玛森案件的冰结，我决定要早点下班到银行去，赶在交通高峰之前，把外公保险柜里的文件拿出来送到霍特·斯普润去。这会是漫长而沉重的一天，我不由自主地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沉痛把自己过早从睡眠中唤醒的原因，我需要及早作好准备。

但是，我现在的状态如此糟糕，唯一能做好的事件可能只有游泳了。在清晨五点半钟，我能想到的游泳地点恐怕只有圣莫尼卡学院游泳池的南加利福尼亚水上俱乐部。不管你信不信，每天的黎明之前总会有五十个人习惯性地出现在那里。你可以同他们一同竞争，或者只是按自己的方式游，也许你会感到震惊，因为在那里你能够彻底地心无旁骛。

我汗流浹背地穿好衣服，把巴罗库塔开上了华盛顿大街。天仍然很黑，气温约有五十华氏度，我心神不安地行驶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在冰冷的更衣室里换游泳衣帽时，听到几个 UCLA 学生正在叽叽喳喳地谈论些什么，对于他们而言，今天的早泳只是为他们的友谊做一次热身运动而已。他们会在一起吃早餐，然后到晚上再聚在一块儿玩保龄球。而我却是一个人，蹑手蹑脚地走进寒颤里去。灯光照耀着巨大的露天游泳池，所有的游泳者都戴着色彩鲜艳的泳帽聚在池壁边，一道明亮的彩色虹光随着水面蒸腾起来的雾气飘荡在半空之中。

然后，在十条水道里突然翻起一片手肘和脚掌的白光，剧烈搅动的池水随着教练发出的节奏音噼哩啪啦地响。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人，不用再想别的；领泳者后面有两个人，五秒钟的距离，九十秒钟的一个来回要重复六次，然后换另一种泳姿。游了一半的路途我就感到心力交瘁，不得不接受失败。等莫名其妙的恐慌平息下来，至少已用了一个小时。

我返回我的公寓，洗了个热水浴，收拾好东西准备到沙漠里去。但是，我发现留言机里已经有两条调度员发来的电讯，说 SAC 高罗威正在找我。

现在我心脏的敲打变得更加紧迫。似乎今天早上我的身体刚刚苏醒过来时就已经感觉到了，玛森的案子还没有结束。

四十分钟后我喘着气赶到高罗威的办公室时，头发仍然是湿的，眼圈周围还有潜水镜留下的压痕。他是在汽车里给我传的话，但现在自己却被交通阻塞给耽搁下了，所以我不得不瞪着窗外的天空，看着它一点点的明亮起来，等到他迈着大步进来，重重地关上门时，我已经在这儿呆了长长的二十分钟。在他嘴里狠狠地咬着一支早熄灭了的雪茄，满抱的报纸一进门就朝我扔了过来。

我笨拙地乱翻着上面的大标题：

简娜·玛森控告医生；治疗失当被传讯

“我的医生把我变成瘾君子”——简娜·玛森

“我是个受害者。”被毒品诉讼案纠缠的简娜·玛森说

简娜·玛森断言医生非法使用麻醉剂； FBI 被卷入

好一阵子我像被一记重拳打在太阳穴上，被这次突然袭击惊呆了。高罗威抓起一把椅子，推到我面前坐下，身体俯向前，我们的膝盖差点儿就撞在一起。我畏缩着缓慢退到沙发上。

“这案子公诸于众了。”

“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

“你当然是为了引起公众注意。昨天晚上十一点以后我和华盛顿通了电话。玛森的案件现在引起了高层的关注，而且马上就会像国歌一样被各种媒介传炒。”

“但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调查。”

“很明显它并没有彻底结束。”

“昨天你还认为我干得不错。”

“我说过‘很明显’。它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不错，但对他们来说就太糟了。”他冲着窗户扬扬头，暗示着那整个文明世界。

“你知道报纸上那些废话全都是胡扯。那是玛格达·斯脱克曼特意安排的。”

“你说得对。但是我必须给局长一个交待。”

“你就为了交差要重新立案？”

“我们承认你的调查很出色，但是它进行得还不够深。”

“我们能够走多远？”

“搞暗中调查。”

我脱口而出：“我们已经搞过暗中调查了。”

“什么时候？”

“你可能不记得了。”

我的食指拉下了一块皮。高罗威带着执法机构长官那种超人一等的穿透力看着我，似乎是想把一个嫌疑犯从他的真实的谎言中抓出来。

“你让我想起来吧，安娜。”

“我曾经暗中调查过，看那个医生是否会给我违禁药物。他没有，实际上，他还建议我去另一家诊所。”

“你没有批准就这样做了？”

“是的。”

“还有谁卷入了这件事？”

“没有。”我撒谎了，“我在我的挎包里放了个微型录音机。”

我知道我的脸现在就像一块红布。

高罗威恼怒地摇着他的脑袋。

“耶稣基督，安娜，这样的话我们将被指控诱捕。”

“我很抱歉。”

“你该明白，这次我是不得不在你的档案中写下一个备忘录。”

“好的。我的档案开始看起来像一只标靶了。”

高罗威瞪着我。

“如果你想要我捏造点借口出来对付医生的话，我可以做。”我找到他的眼神。

“那么你将摆脱恶劣的处境。”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高罗威站了起来：“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

他的两只手都在空中挥舞着，像是要抓住什么莫可名状的东西，然后他的手指互相插在一起，好像那东西已经飞走了。

“我明白我的错误。在纽约，你和新闻媒介是很熟悉的。也许并不是和每一个当地干这行的家伙，但是你和电视新闻部主任，和与警方相关的新闻

报道人是要有交情的——你的工作总是站在市民的反面，但是也许几个小时之后，你们就会在唐人街的某个下流场所中碰面。出了这儿可就没有认识你了，每一件事都会成为全国性的新闻，因为洛杉矶是世界性都市，每个人都会是对手，因为他们围拢到一起的时间决不会超过五分钟，所以他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去赢得一分。这相当的……”他似乎正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

“好莱坞。”

“我想要什么？”他抓起一张报纸把它揉成一根长条，“你以为所有这些狗屁都是她的宣传攻势？我想要以牙还牙。我想为调查局赢得好名声，只要有公平的标准。我想要公众都看见我们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

“那个医生也许是被骗了，”我平静地说，“也许她确实让他写了一两张处方笺，但是我正在告诉你的是，他是清白的。”

“那么就让他广庭大众之下证明他的清白吧，该死的广庭大众，我们会被它搞得精疲力尽的。”

我很抱歉，比我们能想象的更加抱歉，高罗威，虽然他有全副纽约的智慧与经验，但是现在证明，他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也不过是一个有恐惧忧虑的肉身。

我打电话给外公，是莫比·狄克接的电话。

“你在那儿做什么？”

“我开车送你外公去接受治疗。他现在已经回来了。他正在打盹。”

“哪一种治疗？”

“放射疗法。”

听着从那张啤酒嘴里冒出来的这样复杂的术语，足以让你身子端坐起来，你会以为你一定是在收看标准的电视频道，这些术语却是真正可怕的，因为它们意味着连莫比·狄克这样的粗人为了关心我的外祖父，都被迫学到了这些新词汇——关于一种严重疾病的词汇。

“告诉他我很快过去。我现在正在被一件案子纠缠着。他到底怎么样？”

“消除了一点点，但还是跟以前一样糟。你了解长官的。”

在最好的环境形势下，一次搜查和逮捕也要花上一周时间才能完成，而我却已经被害怕所控制了。除了来自高罗威那里折磨人的压力我知道我必须承受下来以外，我还得尽可能地控制外公的病情。所以我要让自己有勇气对抗官僚主义，我要能够举起比从前多二十磅的重量，喘着气，并祈求能有奇迹发生。

一面威吓一面乞求。一点点地我们积蓄起力量。在创纪录的六个小时内，我使那条标题报道被收回。它强调说，那栋第十五街改建的维多利亚建筑属于达那矫正诊所，其实是一家股份公司，而阮德尔·依贝哈特是其委员会的主席。我亲自到位于洛杉矶大街的联邦大楼去，同检察官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手里攥着一纸要求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签署一份授权令和搜查令的文书离开，这使我能够直接进入阮德尔·依贝哈特大夫的办公室，明显地是为了联邦政府的利益，而搜取需要的证据。

二十四小时以后，六名强壮的联邦执法员穿着明亮的桔红色的作战马甲在医生的办公室出现，好像它现在已是东洛杉矶最出名的房子了。伴随而来的是一大群报道员、摄影师和手拿小型照相机从本地或全国各地新闻机构赶来的记者，他们显然得到了我们的新闻联络部有意透露出去的消息。

我要求把这一切都录在录相磁带上。在他的护士告诉他有某些不愉快的

事情将要发生后，我被领到了被告，刚刚来到接待室的阮德尔·依贝哈特面前。

“早上好。我是 FBI 特别行动处的安娜·格蕾。我们有没收你的办公室的授权令。”

医生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

“我不认识你吗？我是否曾经见过你，作为一个病人？”

“有可能。我可以进去吗？”

“不，你不能进去。”

“我有授权令，先生。”

“那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这些办公室里的所有东西现在都是美国政府的财产。”

搜查和逮捕通常就是那些坏家伙们的终点线了，因为意味着你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可以对他们提请起诉了。他们不喜欢它还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拿走他们的玩物，虽然这些东西他们通常也是从别人那里夺来的。他们会咆哮会怒吼会抗拒，甚至会拔出枪来，有的则试图跳逃，或垮掉或哭闹，但是你一定很少看到一个目标像这天早晨的依贝哈特大夫这样，始终保持着他的高贵举止。

“这就是在新闻报道中简娜·玛森对我的那些蛮横指控的结果吗？”

“我不能讨论一件正在进行的调查案。”

“我想知道，”他平静地说，“只是我自己对这起荒唐事件的个人感受。”

“也许你应该打电话找你的律师。”

“也许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被卷入新闻媒介圈的中心过。”他拿起电话，但是还没有拨号就又压下，因为这时他看见执法员正要冲进诊察室里。

“等一会儿，我有病人要回来。”

但是我已经抢在了他的前面，就像是一位正带领士兵们发起冲锋的指挥官。依贝哈特大夫出于自重给我让出了门廊，他也总算认识到了，这些面目各异的暴徒真的是要侵占他的世界了，医学的世界，就像纳粹暴徒冲进波兰伟大的图书馆一样，并把它们烧成白地，一千年的理性化为灰烬。当依贝哈特大夫开始懂得理智并不能保护他和他的领地的时候，恐惧便上升了；他的一生花在了研究骨头的精致逻辑上，但是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愚蠢的行为就足以将它完全抹去。

“在后面有一个上锁的橱柜。”我说。

我们所有的人都进了观察室，在这里，我曾经伪装成一个病人，现在它被联邦执法人员塞满了，依贝哈特穿着白色的医褂，还有两个惊慌失措的护士。

“可以把钥匙给我们吗？”

他点点头，一个护士上前来把钥匙递给我，屋子里的空气闭塞闷热，让人难以呼吸，我向那把锁走去，它就像是我自己的一出戏剧外面的旁观者，我希望待会儿我被证明是错的，虽然这样我便失去了在调查局里的所有的信任，而简娜·玛森将被宣称为胜者，在那些搁板上将塞满了麻醉剂——并不是因为我想看到依贝哈特受罪，但是至少所有这些东西的毁灭将是为了一个原因。

“为什么你要将这个橱柜上锁呢，先生？”

“我经常要给一些脊椎有病的孩子治疗，”阮德尔·依贝哈特舔着嘴唇，

好像它们突然间变得干燥起来，“你知道，淘气的孩子对什么东西都是感兴趣的。”

橱门被拉开的时候，屋子里的沉默让人有种紧张不安的预感。但是在橱柜里面，竟全是收集的小玩具熊。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我的。过去我都把它们摆放出来，但后来它们就开始逐渐减少了。我担心一些孩子会感到伤心，因为当他下一次再来到这里时自己特别爱的熊不在了。”

在众人面前，我必须对这些玩具作一番检查，要足够的严肃，好像我真能从里边发现什么证物一样。但独自在心里却悄悄在想，我应该在门上一头撞死算了。一定有上百种小巧精致的形象，它们是由各种你想象得到的材料制成——瓷土、印花布、金属、丝绒，甚至还有用粉红色的棉球自己做的玻璃眼睛会动的玩具熊。

我用手电筒照了照橱柜内部，看看是否能发现暗格，似乎我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这里的局势。然后我站起来：“我们开始吧。”

当执法员们捆扎起医学设备和医疗记录扔进纸板箱里时，依贝哈特大夫挤出人群朝门厅走去，那边正传来“砰砰”的敲击声。

他打开前门，吃惊地发现一名锁匠正在准备换门锁，另一个家伙则在往门上钉告示牌，上面写着：“国家执法财产。”然后，突然地，在他面前出现了一片照相机的海洋，提问一股脑的迸发出来，都是些关于简娜·玛森的控诉，从这些办公室里配发出去的违禁物，还有惊人的事情是何时发生的等等。

他被弄得晕头转向，脸色铁青。

“我真的没有这样做过。”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了，睁得更大。

我满怀同情地抓住他的胳膊，护着他离开，我记起他曾经也把这样一只怜悯的手放在我的身上。我把他领到接待室安静的角落里，他颓然倒在桃红和灰白相间的长椅上，带着被深深地污辱过后的游离的神情，这时要逃脱羞辱和折磨的唯一途径就是把身体和心灵都封闭起来。还有一种悲观绝望的神情，那是我在被强暴过后的女人脸上曾经看到的。

第四部 四条路

(十九)

维尔希尔的国民保障银行，外公还是个年轻的圣莫尼卡警官时曾在那儿开过一个户头，现在叫作加利福尼亚实玛鲁银行。从 60 年代以来，它一定已几经改头换面了，但是所有这些改变，从里到外，都并没有给那个米色砖头搭起的盒子增添什么新的内容。

可以想象，这个保管库跟外公第一次把他的重要文件存到这里时是完全一样的。即使在改建时你也不能把保管库移去。我敢打赌，过去三十年来的每一天里，时间总是“咔嗒”一声闹在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保管员转着轮盘，一边叽咕，用两只手把门拉开，门半开着，人们都会对那扇六吋厚沉重铁门感到惊奇。它现在仍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同陵墓般的建构方式一样让人难忘；你知道那种方式的，厚重的花岗石条无比精密的砌在一起，在里面，一切都从来不会有所改变。

一个背着马尾辫，戴着长长的水晶耳环，沉静忧郁的黑人妇女察看了我的签名后才打开一扇内门。显得笨拙的门口镶嵌着黄铜和铬合金的方格图案，我们从中穿过走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排着装着合页、擦得锃亮的柜门。我把钥匙交给她。一只钉着铁掌的蓝色鞋子踩在一张踏凳上，一只手伸上去打开了 638 号保险盒。在她身后是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紧急通风设备”和一行说明。她从踏凳上跨下来，拿着一个长方形盒子，把我领到一间更小的密室里，里面有张桌子，门我可以关住。然后她就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死寂的空气里。

我因为一种恐惧和沉痛的感觉而几乎呆滞了，费了很大的劲才迫使自己把那个狭长的金属盖子掀开。

我希望除了一张遗嘱，再不要有什么躺在这冰凉的空盒子里，但实际上，里面却塞满了各类家庭资料，就像是一个人随意从餐具柜里往外拖曳出来的东西一样。

这堆东西的最上层，是一张泛黄的剪报，1962 年 9 月 12 日的《圣莫尼卡晚报》，大字标题写着“‘最自私的贼’忏悔了”。文章讲了一个瘫痪的棒球迷的故事，他由朋友带到“逃避者”体育场去看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他把他的轮椅放在了体育场顶端的通道上，后来轮椅就失踪了。在经过广泛的宣传之后，没过几天，它就出现在圣莫尼卡警察局附近的地方，还附带了如下的说明：

我是偷了你的轮椅的那群自私的贼中最自私的一个，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此作一个说明，是的，我们这样做原来是想开个玩笑，但是我确实以为这张椅子是沃尔特·奥曼尼的，放在那儿防止紧急情况出现。我现在意识到我们的做法除了满足我们最低劣的幽默感之外，什么意义都没有。

我希望有可能的话，在你的内心能最终原谅我。我想我会从这次损人不利己的“玩笑”中接受教训。我真的不是那种好挖苦人的人，我真的希望你和上帝都会原谅我这次的胡闹。对不起。

在文章的旁边另有一幅照片：外公的一只手搭在那架失而复得的轮椅

上。剃了平头、穿着黑制服的外公看上去很年轻，朝气蓬勃。你能看得见别在皮带上的警棍和“史密斯 & 文森 38”的轮廓，解说词写道：

“残疾人的轮椅”，主人在观看上周“逃避者”对“巨灵种”的比赛时被盗，圣莫尼卡巡警伊文内特·摩尔根·格蕾发现了它，一家出租商行此前已向主人提供了一架新轮椅。

那是一个民风多么纯朴动人的年代啊！这时，圣莫尼卡还只是一个未被开发的熟睡中的海滨小镇，小偷们尚有忏悔意识，很多人会认为，如果你的照片能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甚至值得珍藏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在我外祖父的辉煌时刻下面，我发现几枚银元，上面已有了锡斑，显得很破旧，还有被拥成一卷的印有肯尼迪头像的五十美分纸币，却是新崭崭的。里面还有一套 1960 年起的存款债券，每张面值是 100 美元，是给我留下的。一张棕黄色的照片，白色的毛边，是我母亲小时候的，被她的父母亲搂着。再有，就是外祖父的最后遗嘱和证明书，指名我作为他的财产受益人，连同他的出生证明文件，我外祖父的出生证明和社会保障卡，保险单，1955 年的；一个小笔记本，上面用浮雕凸文印着“你孩子的病历”，里面只有一个我童年时的免疫记录，是我母亲亲手写的；一个便笺簿上记载的是 1967 年家庭开销的分类账，另外，在一个信封里，是我外祖母的结婚戒指和一枚琥珀石胸针。散落在盒子里的还有一枚镶在一朵搪瓷三色堇上的金心，一些服饰和一串在母亲十六岁生日时给她的珍珠细链。

我一件件地触摸这些东西，好一阵子母亲似乎又来到了我的身边，她亲手缝制的棉布围裙，有几次得到允许可以把我的头靠在上面，溅满了黄油和油脂的污渍，母亲戴着它为我们做过几百餐饭，洗过上千次衣——它好像还在散发着那令人宽慰的气息。我突然记起，她的尼龙长袜，曾闻起来有股丹宁和秋天树叶的香气，晾在镶有橙红色和黑色瓷砖的浴室的毛巾架上。在前卧室她的梳妆台上，她总是把她的戒指耳环放在一个玻璃烟灰缸里。我的上帝，她用“查耐尔五号”家具擦光剂，撒满了绿胡椒的夹肉面包。她穿着羊毛裙，上身是胸前坠着小圆纽扣的白色半透明的罩衫，打着拘谨的褶边，当她为布拉迪大夫作接待员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但是在它的下边，你看见的却是包裹严谨的背带衬衣。那些都是短袖罩衫，暴露了她的上臂白皙、肉感的内侧。这些，在这间闭塞的密室里，逐一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带着愚蠢的冲动。

她每周要工作到周六的中午，经常她和我会乘坐“大西洋干道快车”，沿途经过在童年人看来还充满了神秘色彩的站台，从长滩殡仪馆穿街过巷到一栋一层楼的牙科楼，然后我便会在一个窄小的后屋——厨房兼实验室里呆上三个小时，一面等着她在一台 IBM 上敲打，应答电话，一面读超人连环画，还可以翻出藏在办公室文件堆里的图画书《儿童的乐园——“益智游戏”》。母亲冷藏了许多小听装的“穆特”苹果汁，但我爱吃我的美国乳酪三明治和用麦杆吮吸雪泥，没事儿就翻看那些染满灰尘的教科书上的畸形牙床的特写照片。这地方到处飘着乙醚的味道。

这边结束之后，我们便回到公共汽车上，接着坐往商业区，她先要到电气公司办公室付清旧账，然后是到“布封和希尔斯”进行一长串冗长乏味的

采购：配钥匙，买浴帘和铝锅，几乎每一个小买卖母亲都要询问我的意见，因为她自己从来就是心不在焉。最糟糕的是在“勒内”，当她在那儿闲荡和痛苦挣扎的时候，我却在衣服挂架底下度过了最恼人的几个小时。

如果我们能在“伍尔维什”或者“科内斯”结束那就是我的幸运了。在这儿我想得起来的的就是那张扁平的木桌子了，上面摆满了吸引我的便宜的海滩纪念品，像塑料皮夹子，上面贴着棕榈树的彩色画片；还有海贝壳制作的立像，但是，最让我渴望得到的——而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是那枚“圣·克里斯托弗”纪念章，但它被人们保存在一个上了锁的玻璃匣子里，因为在南加利福尼亚，每个小孩都想得到这样一枚纪念章。

我突然有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坐在伍尔维什的午餐柜台旁，我一勺勺地舀着苏打冰淇淋，母亲在旁边要的是肉桂寿司和咖啡，彼此分享着一种罪恶的快乐，因为现在离晚餐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我的母亲极少纵容我和她自己，也许是因为这种方式将意味着偷窃外公的东西。但是在那些星期六的下午的确提供了一次放纵的机会——我单独和她在一起，远离了我的外祖父，对于这点，我现在才意识到，原来是我们那时觉得如此沉闷，惊恐然而快乐的隐密的原因。

因为在公共汽车路线的另一个终点，拎着沉重的购物袋，要经过一座石油钻塔，它位于住区中央，用蕃篱隔开，油泵一天到晚都在响，然后我们就照例回到了松树街那幢独眼红砖屋。当然我是以一个小孩的眼光来看待它的，因为一株枇杷树掩藏了两个前窗其中的一个，而另一个窗户看起来就像是透过百叶窗，带着怨恨往外瞪视的人的一只眼睛。

外公买房子的时候它还是新的，是这条街唯一一栋砖房。四处紧闭，关起门来完全就像一座地堡，连一块绿草坪也刈除光了，以保持一致性，除了一根柱子上挂着的黑色邮箱，再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六十年代的新鲜事物之一就是有明亮的黄色装饰的全电气的厨房，时间观念也渗透到了餐桌灶头，当然那特别涉及到外公的时间：“问问你外公他晚餐想吃什么……”“外公准备好了我们就开饭……”在那本便笺簿里的家庭分类账上我发现，我们占用了我外祖父简朴的家中的两个房间，为此我母亲每个月要支付 54.67 美元的房租。

现在我想念她。我想要那双布满雀斑的手臂抱抱我，我想要我们之间的融合，它不仅被她的死，也被我幼年时期神秘的观感所打破；我想要它重新修复。但是怎么能够？她没有走近我，相反，我感到她留下的印象又一次晦暗下去，总是被外公所遮蔽。

在她的阴影下的生活怎么能跟到位于百老汇那幢醒目的蓝色玻璃大厦里的警察总部作一次骇人的、刺激的访问相比呢？外公会带着我到繁忙的警局中转圈，这里的每个人都夸我聪明伶俐，然后，如果没有囚犯的话，我们还会到真正的监狱里去，这里有一个可怕的铁铸的厕所，在外面等他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弟兄们出来了，钻进了他们的警备车，我就一个个地大声叫出他们的名字，我经常用手指去触摸门厅里那枚巨大的铜制警徽，还有一座浅浮雕，一个警察保护着一个男孩和女孩，“永志不忘”——长滩警官协会，让我产生一种前青春期孩子的性激动。

外公带着我去见世面。母亲就呆在家里。外公带着我到海岸线上去，在激浪中挣扎洗礼，摔倒了就威吓我站起来再上去，我也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我扑倒在海浪中了——她在哪儿？胆怯的、消极的、惊惧的、自贱的，直到

那一堆 90 磅的尸体瘫软在我的眼前，那最后的时刻，她的皮肤完全成了绿颜色，她根本就没有力气从医院的病床上爬起来，她侧身躺着，却没有面向我，她的手臂竭力想从她早已失去生命力的髋部曲线上抬起来，一个微弱的声音，我的名字，在我的手指与她干枯的手指缠绕在一起时从喉咙里发了出来，我十四岁。

她仍然没有彻底离开，仍然……也许我真的对她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我现在捧在手里的这些文献，有谁还会像我们这样保存起来的？那不仅仅是为了在某一天她的女儿能够找到它，否则为什么要把一张普通的生日卡装到一个信封里，藏在保险盒的最深处？这是她的结婚证书，盖着拉斯维加斯市的图章，1964 年 8 月 3 日，它宣布在这一天，米桂·桑切斯和格温·格蕾，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正式成为夫妻。

我盯着它，只有一个愿望：那个留着马尾辫的黑女人，钉着铁掌的蓝色鞋子踏在米色的毡毯上，她把那铁门关上，把那巨大的黄铜轮盘牢牢旋紧，把我关进它现在我已深有体会的、黑暗的、窒息的地窖中，让秘密都埋葬在这里吧，这样，一切都将不会改变，永远。

外公没有来应门，我只好用我的钥匙。他正坐在阳台外，面对着黄昏的暮日，身后的动静好像都听不见，他看上去和平日一样。他穿着通常的那条棕褐衣便裤和露出脖梗的黄色马球衫，光的脚颠转了左右方向，交叉着摆在一张塑料矮几上，他宽厚结实、爬满皱纹的手——因为年纪的关系，变得潮红，茸毛耸立——按在胸口，下巴上抬，喷着鼻息。

但是，另一个古老的温和告诫阻止了我把他唤醒：“老爷爷需要休息。”我回到房间，着手收拾起咖啡杯、玻璃杯放到厨房里去。在水池底的棕色胶垫上，放着一些发黄的酥酪，旁边是那根一头缠着棉纱的木头洗碟棍，是外公用了好几年的。我能看见那双沾满油腻的手把咸猪肉和炒鸡蛋盛到绿色的三聚酰胺盘子里，伸出、缩回就像长滩上几乎冲跨我的海浪一样有力。我把杯子放在橱柜上的时候它们发出叮当的碰撞声，然后我便回到了落日底下。

“外公。我来了。醒一醒。”

他睁开眼睛，笑了：“时间的婢女。”

我没有笑：“为什么你这么说的呢？”

“你才驯服了那个骚扰简娜·玛森的卑劣的医生吧。”

“差不多。”

“见鬼，新闻里全讲了。我刚刚才在这里得知。”

他把脚从矮几上放下来，站了起来，我镇静地注视着他。

我跟着他，我们穿过滑动玻璃门走进凉爽阴暗的起居室。太阳光斑仍然在我的视野里飘动。他从电视机顶上拿下一叠报刊杂志。

“你成了名人。”

但是在他平板的音调里好像并没有祝贺我的意思。他捉住了我的眼睛，才把报纸递给我。在他挺直的鼻子和扑满风霜的脸颊构成的慷慨大气的面具底下，是一张带着嫉妒的不高兴的孩子气的脸。

当然我在任何方面都不接近于一个名人的标准。在外公从《洛杉矶时代》、《今日美国》和帕尔姆·斯普润当地的破报纸上收集的文章里，我个人从未被提到过。凡涉及 FBI 的地方都转弯抹角，重头戏当然是这起价值百万的医疗官司，由“电影王后”简娜·玛森和她兴风作浪的“超级私人经纪人”玛格达·斯脱克曼对“玩弄明星的矫形医生”的起诉。所有的传媒都使

用了一幅大图解，上面是两个对立的人形，玛森在一边，依贝哈特在一边。她看起来那么漂亮，那么脆弱，而他则弓着腰，充满了罪恶。

“你平常可没对我的案子显示出这么大的兴趣。”

“这一次不同，那是我的姑娘，简娜。这个医生真该被吊死。我给你拿点什么？”

“水。”

“好主意，今天太干燥了。”

他走进厨房里，我一直站着。当他拿着两个玻璃杯返回来的时候，我把刚刚扔在咖啡桌上的马尼拉信封递给他。

“我从保险盒里拿到了这些文件。”

“你不用亲自跑这一趟。美国邮政现在早已绰绰有余了。”

他今天是不是故意想和我唱对台戏？既没有感谢我的劳苦，又不承认我的成绩。或者只不过是这些年来对我难以捉摸地贬低和操纵的一贯态度的延续？我能够感到喉咙管里像有什么植物卷须缠绕在那里一样，威胁着要掐死我。我不得不伸出手去，把它们强制扯开，以便能够呼吸。

“我到这儿来只是为了表示我关心你，外公。”我故意带着些愤怒的挖苦的腔调，但他似乎没有听出来。

“我很好。”

“是吗？”

“哎，放射线让我昏昏欲睡，化学疗法更是苦痛不堪，不过事已至此好歹我们总得对付过去。”

“确切地诊断结果是什么？”

“他们叫它淋巴瘤。”

“你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我最好能和他或者她谈一谈。”

“没有这个必要。”

“你总不能一个人来应付整个事情。”

“我在医院里有朋友，还有好些女士想来探望我哩。”

“不要和我闹别扭了，外公。”我的手指探进了起居室里把我们俩分隔开的那段空间，“我只需要知道你的医生的名字。”

“行。”

胜了这个回合，我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气。我依然站着。他坐在沙发里翘着腿，而他的眼睛却不知道盯在哪里，眼神惨淡，内向，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我在一把扶手椅子上坐下来，但是椅子陷得太深，我的脚难以踏实地踩在地板上，而且离外公又太远，不能让他朝我这边看上一眼。我想把它拖近点，但是椅子腿却又被小地毯上的粗长绒纠缠住了。

就像是一个跳台边上的跳水者，我在那儿僵持了好久。作为一个小孩，我会探出手去试一试，看看水面到底离我有多远。有一次，一群野小子站在我身后开始喝倒彩，因为我既不敢跳下去又不能转回身，后来一个救生员走了出来，把我夹在胳膊底下，然后把我扔进水池里就像扔一块板石一样。她现在在这里，那个肌肉发达、强健的自我最终会取代那个颤抖恐惧的自我。

“我翻那只保险盒的时候找到了一些东西，有一些珠宝我留下了。还有我父亲和妈妈的结婚证书。你从来没跟我讲过他们结婚了。”

“谁结婚了？”

“米桂·桑切斯和格温·格蕾。这些名字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

“你指什么？”

“两个半小时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从洛杉矶开车出来我有许多时间在脑袋里一遍、一遍又一遍地琢磨它。然后我逐渐得出了结论，那就是，你和妈妈一直在对我撒谎，关于我的父亲，关于我的血统，关于我是谁，关于我的整个生命到底从哪里开始。”

话的末尾，我的声音却辜负了我的勇气，变得微弱起来。

“我告诉过你忘了那个婊子养的。”外公厉声说。在切过房间的三角形阴影里，他的眼睛看起来阴沉可怕。“他抛弃了你和你的母亲，为什么你的脑袋里不能琢磨一下这点？”

“很明显他并没有抛弃我们，因为他们是一起逃走的，然后结了婚。也许你并不了解整个事情？”

外公更加严厉地说：“我了解。”

“为什么在我出生以后他们又等了四年？”

现在我们面面相对了。外公非常警惕，像一条蛇一样冷静。

“让我来做一次随意的猜测吧。”我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挤在我的胸口，好像使整个身体都痛疼起来。“你威胁过我的父亲，你对他抱着疯狂的偏见，直到最终你把他赶走。”

“是我把你养大的！”外公咆哮了，想逼我退缩，“你见鬼去吧。”

但是我用更坚定的声音又说了一遍，足以敌过他的愤怒：“我的父亲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你赶他走。”

“他是个强奸了我女儿的下流胚，然后这家伙”——他停顿了一下，摇了摇头。几乎冷笑出来——“他又来找她，一次又一次……有他妈的五年。然后他违背我的意愿娶了她，这是给我的他妈的最后一击。”

“也许，”我试探着说，“他真他妈是爱她的。”

“你要注意你的语气，否则看我不给你一耳光。”

“或者也许……是她他妈的爱他。”

我们互相瞪视着，我不会道歉，我也不会后退。

“让我们现在就把事情弄清楚吧，外公，因为太阳已经落山了。谁是米桂·桑切斯？”

瞪着眼，沉默。

“他是从萨尔瓦多来的？”

“据说而已。”

“所以他不是墨西哥人。”

“那有什么区别？”

“1958年，米桂·桑切斯和格温·格蕾是怎样遇上的呢？”

“她有那么愚蠢，在蒙塔娜的帕顿药房的时候，被他的几句甜言蜜语就骗到手了。”

“一个打工仔到蒙塔娜大街的药店里去做什么呢？买擦手霜？”

“他的行当在格温眼里，就成了学管理的学生。他在高等学校里读夜班。”

“所以现在他就不再是——一名海外劳工了，他是个哲学博士。”

“抚养你长大的只有我。”他的拳头擂在沙发的扶手垫上，又反弹起来。

“你从我父母身边偷走了我。”

“你生什么毛病了你？是不是吃了迷幻药？”

我带着憎恶站了起来。

“你母亲是个幼稚糊涂的女孩，而你的父亲是人类的渣滓，你得想想，我只不过是想要一个干净的小婴孩在屋里——”

“别说了。”

“但是事实证明你更加黑白不分。”

“所以你只是养了个野种。”

“这是你外祖母的想法，但她也死了。现在我们俩在相依为命。你认为你母亲应该自己安排她自己的命运？”

“她应该跟我父亲走，过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会有我的父母亲。”

“你需要的一切是我。”

我只能怀疑地盯着他看。

“你和你母亲一样的幼稚，”他突然爆发了，“我不能不赶他走。他会毁掉你的生活。”

“所以你就强迫他离开，直到确信他再也不会回来。”

“那不是我力所能及的，这个愚蠢的婊子养的自己害死了自己。”

我沉闷了：“他怎么死的？”

“我告诉过你他是个海外劳工，有一次他和工头顶嘴，做得太过份，便打起来了，然后那个垃圾货打倒了他。就这么回事儿！”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你母亲的精神全垮了。”他用一种生硬的声音继续道，“她绝不想让你知道。她就是看不到他的另一面，他是个鲁莽傲慢的杂种。”

“他葬在哪里？”

外公满脸的不快：“谁知道。可能是在哪块蚕豆地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会按照军人葬礼的仪式送他回家。”

“为什么你现在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病了，而且对谴责已感到厌倦。”

一阵战栗传遍我的全身，然后在身体里，好像有某种东西调整过来了，就像是一个几十年来一直运转失常的接口，现在微妙地移回了它该在的地方。我意识到，我一直知道我的父亲已经死了，并且以为他是死在暴力之下，我曾想象过，他怎样俯身倒在血泊中——我梦见过他好几次——所以一定有人告诉过我或者我一定在无意中听到过。

“没有人在谴责你。”

“胡扯。”

“算了。”我柔声地说，试图调和一下气氛，“告诉我你的医生的姓名吧。”

“就在床旁边，但是，那有什么重要呢？”

他拿起一本杂志，躺倒在沙发里，阴影像一把铡刀一样切过他的身体。他放了一个枕头在颈子后面，支撑起他的头，落日的余晖，梦魇降临前琥珀色的光线，落入他衰竭的蓝眼睛里，这双眼睛现在带着毫无保留的恨意，从书页的上方越过，盯在我的身上。

我无处逃遁，所以走进了卧室，棕色的窗帘布被拉歪了，盖在床上的栗色床罩绷得紧紧的。床头几上放着几个新药瓶，一个鞋拔，钥匙串和一张写着帕尔姆·斯普润的一位肿瘤病医生的姓名、地址的单子，当我把它拾起来

的时候，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外祖父不想要我去和这位大夫谈。它意味着承认这位著名的、全能的、强壮有力的伊文内特·摩尔根·格蕾，警官，孩子们的救星，大规模比赛的保护人，面临着死亡。

在“诊断”下边医生写着：“恶性B细胞淋巴瘤”。特别行动处的查尔斯·冈萨雷斯，白领犯罪组的一个好人，被诊断出同样的病。当我躺在阮德尔·依贝哈特双手的抚摸之下时，一个愿望曾经从我的潜意识跳出来，现在，我不能不承认并且面对这个罪恶的愿望变成现实：外公将会在一年内死去。

(二十)

自从忙上玛森的案子之后，我就没有和银行劫案组的那帮家伙接触过。一直徘徊在无人地带等着我的提升，现在，我需要找个人聊聊，但是，周围竟然没有人。我失魂落魄地在“牛棚”里漫游，在他们每个人空荡荡的办公桌前逗留一会儿，直到我意识到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那么他们一定聚在一起吃他们的家常午餐，我到自动售货机旁，清洗出了里面所有的香子兰奶油三明治，想要有所贡献，但是，在午餐室里同样也没有人。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到哪家饭馆里去了，接着我注意到有一帮人挤满了小会议室，而灯却关着。

透过百叶窗我朝里瞟了几眼，我看见他们全在里边，凯乐、弗兰克、芭芭娜、罗莎琳、唐纳多……还有丢勒，正围着桌子坐成一圈，在纸盘子里堆满了好吃的东西。但是，没有玩笑和活泼的交谈，相反，他们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电视机，里面一盘录像带正在播放安娜·格蕾大步迈上大达那矫正诊所阶梯的情景，后面跟着半打穿着桔红色作战马甲的联邦执法员。我曾经把一家电视台给我的逮捕依贝哈特的一盒录像带借给芭芭娜，但是从未希望过她拿到这里来作下午的公开放映。

我打开了门的时候，他们似乎很惊讶看到我本人。

“作点记录呵，伙计们，看看它就是这样完成的。”

我放下了满抱的香子兰奶油甜饼，然后坐到芭芭娜旁边，从她盘子里挑出一颗草莓来。

“来点吧。”罗莎琳推过来一份。

“我自己就行。”

“我想你不会在意。”芭芭娜指的是磁带。

“当然不。我只是希望你收点入场费。”

我们注意到了阮德尔·依贝哈特心神错乱的脸部特写，那时我正越过他准备冲进检查室去，镜头一直跟着我们到门廊，你可以想象，我的伙伴们一定会为此欢呼的，就像我刚刚办完加利福尼亚第一银行那件劫案的早晨，他们的欢呼那样，然而，现在在视听室里却只有种令人不舒服的紧张气氛，我想，也许当一个人就要离开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就要失去她时，都会是这样。

“这会对你大有帮助的，安娜。你看上去就像一个头儿。”芭芭娜大约看出了我的神情。

“是不是像要发狂的样子？”我转向唐纳多的那方向，但他躲在阴影里啜咖啡。他的沉默让我不安宁，好像自从那顿午餐，他戏谑地把我叫作“戴着黑色‘花边’的安妮·奥克雷”以来，时间已过去了很久。

“不，”芭芭娜说，“你看上去能够控制任何紧张的局面。”

“请原谅，”丢勒咂咂嘴说，“但是，这又不是什么诺曼底登陆，他们不过是闯进一个医生的办公室而已，他能做什么，用他的 X 光机把他们杀死？”

弗兰克和凯乐敷衍地哄笑了一阵。

“新闻媒介都在那里，是高罗威使她成为焦点人物的，”芭芭娜干脆地回应说，“这才意味深长。”

“为什么这么说？”

“人们都围在这儿，最后认识到女人也能干这项工作。”

另一个沉默，没有人想对这点提出疑议。

“可丢勒认为这是一桩蹩脚的案子。”我解释说。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案件，”丢勒说，“高罗威和局座之间本来就在你推我让。”

“你是妒嫉。”芭芭娜相当愉快地表示，手指一面在玩弄项上的珍珠。

“那么就向我证实那是一起案件吧。从搜查和逮捕中重新获得了什么证据？”

尽管我很乐意看到丢勒恼羞成怒的样子，但我不得不向每个人承认我们在办公室里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可以使医生牵连进去的东西，事实上，地区助理检察官已经趋向于认定，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可控告他。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又一场可怜的狗咬狗的戏。”

“在今日这个被新闻事件和图片资料统治的世界里，每件东西都只不过是拿来作秀的，”凯乐缓缓地，有条理地说，“为了六点钟的新闻节目，安娜只是做了她被要求做的事。这是一个脏活儿，但是总得有人去做。”

带子已经放完了。罗莎琳站起来拉亮了灯。

丢勒·卡特尔伸长了他骨瘦如柴的细腿，靠在椅背上，把椅子翘了起来。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吓得屁滚尿流。案子还没有完，你毕竟对案情已有所了解——”

幸运的是我早已有准备。我一直在想玛森那天走出我们办公室和那个吃晚餐的晚上她的举止行动。扩张的瞳孔，颤抖的双手，不调和的能量，当她从休息室里返回来时，这一切都深深刻在我的印象中。

“我们知道玛森是个支配狂，”我尖厉地打断道，尽量不去看他两腿分叉处具有侵略性的展示。“对她的那一伙人，我全都进行过犯罪检查。她多次吸毒，而且她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弄到它们的。”

丢勒猛地向前把椅子放倒，椅子的前腿“咄”的一声敲在地上：“你能得到什么？他们拉开对你的束缚只不过是为了逗那个漂亮小姐开心。”

“是为了让她的经纪人开心。”唐纳多一脸洞察一切的表情看着我，似乎在说“我几周前就警告过你，可是你偏偏要一意孤行”。“她在高层有朋友。”

这好像倒是让丢勒很开心：“一周之内你就会再次面对你的劫案，那时候，我可能不会等到欢迎你归来了。”

他趾高气扬地踱步出去。凯乐摇了摇头。

所有我能做的便是用我的脚趾悄悄地向他那把空椅踢了一脚。

“我现在是大姐大。”

唐纳多把黑瓷碗和一把黑色色拉钳子收进一只购物袋里。

“那么别松劲。”他对我说，带着同样的个人兴趣，就好像是这家伙在

拖洗厕所地板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

我跟着他出去。他把袋子往他办公桌底下胡乱一塞，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好像对发现我站在他面前高高立着相当不高兴。

“罗谢尔在法律学校干得怎么样？”

“她爱这行。”

“可是？”

“这只是一个调节。”

“听起来好像不止如此。”

他不耐烦地叹了口气：“这会让每个人都感到难堪，是吧？突然她就不在孩子们身边了——我本来应该全力投入新的角色，做一个超级爹地的，但是每天晚上到八点钟我才能回家，我在那里又能做什么？”

“那么谁做的这些色拉？”我嘲笑道。

“我做的，要多糟就有多糟。”他开始在桌子上旋着一把银质裁纸刀玩，“法律学校对她很合适。她很早以前就该完成它的。”

跟着，他的食指弹一下，那把刀子旋出一片星光。

我犹豫着。

“我知道丢勒可能是对的。玛森的案子恐怕会崩溃，然后我将会回来和你并肩战斗，重新带给你艰难的日子，你能经受住吗？”

他只花了几毫秒的时间来决定说什么，于是我所有希望便全落空了。

“现在他们让我和乔·波西塔鲁搭档。”

“谁是乔·波西塔鲁？”

“从亚特兰大调来的新手，他本来该来吃午饭的，但是他没能拿到他的加利福尼亚驾驶执照，可怜的婊子养的白痴。”

“那该能改变。”

“什么能？”

“乔·波西塔鲁。如果我回来了。”

然后，又是该死的沉默。

“谁知道呢？”唐纳多空洞地说，伸手去够挎在肩上的手枪皮套，一面打开锁着的办公桌抽屉，把他的武器拖出来。我的感觉极坏。

“是不是因为那次秘密行动你仍然在埋怨我？”

唐纳多在他的手枪皮套外边又穿上了一件运动夹克。

出其不意地说：“不。”然后，他变得温和起来：“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干？”

我看着他的脸好半天。

“去退还我的加湿器。”

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简洁地向我说了句再见，我们就分手了。

我坐在“世纪城购物中心”里的一条长椅上，吃完了一颗从“塞氏糖果店”里买来的黄油松脆花生薄片糖，在过去，放学之后我经常这样偷偷摸摸地款待自己一回。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更加让我感到消沉。除了我脚下这个新的加湿器，装在一个平滑有光泽的盒子里，用细绳捆着，这样，在圣安娜的那些早晨，哪怕湿度为零，我也不再会因为喉咙的干痛而惊醒了。

一点点小安慰。

我和外公医生的交谈是凄惨的。我们只能看着他这几个月来与日俱增的虚弱和痛疼。他说我哪怕是花上一天时间尝试一下就会明白，处在这种景况

里不是人的精神所能忍受的。然而，我总是无法把精力集中在这上边，我听到了我父亲那里传来了异常的悲鸣声，他离我的耳朵这样近，以至于我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那就像是墓穴里水的汨汨声。

我想念我的组，我想念唐纳多，我们清白的惬意的调情已经结束了，和别的家伙在一起永远也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一切开始于那天我独自对付那个银行抢匪之时，在我着手依贝哈特的案子之后它就变得更糟，我就像是一只被人放出来追查兽迹的愚蠢的灵■，我得到这些是不是因为我包藏的野心？当每一个人都离开了猎场，我却仍在撕咬一只假兔子。

麻木地回到办公室，我拿起我的包漫无目的地到商店里去闲逛，呼吸明亮的午后的空气，寄希望于想起点儿什么值得买的东西，能够让我感觉好点儿，但是，所有跟着我去的只有一个空空的屁股包。

我估计在布洛克斯也许会有点新玩艺儿，所以我推开玻璃门，拖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走过化妆品部，腻人的香粉气味令我窒息，又被光亮可鉴的厅柱上反射出的各处银色、金色的光滑物面搞得晕头转向，这是一个地狱，人的心脏都被简娜·玛森掏去了。

不是真正的简娜·玛森，只是一幅真人大小的卡纸板剪影，跟我在马里布她的巢穴里看到的那幅一样，她穿着一件晚长袍，怀里抱着一束花。那一幅一定是一个大模子，因为在花束上印着一行字，写道：正在销售简娜·玛森的“黄玫瑰”化妆品。

一个女孩，妆化得无可挑剔，穿着一件白色的试验室大褂，胸口别着一朵新鲜的黄玫瑰，正目不转眼地盯着我看。

“我们刚到了一种特别的东西，简娜·玛森的新型化妆品，每购二十美元你就可以得到一只手提袋。”

我被搞懵了。在整个柜台上堆满了唇膏、眉毛油、眼笔、香粉、胭脂、指甲油等试用品。金银两色的包装纸上醒目地標示出简娜·玛森的签名，跟那天在办公室里写在芭芭娜的公务便笺上的字体同样的圆滑认真，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精心制作的煽情展览简直无处不在，那天简娜·玛森进来扫视一圈时它们还都不存在，我现在意识到那次她只不过是为了来查验一番，看它们是否已经在化妆品部里摆设好。但它们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时，她自然感到失望。

而且它们并不仅仅是无处不在而已。

“实际的成品是谁生产的？”

“是吉辛勒。”

我现在明白了我们是在吉辛勒的柜台旁。“黄玫瑰”只是一个再生物。他们多年生产的产品陈列，“蓓蕾”和“月影”——我甚至只有十几岁时就在用的——被堆放在角落里，所以简娜·玛森已经成为一家主要的化妆品公司的代言人；在那遇上阮德尔·依贝哈特之前不久，一笔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买卖刚刚成交——而前者，很可能是她和她的经纪人殚精竭虑做出的一项安排。

“你喜欢改进型产品吗，简娜·玛森的问候？”小姑娘甜甜地问。

她指着简娜微笑的剪影边上的一张搁凳。

我发出一声尖厉的咯咯笑声，声音似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姑娘惊愕地看着我，身子向后退了一步。

“她已经给过我了。谢谢。”

甚至到了下午四点钟，百威利·维尔希尔饭店楼上的酒吧还是人满为患，肤色各异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商品和服务，包括一对年轻的应召女郎正在和一些穿着考究的日本人谈生意。不知怎么回事儿，杰利·康奈尔和我居然会在这个集市中碰在一块儿；我让他成了这间屋里最激动的男人。

“我不是一个快乐的野营者。”当我们差点儿就要擦肩而过时他说。

“刚从圣路易斯艰难地飞过来？”

“下一次来访之前你先打个招呼好不好？就说：嗨，这是安娜·格蕾，FBI。三十秒钟以后我将给你一个心惊肉跳的逮捕，现在先通告你知道。”

他摇着头咧开嘴笑了起来。金色的头发，诱人的蓝眼睛，穿着那种最为时髦的流行时装，看上去同时具有保守和激进两种效果——他像一头用闪亮的翻领西服打扮起来的敏捷的灵■。我把他领到最后一张空桌子旁，坐下时偷偷地摸了一下他的极好的开士米。

我们都要了柠檬汁。康奈尔兴奋而且紧张，有点儿强制性的滔滔不绝。

“说起来真是骇人。吉辛勒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打算。他们仅仅和我们签订了三年的广告代理权，而就此范围来说，我们也只是他们的生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相当出色地为他们结束了‘月影’的使命，并且毅然推出了‘黄玫瑰’”。

“是你们部门提出来的主意要动简娜·玛森的脑筋？”

“那是玛格达·斯脱克曼的主意。你见过她吗？”

他使劲想把浮在他杯子里的柠檬片榨干。

“我认识斯脱克曼夫人。”

“这个人简直无处不到。她说她是简娜·玛森的私人经纪人，问我们是否有兴趣为吉辛勒发展一种新的化妆品货色，用简娜作代言人。她杀出来，作了一番极为聪明的描述，结果老总当真买了她的账。”

“这笔交易是怎么个构造法？”

杰利·康奈尔没法安静地坐着。他的膝盖上下抖动，手一直在桌子上敲得“砰砰”作响。现在他的手指捻了捻他的瘦长条子的皮领带。

“那是简娜·玛森和吉辛勒之间的合作计划。他们大量加工化妆品。”

“然后简娜——”

“要求她作一些电视广告节目，定点销售展览，印刷品广告，还有一两次预约的讲话，总共大约要花她一周的时间。”

“她得到多少报酬？”

“我不能告诉你这个……”他用一根牙签挑起柠檬片来使劲嚼，“不过它是个高七位数。”

“为一周的工作。”

“我们宁愿认为为了得到公众的认可她要耗费一生的价值。”

“你做了一桩可爱的生意。”我说。

“就像你一样可爱。”

他侧眼看着我。他的激动不安平息下来。杰利·康奈尔是一个精明的有教养的生意人，一直漂泊不定，现在他正打算定居下来。

“所以你瞧，特别行动处的安娜·格蕾，我还得赶下一班的飞机到圣路易斯，为了这个，我不得不放弃让索尔给我理发的打算，你知不知道要跟那家伙约个时间有多难？”

“你的头发看起来很好啊。”

“我得去保护我的当事人。告诉我有什么事要发生。我在那儿是不是会遇上大麻烦？”

“我也不知道。简娜·玛森什么时候和吉辛勒签的合同？”

“两年前。使这些事情正常运转要花一些时间。”

“那么当她进入贝蒂·福特中心时生意才做成？”

“是的。”

我记起玛格达·斯克曼充满激情的演讲，传媒围绕简娜的毒品问题所做的所有文章如何不可挽回地损害了她的职业生涯。“那没有让你们担忧吗？”

“我们得到保证事情能够处理，并将处于谨慎地控制掌握中。”

“但是在《人民》杂志的封面它又被披露出来。”

“在任何时候你要信任名人的保证都有一定程度的冒险。他们是无法预言的。他们也是人。”

“但是难道它不会让你们的老总感到厌烦吗？他们的代言人竟是个瘾君子。”

“这不像她注射海洛因，是这个奇特的医生让她上的瘾。我想在社会各阶层里反而会引起对她的同情。”他笑得相当可爱，“在这个世界上谁没有做过一点点逾矩的事？”

我把手平摊在桌子上，盯着他的眼睛。

“玛格达·斯克曼是不是向你们宣称简娜·玛森吸毒是医生的过错？”

“是的，而且她说不用为此担心，他已经被起诉了。”杰利·康奈尔突然瞪着我：“还没有吗？”

“没有，除非我们能够找到起诉的证据。”

他开始无意识地拨弄他的领带，就好像它是一支短笛一样。

“管他什么呢，就我的当事人所关心的，在这点上可能还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自顾自地说道，“公众的洞察力是如此的……”

他收住嘴，望着远处，似乎在估算着公众的洞察力。

“好的，”他得出结论道：“吉辛勒是安全的。”

“怎么样？”

“情形最糟的方案：玛森违反了她的合同。我们撤出产品。我们提出诉讼。吓一嚇。”

他拍了两下桌子，像要准备赶飞机去了。

“我不明白。她怎么违反合同了？”

“我们有一个道德方面的条款。”

“给我看看。”

尽管在圣路易斯已将近晚上八点钟了，但在康奈尔和伯吉斯广告公司里仍然灯火通明。有人回到那儿正通过写字楼的传真机向我们传送简娜·玛森合同中的道德条款的副本。当它从机器里吐出来时我一行行地读出声：

M. 道德。如果代言人首先，或在本条文执行过程中，或此后，没有、拒绝或忽视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达成和社会习俗、公共道德与礼仪的一致性，或者做出任何使代言人陷于名声的败坏、丑闻、受辱或落下笑柄的行为，或者上述行为引起了大部分人或社会某团体对代言人或制造商的震惊、蔑视、愤怒或任何不利的反映，那么制造商可以，除了不使自己的合法利益受损害

而提出任何种类的赔偿要求或自然提出起诉外，并随时在类似事件发生后终止该协议。

我握住杰利·康奈尔的手谢了他。我把那张薄纸叠起来，小心地藏进了我的蓝色公文包的 inner 口袋。

(二十一)

第二天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丢勒·卡特正坐在我的位置上玩我的侏儒玩偶，它戴着一只随身听，紫红色的头发，笔直地立着。

“不要动我的侏儒。”

丢勒咧咧嘴。

“让开。”

“就这样跟你的上司打招呼吗？”

我把蓝色帆布公文包重重地放在桌子上。而不幸的是用力过大反而让我自己的太阳眼镜从鼻子上滑落下来，但是我眼明手快地把它捞住了。更加对丢勒怒目相视。

“你不是我的上司。现在请让开。”

“我不会赖在这儿的。接着这个。”

他把今天的《洛杉矶时代》翻到目录部分推给我。这一页的整个上半部分都被简娜·玛森的一张巨幅相片侵占了。照片里简娜坐在她的私室里，穿着蓝色粗纹棉布衬衫，蓬松的卷发，看上去那么娇柔，胆战心惊，弱不经风，一双大眼睛里并无造作的神情，好像她刚刚用完去脂牛奶和寿司早餐，正要让你、读者，分担她最隐密的麻烦。

我不得不站在原地，听丢勒逐一复述文章的内容，关于在贝蒂·福特中心时，简娜如何第一次觉察到她成了在她的疗程中非法加入的麻醉剂的腐败的医生们的受害者，作为舆论环境关注此案的结果，对依贝哈特大夫的调查如何逐步地升级，包括加利福尼亚医药执照；尽管 FBI 继续既不肯定又不否认自己的调查，但是它已经引起了华盛顿，D. C. 总部一位高层官员对形势的关注，他特别指出要注意在健康卫生行业中存在的欺诈行为。

“你这案子完了，姑娘。”

“不要相信你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我冷淡地回答道。

“他在医院的同事们说你那伙计依贝哈特意志十分消沉。”

“在这么多的压力下，谁又能不能消沉？”

“他们说属于那种成就超群，总是备受亲睐却无法面对失败的类型，还沉浸在他哈佛医学院的光辉岁月中，新闻媒介是怎么发现这些资料的而我们却没有？”

我的不自在让他很高兴。

低下头去，我碰到一段文字，上面写着依贝哈特大夫“在蒙塔娜之北的住所已被隔离”。无法得到对辩护律师的建议的评论，我能够想象出他和克莱诺是如何在那堆巨门后面瑟瑟发抖。

丢勒站起来把报纸塞到我手里：“这是一个好机会。你最近已得到了许多次好机会。但是就像我以前试图说的那样，在你继续前进之前，你仍然有一些工作先要完成。”

“那么你是怎么平步青云的，丢勒？”我脱口而出，愤怒几乎让我找不

到语言的逻辑：“我已经在这里呆了七年，你已经呆了八年。告诉我你的秘诀，为何你就能走在我的前面那么远？”

他踌躇着怎样回答我的问题。在他大费思量时，他把他黑发的额发捋到一边，用白皙的指节敲着他的顶门，像是要用胶水把头发粘在那里一样。

“我和撒旦作了一笔买卖。”他的黑眼睛里的神色莫测高深，“当我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时我就想到要离开特拉维斯镇，立志在早年就要创出一番成就，有一天我把这个想法和撒旦谈了，然后我就到了这里。”

“真的？那么你和撒旦做了什么交易来换取你的成就呢？”

“那是他和我之间的事。”丢勒毫无笑意地回答完，转身走了。

我在那儿坐了半天，对他百分之百的严肃性感到畏惧。

我打开电脑时发现电子邮件的方框正在闪烁，所以我立刻把它调进来。这里面是我以简娜·玛森周围一百英里半径范围内所有相关人员所进行的罪行检查的结果，从这儿我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工作、建议、利益、吃饭、睡觉和游戏。每一个人都足够的清白，除了大轿车司机，汤姆·保罗伊，在他当州警期间，曾因为偷窃商品引起些小麻烦，并被迫离开了警界。

我从蓝色公文包用拉链锁住的隔离层里取出了“道德条款”，又打出一份关于保罗伊的报告材料，然后就往 SAC 的办公室跑去。

高罗威从他的办公桌后站起来身向我走过来，手里拿着雪茄向我做了个抱歉的手势：“很抱歉，你得在报纸上读到它。”

“那么那是真的？我被从这案子上撤下来了？”

“局长看见简娜·玛森在《唐纳弗》上的大声抱怨极为光火，用新闻媒介的话来说他想要加强火力。这跟你没什么关系。”

我默不作声。

“我正在提交你到 C-1 的调职申请，祝贺你。”

他等着我的反应。而看到我竟毫无反应时他打直了膝盖，以便能弯下身来斜着眼看到我的脸部表情。

“是我疯了还是你根本不想要那份升职了？”

“现在调不调职与这件事无关。”

我向他出示了那份传真，并且解释说因为这个道德条款，引起丑闻的行为——比如是一个瘾君子——可能会危害一笔数百万的合同。我告诉他我相信所谓阮德尔·依贝哈特的罪行，是玛森一直在撒谎。

但高罗威并未为我的信念所动。

“他们从华盛顿搬来了一个大人物，让他来处理它吧。”他又站了起来，当他带着我走到门口时，他搂着我的肩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你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了。”

“好的，你不喜欢这个道德条款——”我把它捏成球扔进了垃圾箱，然后在他鼻子底下挥舞那份打印稿，“这个怎么样：新花色。简娜·玛森的司机在当州警期间因为偷窃商品而被除职。”

高罗威的眉毛一挑：“别忙了。”

“我们知道玛森是个支配狂。我会对那家伙施加压力，找到真正的毒品供应者，只要掌握了这点我就可以驯服她。”

“真是胡扯。”

高罗威的手赶紧从我的肩上拿开，好像它已变成了一块烧红的铁板。

“安娜，我们已经从这件事上脱身了。”

“如果我能找出供应者并且证明简娜·玛森从事了部分违法财产交易，那又怎么样呢？”

我触怒了他：“没有人会想朝这个方向去。”

“我知道，但是——”

高罗威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嘘”的一声阻止了我。他的声音变得缓慢而柔和，晃动着手指的节奏就像在唱出一支童谣：“我们来回忆一下吧，这次调查的嫌疑犯仍然是阮德尔·依贝哈特对不对？现在你仔细听着，告诉我答案：怎样做才对我们起诉这个嫌疑犯有帮助？”

“也许是开释他。”

很快得知，不管“在城堡里”汤姆·保罗伊和莫瑞恩之间有什么麻烦，但其余时间，他们都一起住在“太平洋岩壁”她租用的一套公寓里，位于从圣莫尼卡到峡谷之间的一个舒适的郊外小镇上。尽管主要街道也只是一条小林荫路，但是在那里仍然感觉到 50 年代的氛围——一个体农场和平房——这使莫瑞恩的地方显得非同寻常。

公寓在一条弯曲的街道上，在一扇巨大的滑门背后，我循着滴水声迈下石阶；这里有一个石砌的人工喷水池，水柱像百合花一样升起散落，池中聚着许多“呱呱”直叫的活蛙。一直向前是一个很小的木制平台，长满了洋红色的九重葛，平台里有一张白铁桌子，几把椅子。这儿可以远眺，维尔·罗格斯海滩的模糊弧线，蓝隐隐地山脉，和银色的海浪，一路直到波音特-杜莫。这些景象极为有趣。

尽管沿着街道有许多房子紧紧靠在一起，但是在这个美妙的场所，除了静谧和微风拂过花丛的沙沙声却是什么喧闹也没有。这会使你饥渴地寻找“切达”乳酪、咸薄脆饼和烈性威士忌，就着它们站在平台上欣赏日落美景。但是你转身过来面向房屋，景象却同样的有魅力：人字屋顶，华丽的装修，一个苏格兰式的小餐厅。

门上，用软木雕刻着巴厘文化里的人物形象，正拥抱在一起跳舞。门微微地张开一条缝。我敲了两下，没有反应，我就走了进去。

“喂？汤姆？我是安娜·格蕾。”

没有回音。

我走过卧室，室内有一张四根柱子的床，被单皱巴巴的，衣服随便仍在破旧的东方色彩的地毯上。空气中充满了檀香木的味道，还有性欲。梳妆台上堆满了古式的香水瓶，有一半打翻了或弄得粉碎。壁橱全开着，抽屉也一样。草帽、玩偶和围巾散得到处都是，像是被抓出来的然后朝窗口扔去，看起来汤姆和莫瑞恩遭到了抢劫。

当我走进被洗劫过的厨房里就更加相信我的判断了。一只炒锅焦底朝天，水散了遍地，炉子仍燃着，我关掉了火苗，嘎吱嘎吱地踩过地板上一个装细条实心面的盒子。有人把一瓶苹果汁砸在墙上。还有人扔过罐头盒。我听到从另一间屋子里传来轻微的呻吟声，立即肾上腺素剧增，武器已握在手里。

我沿着门廊悄悄地移过去，门廊装饰着不祥的非洲面具，通向一间起居室，起居室的兩扇钻石式玻璃窗凭眺着海景。这里还有更多的面具，和眨着眼睛，长着漂亮的中国面孔的玩具娃娃。二手货的沙发上塞满了闪光印花布面的枕头。窗户吊着一块转动的玻璃棱镜，在下午的烈日映照下熠熠生辉，把五光十色的色带抛散在屋里的物件表面。

在那些令人目眩的虹彩中央，是汤姆·保罗伊，除了一件白色的T恤衫，他根本什么都没有穿，两条经过充分日晒赤裸的腿弯曲着，像桩子一样木然不动，他正在那里迟钝地手淫。

他抬起两只赤红的眼睛向我膘了一眼。我一下就捕捉到他未刮过的下巴上白色短髭的闪亮。

“安娜，”他沮丧地咕噜着，“帮我出来。”

他的拇指和食指正向下套动他红肿的阴茎，我抢步上前，从一把摇椅上抓起一床阿富汗羊毛毯朝他扔去。

“耶稣·汤姆，把它盖住。”

他接过毯子遮住他的前身，光着屁股倒在沙发里，然后开始哭。

“这里发生什么事儿了？”

“我们打了一架。”

“莫瑞恩在哪儿？”

“走了。”

他弯过腰来，上身和下肢折成了两半，用手抱着头。

“她没有事儿吧？”

他点点头。

“你没有把她抽得青一块紫一块，然后扔到悬崖底下去？”

“我不会那么做。我爱她，安娜。”他扬起脸向着我。虚胖的脸上现在似要被泪水或口水融化到一块去了，仍在淌着自怜自惜的眼泪：“上帝，我是个肥老屁。”

我把手枪插进皮套，坐下来，等着他自己恢复平静，沙发像岩石一样硬，里面一定充填着马鬃或其他反常的材料。

“有趣的屋子。”

“它是60年代一个电影布景师建的。”

他作了个深呼吸，用拇指揉了揉眼球。

“和简娜·玛森有关系吗？”

“不，莫瑞恩已经在这儿住了好几年了，而她不久前才遇上简娜的。”

“简娜怎么样？她一定正忙着，从一个脱口秀跑到另一个保护受害者权利大会。”

“现在我可没法关心简娜·玛森。”

“她可相当关心你和莫瑞恩。她就是担心像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们约会的那天晚上她告诉我的。”

“简娜试过，但她永远不可能理解我对莫瑞恩的感情。”

“我们还是谈谈你吧。要杯水吗？”

他晃了晃头。

“好吧，我们来作一次交谈。关于一个卡车司机，他据说在加利福尼亚沙漠的一个偏僻地区进行抢劫，然后一个州警出现在事件发生地，伪造了一个报告，这样那些商品就可以被保护起来并重新出售，你认为怎么样？”

他牵起他的T恤衫擦着鼻子：“那是过去的事儿了。”

“简娜知道你的过去吗？”

“简娜认为我是自有巧克力糖浆以来最棒的伙计。”

“她从哪儿弄到毒品的，汤姆？”

他站起来，把毛毯围在腰上。

“没地儿，安娜。”

“简娜觉得你是块巧克力苏打冰淇淋，可莫瑞恩不过是把当你当成一堆狗屎。”

他又变得伤感起来：“让我一个人呆着好吗？”

我也站了起来：“一点问题没有，我会去问问你年轻的朋友她的观点，在这种时刻不会太难，我明白为什么你喜欢小姑娘。但是，别见怪，她们怎么样看你？”

他白色的短髭底下泛起了一道红晕。

“在试图用一盒细条实心面杀你之后，我保证她会激动地告诉我我是怎样为简娜提供狄劳狄德或德克斯代因或凡里尔首或柯卡因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毒品。”

“我跟那些东西没有关系。”

“但是你知道是谁干的。”

他的下颚绷直了，嘴唇紧闭着，公寓突然间变得小起来，玩偶的脸都成了凶恶的原始崇拜物，封闭的房子让人窒息。

“那件事持续下来一定非常有趣，你和‘罗丽塔’，十四岁的奶头。”

“见鬼。”

“新安排：你穿上衣服，我们一起兜回韦斯特伍德去。”

“做什么？”

“调查局会对这件事产生强烈的兴趣，我相信那位来自华盛顿的神秘的大人物将十分愿意和一位了解简娜·玛森私室内幕的人谈话，也许就不会在意一点点你个人的过往史。”

虹彩罩在我们身上。

“那不是我。”

“好吧。”我做了一个夸张的、仁慈的手势好像我最终决定让他摆脱我的钓钩，柔和地、富于同情心地问：“为什么你不穿上点衣服？”

他从睡椅上拾起一件汗衫，匆忙地穿上，然后又带着一脸义愤的表情一屁股坐回去，擦了擦鬓角的汗水。

“我们知道是依贝哈特大夫干的，”我说，像是吐露了一件职业秘密。
“我们已经打得他屁股开花。”

汤姆·保罗伊摇着头，冷笑着说：“那就是确切的原因，当我还是一名州警的时候，我就仇视联邦调查员，你们这些家伙真他妈的傲慢，又真他妈的愚蠢。”

我明白了他已经上钩了，所以我继续送一块鸡大腿给他啃：“我们相信对于医生的这件案子我们做得无懈可击。”

“只有他想要简娜呆在贝蒂·福特，为了救世主，”汤姆脱口而出，“玛格达·斯脱克曼则想把她弄出去。”

“我不信。”

“噫，我可是当事人。”

“胡说。”

现在他要捍卫自己的信誉，红着脸，愤慨地说：“简娜曾经几乎自己毁了自己，是不是？那位医生来到了马布里，看到那一幕，就突然明白了：这位女士是个瘾君子，他去见她那位显然忙碌着自己的生意的经纪人，说：‘我们必须帮助这位女士摆脱毒品，否则的话她会死。’玛格达说：‘我会尽力

提供我的帮助。’

“简娜呕吐了两天，她病得像一条狗，他们在深夜十一点钟派我出去找几种该死的药茶。我不得不跑遍了整个‘鸽城’去找一家晚间营业的保健食品店，当我回去的时候，我听见她们都在私室里。”

“打架？”

“简娜正在那里发小姑娘脾气，包括她想照医生说的回贝蒂-福特去。玛格达对她说”——模仿着她沙哑的口音——“他只是想要你的钱，杰伊，没有人像我这样真心诚意地爱你。”

“玛格达是在试图挽回同化妆品公司的合约。”

“玛格达是在试图控制简娜，像过去一样。她从莫瑞恩那里听说简娜正在同这个医生接近，这使她产生了幻觉。你认为谁能使简娜信服她就把那个裙下之臣除去？”

“条条大路都通向玛格达。”

“因为简娜正在瞧大夫，所以她想干点儿干脆的，但是她实在是个笨人——大哭大笑，周期性偏头痛，手忙脚乱。最后她只好回头找莫瑞恩。莫瑞恩不想承担这份责任所以——你是对的——她把它交给了玛格达。”

最终那个过分劳累的女管家的秘谋昭然若揭了，但是我还是想听保罗伊亲口说出。

“莫瑞恩不想承担责任是为什么？如果我问得愚钝的话请包涵。”

“是为了麻醉简娜。”他灰心丧气地说。

沉默起来，光栅在飘浮着灰尘的空气中慢慢转动。意识到他自己所说的话，保罗伊的脸变得扭曲，但是止住了怒气。

“莫瑞恩是简娜·玛森的街头联络人，”我轻声地试探道，“那就是为什么她被当作‘行头女郎’养在身边的原因。”

“她吸食古柯。”保罗伊用低沉，颤抖地嗓音说，“好像你无法辨别出来，玛格达用一条金线把她牵住了。”

“为她的毒瘾支付报酬。”

“你永远抓不到玛格达的把柄，那就是她的高明之处。”

我绝望地想到自己应当用上录音机或窃听器的。

“除非你变成证人。指证到玛格达和莫瑞恩。”

他没有回答。他的面孔现在也阴沉下来，两只冷漠的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我们答应作为交换条件，可以免除因你可能消费或从事买卖麻醉品而提出的一切诉讼。”

“耶稣，安娜，那是彻底的谎言。”

“我们需要你的证词。”

他反复掂量着。一会儿以后，他才缓缓地地点头答应了。

只是为了更加肯定，我问：“如果你爱她，为什么不让她自己投案呢？”

他看起来似乎已大不相同了，现在他才是个一心一意，成熟的男人，他认识到，也许这是他重新获得对后半生的支配权的最后时刻。

“你到这间屋子来的时候，”他问，“是不是碰上了简，那个没脑子的海滩乞丐？”

那天在海滩上用望远镜窥视他们的帆板教练，有一双漂亮的腿。

“我记得简。”

“莫瑞恩一直都在和他上床。”

汤姆·保罗伊愤愤地从地上卷起一条衬裤，大踏步地朝卧室里走去。

莫瑞恩在审讯室缩成一团，像个婴儿一样大哭着。

“我能帮助你。”高罗威正温柔地说，“我们可以把你从那个可怕的环境中拯救出来，或者你想等到你的律师到这为止？”他补充道，因为录音磁带一直在转动。

“这会要了我爹的命。”

高罗威递给她一张擦面纸。我随他怎么做。我的工作就是翘起二郎腿坐在这儿，突出女人的同情心。

“你能为你的爹妈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照顾好你自己，莫瑞恩。在这方面你一直做得不太好，是吗？”

莫瑞恩摇着她的头，她哭得这样伤心，似乎眼泪已严重妨碍了她的呼吸，她的脸颊像红透的山莓。

“告诉我们你从哪儿买到的药丸。”

“我不能。”

“你怕那些贩子？”

她点点头，一面把沾湿了的头发从眼睛周围拂开。

“你有很好的理由。他们都是坏人。但是你瞧”——说到这儿高罗威叹了口气，就像问题实际上是出在他自己身上一样——“如果你不把他们送交给我们，你就将进监狱，而他们还和平常一样在街上做他们的生意。这公平吗？”

“这不是我自己的错。”

我鼓励性地点点头。

“那是事实，而最终你还是要和它作斗争。但是如果你帮助我们特工人员抓住这些坏种，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救你自己了。”

她沉默着。

“他们欺骗了你。包括简娜。”

擦面纸已经撕成了雪片。

“她说过她会照顾我，”莫瑞恩垂着眼睑低声说道，“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

高罗威摊开双手朝房间四周环视着。他的眼睛睁圆了道：“那么她在哪儿？你试试看，你用你的电话同简娜·玛森联系一下，她就能一路小跑到这儿来？——她在哪儿？”

“她的秘书说她正在法国。”莫瑞恩提高了嗓音回答说，“因为她已经使一种新的化妆品生产出来了。”

“就算她在附近又怎么样呢？莫瑞恩。看着我。”高罗威轻轻地抬起她的下巴，“如果她在附近，甜心，她会走进这办公室，承认她是个吸毒者她甚至像利用一个奴隶一样利用你为她取得所需要的东西吗？或得你认为她会否认它并且运用她的影响力置身于莫瑞恩的小麻烦之外？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简娜·玛森，告诉我。她会保护你像你现在保护她一样吗？”

你几乎可以听见细碎的骨头碎裂的声音。莫瑞恩作了三四次不连贯的呼吸，热情已经用光了，不满却开始起作用。眼泪静静地流进捂在脸上的手掌心里，深深意识到她如何地被出卖了。

当我离开房间的时候，却一头撞进唐纳多的怀里。

“我们找到玛森的毒品供应者了，就是那个保管衣物的女孩。”

“祝贺你。”

“瞧。”

特别行动处的吉姆·凯利正大步迈进审讯室。吉姆是毒品组的头儿。

“她将供认出她的街头联系人。”

“这可能会引起一场小小的麻醉剂业的破产。”唐纳多惊异地喃喃着。

“那是因为我太了不起了。”我用拳头击打着唐纳多的肩膀大笑起来，“现在高罗威也拿得出东西给局座了。”

“不是他们预想的东西。”

“比他们预想的更好，我不得不把它交给高罗威，他想亲自追查简娜·玛森。这是块政治热馒头，但是谈论政治是他们局里的事。”

“今天晚上你可以到‘波拉一波拉’酒吧去了。”

“想跟我拍档吗？”

这几周来唐纳多第一次冲着我微笑：“我还有晚餐，家庭作业，和一个有关电磁铁的课外自修科研项目等着我。”

罗莎琳快步走到我们谈话的地点。她又是那副奇怪的表情。

“圣莫尼卡 P.D. 有电话找安娜。你不在你的办公桌那儿。我想我最好还是过来找你。”

我跟一个叫布兰迪的年轻、认真的办事员通了话，他告诉我阮德尔·依贝哈特大夫死了。因为这起死亡和 FBI 的调查有关，所以他认为我可能会有兴趣到第二十街去看一看；这既是出于礼貌，也是为了表现跨部门间的合作。

(二十二)

蒙塔娜之北。这栋新建的二层楼与当代地中海式建筑在邻近街坊里独一无二的。五间卧室，五间半浴室，美食家的厨房，等等，现在作为案件现场，被用黄色标志带封锁起来。

三辆圣莫尼卡警方的巡逻车和一辆救护车停在路边。并没有挤太多的人——也许有二十多个邻居、过路人、推着婴儿车的佣人——因为现在还只是星期三下午的四点三十五分。

我认出一个人从《洛杉矶时代》来的都市新闻报导员，这里还有一个《眺望》来的小子，一个《圣莫尼卡晚报》的精简编辑，正是这家晚报，三十年前刊登了我外祖父和被盜轮椅的照片。

在门口我向警察出示了徽章，走进这栋深宅。从人们的数量和他们的紧张程度，我知道糟糕的东西正在楼顶上等着我。一位圣莫尼卡的警探在电话里报怨为什么要延误尸体搬运。我听到话筒里回答说 405 干道刚发生一起四辆汽车碰撞的灾难，所以验尸官办公室很可能全被塞满了。

我踏上阶梯，经过了一棵小白桦树，朝他们的水晶吊灯走去。我又被一位警察挡住了。

“他在哪儿？”

“浴室。”

你的膝盖已开经变软但是无论如何你还得往前走，知道将看到的东西会很丑恶，而阮德尔·依贝哈特更加使它变得要多丑恶就有多丑恶。

第一眼我就看到金属气罐掀翻在银灰色大理石地板上。连在气罐上的塑

料管通向一个超大的豪华浴缸边上。你不得不走上前去弯下腰才能看到，塑料管插在一个塑料袋套的小孔上，他正是把这个塑料袋在头上弄死自己的。那张脸已经从淡紫色变成蓝色，少量的呕吐物把他的嘴唇和塑料袋的里层粘在一块。肌肉发达、赤裸的尸体，灰白中也透着蓝气，泡在八吋深的干净水里。尸体小心地从水中移开时，拖动气罐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空响声。在浴缸外沿周围，整齐地排放着儿童洗浴时的玩具——黄色的橡皮鸭子，红色的舀水桶——所有这些被从浴室窗户无辜地穿透进来的下午温和的阳光不协调地照耀着。

现场的伙计们在所有相关的物体旁都作上了他们的三角型标记：注明“氮”的小罐，装“凡里尔苜”的空瓶子——一张处方笺上写有克莱诺·依贝哈特的名字——都在水槽附近。法庭的摄影师叫我站在旁边以便他们拍一张宽度对比照片，我看着阮德尔·依贝哈特摆在它的大理石墓穴里的裸体，它就像是我們所有人的裸体的一副雕像——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我的、汤姆的、莫瑞恩的——我感到羞愧，因为我是活下来并且眼睁睁地看着它的那个人，跟从前我眼睁睁地看着陷入死亡的我的堂妹一样，然后，突然，一种极度沮丧的伤感使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就好像埋藏在地底下我自己的悲痛源泉猛然间冲决而出，喷射到了数千呎的高空。

我蹒跚地走下楼梯，发现新寡妇单独呆在起居室里。

我坐到沙发上，就在她旁边，自我介绍说是特别行动处的安娜·格蕾。

“我们见过？”

撒谎：“没有。”

她的两腿交叉，膝盖紧紧地靠拢在一起，手臂紧抱住自己，腰间还缠绕着她的白色网球裙。

“警察认为是自杀，但那不是真的。”她愤怒或者惊讶地说，扭在一起的腿同时往外踢着，“阮德尔绝不会杀死自己。”

“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谋杀了他，并且伪造成自杀的样子。”

她没有流泪，相当愤慨，但是以一种特殊的斜视方式看着地板。

“可怕的事情总是降临在我们身上，他被人诬陷，被人迫害，他的职业声誉遭到攻击。如果那些人没有任何原因，根本不为任何原因，就那样对付我们，他们杀了他又有什么不可能的？”

“警方会进行彻底的调查，等尸体解剖之后，你就会知道答案的。”

她摇着她的头：“他们将竭力掩盖它。”

她的反应也不是非同寻常的，在这种发生了自己造成的死亡事件的家庭。拒绝接受。偏执狂。她不能让事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完结。当然不能。

“如果我丈夫要自杀他会用一支手枪。”她的一只手从腰间松弛下来，在面前挥舞着，“他刚买了一支手枪，因为邻居里全是贼，难道这也讲不通吗？”

她完全被她自己理论的逻辑鼓舞着，所以我只好让她自个儿沉醉一会儿。

“他一定是被谋杀的，因为否则的话他会使用手枪，是不是 FBI 也卷进去了？”

“我可不这么认为，女士。”

“但他没有杀死他自己。”

她克制地但坚定地说：“很多迹象表明他确实这样做了。”

她长时间地盯着我看，似乎她的说话能力一下子被切除了。

在我们面前的咖啡桌上，放着一只网球拍，一件白色的毛绒衫和一堆信函，这一定是她刚刚从外边拿进来的。萨克斯第五十林荫大道寄来的一本商品目录册的封面上，是一张简娜·玛森的脸部特写照片，面孔的周围堆满了黄色的花瓣和一圈字：简娜·玛森向您推荐“黄玫瑰”化妆品；在我们的百威利·希尔商场，您会遇见明星本人。

可以作这样的想象：简娜·玛森完美、纯洁的脸庞正从覆满黄色花朵的水池中探出。

加上：阮德尔·依贝哈特装在塑料袋里僵死的蓝色的那张脸……那么你得到了什么？

“对你的不幸我感到很难过。”我站起来，走了出去。

远处欢快的街道拐角，劳拉和那位矮小的智利老太太正朝屋这边走来。劳拉骑着一辆儿童三轮车，保姆推着婴儿车。因为看到警察，她们大吃了一惊，佣人伸出手想挡住小女孩，但她已经踩着脚踏板以最快的速度朝着这边的骚乱冲过来，在她单纯的脸上显然出现了一种预知的神情。

我也是五岁，圣莫尼卡的那个夜晚，我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掉转头，从好奇的人丛中挤出去，还没有关上车门我就在想，是否会像我那样，劳拉将教会她自己忘掉这一天，忘掉随之而发生的一切，然而，这种遗忘能持续多久呢？

在高速公路上，如果一路顺畅的话，开到西密河谷只需要四十五分钟时间，特别是当你以稳定的七十五哩的时速前进时。现在是晚上十点。对巴罗库塔来说，这个速度已是极限，但我不在乎那么多。

唐纳多的房子是90年代在几个新开发区里新建上百栋住宅房之一，都安着圆窗户，应当使它们看起来有趣味一些。但是，西密河谷唯一有趣的东西却是那条路，它背后已经抵着群山，是洛杉矶向北延展的脚爪中的最后一个趾节——从这个郊区小镇你再也不能往上走得更远了。这儿的人们仍然可以把他们的宠物养在室外——马和埃塞俄比亚猫的喂养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他们个人的自由。

唐纳多的房子看起来暖和舒适，富有家庭气氛，因为是晚上，所有房门都关着，但屋里灯火辉煌。我走上前按下了门铃。他的妻子打开门。她非常的有魅力。一个潜水教练。灵秀，正在读法律学校。但是我不在乎。

“嗨，罗谢尔，很抱歉打扰你们。”

“安娜！出什么事儿了？”

“一点紧急事务。麦克在吗？”

“当然。我能替你拿点什么？”

“不用，但是谢谢你。”

空调正开着。这地方有股塑料气味，混杂着封闭环境中刺鼻的地毯和用廉价胶合板做的新橱柜的味道。

唐纳多快速跑下楼来。

“高罗威正在召集全体人员。”

唐纳多寻找到我的眼睛，盯住它们，看到里面恳求的神色。我相信他知道他所决定的——立刻跟我走，然后默许驱使我来到这儿的无论何等疯狂的需要，那会是一件任何人都不曾做过的最为敏感的事。

“我上去换件衣服。”他穿着一件汗衫。

“你不必那么做。我们是到鸚歌湖的监视区去，不是参加舞会。”我突然用一种嘶哑地嗓音高声喊道。

唐纳多从壁橱里的一个上锁的盒子取出他的枪套，抓起一件派克大衣。他的妻子吻了他。

“小心点。亲爱的。”

“我会的。”

我们走出了门。“很高兴见到你，安娜，只是太匆忙了。”

我微笑着，挥了挥手。

我们来到路旁，房门已经关上，我们钻进了巴罗库塔。

我带着不必要的猛烈发动了汽车，车子驶离路旁，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唐纳多在派克大衣里扭动着身子，他的枪放在了脚旁边的车底板上。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并没有什么监视区存在。

“她利用医生就是为了卖唇膏。”

我没有说一句话，在黑暗的、空旷的小城里，我们闯过了所有闪着红光的交通灯，从第一个坡道驶入高速路。我们正朝西行驶，我唯一知道这点。

“简娜·玛森曾在贝蒂·福特中心因为吸毒被送入医院治疗。报纸上全部刊登了。她和一家主要的化妆品公司签订了一份秘密的约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但他们有点担心——谁会买一个瘾君子的生产的化妆品呢？”

这笔买卖的价值是她能从那些电影里得到的赚头的十倍。而且她极想得到一笔现金。如果说有谁能为她的毒瘾作替罪羊的话，那一定将是阮德尔·依贝哈特大夫，因为他又愚蠢又天真。正是一根救命稻草。”

唐纳多双手抱在胸前坐着，从车窗旋进来的冷风把他的头发吹得向后摆起。

“都是那个臭经纪人在背后捣鬼。”我的拳头重重地敲在方向盘上。

“很难证明。”

“我不在乎。有了我们从服装女孩那里得到全部垃圾，我就可以搞垮简娜·玛森，揭穿她的谎言，耶稣基督，谁知道，也许那家人能够为医生的冤死提出诉讼。”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他不能忍受这种耻辱。用氮气杀掉自己。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非常聪明，那家伙非常聪明，用一只塑料袋兜住气体，把袋子罩在他的头上。他是个医生，所以他知道如果是二氧化碳在袋子里面沉积起来，自然会引起人惊慌的反应，那么他就有很好的机会把袋子拨开，尽管他自己想死，但人的求生也是本能——所以，他就连续不断地泵入氮气以代替 CO_2 ，通过这种方法，他能够保持呼吸，一直到氧气完全耗尽。用一点点凡里尔苜蓿来放松，舒服的热水浴，不知不觉窒息而死。”

我驶离行车道，车子在积满尘土的路边颠簸着，然后我踩了刹车，我并没有关掉引擎，但是把变速杆挂在停车档上。我开始面向唐纳多，手指伸进了他的派克大衣底下骨骼起伏的肩膀，把他拉向我，试图用我自己的唇封住他的嘴。

我们下了车，我们把武器都锁在行礼箱里。我们翻过一段黑暗不平的崎岖的小路，路边有一块同样黑暗不平的田地，这里是俄克那德山底的裙边地带。

我们迈过干涸的小沟渠走进田地里。

“他们在这里种植什么？”

“草莓。”

我们铺开了一床羊毛毯，毯子还是我有杰克和贾斯迈，两只花斑猫时留下来的，不管你信不信，上面还闻得到一股恶心的陈年猫尿的气味。

我们不能靠得近我们不能躲进更阴暗深沉的地方我们不能有太多裸露的肌肤接触到一起，到处都要冻僵了，我们在我们的夹克衫底下赤裸着，颤抖着，在这深夜的黑暗中越来越狂乱，似乎在这时就不会再有别的欲望存在。

唐纳多在上边，我捏碎了一把汁液横溢的草莓涂在他咬紧的牙关上，他在我的身体深处，用双臂搂着我，肩胛骨紧紧抵着我的下颌，所以我的头向后仰着，头发拂在尘土中。一架直升飞机就从我们头顶飞过，很低，掀起一阵阵强烈的气旋，我睁开眼睛去看它腹部的形状，我知道那是一架军用运输机，因为我们离术谷基地很近，但是这也无关紧要，我已经穿越了理性的王国而进入了我的迷梦的琥珀色微光中。直升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我们的胸腔里形成强有力的共鸣，我好像被一种原始的恐惧攫夺了灵魂，晃悠悠地将我带回圣莫尼卡警察局外直升飞机降临时的惊恐之中，我怕它那种粗暴的男性的力量会很快碾碎我。我的双腿紧紧地缠在唐纳多身上，我在地狱中嚎叫着他的名字。

（二十三）

我独自从床上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一种相似的焦虑和恐惧又立即抓住了我。当我把车开进玛丽娜的车库的那时候，已经过了黎明，我居然不可思议地想到要到学院的晨泳场去游一个痛快。但是，我的双手还是拉过被子来盖过了头，我的脑子里最终成了一片空白。

现在，我的眼睛里干巴巴的，射出火一般，胸腔里也仍然残留着令人难受的被挤压的感觉。迷迷糊糊地，我挪着步子拐进起居室，扭开留言机，看看办公室对我今天的任务有什么指派。里边只有几条口讯，包括卡尔·蒙蒂，一个社会工作人员打来的，谈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奥尔瓦尔多的事。事情都接踵而来，让我有些吃惊，我立刻给蒙蒂先生的办公室回了电话。他们保证说会跟他打招呼。

没有麦克·唐纳多的消息。但是我在期望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在期望什么。我吃了一份炙烤的乳酪三明治，往一杯去脂牛奶中搅进了些可可粉，迟钝地望着阳台外午后阳光的热浪。离昨晚的做爱已经很长一段长时间了，回想起来，除了痛疼，它只能说是粗陋的，没有给你罗曼蒂克的感觉。唯一我想做的就是泡在热水浴缸里。

我早就注意到，当你需要它的时候，这里却永远没有任何热气腾腾的浴水围在你周围。

所以我从厨房的水槽底下拖出来一瓶餐具清洁剂，往浴缸里喷了许多，制造出像山峦一样闪着光亮的洁白泡沫，我往浴缸里灌了三次热水，直到我的皮肤已经烫得通红，触摸着都有种刺痛感，所有镜面已全蒙上了一层水汽。我做了一顶泡沫皇冠戴在头顶，在乳房上则堆起了两座愚蠢的山丘，当我还是小女孩时，这是我常玩的把戏，脖子上和腮帮上都挂满了水珠子，他妈的，唐纳多现在在哪儿呢？他是不是跟我一样感到放松，又充满了好奇心呢？我

怎样回到办公室去？我们再见面时会是怎样的呢？第一次我感觉到，我对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情毫无控制力。

但是在我突然为那种粗暴的狂野感到羞愧前，在无常的锋利剃刀的刀口上所保持的庄严平衡仅仅持续了一忽悠的片刻时光。草莓地里压倒在我们身上的黑暗的直升机的肚腹又重新充填在我的头脑里，带着它的疯狂叫嚣，我差点儿在浴池里吐了起来。

电话铃响了，我的心脏一下抽紧了，忽然之间变成了五十年代喜剧电影中的一个女性角色（简娜·玛森可能就演过这样的角色哩），我跳了起来，浑身滴着泡沫，抓起一条毛巾，朝电话奔了过去，希望能听到我的秘密情人的声音。

是卡尔·蒙蒂。

“我是‘儿童与家庭服务’的申请调查员”，他解释道：“你和奥尔瓦尔多的孩子们是什么亲戚关系？”

“他们是母亲的远房堂姐。”

“你知道他们和索非亚·古特瑞丝夫人住在一起吗？”

“是的，自从他们母亲被害以后她一直在照顾他们。”

“但是她并不是血亲？”

“不是。”

“那么说你就是他们最近的亲属了？”

“他们还有外祖母、阿姨，和叔叔们住萨尔瓦多。”

“我需要告诉你的是，如果孩子们想继续在这个国家住下去，他们将不得不被安排领养。”

“发生什么事了？”

“一个邻居打电话给 LAPD，抱怨电视机声音开得过大，前去调查的警官发现公寓里有两个无人监护的幼童，就与我们取得了联系。”

我们谈话时我穿好了衣服：“孩子们没事儿吧？”

“他们的健康状况还好。但是我们不认为古特瑞丝夫人是个合适的监护人。第一，她的家庭收入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其次，这是法律。孩子们不能和捡到他们的任何陌生人一同居住。”我套上了牛仔裤和短袜。我明白那些法律。

“除非你愿意自己来照顾他们，格蕾小姐。”

“我？”我的胸口感到一阵震动。我环视了一下我的玛丽娜公寓，“我不能。”

“那么我们将为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安排一位适当的领养人。”

“需要多长时间？”

“那要根据情况而定。我们总是要寻找一位合法的收养人。”“机会怎样？”

“小的一个是有希望的。大一点儿的女孩有一些感情上的障碍，可能没有那么称心。”

“你是说他们将不会被安排在一起？”

“没有那种可能。”

“好的，蒙蒂先生，请你多费心了。”

他并没有失去他自己的节拍，继续平静地问我如果孩子们被安置好了是否要通知我地点，我说好的。

“这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允许他们和古特瑞丝夫人生活在一起，一周进行两次家访，但是她有点难以理解这种做法。她似乎对你倒是相当尊重，因为你为 FBI 工作——”

我随和地笑了起来。

“所以希望你能对她作一些解释，或许这对孩子们更有益处。”

当然，我会和古特瑞丝夫人谈的。反正今天要避免办公室的事。

他们叫它帕几娄——它是围绕着麦克阿瑟公园的几块街区，其实它并不比维尔希尔行政区与洛杉矶闹市联接处的另一块跳蚤市场大多少。

这里过去是富有的白人时髦的聚集地，从附近的小型疗养院过来的老人们也能够在一个雅致的公园的绿荫下歇歇他们的轮椅，而现在，却是这个城市犯罪率最高的区域之一。

这里也是这样一个地方，讲西班牙语的人口在这儿的规模、蔓延和密度都给人异常清晰的印象。街道的各个方向，都挤塞着拉丁美洲人的潮流，还有无照经营的小贩们沿街叫卖腊肠、动物标本、“拉姆别达”音乐磁带、跑鞋、水果榨汁机和热玉米棒子。“电话，全国直拨——每分钟二十五美分！”“旧货交换会！”的招牌挂在一家陈年老朽的电影院门口，录相带出租店，赌场，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人的餐馆。毒贩子。戴着牛仔帽的散工等在一个临时拼凑起的“劳务市场”内，为了找一份报酬菲薄的和几个钟点的工作。每一个街区都有一段迷你林荫路，两边都是发霉的灰墙，好像是不久前刚经过炮火的洗礼似的，这地方最可能存在的就是：加利西来拉丁区，美丽沙龙，唐人街捷运公司，考乳鸡店。笔直地穿越过这些障碍，我才算到达了回音公园外边的一块居民区，可以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那一段路，即使到了深夜，杀人率也不会降低的。

古特瑞丝夫人和孩子们在她预定的地方等着我。这个地点叫作“植物园”，而实际上它只是一处临街的店铺，卖点草药，蜡烛或者灵符什么的，现在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紧闭着。我们在一条小型商业街上。旁边那门是家食品杂货铺，叫“庭达·阿尔玛”；再往前是一家墨西哥面包房和一家泰国餐厅。与之相调和的，附近的某处一只公鸡正骤然长鸣。

“今天唐·罗伯托到四点钟才开门，他正用香熏他的公寓间。”

“谁是罗伯托？”

“一个巫师，他将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没有什么问题可问，古特瑞丝夫人。我知道哪些是需要做的事。”

古特瑞丝夫人不耐烦地“嗤”了两声。特瑞萨低垂着她的眼睛，仍是一副阴沉哀婉的面孔。我蹲下来抚摸着她的头发。

“你的生日就快到了，我正在给你做一个芭比玩偶，你觉得怎么样？”

她的整个脸因为一个漂亮的笑容一下散发出容光来。她完全成了另一个孩子。她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只是带着单纯的快乐围着我绕着圈跑，然后拉着她弟弟的手随意地跑进了路边的“庭达·阿尔玛”。

“她是一个相当可爱的姑娘，”古特瑞丝夫人在一旁默默观望着，“就和她妈妈一样。”

她仍然涂着唇膏，而且今天，可能是为了拜访这位巫师，穿了一身白：一件宽大的白色 T 恤，白色的护胫，一双室内穿的白色无跟女拖鞋。这是我看到的她最为和谐一致的一次。

“蒙蒂先生想要我同你谈谈。”

“我已经告诉他了，我写过信给老祖母看她想怎么办。我正在等回音。”

“在和他们家联系上之前，孩子们也应该得到很好的照顾。”

“我是在照顾他们。”

“你让他们自个儿呆在公寓里。”

“只有过一次，因为我不得不去商店。”

“特瑞萨甚至连张床也没有。”

“在我们国家，人们都是睡在地板上的‘陪它特’蒲席里。什么东西更重要——床还是爱？为什么你对家总是毫无概念？”她追究道，“这些孩子都是你的家人，但是你并没有这样认为，你太盎格鲁了。”

“这怎么讲？”

“就像是克莱诺夫人，”古特瑞丝夫人继续道，“她那一类人是没有理解力和同情心的。如果克莱诺夫人没有解雇维奥莱塔，孩子们今天就会有一个母亲了。”

我深深地吸入一口气。

“依贝哈特夫人解雇维奥莱塔是因为她的女儿跌进一个水池里几乎淹死，而那时维奥莱塔正在和另一个女佣闲聊，没有留心。”

古特瑞丝夫人愤怒地摇动着一根食指。

“你所说的没有一件是真实的，这是对你的堂妹美好形象的侮辱。”

“但是我知道的并不止一事实，古特瑞丝夫人。”

我说话的时候她往人行道上吐了口唾沫，人已经迈步走进了“庭达·阿尔玛”。

孩子们正围在一棵纸板剪成的圣诞树旁，树上挂满了各种糖果，我被一股香料和调味品的气息诱惑了，更往里边多走了两步。一个架子上挂满了一束束的山金车花、肉桂枝、帕西拿辣椒、茴芹和巴拉圭干冬青叶，还有些是没有茎干的——一些椰子、带着青斑的桔子、两种香蕉、凤梨和花朵。摇摇晃晃的货物架上堆放着番石榴蜜罐头，玉米片，沙丁鱼，曼榴多，和玉米玛萨，还有用陈旧的灰色塑料袋装的稻米和面粉。电灯全部关着。

古特瑞丝夫人正把孩子们拖出门外。

“如果我给他们买点糖果没有什么关系吧？”

她只是怒视着。我给了他们一人一美元，然后我注意到在那棵糖果树后面是一幅天使模样的人的层压塑料挂像，搁在一个反转放置的蓝色牛奶纸箱上。

“那是什么？”

古特瑞丝夫人没有说话。一个年轻女人从柜台里绕出来。

“EL Nino de Atocha.”

她把架子移到一边，完全露出了那副画像，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似乎是天国里才有的物件，动物围绕在他四周，在画像前，摆着许多蜡烛和一个碟子，里边堆满了零钱、塑料小车、橡皮球和糖果。

那个女孩，穿着一件 USC 长袖运动衫，银星耳坠一直垂到肩头，她说英语时并没有口音。

“尼罗是一个湖泊里的精灵，帮助那些溺水的人们，或其他的失足者。在我们危地马拉，每年都有一个节日，要把他从湖里请出来，在街上为他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

“人们给他留下什么东西吗？”

“美好的祝愿。”

“为什么要那些玩具。”

“因为他其实还是小孩子，罗伯托，就在隔壁，告诉我母亲要为尼罗做这些东西。除了我们，这条街上的其他所有商店都曾经被抢劫过。”

“你在读 USC？”她点点头。“连你也相信这种谎言？”

“我母亲对罗伯托怀有坚定的信仰。我过去并不相信这个。但是许多人都远道来看他，从拉斯维加斯、得克萨斯、圣弗兰西斯科……他有很高的天分。他们来的时候都病恹恹的，离开时则心神平静。”

我向碟子里扔了些零钱。

“这难道不是一个供着神龛的有趣的场所？”

“神龛可以无处不在，许多西班牙美洲人在有人死去的地方设立神龛。像在贝伽，你可以沿路看到人们供奉的神龛，因为有很多人是在车祸中丧生的。”她把糖果树移回原处，“我们把我们的放在这儿，这样人们就不会从尼罗身边偷抢东西了。”

精灵。我想着。跟着古特瑞丝夫人出了门。

孩子们这时已经追踪着公鸡的鸣叫来到了一个小宠物店里。这儿到处挤满了养鱼缸，空气中则弥漫着养在死水里的热带鱼的恶臭味。两只公鸡在放在地上的笼子里满怀疑心地眨着眼睛。

“那些都是斗鸡？”我问那个男人。

他点点头，公鸡打斗是违法的，但是在这里，法律都他妈的见鬼去了。孩子们对那对长尾鹦鹉很好奇。尽管古特瑞丝夫人一直背冲着我，这时我还是把一只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

“我只是想知道关于我堂妹的真实情况。”

我们俩走到了门外。午后的骄阳笔直地把热力射在我们脸上，古特瑞丝夫人几次拍了拍她的白色手袋，其实她仍然是一副火热的性格。

“你的堂妹被解雇是因为她看见克莱诺夫人和一个男人呆在一起，而这个人并不是她的丈夫。”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维奥莱塔带着孩子散步回来，一个男人和克莱塔诺夫人正在屋里。”

我想起沃伦·思佩尔卡对我说过，他见过维奥莱塔一次，那时他去克莱诺家，他们间的私通关系临近终结。一定是那一次。

古特瑞丝夫人憎恶地摆了摆手：“他们没在干好事。”

我能够明白，沃伦·思佩尔卡让克莱诺吃了一惊，他被她将要离开她的婚姻生活这类的幻想激励着，把她推到她丈夫的房子的墙边，试图在那儿就跟她造爱，站立着，正在那水晶吊灯底下。

“维奥莱塔进来了。他们很吃惊，但是当时都没计较。那男人马上就离开了。维奥莱塔非常生气。她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

古特瑞丝夫人的声带嘶裂了。她拭了拭眼角。

“‘你有丈夫，’她对克莱诺夫人说，‘你对上帝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手袋打开了，一大卷卫生纸滚落出来。

“维奥莱塔说：‘我爱你的孩子们，就像他们是我自己的一样。我离开了我自己的孩子来为你工作。我没有欺骗过你但你却对我撒谎了。你像一个妓女随便和男人睡觉！’克莱诺夫人当即解雇了她。”

“她害怕维奥莱塔会告诉她丈夫她乱搞的事情。”

“是啊。”古特瑞丝夫人粗鲁地擤了擤她的鼻子。她的态度转为冷淡。她将要告诉我的是生活中的事实：

“克莱诺夫人散布了一个可怕的谎言，她把小姑娘差点淹死说成是维奥莱塔的过错。维奥莱塔找不列工作。她没有介绍人。她连房租都付不起。特瑞萨的耳朵被感染了，诊所只收现金。维奥莱塔很害怕，她和孩子们会倒毙在街头，或者和无家可归者们一起住在教堂的地下室里，或者，也许会有好心的人把她的孩子们带走。几周以后，她找到了一份夜间的工作，替西洛杉矶的一家大健身俱乐部洗衣服。她的孩子就睡在我的房间里，直到每天早六点钟她回家来。只有一个晚上，她再也没有回到家中。”

犯罪现场的照片讲了以后的故事。维奥莱塔在天亮之前在那个丑恶的街角下了公共汽车，迈着迟缓的脚步走过那伙黑帮和毒贩子，现在这条路线早已被踩熟了，她已经接近家门口了，她又是那么疲惫，她完全没有一点警觉。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那是克莱诺夫人的错。”

我记得第一次在她家的大门口遇见她时，克莱诺·依贝哈特就在力图克服一种罪恶感，她的行为就像一个嫌疑犯，总是想掩藏些什么；一次私通的丑闻。彻底的掩盖手段是在毁灭中完成的。

“还有一个事实：那个女孩的确掉进了水池里，但是维奥莱塔救了她的命。”

我仍持着怀疑的态度扬了扬眉，但古特瑞丝夫人的头却已经点过无数次了。

一个染着金棕色头发还很年轻的男人朝我们走了过来。然后把钥匙塞进了那扇生锈的大门。

古特瑞丝夫人立刻恭敬地微微点头致意，像是对待一个神父一样：“Buenos dias，唐·罗伯托。”

他很平常地回了一礼，推开了大门，往屋里走去。

古特瑞丝夫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她说道：“唯一知道怎么做对孩子最好的人是母亲。美国联邦政府无权作出决定。唐·罗伯托将寻问维奥莱塔的灵魂。她自己会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

拉美血统的工人们正纷纷走下公共汽车，往回家的路上在“庭达·阿尔玛”里暂歇时，他们都往我这个方向投来好奇的一瞥。古特瑞丝夫人忙着召集孩子们。我最后看了一眼沐浴在骄阳下喧闹的街道，便跟随她“嗒嗒”的脚步声走进了阴暗的“植物园”。

古特瑞丝夫人，罗伯特和我坐在商店后屋的一张牌桌旁，桌上放着一台小收音机和一支白蜡烛。我很想知道通过这个传言人之口我们是不是真能听到维奥莱塔的声音。罗伯托大约只有二十五岁的年纪，一个有着阴暗的变态心理的同性恋者，留着嬉皮士的发型，后颈部分的头发全被剃光了，但头顶的蓄得很长，挂有一只金箍耳环。他穿着一件丝质的褐色衬衫和一条棕色裤子，但是总好像有点什么东西不太对头。他的身体各部分似乎也不协调——对于发育不全的躯干而言，他的手臂应该说太长了——而且还有语言障碍。他有一侧的嘴似乎是瘫痪的，当他奋力向我们解释他是如何获得他的才能时，他的手指一直在懊丧地擦着他的脑门。

“我的父亲和祖父在我们村里一直是干这行的。常常有一百多号人排着长队等在门口。我从七岁起就开始向他们学习。”

当说到“传言”这门生意时就简单多了：“你们告诉我实情然后我便告诉你们实情。”

他点亮了蜡烛。

尽管从外表看起来这地方满目疮痍，但是里面的地板很清洁，事物摆放都有一定之规，闻得到一股薰衣草令人舒坦的香气。在过时的木头橱柜背后是排搁架，放满了装着红色、蓝色和绿色油液的半盎司方形小瓶。靠近天花板的那层架子上刚搁着许多八吋长的玻璃烛台，每一支上都有一幅精灵画和一句祝愿或拯救或保护的诺言。

从天花板上吊下来一串串彩珠。靠近门口有打成包的草药和香料，一个石膏制的美国土著酋长的模特儿，以及一棵芦荟，在它的披针形树叶的弓脊上缚着彩色缎带。在一个展台上陈列着念珠，牛的塑像，几件恐怖的装饰是从黑色三角铁里向外探视的独眼球，几本关于“红巫”和“绿巫”的油膩的小册子，还有在一个旋转架上，则井然有序地摆满了各种精灵的塑料画片，标着数字以便易于选择。

我们让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与印第安酋长，怒睁的眼球一起呆在牌桌边一个隔板后面。在我们身后是一个多层祭坛，上面安放着装满水的玻璃杯，蜡烛，几钵菊花，以及一个装了三只小鸡蛋，上面撒着五彩纸屑的碟子。

口中开始念念有词，主要是用西班牙语，但也兼杂着少量英语。然后是古特瑞丝夫人讲述维奥莱塔的孩子们的处境。唐·罗伯托一边听一边让她在一张便笺上写下她的名字和她母亲的娘家姓。他数一数这些名字的字母数，然后按照这个数目发“塔洛特”纸牌。

“请集中精力想这些孩子们的母亲，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吧。”

她顺从地闭上了她的眼睛，我盯着收音机看，头脑里已召唤出了那张鹦鹉的相片。然后，一种强烈的感觉向我袭来，似乎我手里正握着维奥莱塔那本皮面的小圣经；它冷冰冰地，就像有一次我在我的阳台上发现的一只蜂鸟令人心碎的纤弱尸体。

古特瑞丝夫人被警告，不要叉着腿，不要靠在桌边上因为这样会干扰“能量”。她必须翻过两张牌来，从右至左。第一张是 ELsol，太阳。

“这张牌是指萨尔瓦多。”唐·罗伯托说。

第二张，上面有个婴儿，代表美国。

打着呵欠，他相当熟练地把牌重新洗过一遍，接着又把它们分发出来。他让古特瑞丝夫人挑出第十六张。

“现在你必须非常努力地想着这个人。”

我们气都不敢多出一口。古特瑞丝夫人垂着头默默祈祷。唐·罗伯托又是念念有词：“我感觉到她的灵魂在靠近，告诉我们，妈妈，对于你那两个漂亮的孩子，你希望什么？”

罗伯托庄严地摊开古特瑞丝夫人所选的第十六张纸牌。他点点头，于是她再随意地翻开一张。正是那张“EL sol”。

一阵战栗刺穿我的身体，像经受一次地震。

罗伯托的嘴已扭歪了，尽力想表达出他所见到的：“母亲想要孩子回到在萨尔瓦多的外祖母身边。”

古特瑞丝夫人双手按在胸口上。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他示意她翻开“EL sol”右边的下一张牌。它是一张“撒旦”。地狱！

“但是”罗伯托一侧的脸扭曲着，倒吸着凉气结结巴巴说——“萨尔瓦多会是一座人间的地狱。”

古特瑞丝夫人尖声叫了出来。连正在那边旋转着精灵架玩的特瑞萨也紧张地朝这边张望。

“孩子们必须呆在这里。”

“不行！”

“那是最好的方案。”

她摇着她的头，叫嚷着，抓住唐·罗伯托的手。她强烈的感情弄得我烦躁不安。

年轻男人的头拧了过来：“我将告诉你维奥莱塔的情况，”他温和地但相当艰难地说，“她仍不得安宁。”

立即我就明白这是事实，不安宁的不仅是维奥莱塔，还有成批的死者。死者的军团。

“她的皮肤比我更淡色，”唐·罗伯托继续道，“她爱笑。难以确定孩子们是否是同一个父亲。”

古特瑞丝夫人热切地点着头。

“还有另一个孩子，落下的孩子。”

那个男孩子在萨尔瓦尔。热泪在我眼眶里转着圈，我生怕它马上会掉下来。

“她曾经跟水全力拼斗过。”

古特瑞丝夫人才放开他的手，自己带着忧虑坐了下来。

“是的，”她说，“是在一个游泳池里。”

唐·罗伯托合上眼。

“维奥莱塔正在和水搏斗，有人处于危险中。他们正在下沉。在池底维奥莱塔看到了 una bruja del mar，一个海中女巫！”

古特瑞丝夫人大口喘着气，我则感受到一种新的震撼。

“女巫长着长长的白头发和蓝色眼睛，它是一个妒忌的女巫，它的手臂缠绕在溺水者的膝盖上，想把这个人拖进水的深处，掠夺她的生命。”

唐·罗伯托擦了擦前额，他的眼睛挤得更紧。

“维奥莱塔非常害怕，但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

古特瑞丝夫人哀伤地啜泣着。

“正因为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她没有从水中逃离，而是抓住了正在沉溺的人，这时候，只有这一次，海中女巫放过了她们，那个人得救了。”

古特瑞丝夫人为这次的灵魂磋商支付了二十美元，还有两美元买尼罗的挂像，一点七五美元买一种叫“罗帕卡米娄斯”的斗盎司红色油液，唐·罗伯托说它会“打开四条路”。瞧了瞧瓶底，我知道了这种油液产于加利福尼亚的戈登那。

“还有你，”他告诉我说，“如果你继续过分地想到你的堂妹，你就将变得像她。”

我不知道他是指萨尔瓦多人还是死人，但唐·罗伯托推荐了这种补救法：把羊奶、牛奶、椰奶，这些在“庭达·阿尔玛”都可以得到，混合在一起装在一个容器里，采摘一些白花瓣，再添加任何一种我喜欢的香水和鸡蛋壳，搅拌后使之充分沉淀。在淋浴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倾倒在我的头上。这不仅可以使我放松，还可以来一次“灵魂的清洁。”

然后，我就要在一杯水里漂上一朵白色的花，把水放在高过我头顶地方。电冰箱的顶端就比较理想。每过四天我必须换一次花，但是我不能把它扔“掉”，我得往上抛。这样的话，维奥莱塔的灵魂就将得到安息。

我仍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动。我从搁架上取下一个穿着蓝色长袍的石膏精灵，想用来作为护身符，但是唐·罗伯托却拒绝把它卖给我。

“你用不着这种。只要遵照我教给你的方法去做就行了。只要你产生了信仰，它就会发生效果。”唐·罗伯托说，咬着每一个字节，“像一个神迹。”

出了门，我让古特瑞丝夫人搭我的车回北好莱坞，但是，她不想再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恩惠，她说她愿意坐公共车。

“你现在怎么想？”我问。

她放低了声音：“我信任唐·罗伯托。”

“你明白孩子们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领养。”

她伤感地点点头。

“芭比和我会在你生日那天来看你的。”我向特瑞萨保证。

她对此回应了一个甜美的笑容：“谢谢你，安娜小姐。”

“还有，克里斯多巴——我也会给你带礼物来的。”

当我回到汽车里时，我的胸口仍然隐隐作痛。为了孩子们即将经历的，虚脱的社会福利服务会像走马灯似的围着他们打转，直到他们长到十八岁，变得成熟，得到机会，但是还有另外的希望。这里有我在，我能够使事情发生变化。我能够确保他们得到很好的照料。我能够做他们的保护人。我发誓会和他们的老师交谈。保证他们不会学坏。带他们到 FBI 办公室里去看看，就像其他特工们为他们的孩子们所做过的，这会对他们形成好的影响，我会领着他们去电影院，去动物园。我会带着我的年轻的远亲们去海滩。

现在我正穿过杰佛逊海区往回家路上。这里景象凄凉，低矮的砖构工业建筑，房顶上是打着卷的各式电线，连绵的围墙上贴满了美发和电视节目折卖的广告。触目惊心的涂写污染——巨大的字母，书法的粗鲁狂野——在起伏不平的金属一样的黑墙上搅起一片浊气。有一百多个黑衣穆斯林正从小礼拜堂里涌出到街上，他们同帕几娄的拉美族人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卓尔不群，自成一系，也远离着蒙塔娜之北那些购物的闲人。

只要那一丁点的红色油液能够打开四条路……。路死了，就指像死去的神经一样不可能再联通；这里有那么多的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他们像无情的迷宫中的弹子再也见不到踪迹。

我重新拐上了高速公路，想起她躺倒的圣莫尼卡大街的死亡人行道。她在那儿，看起来是那么孤立无助，从她的幻觉的底层升起的黑暗渗透进一切事物之中，嘴，鼻子，眼睛，渐渐地，这个喧哗世界里所有声响随着一个庄严的沉默，终结了。

她孤独地在这黑暗中，一会儿之后，她再也辨不清谁是谁，哪儿是哪儿——生命被卷走了，或者只是一道序幕被拉起。

眼睛的瞳孔只痉挛了一下，便不动了。

她的身体也僵直。

她知道她已经淹死。海中女巫的手臂缠绕在她膝盖上，这次她再也没有力气逃脱。哦不——那不是海中女巫！那是她自己的母亲呀，康斯坦萨，她把她的女孩从可怕的孤独的黑暗中举起，举到她安全的肩膀上，只有在这里，世界才是可靠的和明亮的。只有母亲，这是怎样的一个宽慰，我想，才

会毫无计较地，为你的生命之路作着铺垫，到她七十岁。终究，是母亲。

（二十四）

我希望我能够说，自从有关玛森案件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办公室里的基调已经根本的变了；人们怀着敬意聚拢到我的办公桌前来，想知道事情发生的每一处细节，一个哈佛医学院的医生自杀而死，一个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处于毒品调查之下。莫瑞恩供认出了毒贩的姓名，他被证实与墨西哥黑手党有牵连，所以至少简娜·玛森没有捏造这个事实，狄劳狄德确实来自墨西哥。这对吉姆·凯利和毒品组的小姐绅士们来说是个好的导向，但是对于“牛棚”里余下的家伙们而言则是事不关己。

从我桌子这边的有利位置观察，我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在处理自己的麻烦事，每位特工都要同时对付四十件以上的案子，独独在我的电路筐子里，只有两打未完成的关于武装劫案的报告。但是在这种时候，面对所有那些暴行，我所能激起的唯一反应就是坐在这里，漠然地耐心地把剪下来的纸条，一张接到另一张上。

只有当亨利·卡拉维蒂摇着他的电动轮椅进来分发邮件时，我的兴趣才偶尔达到一次高峰，但也维持不了多久。处理到C—1组的调职申请将花掉数周的时间，而且我可能会消耗全部的时间，麻木地立在原地，想怎么样能够逐步建立起勇气去和麦克·唐纳多搭上话。我们已经有好几天在互相躲避。

这会是很长的一串锁链。

问题是……好的，他们是不会为此为女人们说一句话的，但是我曾经听见男同事们把这种环境称作“持续肿胀”。这是一种集中的感觉垂临在你的身上，无论何时它都会燃起强烈的，难以承受的渴望，只要你瞥见，比如说，他的腰背部，便会想到他把我的手插进那腰带里，缓缓地抽出压在里边、带着汗味的粗棉布衬衫的衣襟，感受着暖融融的肌肤，用我的手指在脊柱上刻画，一直画到它变细的地方，就在臀部不容置疑的曲线之上。我最好是站起来，散散步。

“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给了我一个友好的暗示。唐纳多正和凯乐、弗兰克一起穿过屋子。他穿的正是那件粗棉衬衫，一条森林绿的编织领带，牛仔裤，对我完全是装腔作势的挑衅置之不理，手抬起来，搔着他的后脑勺，身体过度的舒展，毫无顾忌地露出了胸肌和腋窝。迟疑着该不该上前，但我告诉自己有绝好的理由加入他们的谈话，他们确凿无疑是在谈论即将举行的全明星赛，我振作精神在头脑里复述了一遍我在体育版里读到的几行字：圣弗兰西斯科队的主管，罗杰·克雷格；和埃斯队的当家，托尼·拉鲁萨，一个素食主义者。

我只走到半道，SAC 罗伯特·高罗威插了进来，打断了这次设想中的甜蜜偶遇，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去。但是我估摸着我一样可以把我准备好的台词用到他身上。

“你说罗杰·克雷格会把托尼·拉鲁萨捣成牛肉馅饼吗？”

“我总是因为罗杰·克雷格而陷于哭笑不得的窘境之中。”高罗威说：“他在起用梅茨的第一场比赛中就在说大话，到这个赛季结束，十胜二十四负的劣绩足以说明他的级别。”

高罗威从咖啡桌上拾起那枚 NYPD 侦探皮带扣，在手中掂量着，没有说

话。我很不自在地站在房中央。

“简娜把它寄还给你了？”

“我请一位头儿回纽约的时候给我寄了枚新的来，没有它真让我有点神经过敏。”

“好极了，因为现在你可以安静下来了。”

高罗威的手指在他的波浪型头发上虚拂了几下，显然，他的情绪似乎也高昂起来。

“我想要你去与寡妇谈谈。”

“阮德尔·依贝哈特的寡妇？”

“我想要你代表调查局对她的不幸表示慰问。”

我干脆晕倒在这金色的地毯上算了。

“我应该怎么说？”

“就说我们知道她丈夫是清白的，我们会找出真正的坏种。”

他放下百叶窗遮挡早晨的阳光的探视。

“我对外交手腕可是一窍不通。”

“只是去看看她，女人对女人。保持低调。”

“为什么是我，做这样的事？”

“因为这有助于树立调查局的形象……还有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高罗威坐在执行官的椅子上，目光注视着关上的百叶窗。这是他的方式，要为对医生办公室的荒唐地劫掠承担责任，可能是，当然也可能不是这个原因催促医生带走了自己的生命。自杀是一个谜，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谜底；尽管我被深深地触动了，也尊重高罗威的仁慈，但我还是真他妈希望他能自己来填写这张该死的吊唁卡。

我一直等到天黑以后，为了使这次访问看起来是工作之外的事，“低调”的。好家伙，可我确实不想这么做。我们首先欺骗了她的丈夫，然后发现她排斥过一个无辜的女佣人，要对这样一个女人表示我们的同情心，这主意真让人恶心。我打算捎几句话过去就走人。沿着圣维森特往下行驶，我被一种不坚定地强迫自己最后一次经过第二十街外公房子的念头所刺痛，而最终还是彻底屈服于它，甚至是最短暂的迂回一次也会让我感到一种奢侈的回味。

但是当我把车开近屋子前边时它已变得完全陌生了：灯亮着，里面有人在走动。

我在路边停下。踩着混凝土小径经过山毛榉树走向门口。当我的手握住房门把手的弧面时我停了下来，试着感觉一下记忆，剩下的拇指抚弄着已经长了块绿锈的破旧门锁。“记着上锁”，它说。涂着棕色油漆的圆门铃失灵了，但门并没有关上。

我跨进一间小斗室，橡木地板，有一个铸铁暖气管。立刻有一位面色红润的女士从厨房里出来，向我伸出手，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运动上衣，银白色的头发编成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

“嗨，我是黛娜·玛德森，‘太平洋海岸房地产’，今晚一切都好吧？绝好的起步者的房子，你不这样认为吗？”

“确实是起步者的房子。我是在这里面长大的。”

“你骗人吧。如果你认为它有情感上的价值，赶紧抓住它吧，我只是带着两位韩国商人参观这边的地产，他们想买下邻近的这两块地，把旧房子拆

了，然后修建两栋时髦的大屋。”

“什么是时髦的大屋？”

“通常大约有五千平方呎，五、六间卧室，全套家具，壁炉，环境典雅舒适。没有后院，但那是你不得不牺牲的。”

“我见过。”依贝哈特家的房子就是这样的。

“我自己的感觉都曾经混乱过。”她附和着我的腔调，“我听见他们叫它反建筑。对一家人来说它可能太大了，而且难看，违背常理，但是它们可以卖上几百万美元，人们也爱寻找些新鲜的东西。”

以前的屋主都留下了那棵不自然的树。

“那么你是在这儿长大的了。可能自你出生那时候起我就已经在圣莫尼卡出售房地产了。我 1961 年开始干这行时，十年以内蒙塔娜之北没有修建任何新房子。人们宁愿离开他们在狭窄地带矮小的加利福尼亚平房而去‘太平洋岩壁’买一套牧场住宅。他们也在寻求新鲜的玩艺儿。蒙塔娜过去是一条发臭的小街，哼，你们拥有了金巴利超市和苏氏加油站。我们过去有许多加油站，无处不在。”

“我想去看看后院。”

我越过她，走进装着桉木壁橱的厨房。我不能忍受这一切的终止，不去想这儿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一架微型便携式索尼电视机搁在缺角有隙缝的白瓷橱柜台上，开着。

“我走到哪儿都带着它，”她解释说，“有许多的时间你得坐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

她跟着我走到后屋，嘴里不停地说着。

“你还记得第七街和蒙塔娜西北拐角的 V 形臂章加油站吗？然后那儿又有了飞行 A 加油站，接着是第十一街的联合 76 加油站。在第十四街有埃珂加油站，另一家牟比加油站也在那儿建起来了……”

纱门被我“砰”地关上，那张脸在门后还不停地数着圣莫尼卡剩下的加油站。我迈下台阶走到后院中。架置在一根高电线杆上的一盏泛光灯，照亮了插在一张圆桌中间的小孔里的大遮阳伞上的圆点花纹，花纹颜色早已褪尽了。我拉开一把摇摇晃晃的金属椅子，可以听到海风穿过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隔壁的小孩子在说：“呀——呀——呀。”

我的视线顺着一架梯子爬上了绿色木屋顶，那儿还有一套锈迹斑斑的老式电视接收天线射向空中，不用怀疑，就是它过去常常把我带入《狄克·凡·戴克娱乐时空》。一辆轿车从小巷经过，这时我注意到这里竟有双重栅栏，两层绑在一起，高的那层是用木材做的。也许这样连接起来支撑着最初的栅栏要比拆掉它完全重新搭起一圈新的构造简便得多，也更周密。红木厚板间再留不下什么空隙，不像以前我们住在这里时那样，到了晚上，汽车经过也不会有车灯光穿透进来。记忆的明晰让我自己大吃一惊。今天晚上我会花掉多少时间呆在这个后院里。

“你可能不会记得，但是，沿着大海和第七街之间的‘岩壁’区域，那时候你只需花上四万美元就可以得到双份地盘。”

我转过身来，开始面对着这个站在纱门后面的真正地产女性漫射的身影。

“五十年代他们就开始分割这些地盘，当然，劳伦斯·韦尔克修建了他的闪光的白色堡垒于是你们现在才有了被称之为摩天大厦的东西。我们没有

能够保留我们对太平洋应有的尊重，哼，现在你随处可以见到的是圣莫尼卡正在为迎接二十一世纪把自己重新修整一番。”

我听得不耐烦，推开了门。这位真正的地产女性已经把头扭向了橱窗上的电视机，里面正在播放当地的晚间新闻，领衔主演的是发生在百威利·希尔的一点儿小骚乱，当时，简娜·玛森正在萨克斯第五大街露面，介绍她的新型化妆品系列。

没有人想到竟会有二千名妇女排着长队等着看到她。人群失控，中年家庭主妇们像一群暴徒一样疯狂地涌进化妆品部。我们从一个朴素的微型荧屏上观看到这滑稽的一幕，简娜·玛森出现了，把玫瑰花抛向人群时，所有那些女士能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她不漂亮吗？她依然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二十五秒钟之后，这个故事结束了，换上了一种肃穆的强调声音说，就在几天之前，因为违法使用麻醉剂而被玛森小姐起诉的医生自杀了。他们再度闪回那张模糊不清的，阮德尔·依贝哈特躬着背的照片，明显地暗示，他之所以杀死自己，是因为他在医疗保健这一行当中做出了欺诈行为。

我取过一张纸在上边画了画房子的大致情况，算出八十七万五千美元出售价值。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我出去的时候顺手将它扔进了那棵造作的树里。

怀着动荡的和不愉快的心情，我把车开到了第二十街，远远停在依贝哈特家的住所外，强迫我自己艰难地走上一段路。在她开门的那一刻，无论我对克莱诺·依贝哈特有什么样敌意，都已开始变得淡漠了。

她削瘦了许多，眼圈下出现了青肿的眼泡。一件老式的钮扣松垂的黄色衬衫挂在她嶙峋的身形上，袖口挽起来，它对她来说实在是太肥大了。也许它原本是阮德尔的，或者也许是她过去一周里就掉了十磅的体重。在她身后的房子显得很空，只有从隐蔽的位置传过来的电视机的回响，似乎播放的是同样的当地新闻，我刚刚才在第十二街见过来的。我意识到她一直在反复察看被媒介残忍对待的她的丈夫。

我又一次做了自我介绍，因为明显的看出她过于焦虑不安，不大可能想起我来。当这个词“FBI”一说出口，她就开始哆嗦。

“怎么？你到这儿来做什么？”一只眼睛变红了，开始渗出泪水。一只颤抖着的手在脸颊上不由自主地轻轻拍打。

“我奉命来向你通告我们的调查情况。”

“为什么向我？”

“我们想让你知道，你的丈夫已不再是我们的调查对象……”

“不再是调查对象？”

“他已经被宣布无罪，没有做任何错事，我希望这对你多少是些安慰。”

面对着她毫无反应、被深深蹂躏过的脸，我感到自己是个彻底的傻瓜，只能用更多浮华的语言来掩饰自己的退却：“我们正在坚决地追击真正的罪犯，我们希望对他们能够按照法律程序施以公正的裁决。”

她根本没有在听我说的话，她麻木了，这些话塞进她耳朵时肯定就像一团乱麻一样。

“他杀死了自己。”

“我知道。”

“孩子们送回波士顿和我的家人们住在一起。真是好笑，我的女儿是真的爱上过加利福尼亚……”

她确实微笑看，闪光的泪迹遍布在她阴森可怕的笑容上。

“……但是现在她害怕呆在这栋房子里。这个小女孩是她爹的公主呵。”

在那间检察室里，依贝哈特大夫告诉过我关于他女儿的事，说她就像一只小猴子一样往钢琴上爬。我记得在他的语调里充满了引为自豪的柔情。

“我刚刚在新闻里看到简娜·玛森。她看上去是挺不错的。她宣称她从未进行过矫形外科手术，阮德尔说确实如此。我敢打赌她已经卖了好多化妆品。我们一直喜欢她在电影中的形象，但是，真的，她有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妙嗓音，甚至在她成为我们的病人之前，我们就有了她的全套唱片集。从波士顿带过来的。”

一脸抽搐的怪相。

“你也将搬回去吗？”

她对这个问题没有反应。

“你知道吗？我接到一个脱口秀打来的电话，他们正打算搞一点什么东西，关于‘罪犯医生的妻子’。”

“那很恶劣。”

“我告诉他们阮德尔不是个罪犯，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们知道这点，依贝哈特夫人。”

“可简娜·玛森做过。”

突然间，一股晚香玉的香气变得难以相信的浓郁，把我们全都裹在它令人生厌的焦糖一样的腻味中。

“简娜·玛森做过什么？”

克莱诺·依贝哈特的胳膊垂抱在腰际，以抵御湿润海风的侵袭。这是第一次我们抱有同样的信念站在这个门槛的两边，护士和警察，世界原本就是这样运转的。那双有缺陷的眼睛重新盯牢我。

但是，她说出口的只是“祝你好运”，然后便轻轻掩上了门。

我往回走，钻进了汽车，发动了引擎。正当我打亮转向灯向后视镜里一瞥的时候，我看见阮德尔·依贝哈特的青铜色阿库拉在行车道以外粗野地转过车身来。它的轮胎“嗤”地跳过路边石，所有车灯全部打开。一开始它似乎是直接朝我撞过来的，一时间竟让我不知所措。但是反射镜突然又变得一团黑，我意识到克莱诺·依贝哈特转弯了，它开上另外一条路，朝向圣维森特林荫大道。

我立刻也掉转巴罗库塔的车头，跟在她后面，沿着第七街的斜坡向下到查陶葵，然后从这儿驶上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一直向北开去。

我一路上都在想那位日本移民妇女，由于对用情不专的丈夫恼羞成怒，她就是沿着这条线到维尔·罗格斯海滩，从那里走过沙岸，走进海浪，投身于太平洋之中，还带着她的两个幼子。孩子们淹死了，她没有。然而，克莱诺·依贝哈特却是一个人在车上，保持着五十五英里的均匀时速，遇上每一个红灯都谨慎地停下。她继续往前开，我也放松了一些，认为也许她只不过是开车出来兜兜风、散散心，但是，就在经过了倍伯戴恩之后，她左转弯驶入阿诺约路，这个方向是通往简娜·玛森的私宅的。

但是我却被一伙骑摩托车的飞车党阻隔了，他们有三十到四十人，骑在他们的“哈里斯”上，排成四分之一英里的长龙，嗡嗡地轰鸣着，排满了整个双向车道，就像一群炸了窝的蜜蜂一样狂暴蛮横。我的车停顿下来，转向信号“啪啪”地闪烁着，肾上腺激素越升越高。

许久以前，似乎，是在一家银行前的停车坪上，我遇到的是类似的自由

主宰的境地。市民也许受到过威胁，我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选择了傲慢与莽撞的方式，毋须寻求任何的支援。那一次我是幸运的。这一次我拾起了无线电话。

“编号 345 呼叫。”我对着调查局办公室的无线电通讯间说道，“请你通知洛杉矶县司法官，马里布警察局，并要求他们立即对有可能出现在阿诺约路玛森的地界里的骚乱事件作出反应。要让他们务必搞清楚，已经有一位 FBI 特工在场，并且需要帮助。”

等摩托党过完以后，我才猛然横过高速公路，数秒钟内，巴罗库塔的速度便提升到五十，我在桉树覆盖下的肮脏小路上颠簸着，穿越黑暗空旷的草场，直到很快我看见那间门房迎面而来。克莱诺·依贝哈特一定是用她丈夫的通行证瞒了过去，因为现在防护栏杆已放了下来，考虑到这个障碍可能会延误地方司法官的手下，而且现在我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停也没停，一头撞了上去，一下把木头长臂弹到空中，变成碎木柴，只能希望对护栏架没造成什么损害。

所有这些已经给了克莱诺·依贝哈特充裕的三分分钟的领先时间。我在碎石停车坪上画了半个圈，“嘎”地滑到玛格达·斯脱克曼的凯迪拉克旁停下。阿库拉扔在一边，引擎仍然转动着，白色围墙的前门半开。她当然还有她丈夫获准使用的这栋房子的钥匙。

我跑进庭院，它处在两面零碎的聚光灯照射之下，在水池里有几点摇曳的绿色反射光。远端暗黑的院子角落，克莱诺·依贝哈特逼近了玛格达·斯脱克曼高大的身形。斯脱克曼打着驳斥的手势，对着入侵者说着什么，然后弯腰捡起了一段盘卷的花园软皮水管，把它挂回到它的挂钩上。

我加快脚步向前，一面叫了出来：“克莱诺。”

有人把滑动玻璃门拉得更开，说道：“怎么在外边打招呼，出什么事了？”

与此同时，简娜·玛森刚站在那个亮着灯的房间的门槛上，她的身影清晰可见。

克莱诺·依贝哈特拔出一支手枪就开了两火，玻璃全部崩裂了，又一个三连响声在随后的不到两秒钟内发生。

我的武器已拔了出来，瞄准医生的妻子。

“警察。把枪扔掉。”

她的头朝我扭转过来，黑头发甩出一片模糊的亮光。我退后了一步，但是身姿保持了稳定，我的脚步扎牢，我的手臂平稳。我现在反而感到放松，数百个小时训练使我完全能够控制在我心灵上搔动的情感因素。

“把武器放下。”我沉稳地说。

玛格达·斯脱克曼迈进了一步，克莱诺·依贝哈特忙乱地转着身子，手枪已缩到了胸口，后背靠在一个石砌的花台上。

“放下它。”

“别做傻事了，”斯脱克曼的声音像锉刀一般粗厉，“我们得叫一辆救护车来。”

在我的右边，用眼角的余光，我看见门有很长的裂缝，并被打掉了一大块。在屋里，简娜·玛森躺在地上，喷出的唾沫、手里抓着和咳出来的都是血，溅到了满地的长条碎玻璃上。

“听着，克莱诺，我已经叫了后援部队。警方正在赶来。”

“到我面前来，杀了我吧。”克莱诺·依贝哈特的脸完全扭曲了，灯光

落在上边像雪一样惨白。

“你还有太多东西值得你活下去。想想劳拉和彼得。彼得才一岁呀。难道你想叫他们既没有父亲又没有母亲过一生吗？”

我又往前靠了一步。她的枪仍然直直地对着斯脱克曼的前胸。

“我很同情你，克莱诺。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你一定能够应付过去的。把你的枪放下，我也将放下我的，我们来好好谈谈。”

她只是瞪着眼，身体似乎已失去了机能。

“想想你的孩子们，那才是需要做的。”

非常缓慢地，克莱诺·依贝哈特弯下了腰，随那武器落在地上。

“疯子！”斯脱克曼嚷道，蹒跚地朝房子走去。

“你做对了。”我迅速地对克莱诺·依贝哈特说，“现在只需要放松，放松。”

我们听见警报声，不久，电话筒的喧嚷声也来到了门外。因为对方放弃了武力，强援又已在身后，所以我能够走得更拢，于是我把枪插进了皮套，但我接近她时手仍未离开它半寸，嘴里保持着“嗒嗒”地说些抚慰的话。那武器是一支小巧的五发，38“史密斯&文森”左轮手枪，它是易惊慌的医生买来保护他的家庭的，超过二十呎的距离就不那么准确。我一脚把它踢开。

我放上一只手在克莱诺的肩膀上，她的精神在这一点触动下彻底萎缩了，身子沉了下去，靠在花台边上，口中呢喃道：“对不起。”

当地警方把这儿的乱摊子接管了过去。这本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以内。他们铐上了嫌疑犯，将她拘留。他们先给伤员用了CPR，并且通知了医护人员正在剪除撒满各种形状的碎玻璃片、血迹斑斑的罩衫，把各式医疗仪器联接在受害者的胸部以便把脉搏、呼吸、体温、血压等的数字随时用无线电信号传送给当地的急救医院。那张漂亮的脸现在极为松弛，平日的红润转为苍白，眼睛懒洋洋地闭着。那些医师中的一位在她的胸口按了按，气体立即随着血液一块儿汨汨地冒出。“血胸。”他说。凶杀处的代理官想知道受害者的状况，以便能够指控嫌疑犯。医院的信号返回来，没有生命指数。伤害太严重了。女演员有可能在射击之后几分钟里就死了。指控罪名将是谋杀。

这是最后一次我认识到玛格达·斯脱克曼，她跪在湿的混凝土地上，她的头后仰，十指紧捏在一起，哭着：“我的天，杰伊，噢我的天，杰伊。”而奇怪的是，这种惨痛的声音听起来完全像我的母亲。我从未听见她的声音像这样，并不高亢，钻进我耳朵里，有十五年了。当他们告诉她，她的著名的委托人已经死了时，玛格达·斯脱克曼的前额非常缓慢地垂到地面，而且很长时间就以这种方式呆在那儿，悔恨地压弯着腰，直到有人把她拖开。

我记起了母亲的哭喊，因为恐惧，我的脸一下子烧烫了。

它经常把我从床上唤醒，我爬起来，迷糊地走到门厅里，她叫我在睡衣外边再穿上一件毛线衫，因为，似乎很奇怪，我们就要去码头找冰淇淋。我记得在我床头的墙面上挂着木头雕刻的玛丽和她的小羊羔，在我的音乐盒里甚至还有一只黑色的毛茸茸的羊羔，它在里面演奏歌曲。

当我第二次走出卧室时，我抓住那只羔羊，扣紧了身上的毛线衫，因为我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小女孩。后院里有说话声和咆哮声。我没能找到我的母亲，我就走出门，那时我父亲正和外祖父在激烈地争吵。我的父母一定是刚从拉斯维加斯回来，他们在那儿结了婚，而外公一定是气得发疯，因为这个愚昧的非法打工崽子胆敢拐走他的女儿，胆敢威胁拿着黑色警棍的他，让

警棍戳了个空。

我来到他们两人之间。我父亲抱起我也紧紧地搂住他，我的双腿夹在他的腰间。这时候外公试图把我从那双手臂中拉开，因为他们在同一时间都咆哮了起来。我跌到了草地上，一辆轿车从小巷里穿过，几束光线扫过庭院。在车头灯光脉冲里，我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那不是蚕豆地里的几个工头，那是我的外祖父，他举起了他的警棍，用力砸在我父亲的太阳穴上，然后是肩头、脖子，砸，直到鲜血从太阳穴上一道道地流下来，他强烈地抽搐着、瘫坍着，最后悄无声息地躺倒在地上。

引擎吼叫着，宇宙间最响亮的声音，我母亲一直在等我，当我爬进停在屋前的汽车的时候，不安地攀在巨大的方向盘下边她的大腿上，告诉她我看见了什么，可能，或者也许一个字我也没能说得出来。但是，无论我说了些什么，那个晚上我们的确开车去了码头，我还记得海风是如何刺穿我的毛线衫，我们如何坐在一块沙滩上，还有，最后，她如何把我揽进她的怀里，哭着，她是否知道或者怀疑过是她自己的父亲杀死了她的新婚丈夫，我永远不得而知。我想知道他如何处理那具尸体，但毕竟，他是一名执法官员，他是否能更好的隐匿一次罪行？也许他把它倒在了脱潘伽峡谷里，也许他只需要把它运到验尸官办公室，报告说在一家墨西哥酒吧里发生了酒后斗殴事件，但是，母亲一定知道米桂·桑切斯离开了她是因为通过某种方式他被外公的狂暴击溃了。随后，她过分地屈从于他，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或者说偿还给他，明显地逗留于世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了。那次的事件我应该是见证，但无论怎样的证据我都将它埋葬了，为了我自己，以及，现在我才明白，为了她。

“安娜，是我。”

他非常温和地说，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刻我的灵魂并不在这个地球上。慢慢地，封闭了我的听觉的尖锐的嗡嗡声平息下来，浪涛的拍击声重新回到耳中，低沉、稀疏、有节律。我已站在悬崖边上。

“你打电话回去时我就离开了办公室。凯乐和我赶走了那些笨蛋。”

“谢谢你。”

“我们可以照看自己。”

我没有反应。

麦克·唐纳多张开双臂从后面抱住我，我的后背靠在他的胸前，注视着碎浪在暗黑色的海中腾起一条长长的白色水线。

“你还好吧？”

我摇摇头。不好。

“我能做些什么？”他问。

我转向他，我们忘情地拥抱在一起。

“我到这儿来是为了你。”他耳语着。

我看到在黑暗中他的眼睛，它们充满了疑问。

最后我说：“我不能。”

“为什么？”

“这里面总会有一次背叛。”

我离开他，再没有朝后看。三十分钟以后，我已经在马里布警察局里，写我的陈述书。

(二十五)

SAC 罗伯特·高罗威在我们局里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透露了简娜·玛森死亡时的细节。他精心做了编排，验尸官本人亲自来到这里，还有洛杉矶县的行政司法长官，他们都用适当的语气对殒落的美国天皇巨星表示尊敬。电影音乐片协会的几位老前辈——我一直没能记住他们的名字——之一，他虽然已经八十岁了，可仍然留着恶作剧的精灵的发型，朗读了一份声明宣布设立“简娜·玛森控制枪火基金”。新闻界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并且改善了和高罗威的关系。高本人离开发言席时看起来相当满意。

在执法机构官员的幌子下，芭芭娜·苏立文得以出席了葬礼——或者至少她声称可以同保安力量在一起，占据了百威利·希尔长老会教堂前排的有利位置，有清楚的视角。她说高潮是看见肖恩·康耐妮的时候，不过，那里有足够的好莱坞名流在场，可以给各种报纸提供数月的话题。为这个重要的，压倒性的事件，媒介甚至搞了一个抽签仪式以决定到底哪些新闻工作者可获准进入教堂。任何摄影器材均不允许，但是，从过多的“内部”照片——铺满玫瑰的灵柩，哀悼的前任丈夫们（包括那位汽车大王）、孩子们、孙子们——看来，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大量被邀请来的送葬者在他们黑色葬礼包中都备有一架自动卷片机。

“我是一个历史见证人。”她宣称，一面忙着把她的黑灰色外套挂起来，查看电话留言信息，最后是往两个深蓝色、印有 FBI 盾形徽记的大杯子里倒入她著名的桂皮饮料。

“没有自作聪明的评论？”

在恰当的时候我将告诉她对简娜·玛森的依恋是一种病态，但是我还没有这份精力。我只是摇摇头。

“你怎么啦？”她问。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直觉得自己想要大声喊叫。”

我耸了耸肩。芭芭娜的蓝眼睛充满了关切。

“那是某种创伤。”

“这东西还没能来烦我。”

“噢到我这儿来，看看是谁射中你了？你应该同哈维·麦克金斯谈谈。”

“你又不是第一个提这种建议的人。”

“怎么样？”

“我不需要神经科医生。”

“那是帕蒂·麦考马克在《坏种》里的台词。”

她啜了一口咖啡。我对我那杯没什么兴趣。

“你游过泳吗？”

“没有。”

“至少还可以去游泳。”

“那可太费劲了，会让我下不了床。”我不为所动，“谢谢你的咖啡。”

芭芭娜大姐说：“这可不太好。”

“我会没事儿的。”

振作起精神，我继续处理那一堆银行劫案。我遇见了唐纳多的新拍档乔·波西塔鲁，他属于那种长方脸、短头发、膀大腰圆、雄心勃勃的小伙子，认为自己肩负着拯救这个世界的使命。我觉得我会妒忌的，但每一次他和唐

纳多离开办公室我反而舒了一口气，直到最后唐纳多走到我办公桌前来使我无法不面对他。

“你这种行为就像是大学生中的卖俏者。”

“真是可笑，”我把他挤到一边，“对不起，我得去买一个芭比玩偶。”

他顽皮地用手指捉住我的脖梗，把我拖出边门，就好像我是一只扭动着的小狗。

但是当我们独自呆在回形楼梯井里时，玩笑便结束了。我们没有接吻，我们甚至没有靠拢到一起，事实上，我们在尽可能地站开，就好像阻隔我们的空气突然有了木星大气层的密度，穿也穿不透。

“我正在离开罗谢尔。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谈论这件事。”

“噢耶稣，麦克。”

“这对孩子们来说将会很糟，的确很糟。”

他拉起衣袖擦了擦眼睛。现在我的眼睛湿润了。

“别为了我这样做。”

“谁说这件事和你有关系？”

我退得更远，这样我的后背已经抵到了粗糙的煤渣砖墙上。

“我告诉过你，我不能。不管你有妻子或是没有。”

一阵奇怪的穿堂风从楼梯井里刮过，时不时发出呜咽之声。

“所以现在所进行的一切都只是一一虚无。”

我痛苦地：“一点用也没有。”

“那么为什么？”

他问，但现在他已转移了目光，毫不相信我的狡辩。

“我不相信那会是可能的。”

“什么不可能？”他轻轻地笑了起来，“快乐？信任？世界的前途？什么？”

然后他只是沉默地看着我。

“抓住它。”他最后说。

我相信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任其自然。

“如果在你和罗谢尔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的过错，我真的感到抱歉。”

我匆忙地跑下楼梯。

酒鬼们和我都在北好莱坞圣莫尼卡大街的“繁荣”旧货店前排着长队。他们是为了度过一个长夜而花上 3.95 美元买上几品脱的杜松子酒。我则抱走了一口袋给克里斯多巴的塑料小军士，和给特瑞萨的芭比玩偶。真希望我的身体里能够起一种奇妙的化学变化，让我喜欢上酒并且喝个烂醉，我的胸口一直在痛，就好像是有人在里面埋了一支铁镐，我讨厌他们的陈词滥调，特别像结账处的那家伙（“你走好”、“谢谢”），眼泪毫无理由地就从眼里滚了出来。

在对付挡在我的车前，拍着车门的街头乞丐的纠缠时，我才把眼泪收了回去，似乎是为了把他们的腌臢气味挡在外边。发动了引擎，我把那一切全都抛在后边彻底了断。我想要在我见到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时我的样子看起来是欢快的，一个模范的角色，一个向他们展示这个社会积极的一面，展示辛勤工作后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的人。

没有人应我的门，而门廊的门锁是破的，所以我直接从“气管”下走过

上了铁梯。现在是晚上六点三十分，我希望古特瑞丝夫人正在家中准备丰盛的晚餐，从而不会再有人打电话给“儿童与家庭服务”。但是，当我接近房门时越来越强烈的打击乐声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我敲过门以后又结实地踢了几脚，门终于被对方打开了，是一个穿着夏威夷衬衫，叼着香烟、特胖的十几岁男孩。

“什么事儿啊？”他以命令的口吻说。

“我来找古特瑞丝夫人。”

“她不住在这儿。”

我一把推开他正想关上的门。

“你他妈的干什么？”

我向他出示了徽章：“FBI。我可以进来吗？”

还有五、六个男孩爬在地板上正在玩影碟游戏，周围都摆着烟，里面谁知道还掺和着什么东西。他们看着我，然后眼睛就不知道瞟在哪里，用西班牙语互相开着玩笑。我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仍然离门口很近。

“住在这儿的那个女人在哪儿？”

“我告诉过你，小姐。她搬走了。”

“这是谁的公寓？大人们在哪里？”

“这是我的地方。”最小的那个男孩说，他戴一副红色反光太阳镜，继续摆弄着操纵器，“事实上，是我妈妈的。她在上班。住在这儿的那位小姐回萨尔瓦多去了。”

“我需要和你谈谈。”

“可以。”

他起来大摇大摆地朝我走过来，而他的同伙们则吹着口哨，怪叫着，朝他起哄。我不喜欢这座建筑的野蛮气息，而且站在流行乐器和影碟的摩沙发出的刺耳的混乱中我简直就像一个傻子。

“帮个忙好吗，把太阳镜摘掉。”

“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看到你是否坦白。”

麻烦的家伙：“我很坦白。”

他取了眼镜，暴露出来的小家伙大约只有十二岁。

“这非常重要，你准确地告诉我古特瑞丝夫人和孩子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我们住在过道的那边，她和我妈妈很要好。有一天她说她将去萨尔瓦多因为她要把几个孩子带回给他们的父母还是什么——”

“给外祖母。”

“对，外祖母。这样我们就得到这间公寓房，屋里所有的东西值一百元。”

火山画还贴在墙壁上。牌桌也还是原样，不过桌面上现在已成了啤酒瓶的展台。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走了，被抹掉了。

我注意到“EL Nino de Atocha”的层压塑料像在厨房里，正倚靠着黄色的瓷砖墙壁。

“那是她留下的？”

“我想是。”

“你想要它吗？”

他耸耸肩。我取走了那幅画像，还有两截还愿蜡烛。

“把音乐关小点。”

从公寓房出来，要走过两个街区才到黑漆漆空荡荡的停车场，几辆残破的汽车被扔在路边。

拐过圣莫尼卡大街的街角，犯罪现场照片所展示的场景就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大街，有一条蓝色长凳的巴士站，一栋低矮的建筑，窗户全部用砖头填封，那被证实是一间录音工作室。几步远的地方是一条小街——有快餐鸡、比萨饼、干洗店，还有一间很大的“火烈鸟”音乐商店——但现在塞满了各种等着找泊车位的机车。大街上的高峰期车流移动相当缓慢，好像整条街都浸泡在腻滑的黄色车头灯光中。

如果我观察得足够仔细，我就能够发现在长凳上和砖石墙上留下来的子弹坑，但是我不想去做这样的体验。我曾得知维奥莱塔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这里有教众：年轻的皮条客们挤靠在车窗上推销十五美元的生意。这里有神父：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分裂者穿着一件儿童棒球夹克，衣袖刚刚够得着肘部，拖着脚在移走，一面极为精心地数着人行道上的每一块方砖。这里有花窗色玻璃：小药水瓶的碎片在橙色的街灯照射下异彩纷呈。而代替焚香的，我们接受渎神的汽车尾气的赐福。

于是，我把尼罗的画像架在那些填封的窗户中的一个窗台上，并且请求他，湖泊的守护神，净化这个曾经毁坏过生灵的是非之地。我摆好了那两截残烛，纪念维奥莱塔和我的父亲。虽然对于他们的魂灵我将永远不能真正地理解。尽管汽车的喇叭声和嘶叫声嘈杂得像一条飞机跑道，身边的人群也熙来攘往，我只管闭上我的眼睛，静静地站在那里，诚心地向 EL Nino 祈祷，请求他护佑那些不幸的人们。我为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祈祷，希望他们能够找到那片黑沙滩，温暖的海水中盛满了红色的鲷鱼和褐虾；希望他们到达丛林里的家园时，能够发现他们善良的兄长和慈爱的祖母正张开双臂迎接他们。

回家的路上，喉头一直塞得发痛。当我回到公寓时，我发现唐纳多的名片插在门缝里。“给我打电话。”他写着。

我没有打。

六天后，调升“绑架与敲诈组”的申请获得了批准。尽管我早已认识那个组的大多数家伙，但第一天早晨还是有点紧张。我要面对新工作程序、更多的文案、完全不同的进度表，当然还有全新法律条款需要记忆。

我的办公桌被移到了“牛栅”的另一侧，我得跟“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说声“再见”。在新地方还没有给它找到合适的位置，所以我把它留在衣帽架上，并且用原子笔在那些陈旧的临别留言下添上我的建议：“一定要留下备份盘。”

我在 C-1 的第一个案子是一起未遂绑架案，一个心怀不满的雇员把他的文具店店主抓进一家汽车修理厂，勒索赎金。他溜走之后跑到一个邻居家，邻居打电话通知了警察。嫌疑犯现在已被拘禁。作为这个新等级里的下层人，我的任务是去找这位邻居——他已经被访问过两次了——确认他的陈述里的某些事实。

劫持发生在第六街，离圣莫尼卡大街的直线距离最短，所以我又一次经过了那个街角。

我的所见使我改变了方向，驶离了行进大军的行列，把车停在了巴士站

的中间。

就是这个车站，维奥莱塔乘坐着同一辆公共汽车到西洛杉矶做零工，那天晚上也是从那车上下来，4路。

也许这一路她还在编织，也许她打了一个盹儿——沿途经过了麦克唐纳，花冠书屋，路氏快餐店，深红色的福摩萨咖啡屋，古勒斯的猫咪剧院，费厄法克斯区的犹太烤饼店——但是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总是在同一地点上4路车，也总是在同一地点下4路车，从未改变过路程。她不是疯狂争夺的一个部分。她知道她是谁。她已经来到了美国，这就是她的旅程，而它竟然就在这里终结，在一个死亡之路的十字街口，在一帮贼眉鼠目的渣滓的包围中——不适应环境的人、夜无归宿的人、被遗忘的人、让人熟视无睹的人、不健全的人、被剥夺权利的人，受到伤害却得不到帮助的人——在黎明前最寒冷的那个小时里。

我了解了那天夜里的那个时刻，了解了那个十字路口。我相信我已花了大部分的生命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周围笼罩着鬼魂，死尸般的冰冷。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维奥莱塔赋予了希望以单纯的魅力，从她降生在丛林里的一个蒲席上的那一天，这个观念就给了她，这是她的天赋权力，就像太阳光每天落在竹叶上一样没有什么深奥的理由，而现在，在一次如此平凡、短暂的事件的光照之下，那个天赋明明白白地展示在我面前。

我下了车，穿过人行道，走得极慢，为我的醒悟感到惊讶。熙攘的人群消失了，或者至少暂时有更多人此刻正忙于他们的生意，尽管有零星的过客。走得更近一点我才看到，我在路那边的隐约感觉是对的：“EL Nino de Atocha”的画像依然摆放在那里，不仅如此，窗台上堆放更多令人吃惊的东西。人们在这里留下了花，玩具车，蜡烛，和硬币。《圣经》也在，没有动过。没有人会从尼罗身边偷东西。

在凸出的窗台掩蔽的正下方地面上，增加了些别的蜡烛：有我曾经在《勃塔尼卡》中见过的和精灵的画片印在一起的幸运蜡烛；有圣诞节留下来的粗壮的红绿蜡烛；也有杂乱收集起来的，搁放在果汁包装纸盒里或者固定在包着铝箔的扭曲的贴板上的，烧过一半的细枝蜡烛。全部燃着。有人来点燃它们。这时候，我第一次能够感觉到，在我的内心，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在一起的，然后，又一起从这微弱的烛光中升起，上升。

我不知道在我返回汽车，拾起无线电话之前，我究竟在那儿站了多久。

“我是345。你能和587联系上吗？”

敏捷地：“是的，没问题。”

我说出了我的位置：“你能让他立即赶到吗？”

“是紧急情况？”

“不是紧急情况。只是一个奇迹。”

我倚靠着政府公车，直到十分钟以后唐纳多赶来，警灯闪烁，车身横着骤停，巴士站被堵塞了。

他摔开车门，带着一脸的焦急朝我奔跑过来。就在那个新手乔·波西塔鲁，和每一个人面前，我向他伸出了手。

